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邓小平与香港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他的名字在中华大地广为传颂。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七十多个春秋，绘制了一幅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他忠贞不渝追求真理的革命夙范，坚毅果敢、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高瞻远瞩的超群智慧，无私无畏的优秀品格，都令人赞叹不已。他的名字历史地同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中国的改革开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香港—1997”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84 年 12 月 19 日是一个永垂史册的日子。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1985 年 5 月 27 日，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换文生效，香港进入了回归祖国的 12 年过渡时期。香港，这颗堆糜的东方明珠，终于踏上了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归程。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首都北京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东侧，悄然而醒目地竖起了一块倒计时钟，记载着香港回归的准确时刻。南来北往的人们到此都不禁止步凝望，心中涌起一股股热浪。在距离香港回归祖国两周年之际一 1995 年 7 月 1 日，罗湖桥头也矗立起一座倒计时钟，上面的时间清楚地显示：距 1997 年 7 月 1 日还有 730 天。从此，天安门广场和罗湖桥头共同闪动跳跃着同一个时间，内地 12 亿人民和香港 600 多万同胞共同期待着同一个时刻。

想到那一天，人们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香港虽小——

它只有 1092 平方公里，在世界地图上只不过是中国海岸线南端的一个“点”，但是，它牵动着 12 亿同胞的心，与伟大祖国荣辱与共。150 多年前，英国殖民主义者用杀人不见血的鸦片，敲开了中国的大门；用坚船利炮强割强租了香港。从此，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人民在沉沉黑夜中熬过了一个世纪的漫漫岁月，终于有了“收复香港”的希望。但是，蒋介石推行软弱外交和实行反共优先的政策，一再失去良机，使希望成为泡影。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从整个国际战略考虑，作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决策，从而稳定了香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提出了加强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提出了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他的思想指引下，香港即将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中华儿女无不为之精神振奋，扬眉吐气！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首先在香港问题上得到实践，这不仅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范例。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是非常伟大的决策。香港问题的解决为“一国两制”率先垂范，将使祖国统一大业展现非常美好的、广阔的前景。

《邓小平与香港》一书描述了香港从割让到回归的风雨历程。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一历史轨迹的追踪，更好地认识邓小平这位伟人，更深刻地体会“一国两制”的真谛，更清楚地了解香港苍凉而悲壮的过去，展现其繁华和雪洗耻辱的现在，迎接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

谨以此书献给香港回归祖国之日，以表达我们对邓小平的崇敬之情，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喜悦与自豪！

编者　1996 年 12 月

邓小平与香港

第一编　夜沉沉路漫漫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毛泽东

小河弯弯向南流，
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
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船儿弯弯入海港，
回头望望灯火闪亮，
东方之珠整夜未眠，
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

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
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
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
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一曲响遍伸州大地的“东方之珠”，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既唱出了中华民族对脱离祖国母体长达 150 年之久的“游子”的深切思念，也道出了香港同胞渴望早日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无限眷恋之情。 1997 年 7 月 1 日，这是全世界炎黄子孙翘首以待的日子，届时，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欢声雷动，彩旗飞舞，惊天地，泣鬼神，香港将回归祖国。

说香港小，是因为它只有 1076 平方公里（据最新资料统计，现已为 1092 平方公里），仅仅是祖国领土的八千九百分之一，在世界地图上只不过是中国海岸线南端的一个“点”；说香港大，是因为它牵动着 12 亿同胞的心，与伟大祖国荣辱与共，它艰辛坎坷的历程正是中华民族逐步摆脱屈辱走向繁荣兴旺的缩影。

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用手与手的相牵，泪与泪的交融，共同翻开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新的一篇。

第一章　岁月悠悠话香港

美丽的名称动人的传说

我们现在提及的香港，指的是香港地区。它座落在中国大陆南端珠江口的东侧，位于北纬线 22 度 9 分至 23 度 37 分和东经 113 度 52 分至 114 度 30 分之间。北与深圳相连，西隔珠江口，与珠海、澳门相望，东南两边都是一望无垠的大海。包括香港岛、九龙，“ 新界 ”三个地区和周围 235 个大小岛屿。

香港岛及周围岛屿的面积总计 79． 77 平方公里，是香港的商业活动中心和行政官署所在地，香港岛从形状上看，西边小，东边大，呈不规则三角形，酷似一只即将腾空而起的青蛙。全岛地势自北向南倾斜，在北边的维多利亚港沿岸，有一条狭长的低平地带，是香港的闹市区和几条繁华的街道，如上环、中环、湾仔、北角。港岛北岸与九龙半岛遥遥相对，中间是著名的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港面积大约 6000 公顷，可同时停泊 150 只巨轮，港内有九龙港、红勘湾和爱秩序湾三个大海湾，还有两个避风港——九龙油麻地和港岛铜锣湾，再加上由于九龙半岛自然延伸入海部分形成的天然屏障，港内风平浪静，与美国的旧金山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齐名，并称为世界三大优良天然深水港。紧靠这一地带的南边，便是全岛最高的山峰——太平山。站在山顶向下瞪望，港九景色尽收眼底，尤其是到了夜晚，整个香港灯火璀璨，万紫千红，与维多利亚港的海水相映成辉，更显得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令人流连忘返。

九龙是指界限街以南部分，连同西面的小岛昂船州，共 11.7 平方公里。这里是香港连结世界的重要枢纽，有闻名于世的启德国际机场和广九铁路的起点站红勘火车站。尖沙咀、油麻地、旺角等地是香港的又一处工商业中心，酒楼、商场比比皆是，堪称“ 购物天堂 ”。连接香港和九龙的海底隧道、地铁穿梭往返，极其方便。

“ 新界 ”是香港最大的部分，连同周围的 200 多个岛屿总面积达 984.53 平方公里，约占香港总面积的 92%，容纳了香港总人口的 60%以上。“ 新界 ”地域广阔，拥有香港设置的全部新市镇，香港的工厂、水塘、菜地、历史古迹、郊野公园、旅游胜地主要分布在这里。“ 新界 ”还是香港与中国大陆保持陆地交通的必由之路，广九铁路的大部分以及连接内地的四条过境通道罗湖、文锦渡、落马洲、沙头角，还有集装箱码头和香港中文大学也都位于“ 新界 ”境内。

大约在 19 世纪中叶或更早的某个时间，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便开始用“ 香港 ”来称呼这一地区。至于为什么叫香港，则留下了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

一是相传早年在香港岛东南部的石排湾，也就是现在香港公园处，有一条全岛最大的溪涧，直流入海，老百姓称之为龙水。其水清例甘甜，沁人心肺，岛上居民和过往船只上的人常在此汲水饮用，并誉于这条小溪“ 香江 ”的美称，小溪入海之处称为“ 香港 ”。久而久之，人们将这个岛也叫做香港。

二是相传香港是由岛上的红香炉山而得名。据说在很久以前，有一只红香炉从海外漂来，停泊在海边的天后庙前，当地村民视之为圣物，将它抬至庙中，并称庙后山峰为红香炉山，庙前海港为红香炉港。随后简化为“ 香港 ”，

并成了全岛的名称。

三是相传在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伙由一林姓男子和其妻香姑带领的海盗，长年横行在珠江口外伶仃洋（亦称零丁洋）附近，袭击来往过路商船，清政府很是头痛，最后下定决心剿之，派出清将李长庚前往作战，终将海盗群击溃。林某逃往台湾，香姑率余部占据了今天的香港岛顽强抵抗，这个岛便因香姑得名。

最后一种说法似乎更有道理，据说香港的地名来自于它的特产。相传古代香港及广东东莞、宝安、深圳一带盛产一种叫“莞香”的香料，此香因气味奇特，颇受人们的喜爱，远销江浙，誉满全国。当时贩香的商人们一般都是在港北的石排湾将莞香装船运往广州或江浙一带，所以人们将这个港口称为“香港”，意为贩香运香之港。并将港口旁边的村庄，叫做香港村。传说1841年英国侵略者在港岛南部赤柱登陆后，由一名叫陈群的当地居民带路向北走，经过香港村时，英军询问该处的地名，陈群用当地的方言回答道“香港”，英国人即以“HONG KONG”录之，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时，便用此名称呼该岛。后又割让和租借九龙、“新界”，香港又成为整个地区的称谓。

中华民族的一片热土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大约在一万年以前，香港与九龙是一片相连的陆地，属于大陆山脉向海洋的延伸部分，后来由于山体下沉，桑田变幻，使之与大陆分离，形成了今天的维多利亚海峡。根据本世纪70年代香港修建地铁时，对海底挖掘的泥土样品进行的放射性碳—14测定，断定在公元前6000年时，香港的海平面低于现在大约11米，令人不能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香港蕴藏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约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2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200年）和青铜器时代（约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400年）的文化，共有遗址60余处，几乎遍布于香港岛、九龙半岛和离岛的各处。据香港大学博士丁新豹的研究，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经过琢磨的石器、绳纹和几何纹的夹砂陶器、彩陶器以及各种青铜器，说明香港地区的古代文化与长江以南文化同属一个系统。

据说在商代，珠江流域居住着一个奇异的部族，这个部族最早的首领叫公师隅。他率领族人一路南迁，到达今天广州越秀山下的海滨地区，修筑了一座南武城，开始在这一带定居。后来，有5位仙人从南海来到南武城，教民种稻，这个部族的人口日益繁衍增多，分出许多更小的部族，被称为“百越”。他们以航海捕鱼为生，创造着一种土著海洋文化，成为香港早期文明的拓荒者。本世纪70年代，香港报界曾发表了一则引人瞩目的新闻：在港岛大庙湾地区发现了刻在岩石上的古代“海盗”地图。这些所谓的海盗地图，符号怪异，年代久远，形状奇特，线条粗犷，并配以鸟兽的图案。经专家鉴定，这并不是什么海盗地图，而是百越人留下的图腾。在百越人崇拜的图腾中，有一种叫作“灌兜”或“灌头”的怪鸟，据上古奇书《山海经》的《海外南经》中记载，南方有一灌头国，“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一曰在毕方东，或曰灌东国。”这种长着人面，生有双翅，鸟嘴，以食鱼为生的神物便是百越人的图腾。在香港发现的先秦岩画中，往往以装饰华丽的

巨鸟为主体内容，鸟为风神，在广阔无垠的海洋上它是雄健、光明的象征，所以成为百越人崇拜的对象。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挥兵直指岭南，公元前 214 年，将这里统一于中央王朝的版图，并在此新设三郡，即象郡、闽中郡和南海郡。其中南海郡地跨今粤东、粤中以及粤北的大部分，下辖番禺、博罗、四会和龙川四县。香港地区便属番禺管辖。秦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龙川县令赵佗也乘机占据广东，自封为南粤王，建都番禺。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因为岭南太远，鞭长莫及，对赵佗采取了安抚政策，封为南越王。刘邦死后，赵忙又闹独立，朝廷多次征剿无功，只好派人再去赏赐慰勉，赵佗才除去帝号，臣服于汉室。其后，赵佗死，部下吕嘉杀了汉朝派来的使节，宣布第三次独立。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讨伐南越，吕嘉抵挡不住，逃往国外。汉朝灭了南越后，在这里设置了南海、合浦、交趾等九个郡。香港地区划归南海郡博罗县管辖。

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将南海郡东部划出，另设了一个东莞郡，下辖宝安、兴宁、海丰等 6 个县。宝安县的辖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区和深圳市、东莞市，县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头城。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仍沿东晋旧制，到隋朝又废东莞郡，将辖地并入广州府南海郡，宝安县也改为隶属南海郡，香港则仍归宝安县管辖。

唐初沿隋制，唐肃宗至德二年，改宝安县为东莞县，香港又归东莞县管辖。

明神宗万历年间，广东巡海道副使刘稳，以南头、深圳、香港等地离东莞县城太远，管理困难为由，奏准朝廷，将东莞县滨海地区划出另设一县，名为新安县。自此，香港地区改归新安县管辖，直到清朝道光二十一年。

香港地区的地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的要算《新唐书》中记载的“屯门”了。今天香港“新界”的青山，过去称为屯门山，意思是设有屯田防卫之兵的海门。屯门山东面的海湾，称为屯门湾，屯门湾三面环山，是个天然避风港。在轮船发明以前，无论对内的沿海交通，还是对外的远洋交通，都以帆船为主，船期受季风影响较大。由于屯门湾优良的地理条件，加上又紧扼珠江口外交通要塞，所以古时波斯、阿拉伯、印度、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等地的使节和商人，从海路到中国来，多数都会乘夏季西南风之便，向东北航行，抵达中国后，不能直接进入广州，都要先在屯门等候传召。下南洋的中国商船，或返航的外国船，一般也要先停泊在屯门，待冬天东北风起后，才扬帆启程。因此，屯门自然成了海上要冲之地。

有文字记载的屯门对外交通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据《新安县志》记载，在南朝刘宋期间，印度高僧杯渡曾来中国旅游，在刘宋的都城尽显其神通，然后在归国途中到交趾和广东一带云游，并在屯门湾背后的屯门山上小住，因此屯门山又被称为杯渡山。

到了唐朝，屯门在对外交通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唐王朝为此设置了屯门镇。增设海防，驻有官吏和军士负责管理与保卫，从唐朝大诗人韩愈的诗词《赠别元十八协律诗》中，即可感受到屯门在当时已是广为人知的华南海上要塞。

峡山逢飓风雷电助撞摔。
乘潮簸扶胥，近安指一发。
两岸虽云牢，木石瓦飞发。

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

五代十国时，南汉朝廷在屯门设置了海关，对从各国来华的商船抽收关税。由于往来商船很多，屯门关税成了南汉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宋代曾在大奚山（即今大屿山）设置摧锋军驻守。在屯门设有巡检司，负责防止海盗入侵和拱卫广州地区。至明清两代，中国与外国的交通往来更加发展，屯门的地位也进一步重要。据明代有关海防的文献记载，1540 年广东全省的海防共分三路，香港地区属于中路，主要目标是防御倭寇的袭击。如顾炎武所说：“ 中路自东莞南头城出佛堂门、十字门（在澳门港口外）、冷水角诸海澳。 ”[①]整个防御系统的构成依照海岸地形，估计倭寇在从福建到广州的航程中必然要经过某些战略港口、港湾和岛屿。从阴历三四月起，东南风正盛，若倭寇于此时扬帆从福建海岸直趋粤海，第一个理想的停泊点极可能是柘林，所以柘林周边海域被确定为防御系统中的东路。如果倭寇被堵，无法从柘林登岸，则必然会驶向东莞县海疆，在屯门、鸡栖、佛堂门、冷水角、老万山、虎门山一带水面游弋；特别是南头，可能被作为停泊和藏匿的地点。所有上述港湾和岛屿周围的水域合起来就是防御系统的中路。因此，东莞、大鹏两个千户所的驻军负责经常在陆上和这些水域内进行巡视。尤其是明朝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海外扩张，屯门在海防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成了扼守珠江口的军事要塞。

古代中原人民迁居今香港地区的经过，宋代以前已无法考证。由于香港地区盛产海盐、莞香和珍珠，自北宋起因中原战乱，越来越多的中原人民迁居香港地区。现今“ 新界 ”的五大姓：锦田邓族、新田文族、上水廖族、河上乡侯族及粉岭彭族，都是在宋、元时期先后迁徙至“ 新界 ”开村立业的。

苍茫史海留传奇

在香港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曾发生过许多震撼人心、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如今，那仁立在香港界内随处可见的历史遗迹，正在用无声的语言向人们娓娓讲述着那些早已逝去的往事。在这浩如烟海的史实中，最悲壮的一幕莫过于南宋末代皇帝在这里的遭遇了。

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宋恭宗德佑二年，京师临安被元军攻破，谢太后携恭宗皇帝投降。丞相陈宜中、礼部侍郎陆秀夫、总督都府诸军大将军张世杰等率领数十万不愿作亡国奴的军民，护卫度宗皇帝之子、恭宗皇帝之弟赵昰、赵昺出走温州，乘船从海路逃到了福州。

在福州安顿下来后，陈宜中、陆秀夫等大臣聚在一起议事，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既然宋恭宗已被元军掳去，只有尽快另立新君，才能号令天下，光复大宋。于是众臣拥立年仅 9 岁的赵昰为帝，改年号为景炎，史称宋端宗。由于新皇帝年幼无知，所以朝廷大权实际掌握在陈宜中、陆秀夫等人的手中。不久，从元军中逃出的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也辗转赶到福州，组织军队继续抗敌。

元军得知陈宜中等重建朝廷后，立即派精锐部队追踪而来。赵昰在福州龙椅尚未坐热，就又被迫逃亡，从泉州经厦门逃到广东惠州。景炎二年初，进入香港地区的梅蔚，也就是今天的大屿山梅窝村。4 月，又转移到九龙城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97，第 9 页。

以南的官富场。官富场是当时著名的盐场，经济基础较好，还有一部分军队驻守。张世杰等人的甲意在于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站稳脚跟，并建立反攻的根据地。6 月，张世杰陪赵昰东巡古塔，即今天香港南佛堂东龙岛。9 月，又转到浅湾，也就是现在“ 新界 ”基湾一带。不久，元军袭击浅湾，赵昰只得退往东莞虎门。后又转移到井澳。

景炎三年，文天祥收复惠州，宋将王道夫又攻克广州。一时间小朝廷人心大振，以为复国有望，赵昰便回到距离广州较近的大屿山。但好景不长，元军很快又反扑过来。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赵昰体质极差，受此惊吓后便一病不起，不久就病死在大屿山。

赵昰死后，丞相陈宜中见大事已不可为，就带了一些军士逃往现在的越南中部，其他人也信心动摇，准备散去。在这紧急关头，陆秀夫仗剑挺身而出，慷慨陈词道：“ 度宗皇帝尚有一子，可以继承大统。现在百官俱在，有精兵数万，未必不能兴国。况且文丞相还在潮惠一带招集兵马，抗击元军，我们若就这样散去，也有负文丞相的一片忠心。 ”

在陆秀夫的激励下，群臣又振作起来，拥立年仅 8 岁的赵昰继位，改年号为祥兴，并迁居到崖山。在那里修建皇宫和军营，企图以此为根据地，重整山河，以图复兴。

祥兴元年 12 月，元军大臣张弘范率精兵数十万，海陆并进，向宋军发动了猛烈进攻，文天祥以仓促招集之军，殊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在广东海丰五岭坡被元军俘获。消灭了文天祥的部队后，张弘范又一鼓作气扑向崖山。祥兴二年 2 月，张世杰指挥宋军与元军在海上进行决战。元军士兵慓悍凶猛，骁勇善战，宋军虽缺衣少食，疲惫不堪，但人人抱定必死之心，奋力拼杀，也给元军以重创。最后，元军趁涨潮之际南北夹攻，终于突破宋军战阵。张世杰率 10 余艘船只突围出来，退至螺岛时遇台风溺水而死。

一直护卫在赵■左右的陆秀夫，见败局已定，再也无力回天，就让妻儿投海自尽，然后对赵■说：“ 德佑皇帝被鞑子兵捉去受尽了屈辱，陛下不可再受俘虏之辱了。 ”说完，背起 9 岁的小皇帝赵昰蹈海殉国。南宋小朝廷的悲剧，终于在这里降下了帷幕。

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宁死不降，显示了一代爱国将领的高尚情操。在押往北方途中经过香港附近的零丁洋时，他留下了千古绝唱《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由于这段不寻常的历史经历，香港留有不少宋王的遗址和传说，在九龙城寨以南，启德机场以西的圣山上，就有一个“ 宋王台公园 ”，供南来北往的游人过客凭吊和参观。

在“ 新界 ”的锦田还有一处遗址，叫作“ 周王二公书院 ”，在上水的石湖墟还有一处“ 王巡抚祠 ”，记述的都是同一个动人的故事。据说在清朝初年，满汉矛盾十分尖锐，民间反清复明的斗争也连绵不断。明将郑成功占据台湾，经常袭击清军，使朝廷十分头疼。为了禁止沿海居民接济郑成功，清朝政府在顺治十三年发布了一个“ 禁海令 ”，不许沿海商人和渔民的各种船只出海，也禁止外国商船来华贸易。顺治十八年，清政府又颁布了“ 迁界令 ”，将广东沿海包括新安、东莞、新会、香山、海丰等 24 州县的居民。一律内迁

80 里。今天香港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都在迁界范围之内。迁界和实施海禁 20 多年，使这一带土地荒芜，房屋倒塌，经济萧条，人口锐减。给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遭到百姓的一致反对。当时的两广总督周有德和广东巡抚王来任等地方官员多次给朝廷奏本，请求复界。清朝政府经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在康熙八年同意部分地区复界，香港居民才得以陆续回迁。同时，福建、江西和广东潮州、惠州等地的贫苦百姓也纷纷迁人，香港的客籍居民人数大大增加，生产得以迅速恢复。香港地区的居民为感谢周有德和王来任二位大人为民请愿，使他们得以安居乐业，特地集资修建了以上两个建筑物以示敬意，并告诫子孙后代永世不忘。

这两处遗迹也是香港人民历史功绩的证明，它说明香港地区的居民是多么珍惜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土地，决不让它轻易地失去。

香港有天然的深水港口，地处航运要道，过去曾是海盗频繁出没的地方。根据史书记载，早在南宋宁宗庆元三年，即公元 1197 年，香港一带的海域便有海盗活动，劫船事件时有发生。及至明代，海盗活动更加猖獗，最著名的当数张保仔。

张保仔率领的海盗以珠江口的岛屿作为根据地，活动范围波及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他们聚众数千人，拥有船只几百艘，势力相当庞大。香港岛的太平山及邻近的大屿山、长州等地，都曾是他们的巢穴。当年海盗们在西盘营歌赋山上所构筑的壕沟工事，至今仍清晰可辨。那些壕沟建造得十分坚固，两侧用青砖与石块砌成，深及腰腹间，可供人俯身躲避来自海上军舰炮火的袭击；在全岛的最高处太平山顶，修建有瞭望台，监视来往的船舶。对于取道香港的商船，一律强行收取“过路费”，即买路钱，如遇抵抗，便杀人越货，毫不留情。致使往返香港海域的船只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张保仔原是新会的一个渔家子弟，15 岁时便入伙参加以郑一为首的海盗队伍。他作战英勇，办事干练，深得郑一的赏识，并被提拔为小头目。后来，郑一在一次台风中意外身亡，海盗们便拥立郑一的妻子为首。其后，由于郑妻与张保仔产生了恋情，便将这支队伍交与张保仔统领。官军曾多次派兵清剿，甚至联合葡萄牙舰队一起围剿，都无法灭之。最后只得采取招安的方式，许以三品官职，引诱张保仔放下屠刀。经一澳门中医周熊飞在两广总督百龄和张保仔之间的斡旋，经双方商定，于嘉庆十五年 2 月在现在的中山县县城石歧镇招降。

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迹，张保仔投降官府后，还发表了一份悔过书，决心放下屠刀，改邪归正。他积极配合官府，擒拿了不少海盗，使两广一带海域的治安状况大为好转，并因此加官进爵，升至闽安协副将，成为二品大员。

关于张保仔的传说在香港流传甚广，历史遗迹也多处可见，又为香港文化增添了一枝奇葩。

第二章　米字旗下的炮舰政策

接踵而至的“海盗”

13 世纪出身于威尼斯商人家庭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览中国，足至今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山东、云南、江苏、浙江及北京等省市，回国后将其在东方的奇异经历和丰富见闻录之，这就是一度风靡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在书中，他描述了远东古国——中国的神奇和富庶，展现了东方文明的无限魅力。到了 15 世纪，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怀着向东方探险和扩张的强烈欲望，为了发现和占有这块“人间天堂”，开始出海远航，踏上了寻找通往东方新航线的漫漫之路。

最早由海路到达中国的是葡萄牙人。　1514 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海峡后，便以此为据点向中国扩展。1521 年，葡萄牙人的船只第一次强行驶入香港，在屯门登陆。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如同他们以往在其他任何被占领地所作的一样，葡人立即安营扎寨，并在屯门立下了一块刻有葡萄牙国徽的石碑，企图将这块土地据为己有。这一举动激怒了明朝政府和广州水师，在广州水师海道副宏的指挥下，中国官兵奋起抵御，用仿制葡人的大炮开火，将不速之客赶了出去。1553 年，葡萄牙人再次来到了中国海域，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们变换了方式，以要晾晒被海水渍泡的“贡品”为名，通过贿赂明朝地方官员，以每年 500 两白银的代价，租用澳门一地存放货物。数年后，葡萄牙人又逐渐买通了广东有关官员，获得了在澳门建造房屋的权力，进而在澳门站稳了脚跟。

接踵而至的是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他们在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都企图占领台湾，终因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而未能得逞。

在潮水般涌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中，野心最大、吞食中国欲望最强烈的是英国人。近代史上的英国，素有海上霸王之称。它凭借着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不断夺取别国岛屿和半岛，如：直布罗陀、马耳他、锡兰、新加坡等，作为自己的军事基地和通商据点，因此，有人形象地将英国比喻为‘海岛和半岛收藏家”。1635 年，英王查理一世授权海军上校约翰·威德尔率领 4 艘武装商船前往中国开展贸易，并指示威德尔：“凡属新发现的土地，若据有该地能为朕带来利益和荣誉，即可代朕加以占领。”[①]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派遣商船来华。威德尔的船队首先抵达澳门，受到了葡萄牙人的冷遇，甚至不允许英船入港，船队只得直接向珠江口外驶来。1637 年 8 月，威德尔的船队驶入中国珠江，守卫在虎门炮台的明军将士一再阻拦，英国舰队仍不减速，双方开始交火。由于中国海岸炮台年久失修，装备落后，不久便被英军攻下，英船直驶广州。8 月底，英船在售出所携带货物后，满载糖、瓷器等货物返航。这是中英之间第一次直接贸易，虽然交易量不大，但使英国人了解和认识了中国，他们认定与中国发展贸易大有可为，并开始在中国沿海寻找一处可以居住和落脚的岛屿。

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对华贸易已有了很大增长，英国人更加急于在华寻求一块居住地，认为这是进一步发展对华贸易的关键所在。1787 年，英国政府派遣卡思卡特中校出使中国，其主要使命就是向清朝政府要求割让一块土

[①]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1 卷，第 16 页，1926 年牛津出版。

地，作为英国的通商据点。一直觊觎中国市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慷慨解囊，承担了卡思卡特此行的全部费用，这是英国第一次准备向中国提出割地要求。临行前，英国国务大臣西德尼勋爵于 11 月 30 日正式向卡思卡特发出训令，明确表示，英国对广州的通商条件深感不满，“ 我们希望在比广州更方便的地方获得一小片土地，或应该与大陆分开的岛屿 ”，作为英国的商业基地；如果中国同意割让，卡思卡特便可以以国王的名义予以接受，同时要设法获得“ 最有利的条件 ”；英国应在该地享有设警权，并按照英国法律对英国臣民行使裁判权；要十分慎重地确定居留地的地点，既便于英船安全，又便于出售运去的英国货，还要靠近上等茶叶的产区，位置应在北纬 27—30 度之间。这一训令，再次清楚地表明英国政府企图经过外交谈判割占中国东部岛屿的侵略意图。由于卡思卡特在出使途中因病去世，致使这一使命中途夭折。然而，英国始终没有放弃这一目标，又在寻找新的机会敲开中国的大门。

1793 年，以祝贺中国乾隆皇帝 83 寿辰为名，英王派出了马嘎尔尼勋爵为首的外交使团，经漫长艰苦的航行，到达了中国天津的大沽港。9 月 14 日，乾隆皇帝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接见了马嘎尔尼一行，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庆典完毕，马嘎尔尼根据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指令，向清政府发出照会，提出了中国开放舟山、宁波和天津为通商口岸；在北京设立商行，买卖货物；在广州附近割让一块不设防的地方给英国等要求。英国人的狂妄自大深深激怒了乾隆皇帝，他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在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函中严正指出：“ 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 ”“ 尔使臣称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 ”，“ 此事尤不便准行 ”。[①]

1816 年，英国政府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又向中国派出了以印度总督阿美士德为首的外交使团。临行前，东印度公司的“ 机密商务委员会 ”专门致信阿美士德，就使团的任务提出了详尽的指示性意见，其中明确地提到了夺占岛屿问题。信中写道：“ 如果中国粗暴地把我们拒于对华贸易之外……那他们就不必指望我们会继续采取被动的态度。他们必须明白，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占领中国东部有价值的岛屿、特别是台湾和琉球更容易的事了。这将使我们截断他们与亚洲诸国之间的全部海上贸易，并给北京一带造成恐怖。 ”这些凶恶的语言使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1816 年 2 月，使团从英国出发，同年 8 月 29 日到达北京。清政府立即安排接见，不料却在觐见皇帝的礼节上发生了纠纷。清政府认为英国人是来朝贡的，因此必须向皇帝三叩九拜行君臣之礼，而英国使节却拒绝向中国皇帝下跪，并坚持改期拜见。嘉庆皇帝龙颜大怒，不仅决定不再接见英国使节，而且下了一道逐客令，将英国使团驱逐回国。同年 11 月，在返程中的阿美士德又乘“ 阿尔塞斯 ”号军舰来到广州，强行进入珠江，炮击虎门要塞，用大炮的语言结束了他的这次中国之行。英国使团无功而归，但却

目睹了一个具有 4 亿人口的大市场，他们是决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

从阿美士德来华开始，英国人便把目光集中到香港这块风水宝地。阿美士德回国后致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 将来贸易展开，如果不便与祖国联系，那么在中国口岸设立贸易中心，以脱离中国的管制，这是很必要的。很

[①]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第 1 卷，第 59 页，1953 年美国出版。

多年以来，香港是轮船停泊的良港。”“英国的船长时常到这里来，所以对这一港口相当熟悉。”[①]

第一个主张用武力侵占香港的英国官员是 1833 年被英王任命为驻华商务监督的律劳卑。他在 1834 年 8 月 21 日致外交大臣格雷的信中，要求派几艘军舰来华，“占领珠江东部入口处的香港，它令人赞叹地适用于各种用途”。[②]律劳卑的继任者罗宾逊更加狂妄，在 1836 年 1 月致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函中，他直言不讳地说：“摧毁一两座炮台，并占领附近的一个天然的极适合各种商业目的的岛屿，可能产生我们希望收到的效果。”建议将全体在华的英商都转移到“大屿岛或香港附近的一些美丽的海港去”，[①]在那里建立商业据点。配合英国官方的意图，在华英商的报纸《广东记录报》也发表文章，极力鼓吹占领香港，叫嚷“如果狮子（指英国）的脚爪准备攫取中国南方的一块土地，那就选择香港吧。只要狮子宣布保证香港为自由港，它在十年内就会成为好望角以东最大的商业中心。”[②]侵略者的贪欲是不可遏制的，香港沦落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了。

罪恶肮脏的鸦片贸易

割让香港的历史悲剧，是由一宗罪恶的商品贸易开始的。

19 世纪初期的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的后期，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迫使它四处扩张，寻找海外市场和建立殖民地。在长达百年之久的对华贸易中，英国发现自己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这主要由于他们对中国市场了解甚少。据说早期经营对华贸易的一个英国商人在发现了这个拥有 4 亿人口的大国后，曾惊叹道，如果中国人一人买一顶睡帽，就足以使英国的纺织工厂忙乎几年了。殊不知中国人祖祖辈辈就没有戴帽睡觉的习惯。同时，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也具有一种天生的抵抗力，中国并不需要来自西方的生活奢侈品，而中国出口的丝织品和茶叶却成为西方上流社会不可缺少的点缀物。

尤其是茶叶，这个从中国进口的最大宗商品，不仅成为英国人生活之必须，而且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重要财源，英国政府也通过征税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为了维持茶叶和丝织品的进口，英国政府每年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来弥补对华贸易逆差，这显然有悖于英国发展对华贸易的初衷。特别是在 1825 年英国国内爆发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后，英国资产阶级非常焦急，急于改善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尽快摆脱经济困境。他们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寻找一种一本万利且可连续供应的特殊商品，最后，他们选定了鸦片。

鸦片，俗称大烟，是一种用罂粟的汁液提炼而成的麻醉毒品。它最早产于南欧及小亚细亚，后来传入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等地。明朝中叶，荷兰人把鸦片带入台湾，又从台湾传入大陆沿海各省。起初，鸦片是作为药品征税进口的，后来有人抱它当毒品吸食。最要紧的是一旦吸上瘾，便极难控制。天长日久，吸食者就会骨瘦如柴，精神萎靡，面色灰黄，如同废人一般。

[①] 贺弘景：《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第 43 页，1994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②] 《英国议会文书：1840 年有关对华鸦片战争文件》第 265—266 页。

[①] 《罗宾逊致巴麦尊函》，1835 年 4 月 13 日，英国外交档案，F.O.17/9。

[②] 《时代》周刊，1982 年 10 月 11 日。

由于鸦片的毒性极大，英国国内对之是严加控制的。英国的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了曾在有关鸦片贸易的报告中说：“ 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为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容许流行的。明智的政府都应该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耗。 ”[①]对于敢于违背政府命令，偷食鸦片者，英国人的处罚是相当严厉的。据鸦片战争前两年（即 1838 年）任清朝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本《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中记载：“ 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系其人竿上，以炮击之入海，故红毛人无敢食者。今入中国之鸦片，来自英吉利等国，其国法有食鸦片者死。故该国只有造烟之人，无一食烟之人。 ”[②]另外，鸦片战争时主张向西方学习新思潮的倡导者之一，道光进士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一文中也说：“ 此烟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其国人食之，有犯者以炮击沉海中。而专诱他国，以耗其财，弱其人。 ”[①]如此严厉的刑法，在英国当然没有人敢以身试法了。

然而，他们在中国却肆无忌惮地推销鸦片。一些鸦片贩子极力散布“ 鸦片无害论 ”，胡说什么“ 鸦片无害于中国人，就像酒无害于美国人一样。 ”澳门的报纸上也刊载文章，宣称“ 土耳其之人，食鸦片甚多，人人皆勇壮。在英吉利国之人，食鸦者亦多，并未见变成禽兽。 ”还说英国有一吸食鸦片的人，“ 一生壮健，寿至八十岁 ”。[②]英国明令禁止本国人吸食鸦片，却在中国大肆兜售，宣扬吸烟的“ 好处 ”，用心何其歹毒！

鸦片贸易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惊人的利润。尤其是 1793 年后，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制造鸦片的特权，他们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印度农民种植罂粟，低价收购，加工制成鸦片后由专卖局高价拍卖给鸦片贩子，让他们走私到中国。通常的走私办法是：先将鸦片从印度等地运来，卸进趸船，再由本地烟贩交钱提货，用叫作“ 快蟹 ”的小船偷运到珠江三角洲各地出售。现在的维多利亚港，当年被称作尖沙咀洋面，便是鸦片走私船只频繁出没的地方。鸦片卸下后，英国人再将船只驶入广州黄埔，公开出售其他商品。这样既可以躲避清朝海关的查禁，又可以不纳关税。然后，再用贩卖鸦片和商品所得到的白银换取大量的中国茶叶和丝织品，运往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高价出售。这样就形成了棉纺织品——鸦片——茶和丝的三角贸易，而在这三个环节中，鸦片贸易是最为关键的，它是资本原始积累和尽快繁殖的重要手段。

19 世纪 30 年代，鸦片走私现象更为严重，已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公害。据统计， 1820—1821 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为 4244 箱，此后每年都有增加，但整个 20 年代平均每年输入鸦片不到 1 万箱。 30 年代情况则大不一样了， 1830 至 1831 仅一年便猛增到 18 956 箱，此后继续直线上升，自 1835 年竟每年超过 3 万箱，比 20 年代增长数倍。如此猖撅的毒品走私，造成了烟毒泛滥全国的局面，残害了千千万万吸食者，导致国家白银大量外流，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 1800—1840 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在 42 万箱左右，从中国掠走的白银至少在 3 亿元以上！

鸦片给国计民生带来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早在清朝雍正年问，朝廷就颁布法令，严禁毒品走私，但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就在于鸦片

[①] 贺弘景：《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第 45 页，1994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②] 《北京青年报》1996 年 2 月 26 日第 7 版。

[①] 《北京青年报》1996 年 2 月 26 日第 7 版。

[②] 徐立亭等：《中华五千年》第 319 页，1982 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贸易使鸦片贩子牟取了意想不到的暴利，从而使他们敢于挺而走险。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威廉·查顿在给朋友的信中难以抑制极度兴奋的心情，曾无耻地夸耀：在最好的年头，每箱鸦片的利润可高达 1000 银元，“ 这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 ”。这个 19 世纪初在苏格兰岛上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医生的查顿，1828 年就与他人合作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贸易公司，从此一跃成为英国著名的大资本家。 1841 年，他竟当上了英国国会议员！他的巨额财富和显赫地位都建立在罪恶累累的鸦片贸易之上。

随着鸦片走私贸易的日益扩大，英国人越来越迫切地感到需要在整个东南沿海一带拥有一块立足之地。1830 年， 49 名英国鸦片贩子联名向英国议会上书，要求英国政府“ 采取一项和国家地位相称的决定，取得邻近中国沿海的一处岛屿 ”，以“ 保护 ” 英国对华贸易。1836 年，英国政府改商务监督为领事，第一任领事由查理·义律担任。义律将保护鸦片贸易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主张用强硬手段对付中国。上任不久，他就对英国的鸦片贩子们宣称要“ 永久在香港设站 ”。在其支持和纵容下，英国船只大量集中在香港九龙尖沙咀一带，并私自上岸建立居住地。英国已决心用武力侵占中国的一块土地了，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混淆视听、出师有名的借口而已。这个借口终于在禁烟中被他们找到了。

自从英国把鸦片作为“ 特殊商品 ” 输入中国后，中英之间贸易额发生了急剧变化，不仅迅速补偿了英国贸易上的逆差，而且扭亏为盈，导致了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鸦片的流入还带来了天朝上上下下的腐败。由于鸦片经营获利极大，京城内的官吏们竟无视朝廷的禁烟命令，或包庇烟贩，或接受贿赂，更有甚者，竟在京畿之地，皇帝的眼皮底下开起了烟馆。在边关海疆，天朝的训令更是鞭长莫及，腐败现象也更为严重，据说广东水师的巡船竟和夷船约定每箱鸦片收缴 5—10 元的“ 过眼税 ”，便可保其畅通无阻。闽粤沿海的清朝官员，都从鸦片走私中得到了好处，缉私船反而变成了走私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更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①]

鸦片输入不仅给清朝财政带来了巨大损失，导致腐败现象滋生蔓延，而且严重地毒害着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据道光十五年（公元 1835 年）的估计，当时中国约有 200 万人吸食鸦片。林则徐在广州微服私访时曾亲眼目睹了广州街头“ 烟民 ” 们的惨状。他们骨瘦如柴，萎靡不振，有气无力地蜷缩在墙角哈欠连天，鼻涕眼泪流淌不止。“ 鸦片 ” 这只“ 凶手 ”，不知使多少中国人颓废沦丧；失去劳动能力，甚至葬身于烟海之中。中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被毛泽东誉为“ 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②]之一的严复，就是由于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最终被烟毒所葬送。严复早年留学英伦，学贯中西，翻译出版了《天演论》、《原富》、《名学》、《法意》等一系列著作，传播了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将西方的“ 进化论 ” 与进步的社会科学学说介绍到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代才子却不幸毁于鸦片的毒害之中。他痛苦万分，悔恨交加，临终前向世人发出了“ 鸦片是魔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6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1 版，第 1406 页。

鬼”的忠告。

目睹鸦片造成的巨大危害，许多正直的官员强烈要求禁止鸦片进口，但也有一些权臣极力反对。于是，在清朝政府内部，开禁派和禁烟派的斗争一直在激烈进行。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太常寺卿许乃济和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的开禁派极力反对禁烟运动，认为“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主张鸦片合法输入；严禁派则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力数鸦片流行之弊端，请求朝廷采取果断措施，杜绝鸦片贸易。 1838 年林则徐在《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绝源片》的奏章中绝非耸人听闻地指出：“犹若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的慷慨陈词打动了道光皇帝，使他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决心支持严禁派，从而结束了朝廷内部禁与不禁的争论。

1838 年 12 月，应皇帝的召见，林则徐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自 27 日起，道光皇帝在 8 天内连续召见 8 次，听取他对禁烟问题的意见，给予他极大的信任，并特许林则徐乘轿入宫。随后，便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办理禁烟事宜。1839 年 3 月 10 日，林则徐抵达广州，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和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合作，开始了雷厉风行的禁烟行动。

初到广州的 8 天，林则徐首先设立了一个特别机构，广泛收集情报资料，同时派人暗察密访，掌握了中外鸦片贩子的底细，而没有急于采取任何行动。这是广州历史上最漫长的 8 天，所有与鸦片走私贸易有关的人员都倍受煎熬。3 月 18 日，林则徐将广州十三行的商人全部传到大堂，痛斥他们惟利是图，为虎作伥，伙同洋人残害自己同胞的无耻行为。针对好商的收买，林则徐痛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的脑袋。”并命令他们给洋人带话，限 3 天之内交出全部鸦片，并出具保证书，“声明此后永不敢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

英国人并没有把林则徐放在眼中，依仗着停泊在珠江口的军舰，只通过广州的外国商会向林则徐递交了一封复函，表示“不再与鸦片发生关系”，却迟迟不愿缴出鸦片，在林则徐的一再坚持下，才咬牙缴出 1000 箱敷衍。由于完全掌握了英商的底细，林则徐驳回了英商的申报，命令他们必须全部缴出，并扣押了英商的头目颠地，迫使英国人乱了方寸。一直躲在澳门观察事态发展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受英商的请求，匆匆赶到广州，将颠地保释出来。中方作出了更强烈的反应，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派兵包围了英国商馆，封锁了海面，使英商进退两难。面对威武不屈的钦差大臣，义律只得以屈求伸，于 3 月 27 日让英商交出所有的鸦片。

接下来就是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 1839 年 6 月 3 日，在钦差大臣林则徐亲自监督下，将收缴的 19 178 箱总重量为 2376 254 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清兵们将一箱箱鸦片倾倒在海水中，再加上一些生石灰，顿时浓烟滚滚，直冲云霄。在场的中国军民无不为之拍手称快。一位目睹销烟全过程的外国传教士在记载这件事时写道，起初他以为“中国不会焚毁一两鸦片，即使烧毁，大部分鸦片也一定会被偷走”，然而，“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超出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加忠实的了。”[①]

早在 1839 年的 5 月份，义律便下令所有的英商全部撤往澳门，同时，大

[①] 徐立亭等：《中华五千年》第 323 页，1982 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批英国船只继续盘踞在香港海面，偷卖鸦片，任意登陆骚扰。7 月 7 日，英船“ 考奈蒂克 ” 号和“ 满加洛尔 ” 号的水手在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游逛滋事，调戏村民林维喜的妻子，林维喜不堪受辱，奋起反抗，被英人打死。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包庇杀人凶手，义律于 10 日亲赴出事现场，安抚死者家属，并诱骗林维喜之子立下一纸文书，交义律“ 收执存照 ”。上面伪称，林维喜“ 被夷人身挨失足跌地，撞石毙命，此安于天命，不关夷人之事 ”，日后“ 不得生端，图赖夷人 ”。[①]

英国人的暴行，激怒了九龙的乡民，林则徐也极为重视，派人前往调查，并要求英方交出凶手，按中国法律治罪。义律拒不交人，林则徐 8 月 15 日责令澳门葡萄牙人不得收留义律和英国烟贩，不得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处，否则便断绝与葡萄牙人的一切贸易关系。8 月 23 日起，全体英国船只只好陆续离开澳门，停泊在零丁洋和九龙海面上。无处落脚的义律恼羞成怒，再次给英国政府写报告，要求英国尽快派军队来，在中国沿海占据一个岛屿，以便立足。印度总督在接到义律的来信后，立即派出装备有 28 门大炮的巡洋舰‘ 伏拉奇号 ” 驶达香港，向中方进行军事威胁。

9 月 4 日，义律亲自率领 3 艘快艇前往九龙岸边，向清军索取食物和淡水，遭到拒绝后，立即下令向清朝水师和炮台开火，清军被迫还击，双方激战 5 个多小时，英军负伤多人，义律的帽圈也被击飞，险些丧命。这是鸦片战争爆发前，中英双方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史称“ 九龙之战 ”。九龙海战虽然规模不大，但它是鸦片战争前英国侵略者在中国第一次诉诸武力，它标志着英国入侵香港地区的开始。1840 年 2 月，英国政府正式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来华。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还照会清政府，叫嚷“ 中国将英国全权代表所指定的沿海一个或数个岛屿永久割让给英国政府，作为英国臣民居住和贸易的地方 ”，否则英国对中国将“ 相战不息 ”。

1840 年 4 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一场由鸦片贸易引发的战争迫在眉睫。

炮口下的屈辱条约

1839 年 9 月，林则徐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资产阶级舆论大哗。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地的工商人士纷纷上书外交大臣巴麦尊，要求英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措施，以保证和扩展英国在华利益。伦敦“ 东印度与中国协会 ” 在致巴麦尊的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对华鸦片贸易“ 是直接、间接经最高当局批准的 ”，此项贸易帮助英国获得了大量茶叶和生丝，并使英国在对华贸易中保持有利的出超地位。他们要求英政府强迫中国赔偿鸦片烟款并缔结商约，内容包括开放多口通商，协定关税，英国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等等。如果中国拒绝开放各口通商，则割取一个东部海岛，在岛上建立英国商馆。在华经营鸦片贸易的英国大商人查顿和义律也纷纷致信巴麦尊，建议派海军来华，强迫中国赔款，割让岛屿。这一切，都对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39 年 10 月，未经英国议会讨论，巴麦尊便作出了侵华决定。他在 8 日给义律的回信中表示，英国政府已决定对中国用兵，远征军将于明年春天

[①]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 218 页。

抵达中国海域，“远征军到达中国海域后，应即占据中国沿海某个岛屿，用作集结地和作战的基地。”1840 年 2 月 20 日，巴麦尊一天内发布了四道训令，除任命义律和懿律为侵华全权代表外，还对侵华事宜作了周密的部署。决定先“兵”后“礼”，用武力威胁中国政府屈服，然后北上谈判。并拟定了未来谈判的条文，其中包括折价赔偿被销毁的鸦片，开放广州、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将中国沿海一处或数处岛屿永久割让给英国，赔偿军费等。一个罪恶的阴谋已策划完毕。

林则徐不愧为清朝政府中有胆有识的官吏之一，在干净利落地处理完销烟事宜后，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清醒地意识到英国人“惟利是图”，对于鸦片被收缴“必不甘心”，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因此，他率领广州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将领整顿军队，修筑工事，增添大炮，认真备战。他还注意发挥群众的力量，积极倡导“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号召“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人人持刀杀之”。

1840 年 6 月，一支强大的英国远征军舰队到达中国，出现在澳门海面上。英军知道广州林则徐早有准备，便虚晃一枪，在实施了对珠江一带的封锁后，挥师北上，去攻打浙江定海。定海总兵张朝发仓促应战，用米袋搭起的工事抵抗英炮的攻击，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一个拥有 2600 人军队、30 万人口、 500 平方公里的岛屿瞬间沦丧。7 月 5 日，定海失陷，张朝发英勇殉职。英军一路追击，7 月底抵达天津大沽口炮台，将军舰耀武扬威地开到了天朝皇帝的眼皮底下。

道光皇帝自虎门销烟以来，一直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捷报”所陶醉，以为“外夷”不堪一击，只需“示以声威”，便可将他们吓走。忽然听说兵临城下，顿时大惊失色，转而求助于开禁派。他一面调任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受命调查英军内犯的原因，一面谕令驻保定的直隶总督倚善赶到天津，等候英国舰队到达后出面交涉。8 月 11 日，英军让琦善向清政府转交了《帕麦斯顿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定宰相书》，提出了赔偿被没收销毁的鸦片、割让岛屿、增开通商口岸等无理要求。琦善为了退兵，玩弄了一场“丢卒保车”的游戏，将一切“过失”归罪于林则徐。他在致英方的信函中声称：“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鸦片，未能仰体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州，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返掉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驶往广州，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①] 如此说来，林则徐正义的销烟行动竟成了错误之举，英国人反而蒙受了不白之冤。9 月上旬，义律见清政府已经屈服，北上的目的业已达到，估计短期内清朝皇帝也不可能接受英方的全部要求，再加上冬季马上就要来临，英国人无法在寒冷的白河口过冬，便同意将谈判改在广州进行，英舰也全部撤回了广州。

昏庸的道光皇帝见英军撤退，总算松了一口气，并把退兵的功劳算到了琦善的头上。同时连颁谕令，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为由，革去林则徐钦差大臣的职务，并委派琦善为新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宜”。11 月底，倚善到达广州，中英谈判继续进行，义律为英方的全权代表。谈判依然围绕赔款和割让土地问题进行，中方拒绝了割让岛屿的要求，但同意赔偿英商损失 500 万元；而英方坚持要求赔款 700 万元，并开放广州、厦门和

[①]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 13 页。

定海三口岸通商，英国人可在通商口岸居住并享有特权。　12 月 15 日，中方再次作出让步，表示赔款可增至 600 万元，待英国交还定海后，除广州外再加一处通商口岸。但义律仍不满足，提出通商口岸必须在浙、闽或苏、闽再增设两处，只有答应以上条件，英国人才能撤军。道光皇帝得知英国人贪得无厌，得寸进尺，不由得龙颜大怒，拒绝了英国人提出的一切条件，并决定派兵前往广州听候调度。

义律在谈判桌上没有捞到便宜，便决定使用武力进行威胁。1341 年 1 月 5 日，义律通知琦善，声明谈判破裂，日内即将动兵。7 日，1500 名英兵从穿鼻洋南面的一个沙湾登陆，在几名汉奸的带领下，用竹梯爬上后山，利用优势兵力，杀进了虎门前沿到达沙角炮台。在沙角炮台之战中，600 多名清兵在副将陈连升的率领下，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同装备精良的英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

1841 年 1 月 18 日，琦善和代表鲍鹏同义律在穿鼻洋面的船上会晤，双方达成了割让香港的初步协议，这就是所谓的《穿鼻草约》。根据这一协议，英军退出所占领的虎门沙角炮台和浙江定海，中方将香港岛让给英国人居住，但中国仍然保留在香港的征税权。这一初步协议后来一直被英国人当作合法占有香港的依据。然而，所谓的《穿鼻草约》，纯属子虚乌有，只不过是英国人的外交讹诈而已，企图以此瞒天过海是不堪一击的。首先，这只是琦善和义律的私下交易，上面甚至没有双方的签名和印章。中国政府既不知晓，也没有正式批准，就连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也未收到草约文本，只是从英国报纸刊登的义律对在华英侨的公告中得知此事的。其次，琦善本人也否认将香港一地割让给英国，只是“代为奏恳”，有待于皇帝的批示。最后，容许在香港居住与割让香港亦不能等同。因此，这一凭证是无法为侵略者开脱罪责的。

1841 年 1 月 24 日，英军统帅帕麦下令占领香港岛。次日清晨 8 时许，英军在今天的上环水坑口附近登陆。对此，英舰“硫磺”号舰长爱德华·贝尔彻做了如下记载：“作为真正的首批占领者，我们在占领峰上（英国侵略者为纪念武装占领香港而命名，今上环水坑口街附近的大宣地）为女王陛下的健康三次干杯。舰队于 26 日到达，海军陆战队登陆，在我们的驻地升起英国国旗。司令官帕麦爵士在舰队其他军官的陪同下，在陆战队施放的礼炮和各军舰的隆隆札炮声中，正式占领该岛。”[①]

消息传到京城，道光皇帝龙颜大怒，大骂琦善“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负国，实属丧尽天良”。并颁发上谕，将畸善革职锁拿，押解进京，家产查抄入宫。义律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他满

以为自己为英国立了一大功，谁知当消息传到英国时，外交大臣

巴麦尊也暴跳如雷，认为义律要价太低，亦“有负皇命”。他责备义律索取的 600 万元鸦片赔款数额太少，没有充分使用“本来就是派了去供你支配的武装力量，在未达到全部要求时就接受这些条件”。巴麦尊对于义律放弃对舟山占领尤为不满，命令其重新占领舟山。巴麦尊还认为，义律所谓的对香港的割让，其实并无保证，“条约”上既没有加盖关防章，也没有玉玺印，英国并没拥有对香港的主权。鉴于义律的过失，已不能再承担国家赋予的重任，

[①] 贝尔彻，《环球旅行记》第 2 卷，第 147—148 页，1843 年伦敦出版。

5 月 3 日，义律被解职，接替他的是璞鼎查。

璞鼎查原为英属殖民地印度信德省行政长官，曾参加过侵略阿富汗的战争，来华前已在亚洲活动了 30 余年。作为一名老殖民

主义者，他信奉武力至上的原则，决定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1841 年 8 月到任后，他立即统兵 3000 人，率战舰数十艘，大举北犯。从 8 月至 10 月，先后攻克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1842 年 6 月进犯吴淞口，7 月攻下镇江，8 月直逼南京。他在致巴麦尊的信中，得意洋洋地写道：“ 现在剩下的事，就是女工陛下宣布哪些中国港口和海域将并入女王陛下的版图了。 ”[①]

软弱的清朝政府被英国的炮舰凶焰吓破了胆，道光皇帝急愉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向侵略者屈膝议和，并授予“ 便宜行事，不 为遥制 ”的全权。1842 年 8 月 29 日，在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英舰“ 皋华丽 ”号上，中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共有 13 款，主要内容有：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五口通商 ”；赔款 2100 万两银元；中国的海关税率由中英两国协定；英国商人在各通商口岸和中国商人自由贸易，不加任何限定。历史不会忘记，这一条约的签订，已是英国强行占领香港 1 年零 7 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中国人民的财富被侵略者无耻地掠夺，香港的百余年沧桑史也由此开始。

[①] 1841 年 8 月 12 日璞鼎查“ 通告 ”，载《中国丛报》第 10 卷第 8 期，第 478 页。

第三章　张开贪得无厌的大口

战火再起与“六不”钦差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欣喜若狂，以为可以凭借他们攫取的特权，在中国倾销工业产品，从而牟取暴利。当时英国驻广州代办米契尔在写给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公使文翰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英国的工厂主和商人们一想到和 3 亿或 4 亿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璞鼎查告诉他们，他为他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这个世界是那样的广阔，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产品也不够供给它一个省的衣料。

但时隔不久，英国人就发现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从 18431855 年，英国对华贸易总额几乎没有什么增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再次表现了其顽强的抵抗力。更重要的是鸦片贸易的迅速增长，像一块巨大的吸水海绵，将中国可以动用的现金几乎全部抽干，使中国人无钱再购买其他的英国工业品。正如当时居住在英国的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鸦片又购买商品。”[①] 但英国政府却不这样认为，殖民主义者希望中国进一步向西方“开放”，来满足国内资产阶级发展生产、扩大海外市场的需要。

1854 年，英国人首先发难，法国和美国也随声附和，向清政府提出要全面修改《南京条约》，增加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公使进驻北京和鸦片贸易合法化等内容。在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后，便决定寻找借口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迫使清廷就范，“亚罗号”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亚罗号”是停泊在珠江上的一艘商船。1856 年 10 月 8 日，广东水师根据举报登船搜捕海盗，并抓走了两名海盗和 10 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事发之后，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立即向清政府提出抗议，称“亚罗号”是英国船，中国官员上船搜查时扯下了英国国旗，侮辱了英国。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在 4 小时内赔偿损失，放回人犯，赔礼道歉，“如逾期不允所请，即进兵攻城”。

事实上，“亚罗号”仅仅是一艘曾在香港注册的商船，注册的船主是中国人方亚明，而且注册早已过期失效。按照国际惯例，在中国港口停泊的船只根本无权在船头悬挂外国国旗，“亚罗号”上悬挂的只不过是一面普通信号旗而已。巴夏礼原以为自己的要求没有道理，叶名琛不会接受，这样就有了挑起战争的借口。不料这位糊涂总督早已被洋人的气势吓破了胆，不仅立即放人，而且表示今后要尊重英国国旗。巴夏礼又胡搅蛮缠，以叶总督礼貌不周为由，拒绝接收送还的被捕水手，并命令英军上将西马糜各里率军舰攻打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便由此引发。

1856 年 10 月 23 日，英军开始攻打广州沿江炮台。此时的叶名琛正在校场悠闲地观看骑射比赛，当城外守军前来报警时，他对敌情却置若罔闻，竟然下令不准还击，还满不在乎他说：“没关系，到天黑他们自然会撤走的。”英军几乎是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广州城的，数日后，英军由于实力所限，又退回虎门等待援军。而咸丰皇帝却把这一功劳记在了叶名深的头上，赞扬他熟悉洋人，运筹帷幄，操纵得当，退兵有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6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1857 年 12 月，由加拿大总督额尔金和法国特使葛罗率领的英法联军再次兵临广州城下，要求“修约”，提出了新的割地赔款要求。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叶名琛不是积极备战，而是幻想神灵保佑，迷信巫师的占卜，“只要度过十五日，定当无事”。眼看敌人就要进攻，广州危急，将领僚属们要求调兵设防，叶名琛不准；请求召集市民团练自卫，叶名琛依然不准；请求派人去了解敌情，观察敌人动向，他还是不准。其部下都被他这种举止弄得哭笑不得、百般无奈，自知守城无望，杀戮之祸即将临头。英法联军于 12 月 28 日清晨发起了进攻，这一日子距离叶名琛等待的“安全期”还相差几日，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联军很快全部登陆，迅速攻占珠海炮台，并向城内开炮，商店民房相继起火，总督衙门也被炮火击中。叶名琛惊慌失措，连忙逃到内城粤华书院中藏身，而爱国将士们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顽强地抵抗着外敌的入侵。29 日，联军攻陷广州城。广东巡抚柏贵和守军将领穆克德纳举起白旗向联军投降。美丽的羊城火光冲天，血流成河，官民财产被抢劫一空。叶名琛在都统衙门内的后花园里躲藏了好几天，还是被敌人俘获。当晚，英军士兵押解着叶名琛乘小舢板往军舰上转移，跟随他多年的仆人江升劝他投河自尽，以报国家，但他还是选择了生路。

咸丰皇帝听到禀报后，不由地斥责道：“此次夷情猖獗，原因叶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以致夷人激忿。”“叶名琛既不能驾驭夷人，复不能激励乡团，动其公忿，以致大伤国体，实堪痛恨。”老百姓对这样的昏官更是憎恨不已，特编了一首歌谣挖苦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这便是“六不钦差”的来历。

广州沦陷后，激起了广东人民的愤怒反抗。广东爱国官绅发布告示，号召对港英当局实行制裁：“行封港之法，绝其贸易接济，凡吗咕敢私买卖者，拿获治罪。为洋人服役所谓沙门者，及代为驾火轮船禅艇者，限十日回家，不准逗留，违者缉获治罪，并罪及本家亲属，三代不准应试。”[①]1858 年香港人口仅有 8 万人，但在当月响应号召离开香港返回内地的中国居民至少有 2 万人，大批华人离港和封港政策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由于仆人、裁缝、鞋匠、木匠和其他手艺人纷纷离港，再加上食物匿乏，物价暴涨，使英国占领者感到极大的不便和困难。

九龙被占与火烧圆明园

九龙半岛位于新安县大陆部分的南端，它与狮子山、笔架山等横开列嶂，是高山地带的外缘。九龙半岛的岬角尖沙咀隔着宽约 1.5 公里的海面，与香港岛的中环和湾仔相望，好似大陆伸出的一只手，要去拥抱对岸的港岛。九龙半岛和香港岛之间是世界上少有的天然深水良港，宽 1.5—9.6 公里，面积为 5200 公顷，可供巨轮自由来往停泊。海港四周群山拱卫，东面入口鲤鱼门地势狭窄，可阻挡波浪；西面入口急水门有大屿山及一些星罗棋布的小岛屿，可减缓风浪，使整个海港成为巨大的袋式避风良港。

说起“九龙”岛的名称，还有一番不寻常的来历。一般人认为得名于半

[①] 徐广绪：《思补斋自订年谱》，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 194 页，1979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按：吗咕即商人，沙门即仆役。

岛上的九龙岭。可是九龙岭也仅为一岭，何以称为“九龙”？即使再加上东山、观音山、慈云山、鸡胸山、狮子山、笔架山、鹰巢山，也只有八岭，“九”从何来？据说南宋末年，在元军的紧逼下，小皇帝赵昺逃至这里。赵昺观看地势，只见周围有八座山峰，郁郁葱葱，甚有气势，便随口说道：“每山一龙，八座山正好八条龙。”大臣陆秀夫附和道：“陛下贵为天子，也是一龙。”赵昺点头称是，便命名此地为“九龙”。

历史上，九龙半岛属于“官富场”辖地，南宋政府曾派官员在此管理盐政，并由军队驻守“官富寨”“1370 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此设“官寨巡检司”，辖地包括现今整个香港地区和深圳东部。清代初年，政府仍在这里设立炮台，重兵把守。

英国人对这个优良的海港图谋已久，鸦片战争期间，英国鸦片商不断鼓吹占领九龙半岛。如前所述，早在 1841 年义律就曾向倚善要求同时割让香港岛和尖沙咀，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才将割占九龙的问题暂时搁置。1847 年，英国远征舰队司令西马糜各里到达香港后，又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占领九龙的问题，他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我认为占领九龙半岛乃是必要的。一是防止它落人另一个外国政府之手，二是它对日益成长的香港社会可提供安全的保证和必须的供应。还有一个必须占领九龙半岛的理由是，在飓风季节，它是我们船只安全所必不可少的唯一避风港。这个极其重要的占领，我们一刻也不能忽略。”[①]

1854 年 7 月，广东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天地会起义。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起义军便攻克了 40 余座府州县城，同年 8 月，与港岛只有一水之隔的九龙城寨，也一度被罗亚领导的惠州起义军攻占。两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克广州，袭九龙，如入无人之境。腐朽没落的清政府被内优外患搞得首尾不顾，焦头烂额。英国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夺占九龙半岛随之提上了议事日程。

英军将领关于尽快占领九龙半岛的建议在 1858 年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首肯。6 月，英国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命令驻华全权代表额尔金要抓住一切机会，从中国政府手中割占九龙鲫角和附近的岛屿昂船州，至少要割占九龙。英国人加快了侵略的步伐。更为可耻的是，九龙尚在中国人的手中，英国军队便开始讨论如何分配和使用它的问题了。侵华海军司令贺伯首先表示，由于九龙水深地宽，可以成为船舶修理厂的最佳选址，还可利用其优美的环境建造一座海军医院。陆军司令则提出，九龙地势平坦，气候良好，更加适合陆军驻扎。

在英国殖民地部的档案中,至今依然保存着一份 1859 年 6 月 6 日香港辅政司官员马撒尔受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的委托，撰写的一份备忘录。这份历史文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为了侵占中国领土，殖民主义者是怎样处心积虑地编造侵略借口的。

马撒尔在备忘录中是这样分析的：

（1）对香港的好处：首先是可以防止其他强国占领九龙。其次是便于对香港港口的管辖。把九龙半岛变成香港的一部分，该海港就成为香港的领海，就能使用英国法律。再次，尖沙咀一带暴力行为正在增加，为了维护香港地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和平与良好秩序，占领该半岛是极端必要的。此外，香港

[①] 贺弘景：《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第 66—67 页，1994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城市发展过快，拥挤不堪，占领九龙后可以为香港居民提供方便的设施，并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通过出售九龙的土地，香港地区的收入也将大力增加。

（2）中国人的得失：他们在九龙没有权威，估计他们从那里得不到税收。九龙的土地对他们没有价值。如果该地导致他们与其他国家或无法无天的外国匪徒发生冲突，英国的占领将会增加九龙清朝官员的实力，避免 1854 年 8 月的事件重演。

（3）占领土地的范围：马姆斯伯里的信件指定为九龙呷角和昂船州。九龙城和九龙炮台不包括在内。

（4）给中国政府的补偿：该地对中国不仅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是碍事的和危险的。只须偿付一笔最小的款项，就可以成为合法的补偿。

对于采取什么方式占领九龙，英国政府内部是有分歧的。由于担心对九龙的直接军事占领会引起清朝政府的激烈反应，危及到英国在广州和香港的商业贸易，因此，决定先采取租借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伺机占而有之。

1860 年 3 月 18 日，迫不及待的英国军队在克灵顿中将的率领下，强行在九龙半岛的岬角——尖沙咀一带登陆，对九龙实施了实际占领。为了掩饰自己的强盗行为，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在 20 日匆匆从香港赶到广州，会见两广总督劳崇光，并将早已起草好的外交照会交给了对方。巴夏礼在照会中宣称，九龙半岛已成为附近地区强盗和逃犯出没与藏身之地，香港英国当局曾多次敦促九龙司巡检清除这些危险分子，但没有任何成效。这种混乱局面给英国的利益和港岛治安带来了麻烦，中国政府只能用两种办法中的一种来解决问题，或派遣官员和军队前往该地去驱逐坏人并在该地区长期驻扎一支强大的部队，或在九龙划出一条边界，界内的部分割让给英国政府。在采取永久性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之前，英国要租借这块地方。

在巴夏礼为劳崇光指出的两条路中，第一条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英军已经占领了九龙，是根本不可能再退出的。剩下的一条路就是将九龙租给英国人。当时的广州还在英法联军的占领下，身为清朝两广总督的劳崇光被英国人的嚣张气焰吓破了胆，完全成为英法联军管制委员会操纵下的傀儡，对侵略者的旨意唯命是从，竟于当天就匆拟复信，擅自允许英国租借九龙的部分地区，真是昏庸荒唐到了极点。就连英国人也为轻而易举到手的胜利感到困惑，陆军大臣赫伯特发表评论说：“ 中国人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 ”然而，这位将军所不了解的是劳崇光并不能代表中国人，他只是中国人的败类。

3 月 21 日，巴夏礼和劳崇光在拟好的租约上签字盖章。根据这一协定，九龙半岛南部，包括昂船州在内，租借给英国；英国每年向中国地方当局交纳租银 500 两；只要英国政府按时交纳租金，中国政府便不得要求归还上述土地。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英国人便将对九龙的武装占领变成了“ 合法的租用 ”。但是这毕竟只是巴夏礼与清朝一地方官员签订的协约，并未得到清朝政府的许可，因此，英国人决定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正式割占九龙。

1860 年春季，英国政府再次任命额尔金为全权大臣，前往中国用武力解决换约问题。7 月，外交大臣罗素在发给额尔金的信中指示说：“ 女王陛下政府获悉，巴夏礼先生已为她从中国当局获得九龙半岛的永租权。尽管知道租借会带来眼前的利益，在全面考虑之后，女王陛下政府认为，他们应该取得九龙半岛的完全割让，这是非常称心如意的事情。为此我训令阁下，要竭

力实现这一目标。”[①]额尔金遵照英国女王的旨意，率兵北上。8 月，英法联军第二次攻陷塘沽、大沽和天津，10 月，英军在京郊通县八里桥击溃了清军主力，进入了北京。

10 月 6 日，英法联军抵达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圆明园是由圆明园、畅春园和万春园三园组成的，所以又称圆明三园。此外，它周围还有许多属园。这些以圆明三园为中心的园林建筑，东起近春园，西到香山一带，连绵 20 华里，总面积有 5000 多亩。它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景胜，还创造性地移植和再造了西方园林建筑，真可谓是集中外园林艺术之大成。园内还珍藏着无数的黄金珠宝、丰富的历代典籍和极为罕见的古代文物，堪称人类文化的一座宝库。进园之前，联军司令官下达了“自由抢劫”指令，侵略者们争先恐后地破门而入，对这座举世闻名的园林杰作进行了疯狂和野蛮的摧残破坏。

据当时在场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报道，面对数不胜数且价值连城的各种珠主，侵略者们简直不知该如何选择，“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丢了银子，为了镶有珠玉的钟表和宝石又丢掉了金子”，“每个人都不愿放弃这个特权，纵情肆意，予取予携，手忙脚乱，混乱不堪。”从将军到士兵，每个人都囊中饱满，不堪负重。这座历史名园就这样毁于一旦。

为了逃避国际舆论的谴责，掩盖自己的野蛮行径，在英国首相巴麦尊的批准下，联军在圆明园放了一把大火，将其“夷为平地”。大火连烧了三天三夜，滚滚浓烟覆盖了整个北京城。当时，法国杰出的作家维克多·雨果曾经愤怒地谴责道：“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我们所有教堂的所有珍宝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座神奇无比，光彩夺目的东方博物馆。那里有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数不胜数的金银财主。多么伟大的功绩！多么丰硕的意外横财！这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口袋，另一个装满了钱柜，然后勾肩搭背，眉开眼笑地回了欧洲。”“这两个强盗分别叫作法兰西和英吉利。”

面对灭绝人性的强盗，清朝统治者惊恐万状，咸丰皇帝早已逃往热河避难。只留下他的六弟，人称“鬼子六”的恭亲王奕䜣与洋人议和。奕䜣在清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是一位老道的行家，但见了洋人，却吓得不敢靠近。他带着键锐营、火器营的数名官兵进城试探虚实，清兵们听说城内有洋人，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抱头鼠窜而去。奕忻则“登高瞭望，见火光至今未熄，痛心惨目，所不忍言”。但他却不敢做一丝一毫的抵抗，理由是“如派兵阻拦，必于城内宫殿拆除，以逞其强”，他所能做的只是向洋人求和。 10 月 15 日，奕䜣分别照会英、法全权大使额尔金和葛罗，询问“何时换约”？而侵略者却迟迟不作答复。一直等到第三天，才接到两国照会，英军索取“赔恤金”30 万两，法军索取 20 万两，赔偿军费各 800 万两，并指定在当月 20 日复照、 22 日付银、 23 日换约。

奕䜣按规定的时间回复了照会，交付 50 万两白银，但换约一事却未能如期举行，问题在于趁交换《天津条约》和签订《北京条约》的机会，英国人根据政府的训令，提出要废除“劳崇光与巴夏礼协定”，在《北京条约》中增添了“广东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的条款。清政府这才知道，南九龙早已被劳崇光私自租给了英国人，奕䜣惟恐皇帝发怒，得罪了洋人，

[①] 《罗素致额尔金密函》1860 年 7 月 9 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881/933。

便向咸丰解释说：“ 惟其地方与香港毗连，系海口余地，非内地要隘可比。 ”在他眼中，既然劳崇光已将九龙司租给英国，就和割让无异，九龙乃无用之地，给了洋人也无妨。面对咄咄逼人的侵略者和一群极力劝降的无能官吏，咸丰皇帝只得“ 恩准 ”。10 月 24 日、25 日，清政府被迫在不平等的中英《北京条约》上签字。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英国在华权益，其中第六款规定将九龙司一区（即南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

正式割让九龙半岛的仪式于 1861 年 1 月 19 日在九龙的尖沙咀举行。英国港督罗便臣、全权大使额尔金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都出席了这一仪式，清朝政府的 4 名广东地方官员也应邀出席。仪式开始后，由巴夏礼将一个装有九龙泥土的口袋递给中国代表，再由中国人将这袋泥土“ 授与 ”香港总督罗便臣，九龙的正式交割就这样完成了。在英国侵略者的刺刀下，九龙终于走完了由被强占变成强租，最后又由被强租变成割让的全过程。

瓜分中国的狂潮与强租“ 新界 ”

东汉初年，光武帝在写给大将军岑彭的信中说到，人总是苦干不知足，刚刚占有了陇地（今甘肃省东部），又进而想得到蜀地（今四川省中西部）。于是便有了“ 得陇望蜀 ”的成语，用来形容某些人的贪得无厌和得寸进尺。如果用这一典故来比喻占有中国香港和九龙地区后的英国人的心态，则是再贴切不过

了。

在占有九龙岛的南部之后，英国人又开始策划新的拓界方案，以便在中国寻求更多的利益。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使他们的胃口张得更大，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

那是 1874 年 8 月 15 日，广东清军水师的巡防舰按照惯例在珠江口外的海面上巡逻，检查在这里捕鱼的鱼船是否持有船照。按当时颁布的《沿海水师防护章程》，出海捕鱼的渔船，必须要领有水师发给的船照，否则算私自出海，以海盗论处。接近黄昏的时候，巡防舰行至香港岛西南的南丫岛附近，截住了一艘香港渔船。水师上前检查船照，而对方却不能出示，于是水师船要求该渔船补领船照，否则便要没收船只，渔民不服，与清军争执起来，冲突中清军开枪打伤三人。这件事论理说清军并没有错，因为港英政府的管理范围在当时只限于香港岛、九龙以及昂船洲，南丫岛和大屿山一带，仍然归中国管辖。香港渔船在这里捕鱼，属于越境行为，清军是有权对他们进行盘查和处罚的。

但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事件，竟在港英统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驻港英军也因此更迫切地感觉到，必须进一步扩大占领香港的范围，才能“ 保护香港的安全 ”。他们秘密拟订了一个“ 拓土 ”计划，并上呈英国政府参考，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付诸实施。这个计划就是后来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原稿。 1884 年，驻港英军司令萨特金少将再次拟定了一个关于扩展领土的报告，建议将香港殖民地的范围扩展到九龙北面的山岭和周围的一些岛屿。但由于此时英国正在近东、中非和南非同欧洲列强进行激烈的争夺，因此还不打算在中国投入更多的精力，外交部和殖民地部对这一建议的反应冷淡，香港拓界一事被暂时搁置。

19 世纪末，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过渡到帝国

主义阶段。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列强加入到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行列当中。俄、法、德、日等国在远东、中近东、非洲和太平洋地区屡次出击，要求分享最大限额的“阳光下的地盘”。1894 年，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胁迫清政府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1896 年 6 月，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取得中东铁路的筑路权和战时将军舰开入中国各港口的特权。对号称“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来说，这一切均构成了对它的极大威胁，迫使它不得不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

在英国统治集团中，最热衷于鼓吹扩大在华领土和势力的官员是当时的港督威廉·罗便臣。早在 1894 年 11 月 9 日，他便向英国殖民地大臣里彭递交了一份要求“拓土”的报告，在这篇冗长的报告中，罗便臣写道：“虽然难以置信，但我请阁下注意下列事实：加普礁和横澜岛以及上面的两个有价值的灯塔属于中国。港口的东、西进口鲤鱼门海峡和青洲水道属于中国。鲤鱼门要塞是中国领土。海港北岸方圆 2 英里之外属于中国。九龙城属于中国。距维多利亚港只 1 英里左右的鲤鱼门水域属于中国。”这样，“中国本身，或是同中国或英国开战的另一个国家可能登陆珠江北岸或鲤鱼门海峡外的大鹏湾，南下九龙半岛，这不仅对我守军不利，而且很容易从中国领土炮轰维多利亚港，截断粮食供应。因此我以为，香港边界应该拓展至大鹏湾，从那里延伸到后海湾……从鲤龟门海峡伸展到九龙背后的山顶，包括珠江口汲水门在内，以确保女皇这块有价值的领地的安全。再者，加普礁、横澜岛、大屿山和所有香港 3 英里以内的海岛均应割让给英国。否则，一旦发生战争，本殖民地将难以防守。”[①]为了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几天后，罗便臣又将一封香港巨商遮打的来信转交给里彭，遮打在信中列举了香港拓界的“理由”，包括水源、畜禽、蔬菜的不足，人口及工业缺少活动范围等。最后，罗便臣又言犹未尽地附上另一份报告，为大英帝国的未来出谋划策：“中国的国力现正处在最低点，但考虑到日本的进步， 50 年以后，也许 20 年以后，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具备足够的技术力量来开发它的自然资源。到那时候，周围的山头和岛屿都归中国所有，我们的位置将在哪里？”“目前的时机是最好的”，拓界一事，“要干就得现在干”。罗便臣预计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强大，但从正确的估计中却导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要加紧侵略。真是一副趁火打劫的强盗嘴脸。

这种拓界的喧嚣终于有了反响。 1895 年 5 月，英国海陆军联合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以军事需要为由，建议在香港“展拓和调整界址”，并分别得到了英国海军部和陆军部的赞同。1896 年 10 月和 11 月，英国殖民地防务委员会也两次提出备忘录，敦促英国索尔兹伯里政府就香港拓界一事尽快采取行动，寻找新的战机，争取“美梦成真”。

1894—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唐朝政府的软弱和腐败纵容了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他们像饿狼一般，扑向中国这个奄奄一息的巨人，撕裂着他的身躯，吞噬着他的血肉，一场瓜分中国的浪潮由此掀起。

日本人从朝鲜打到中国，一路乘胜前进，并占领了辽东半岛。在刘公岛港湾内将清朝北洋水师击败后，日本人张开血盆大口，企图一举吞并中国，

[①] 《罗便臣致里彭密函》第 23 号，1894 年 11 月 9 日，英国殖民地档案，C.O.537/34。

在与中国签署的《马关条约》中，不仅获得了两亿两白银的军费赔偿，而且获得了对朝鲜的控制权，割走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获多处内河港口通商等特权。没想到却引出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事件。俄、法、德惟恐日本在华势力扩展太快，危及到自己的侵略利益，就在条约签字的当天，俄国政府正式向法国和德国建议，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否则将“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日本人在经历了两年的战争之后，已经精疲力尽，实在没有能力与三国相抗衡，只得在多索取了 3000 万两白银后退出了辽东半岛。

就在日本军队退出辽东半岛、清朝政府尚在向干涉国“感恩戴德”的时候，侵略者的本性却暴露无遗了。

对中国下手最快的是俄国。为了报答俄国政府的“干涉”提议， 1896 年 3 月，清朝大臣李鸿章作为特使，被派往俄国，去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在俄期间，俄国人便诱使他签订了一个密约，允许俄国人修筑铁路时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允许俄国舰队在胶州湾“过冬”。后来，俄国又强迫清朝政府与其签订了《旅顺大连租地条约》，租期为 25 年，把中国东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法国也不甘落后。甲午战争结束的当年，就抢占了中国云南边境上的勐乌和乌得等地，并迫使清政府增开云南河口、恩茅为通商口岸，还取得了在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开矿优先权。 1897 年 3 月，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同意不将海南岛割让给任何其他国家，企图把西南和华南都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德国则立即向清政府提出了租借胶州湾的要求，为了与俄国人取得默契，德皇威廉二世专门去莫斯科拜访了沙皇尼古拉二世。1897 年底，德国借口两个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军舰占领了胶州湾。步德国人的后尘，俄国人也将舰队开进了旅顺和大连。次年，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了《胶澳租界条约》，把胶州湾租给了德国，租期为 99 年，山东被德国人装入囊中。

对于俄、法、德三国的行动，英国人起初并没有放在眼中，希望保持“局外人”的身份，待三国各自利益发生冲突时再去充当调解人，坐收渔人之利。在俄国和德国瓜分了中国的东北和山东之后，英国人瞄准了威海城，认为占有了威海，就可以牵制俄国和德国在中国北方的势力。谁料到法国派军舰开进了广州湾，还要租借该地为军港，这一举动，令英国人大吃一惊。在英国人的眼里，香港地区属于英国的地盘，是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的重要基地。如果法国人占有了广州湾，就等于在香港的门前筑起一道篱笆墙，大大限制了英国人在华南地区的活动，威胁到英国的殖民利益。英国人决定以法国租借广州湾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拓展香港界址的要求。1898 年 3 月，英国政府正式指示驻华公使窦纳乐，要求他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保证，如果法国租借广州湾，英国随时可以要求拓展香港界址。英国终于赤膊上阵，卷入到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之中，它强行租借了今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及附近岛屿，即后来被称为“新界”的地方。

强租“新界”的谈判于 4 月 2 日正式举行。清政府早已料到英国在众列强都获得既得利益之后，会杀一个回马枪，提出在香港拓展界址的问题，因此早已做好准备，预备再牺牲一块小面积的土地，来满足侵略者的贪欲。4 月 24 日，窦纳乐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指示，向李鸿章等出示了拓展界址的地图，强索大鹏湾到深圳湾一线以南，包括九龙城和 ZOO 多个岛屿在内的大片土地和水域，令清朝大臣们大吃一惊。根据这个方案，英国占有的陆地扩大

了十几倍，水域扩大了四五十倍。清朝官员开始时坚决不答应，但抵抗依旧是微不足道的，而英国人却趾高气扬，毫不退让，提出如果俄国政府放弃旅顺和大连，法国人放弃广州湾，英国人则放弃这一领土要求。被侵略者吓破了胆的清朝政府哪里敢再同虎视耽耽的列强去讨价还价，只好基本接受了这一方案，仅在九龙城的归属上做最后的抗争。

九龙城是宋代“官富寨”的遗址，是宋代管理九龙官办盐务和驻扎军队保卫海防的地方。占地面积 70 多亩，城墙依山而建，远望呈人字形，城寨虽然不大，但地势险要，是一重要的历史古迹。

4 月 28 日，双方的谈判进入最后时刻，中国官员仍坚持九龙城归中国管辖，中国保留使用九龙城码头的权力；英国政府要缴纳租金，并要协助中国海关稽查走私等条款。为了尽快地将这一赃物弄到手，窦纳乐建议英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以免夜长梦多。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批准了这一提议，同意中国的行政管辖权可以在九龙城继续保持，但别有用心地提出，要附加“不能对香港的安全和安定构成威胁”[①]条文，为今后伺机占有做准备。

1898 年 6 月 9 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北京正式签字，代表两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的分别是清朝政府代表李鸿章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条约中竟然写道，出于香港地区安全的考虑，从 1898 年 7 月 1 日起，将北九龙及大屿山等岛屿，大鹏湾等水域租借给英国，租期为 99 年。就这样，英国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最终完成了对香港地区的占领。

“新界”被租借之后，九龙城寨随即成为孤城一座，失去了防守的意义。它虽然主权明确，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管理上极为不便，一度成为无依无靠的“弃儿”，致使社会治安混乱，黑市流行。 1899 年 12 月，英国在制定的新枢密院令中宣称，鉴于九龙城内中国官员行使权力不利，影响了香港的防务与安全，九龙城实际上已成为女王陛下殖民地香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派遣英军强行将九龙城寨里的中国官员驱逐出去。英国殖民者在欢呼他们伟大“胜利”的时刻，也把自己的卑劣行径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国人愤慨，山河垂泪。在那屈辱的年代里，香港与它的祖国一起被殖民主义者任意宰割，在刺刀和大炮的威逼下，忍气吞声，伤痕累累，被迫与母体分离。它宛如一个从母亲怀中被抢走的孩子，日日夜夜盼望回到母亲的怀抱。 30 年代，著名爱国学者闻一多先生游历香港，曾用悲愤的笔触写下了《七子之歌》，表达了对国土沦丧的无限悲痛心情：

我好比凤阀阶前守夜的黄豹，
母亲呀，我身份虽微，地位险要。
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
啖着我的骨肉，啜着我的脂膏；
母亲呀，我哭泣号响，呼你不应，
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我的胞兄香港在诉他的苦痛，
母亲呀，可记得你的幼女九龙？自从我下嫁那镇海的魔王，我何曾一天不在泪涛汹涌！母亲，我天天数着归宁的吉日，我只怕希望要变作一场恶梦。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①] 《索尔兹伯里致窦纳乐电》第 135 号，1898 年 4 月 28 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881/7118。

第四章　悲壮的正义之歌

香港逐步被割占和租借的历史，既是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进行顽强抵抗的历史。

港英当局的残酷统治激起
香港人民的强烈反抗

在英国国会 1857 年的档案里，保存着一封陈芝莲（广东新安县人）给胞兄陈桂籍（曾任晚清户部主事）的信，为我们描述了当时香港的治安状况。信中写道：“ 看来英夷非常小心，夜间定时打炮以维持士气。汽船及其他船只，大小不一，一共 20 艘，日夜巡逻不绝。每一家洋行，都有夷兵守卫，一到薄暮，即准备大炮以为防卫。警察以 18 人为一队，出巡各街道，巡至认为危险地带，即集合更多的人数，先行放枪，才敢前进。 ”

为了巩固在香港地区的统治，港英当局开始逐步建立一套殖民管理体系。　1842 年 2 月，璞鼎查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总部从澳门迁到香港。次年 1 月，又将原来设在广州的英国驻华司法院迁到香港，改组为香港法庭，由璞鼎查兼任裁判官，用英国军法审理案件，负责审理在香港和大陆以及中国沿海 100 海里以内公海上的犯罪。　1843 年 6 月，英国在香港正式建立了总督府，璞鼎查被任命为香港第一任总督，并宣布成立行政局和立法局，协助总督处理政务。

针对香港地区社会治安不好的状况，璞鼎查建立了治安委员会，委任有地位有身份的英国人为治安委员，协助港府维持社会秩序。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限制华人的活动，包括夜晚 11 时以后不许上街；对不服从治安委员会管辖者处以 3 个月监禁；入夜后　在街上行走须携带通行证和灯笼照明，以便警方识别身份 海晚 10 点至清晨 6 点每个中国家庭和店铺都要在自家门前悬挂灯笼，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和店名；晚 9 时以后，除持有港英政府发给的特别许可证者外，任何华人不得行船等等。

1844 年 7 月，香港警察总署正式成立。特以每年 500 英镑的高薪聘请伦敦高级警司查理士美来港主持总署的工作，并在境内外招聘警察队伍。在首批招募的 171 人中，有欧籍人 70 余名，印度人 30 名，中国人 50 名，其他国籍 20 余名。后警力不断扩大，便以英、印、华、鲁（山东省威海卫人）、俄五个系列组建了 A、B、C、D、E 五个队伍，加强巡逻，负责香港治安。

与此同时，对中国人行动的限制和迫害也进一步加强了。港英当局严格限制中国人的居住和经商范围，沿维多利亚港湾的中间部分和半山区都是清一色的欧洲人居住区，中国人不得在此建房居住。从璞鼎查街到花园道之间，都是洋人经商区，华人店铺不得开设；华人经营区被规定在维多利亚城的东西两端，不能越雷池一步。对华人滥用刑罚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在香港岛上环的后面，有一个被称为“ 十王殿 ”的地方，就是当年港英政府对中国居民进行处罚和鞭笞的场所。行刑时，“ 犯人 ”被脱光衣服，执刑人用一根浸过煤油的麻绳鞭抽打“ 犯人 ”的后背，直到皮开肉绽为止。除鞭笞等刑罚外，还有游街、站木笼、戴枷锁等惩罚措施，中国人稍有过失或对洋人有所冒犯，就被处以刑罚。

香港人民对英国当局的歧视和压迫政策进行了坚决的反抗。1844 年 8

月，香港立法局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岛上居民，不论洋人和华人，一律要向总登记官领取登记证，每年交费一次，华人居民对这种“人头税”怨声载道，并发动了罢市和罢工。这次斗争坚持了 3 个多月，迫使港英当局不得不修正此案，取消了登记费。同年，港英当局又以防止盗贼为名，颁布取缔船艇规则，对华人施行严厉管制，激起了船民们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返回内地，使香港的交通运输一度陷入瘫痪，英国人只好将这一规则取消，另行颁布海港安宁条例。1856 年，港英政府不顾中国居民的生活习惯，硬性颁布了《华人屋宇及妨碍公安条例》，对中国居民屋宇的门窗及间隔式样都作了新的规定。中国居民强烈反对，而港英当局置之下理。愤怒的中国人举行了总罢工和总罢市，并举行集会提出了修改公安条例、制止敲诈勒索、不得随意对华人动用私刑、不得随便拘捕和驱逐小贩等要求。面对齐心协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中国人，港英政府急忙调动军队前来“维持秩序”，并被迫全部接受了华人提出的要求。

在所有的反抗斗争中，影响最大的是以下几件事。

轰动国际的“毒面包案”

1857 年 1 月 15 日清早，正当英国人借“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在香港的英国人及其他欧籍人士约 400 余人突然发生食物中毒事件，连港督宝灵的夫人也未能幸免。来自四面八方的呼救声使香港乱作一团，全港的外国人都陷入恐怖之中。经化验，这起中毒案的根由是当日的面包中有人投毒，其中，每 4 磅白面包中含有 0． 92 格令砒霜（格令：重量单位，1 克=15.4324 格令），每个烤面包中含有 0.15 格令砒霜。

港英当局十分震惊，立即立案调查，并且很快查出这些有毒的面包均出自“裕盛办馆”。裕盛办馆是一家专门承接外国人伙食的商店，包括供应全港外国人每天食用的面包。老板姓张，名阿霖，系广东香山县人。此人当然是毒面包案的首要嫌疑犯，警方立即派人前去拘捕，但赶到裕盛办馆时，只见 50 余名工人还在工作，而老板却乘一早的轮船与妻儿老小回广东老家去了。根据这一情节判断，一定是张阿霖投毒后畏罪潜逃。警方立即拘捕了所有的伙计，并派出战舰追赶“皇后号”客轮。

张阿霖在乘船返乡途中经过澳门时听说了香港发生面包中毒事件，当然明白自己难脱干系，但他并没有逃走，而是在澳门下船等待警方的到达，然后投案自首，由澳门警方代为扣押，次日押回香港。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香港和广东因为“亚罗号事件”处于战争状态，英军正在攻打广州，张阿霖一定是受了广东总督叶名深或某人的抬使，以投毒的方式来报复英国人。但张阿霖的供词却与此大相径庭。据他所言，在香山老家的祖父多次催他回去探望，那天一早外出并非反常现象。在出发之前，他也携带当天出炉的新鲜面包上路，途中，家人皆因食用这种面包中毒，说明他全然不知面包中有毒一事。此外，他的裕盛办馆是专门为洋人所开，现在生意正火，他怎么会加害自己的主顾，断自己的财路呢？至于受两广总督指使一说更是没有根据。广东方面与张阿霖不但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还要制裁他，因为他在香港为洋人服务，为许多国人所不齿，在广州的一家分店也被人烧毁，还受到恐吓，要捉拿他在老家的亲属，所以不可能受人指使。

尽管如此，张阿霖依然被法庭提审，并于 2 月 2 日正式开庭审理。经初

步侦查，中毒确因投毒所致，但始终找不到嫌疑犯的投毒证据，审讯 3 天仍无结果，法庭只得宣判张阿霖等人投毒罪名不能成立，无罪释放。但那些因食用毒面包中毒的洋人不肯轻易罢休，他们宣称要用私刑来处置张阿霖等人。港英当局只好再次将张等拘押起来。5 月 8 日，根据英国殖民地部的指示，在找不到投毒证据的情况下，此案可不再审，将所有有关人员全部驱逐出境了事。张阿霖选择了越南西贡。

这件事发生之后，港岛的洋人再也不敢到中国人开办的面包店购买面包了，都到下环英人的店铺里去购物。不久，英人的面包房又遭火灾，烧毁面粉千余包，损失惨重。

这桩毒面包案真相如何，究竟是谁放的毒，至今仍是个谜，但投毒之事却是千真万确的，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件令香港人民开心的事。无论是何人所为，原因都是不言自明的。当英国人的炮舰血洗广州城，民族矛盾白炽化的那一时刻，有血气的中国男儿难道能够坐以待毙，无所作为吗？革命导师恩格斯曾在“毒面包案”发生之后，作过十分精辟的评论：“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人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①]

动人心魄的“新界”保卫战

1898 年 6 月《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经近一年的勘察和定界，次年 3 月，英国人准备正式接管“新界”。消息传来，“新界”居民无不义愤填膺，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抵抗侵略者，保卫家园。

3 月 28 日，港督卜力派遣港英政府警察司梅轩利前往“新界”大埔墟搭建一警棚，为在此地举行升旗和“新界”交接仪式作准备。当地的居民坚决反对，但英国人丝毫不予理睬，梅轩利命令强行动工，从而诱发了“新界”居民的武装抗击行动。就在当天，锦田、屏山、厦村的乡绅召集八乡的乡绅开会，以“寻求自卫之道”。他们广泛散发传单寻求支持，号召群众参加抗英行动，并将替英人修建警棚的雇工全部赶走。

梅轩利发现雇工不知去向，预感到事情不妙，连忙赶回香港向港督报告，希冀借两广总督的手来制止“新界”人民的反抗。4 月 3 日，梅轩利率领 6 名锡克族警察和从九龙城中国驻军中借来的 5 名勇兵前往大埔“维持秩序”，企图用华兵来代替原看守警棚的印度警察。他听说乡绅们正在当地的文武庙里开会，便到会场上去炫耀武力，与当地百姓发生口角。人们用砖石、棍棒、椅子、木桶、扫帚向这些不速之客发起攻击，并串联四面八方的百姓都来参战。梅轩利一见大事不好，连忙趁着混乱躲藏起来。这时，夜幕已降临，人们还是源源不断地从各地赶来，愤怒的群众将正在修建中的警棚燃之一炬，然后开始搜查梅轩利。梅轩利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藏匿于草丛之中，并派人赶紧回去求援。

卜力得知警棚被焚，梅轩利处境危急，立即派遣 100 名英国皇家威尔士枪手分乘两艘鱼雷快艇赶赴出事地点，待英军到达时，人们早已散去，只剩下被烧毁的警棚还冒着缕缕青烟。卜力认为这只是当地人的一时冲动，过后便会平息下来。但是，他完全错了。此时的“新界”人民正在积极准备发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0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新的斗争，一场反抗英国侵略军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4 月 15 日，当梅轩利率领数十名警察再次赶到大埔，保护为举行升旗仪式赶建的警棚，并竖立旗杆时，与四面八方赶来的 2000 余名民众相遇。英国为升旗仪式准备的警棚，又一次被付之一炬。侵略者动用了舰艇上的大炮猛击抵抗者的阵地，抗英战士终因武器装备落后散去。 16 日，接管“新界”的升旗仪式在大埔附近的旗竿山上匆匆举行。驻港英国陆军司令加士居、海军准将鲍威尔率领 400 名英军列阵会场，港府辅政司骆克在炮兵的礼炮声中，将一面丝质英国国旗慢慢升起，并宣读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香港行政局的命令，宣布从 1899 年 4 月 16 日下午 2 点 50 分起，“新界”的中国居民归英国管辖。

英军在升旗仪式完毕后继续向西推进，但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中国人的顽强抵抗。 17 日，英国军舰“汉伯”号和“孔雀”号停泊在大埔码头，这时的大埔墟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景象，码头上一片死寂，居民迁徙一空，致使英国人连一个苦力都找不到。下午一时许，几千名抗英志士突然出现在大埔附近的山头，并用几门重炮猛击英军营地。加士居立即下令狂轰抵抗者阵地，并由伯杰上尉率领香港团队的两连人马向山上发起进攻。抗英队伍英勇作战，终因抵挡不住英军的优势火力，再度退却，埋伏在林村山谷，等待英军步入埋伏圈。

林村山谷谷道狭窄，宽不过 1 华里，长大约 3 华里，谷底平面皆为稻田，仅有一条小路贯通。待英军进入谷道后，抗英部队便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地发起攻击。英军受到袭击后，立即退出山谷，选择易于隐蔽的地形向山上迂回攀登。抗英队伍在处境被动的情况下，又坚持抗击了 1 个半小时，然后沿着山脊经上村向八乡的方向退去。英军完全占领山顶后，发现抵抗者已不知去向。曾参加过林村战斗的一个英军士兵后来回忆道：抵抗者“阵地选得好，要是他们枪打得准，英军本来是会倒霉的”。

4 月 18 日，在锦田的吉庆围英军再次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当时的锦田，分为吉庆围、泰康围、南围与北围四个村寨。吉庆围是锦田邓族的乡院，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院的四周筑有两丈高的围墙，墙外有一条护城河，院子的入口处装有一扇铁门，这是邓氏家族流传下来的珍宝，已有 300 多年历史。英军进犯锦田时，这里的人们以犁镐、木棍、火枪作武器，以护城河和围墙为屏障，与英军对垒，英军屡攻不下，最后只得动用大炮轰破了围墙才攻了进去。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里，许多村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倒在血泊之中。

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者为了炫耀自己的胜利，将吉庆围的铁门卸下，当作“战利品”运回伦敦巡回展出。直至 1924 年，邓氏家族的父老乡亲，才正式向港督司徒拔提出了归还铁门的要求，经多方查找，终于发现它的下落，并于 1925 年将铁门运回香港，邓氏族人将它披红挂彩地搬回吉庆围，并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把它重新安置在原处。为了让子孙后代铭记铁门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特在铁门边围墙的右侧镶嵌了一块石碑，以告诫后人。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适前清光绪已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清政府将深圳河之南际，租与大英国。斯时清政府未将命令颁布，故英军到时，各乡无知者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围人民，恐受骚扰，坚闭铁闸以避之，而英军疑有莠民藏匿其间，遂将铁闸攻破；人围时，方知皆是良民妇女，故无薄待情事，将铁门缴

去。”[①]

很显然，这段碑文为了避免激怒港英当局，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将这段往事表达得十分婉转，不敢直言道出当年乡民英勇抗击英军的实情。但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仍可感受到浓浓的炮火硝烟，英军破门而入，又凶残地将铁门作为战利品掳走，一场鏖战当在不言之中。它是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入侵的永不磨灭的历史见证。

风云激荡的海员、省港大罢工

进入 20 世纪以后，香港的反帝斗争不断发展。在 20 年代之前，香港市民的斗争目标集中在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抵制洋货等方面。

1908 年 9 月 26 日，《南洋早报》登载了一个英国殖民者的一封信，提出应在公共场所，如公园和电车上划分洋人和华人的界限，不得逾越。这封充满种族歧视的信函激起了港人的强烈愤慨，他们通过各种舆论工具进行了坚决反击。 11 月，一艘日本轮船私运军火抵达广州，在附近海面上被中国军队截获。日本当局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中，不仅不向中国赔礼致歉，反而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道歉、赔款并释放扣押船只和人员。广东各地人民举行各种抗议行动，香港居民也积极响应，愤起捣毁了日本人贩卖日货的商店，表现了极高的爱国热情。

1913 年 10 月，港英当局公布了《禁止通用外国纸币货币条例》，禁止外国货币包括中国货币在香港市面上流通。条例公布后，英商经营的电车公司首先拒收中国货币，市民哗然。他们普遍认为，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香港就拒受中国货币，这是在藐视中国政府的尊严，伤害了香港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于是，发起了抵制电车运动，数月之内，乘车人寥寥无几，迫使港府不得不将条例推迟执行。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香港人民积极响应。他们涌至日本人开设的商店门前，投掷石块，高呼口号，号召大家一起来抵制日货。一时间香港提倡国货，反对日货的运动风起云涌，国产的布匹十分畅销。就连一些中小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将家中的日货主动交出，并在中环警察署附近当众烧毁。港英当局被这种抵抗浪潮所吓倒，连忙取消所有警察的假期，荷枪实弹地在日本商店门前昼夜巡逻。并清理学生课本中的反日内容，对涉嫌有“过激”行为的学生严格监视，限制其活动自由。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香港人民的反帝斗争主要以工人运动为主。最著名的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工人大罢工。

1922 年 1 月，在工人运动领袖、共产党员苏兆征等人的发动和领导下，香港海员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要求英国资本家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待遇，使香港沿海航运几乎全部陷入瘫痪。罢工前后，正值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处于鼎盛时期。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广州政府对这场以经济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劳工运动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海员罢工爆发时，孙中山正在桂林整军筹划北伐，他获悉罢工的消息后，急电令国民党员马超俊“迅速赴港慰问，并予就地调处”。马氏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垦夜到港，亲切

[①] 黄南翔：《香江岁月》第 62 页，1985 年香港奔马出版社出版。

慰问罢工海员，“海员得悉国父的关切，更为感奋”。[①]

港英当局对此十分惊慌，宣布戒严，并强令工人复工。罢工的工人坚决不妥协，分批撤离香港，返回广州。到 1 月 19 日，回到广州的工人已有 5000 人左右。广州各工人团体热情接待来自香港的兄弟，在广东省总工会的倡议下，全省 27 万工人，每人捐献一天的工资，援助香港的罢工工人。广东政府也积极给予经济援助，据 1985 年台北出版的《中国职工运动史》记载，广州政府每月借出数千元，前后计约 10 万元，为罢工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港英政府为了压制工人运动，于 2 月初下令封闭了海员工会，但海员们仍然不屈服，表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为了有力地支持海员的罢工行动，香港海陆理货会工会、同德劳动总工会、集贤工会和煤炭工人也举行罢工。香港工人运动霎那间形成了燎原之势，港督司徒拔在写给英国殖民地部的报告中惊呼：“形势有些严峻，因为海员罢工不单纯是一场经济运动，而是一场政治运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是此次罢工的幕后组织者。广州政府已完全处于这一具有布尔什维克性质的组织的控制下。毫无疑问，极端主义者站在孙的一边。”[①]远在英伦三岛的英国政府急令香港总督迅速解决罢工问题，不可任其蔓延。

到了 3 月份，罢工的工人已增加到 10 余万人，工人们仍然在源源不断地由香港返回广州。3 月 4 日，当一批罢工工人行至九龙沙田时，遭军警阻拦，阻挡不住便开枪射击，当场打死 6 人，伤数百人，面对港英政府的暴力镇压，工人们更加团结，继续罢工，决不妥协。无计可施的英国人只好请求广东革命政府出面调解，在广东省省长和广东总商会的周旋下，港英当局被迫宣布取消对海员工会的封闭令，释放被捕工人，并同意增加工资。罢工取得了全部胜利，工人们欢欣鼓舞，通宵达旦地庆祝自己的胜利。广州几十万工人也在东校场举行大会，欢送香港工人胜利返港。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标志着香港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为即将到来的新的工人运动高潮准备了条件。

1925 年 5 月，上海日租界警察枪杀了棉纺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 28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加强对罢工运动的领导，把经济斗争引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5 月 30 日，上海人民的反帝示威游行遭到英国军警的血腥镇压，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香港工人一向对内地的革命抱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为了动员香港工人声援内地的爱国运动，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派秘书长邓中夏去香港，和苏兆征一起领导罢工斗争。从 6 月 19 日起，香港的海员和电车、印刷工人首先罢工，其他在港工人积极响应，半个月内，参加罢工的工人就增加到近 20 万，并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全港工团委员会，在全港工人的一致支持下，全港工团委员会代表工人向港英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其中包括：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的自由；香港居民不分国籍享受同等法律待遇，取消对华人驱逐出境及答刑等行为；制定劳动法，规定最低工资、废除包工制、保障女工和重工生活、实行 3 小时工作制与劳动保险制；华人有居住自由权，消除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等条件。

从这些要求中可以看出，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人阶

[①] 中国劳工运动史编撰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一册，第 182 页，1985 年台北出版。

[①] 《港督致殖民地大臣电》，1922 年 2 月 28 日，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29/474。

级本身的局部利益，而是从全体香港人的利益出发，代表了香港所有居民的一致要求。斗争的目的也不再停留在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经济要求上，而发展上升为争取民族平等自由、反对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治斗争。

港英当局对罢工工人的要求，根本不予考虑，并宣布紧急戒严，调集大批英军进入市区，手持武器的英国和印度军警出没在大街小巷，四处搜捕罢工工人。为了对支持香港工人罢工的广东政府施加压力，香港当局还宣布禁止向广东出口粮食和煤炭，派出三艘军舰驶入广州内河进行恐吓。

6 月 23 日，中共广东区委在陈延年、周恩来的领导下，广州各界群众 10 多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声讨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英军竟向人群开枪，当场死伤 200 余人，这就是闻名全国的“ 沙基惨案 ”。惨案发生后，越来越多的省港工人加入到罢工队伍中去。为了加强对罢工运动的领导，7 月 3 日，以苏兆征为委员长，邓中夏、廖仲恺为顾问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下设干事局、财政部、工人纠察队和宣传部等机构，负责处理罢工斗争的日常事务。为了从经济上打击港英殖民者，罢工委员会宣布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并为此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工人纠察队，共产党员徐成章、陈赓等分别任工人纠察委员会委员长、纠察队总教练等职，主　　要任务是维持秩序、封锁海面、稽查私货，不给香港提供食物供应。

大罢工使香港的运输中断，工厂停工，公用事业瘫痪，肉食和蔬菜等物资严重短缺，价格暴涨，街道垃圾粪便堆积如山，香港一时变成了“ 死港 ”和“ 臭港 ”。大批轮船停滞港内，货物进出不得，市井萧条，商号店铺纷纷歇业，股票价格暴跌，银行挤兑成风，商界人士惶惶不可终日。港英当局万般无奈，只好一方面颁布紧急戒严令，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搜捕罢工领袖，一方面幻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7 月 27 日香港政府致电英国政府，要求出兵广州，8 月 25 日，再次致电英国国王和首相，力陈出兵广州方可解香港之围。是时，英国本上工人也在举行大罢工，英政府自顾不暇，只得在回电中表示，尽管十分关注香港局势的发展，但从全局考虑，实在无法出兵，请当地政府自己设法平息。

在罢工的打击下，英国对华贸易损失惨重。据统计，在 19241925 年间，英国对华贸易额在中国全部进口贸易中所占比例从 12.4%降至 9.8%，即从 2890 万英镑下降为 1970 万英镑。港英政府无可奈何，只得任命在香港政府供职 14 年之久，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熟悉的金文泰为新任港督，与广东政府谈判，寻求通过交涉解决罢上的新途径。　1926 年，中英双方的谈判尚在进行，鉴于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为稳定革命后方，排除帝国主义的干扰，支持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经研究认为，罢工封锁斗争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 10 月 10 日主动宣布取消对香港的封锁，结束罢工。

长达数月的罢工运动给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使他们意识到，排斥占人口总数 96%以上的华人，香港的政局不可能稳固，经济也不可能繁荣和发展，必须改变以往的管理方式，吸收一定比例的华人参政。从第 17 任总督金文泰开始，香港突破了行政局历来不许华人参与的传统，首次委任了一名华人为行政局议员，以后又扩大立法局组织，增加了两名华人非官守议员。还在教育上进行了改革，香港大学一改过去只用英文授课的做法，增添华语课程，并增设了中文系。

1925 年的大罢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最重要的事件。通过这次罢

工，香港人民不仅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为自己挣得了一定的权利。从此，华人参政、争取民主权利、扩大华资力量等一系列问题便脐身于香港的社会生活，成为香港人民关注的焦点。

第五章　令人目眩的历史变迁

从 1841 年到 1941 年的 100 年里，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　　民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含辛茹苦，艰难创业，把一块默默无闻　的土地建设成一个世界闻名的国际都市，这其中浸透着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

起步蹒跚的丑小鸭

在英国人刚刚占领香港这片土地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价值。由于英国远东贸易的中心一直在印度，因此，在他们的眼中，香港岛只不过是进行鸦片贸易的一个中转站。

1844 年，香港财政司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年度报告，认为香港没有任何可观的贸易，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任何机会能成为贸易中心。

使尽一切卑劣手段弄到手的香港，难道就此放弃吗？怎样才能吸引商人和投资，更好地开发和利用香港，成为英国政府立即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许许多多的建议中，前驻华全权代表兼商务监督义律的意见十分引人注目。义律是当年极力主张侵略香港的英国官员，对香港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十分熟悉。在率领军队占领香港后，他曾仔细研究过这个小岛对英国远东贸易的作用。根据他的分析，香港地域狭小，自然资源缺乏，甚至连居民的口粮和大部分日用品都需要依赖进口，与中国内地的交通又不方便，实在不是商家首选之地。要想使这块地方繁荣起来，唯一的选择就是实行自由港政策，允许商品自由出入，不收关税。否则谁也不会把货物运到这里，先向英国人交税，然后再转运其他地方。

所谓自由港，就是指商品可以免征关税自由进出的港口，海港地区或海港城市。它来源于英国 18 世纪的古典经济学，是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产物，目的是尽快地繁荣自由港本身。在获得英国政府的同意后，义律于 1841 年 6 月 7 日，也就是香港被正式割占前一年多，宣布香港为远东第一自由港，允许各国商人和货物自由进出，中国人出入境也来去自由，不受任何限制。

自由港政策果然奏效。　1841 年以后，它不断吸引世界各地的货物、资金、技术和人才，前来开发这个渔岛，转口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与转口贸易相关的其他部门，如航运、船务、港口、码头、货仓、保险、银行、邮电通讯等行业也应运而生，香港开始有了生机。

1843 年，是英国人开发香港决心再次动摇的一年。这一年，上海、宁彼等五口开始通商，许多外国人都转移到上海等地去寻求发展，驶入香港的商船数量大减，下半年起，香港又开始流行瘟疫，许多外商染病身亡，大批商人望而却步，一些商行逐渐迁出，刚刚有所转机的香港又面临新的危机。直至 1845 年，情况仍无大的改观，　31 家英商在这一年的 8 月联名上书英国殖民地大臣，表示“香港已无商可经，只可供香港政府及其官员作为驻节之地，并收容一批身无所长的贫民而已”。就连港府的高级官员中，也出现了放弃香港的主张。当时任库务司的英国官员马田在写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驻港英军由于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和气候，两年内就死亡 300 余人，香港不是欧洲人的久留之地，也不可能发展成一个商业城市。

为了减少损失，增加港府的收入，英国人加紧发展鸦片贸易，利用这一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来启动香港的经济。据统计，1845—1849 年，由印度

运到远东的鸦片中，有 3/4 是经过香港转销内地的。其总数达 16.5 万箱，价值约 8300 万元。鸦片贸易在每年的进口贸易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以 1864 年为例，香港全年进口的几大类商品货值折合成白银分别是：棉织品：700 万两，毛织品： 500 万两，五金： 200 万两，鸦片： 2 000 万两，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就在香港艰难挣扎之际，一个“天赐良机”再次使它摆脱了困境。1850 年前后，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澳洲相继发现了金矿。金子——这一令人发狂的东西，极大地刺激了西方人的贪欲，为了尽快地“掘地三尺”，挖出地下宝藏，他们急需大批廉价劳动力。一些国际人贩子看中了中国的劳力市场，他们跑到中国来，用种种欺骗手法诱惑了大批穷苦的中国人与其签订卖身契约，承认自愿前往异国他乡，然后远渡重洋去充当“淘金”苦力。英国商人又看好了一桩新的买卖，这就是罪恶的劳工贸易。

当时前往美国和澳洲的主要路线是由陆地到达香港或厦门，再由这两地分别乘船出洋。大批劳工借道香港出国，使香港原本就有的劳工贸易再度兴旺起来，大量的劳工贸易和运输为各国殖民主义分子聚敛了惊人的财富。当年从香港开往美国的劳工船的客运成本每人不足 5 元，然而，每张船票售价为 55 元，利润竟高达 10 倍之多。仅 1852 年，经香港乘船到旧金山的华工有 3 万多名，香港商人从中赚得的船票利润就达 150 多万。1872 年，美国记者凯利在一篇报道中曾这样描述说：“我到苦力船上看过，送到市场上去的 900 名活人，对于苦力商来说，就等于 45 万元的财富，而他们原来花费的成本，总共不到 5 万元，运到古巴后便可赢利 40 万元。即使是在非洲黑奴贸易的鼎盛时期，也从来没有实现过这样惊人的利润”。除了到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外，还有许多华工被贩往秘鲁、古巴及南洋等地当苦力。据统计， 19 世纪下半期，被拐贩出国的劳工约达 205 万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途经香港中转的。

华工在装船前，都要被迫脱去上衣，胸前用英文字母烙上印记，以标明将要被送去的地方。劳工大多是以“赊单工”的名义前往海外的，其船费由招工代理人垫付，到达目的地后从所得工钱中加利扣除，在还清欠款前他们没有行动自由，一切都要听从债权人的驱使，实际上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临行前，他们不仅被烙铁烙得遍体鳞伤，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在极度悲愤和矛盾的心理中被人像赶“猪仔”般地撵进拥挤的货舱，运往遥远的彼岸。由于船上的居住、卫生和饮食条件极差，大量的劳工惨死在运输途中。请看下面的一组数字：

1850 年 2 月，一艘由香港开往秘鲁的英国船只，出发时载华 1450 人，到达目的地时仅存活 150 人，途中死亡 300 人；

1856 年 3 月，一艘由香港开往古巴的船只，出发时有华工 298 人，到岸时仅存活 163 人，途中死亡 135 人；

1861 年 10 月，一艘由香港开往；日金山的法国船只，出发时载华工 1000 余人，竟无一人活着看见目的地的海岸。

忍无可忍的华工们为了生存，也曾以暴动来反抗人贩子的非人虐待，但苍茫大海何处藏身，得到的往往是更残暴的虐待。有记载说，1872 年 8 月，一艘由澳门出发的西班牙籍船运载着 1005 名劳工前往古巴，劳工们不堪忍受船主非人的折磨，在开船的 4 天内就连续发动了 3 次暴动。暴动失败后，船主将他们锁在舱底，或分批捆绑在船栏上，用皮鞭反复抽打，还往流血的伤口上泼撒盐水……

香港除了作为运送劳工的主要中转码头直接获利外，还是澳门等劳工转运码头的基地，从改装和修理船只、供应粮食和淡水等方面获取间接利润。几乎所有的苦力船都是在香港进行改装的，将货舱加一夹层以便运载更多的劳工，安装舱门铁栅以防范劳工途中反抗等。据统计，从 1845—1874 年的 30 年中，经由香港贩卖到世界各地去的“赊单劳工”共有 266 326 人，香港的旅店、粮店、运输、经纪等行业无不从劳工贸易中获取暴利。血腥残酷的华工贸易既给英美等国的好商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对香港初期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刺激作用。

在同一时期，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迅速席卷了整个南方，并在南京定都。战乱使国内人心惶惶，华南一带的有钱人家为了躲避战争，携带家人和财产逃至香港，给香港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他们利用这些资金在香港投资，开办商店和实业，使香港的市区进一步繁华起来。长江一带是太平军与清军对峙争夺的主要地区，使南北交通受阻，人货均无法往来，迫使航运线路南移，一些华商便看好香港，利用香港海域沟通南北运输。于是，北方生产的花生、大豆、药材等，都要通过香港转运到南方各地，而南方出产的丝绸、大米、木材、白糖等物品，也要经过香港转运到北方。专门经营南北货物流通的“南北行”，专门将南北方土特产贩往南洋和北美的“南洋庄”和“金山庄”，作为一种新兴的行业，迅速兴盛起来。

受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香港终于站稳了脚跟，迈开了走向国际化都市的第一步。

人·地·港

人，是万物之灵长，只要有了人，便可以拥有一切，也可以创造一切。

在 19 世纪后半叶和 20 世纪初，大批怀着满腔热情和抱负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涌向这片土地，准备一试身手和运气，寻找一方适合自己发展的土地。于是，香港的人口逐渐递增，为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扩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让我们通过这样一些统计数字来看看香港人口的发展情况：

1841 年 5 月，英军在强行登上港岛后曾发布了一份公报，说当时香港岛上的人口为 7450 人，其中包括农村人口 4350 人，水上人口 2000 人，其余为外来流动人口的小贩。仅仅过了不到一年，在 1842 年的 3 月，港岛的人口就上升为 15 000 人，与上一年的数字相比正好翻了一番。其中英国人、印度人和葡萄牙人约有 1000 人，在 8 月英国正式割占香港时，人口已接近 2 万。

1841—1860 年，是香港人口高速增长期， 20 年间增加了十几倍，由原来的 7450 人增加到 94 917 人，这种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割占九龙后，地域的扩大，人口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内地发生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的人口流动。

1898 年“新界”被英国人强行租借后，香港人口剧增至 254 400 人。

此后， 20 世纪初期的辛亥革命，以及 30 年代爆发的抗日战争，都引起了内地人口向香港移居的高潮。据统计， 1906—1911 年间，香港人口从 32.9 万增加到 45.7 万， 1936—1941 年间又从 98· 8 万增加到 163·9 万。香港成为内地人名副其实的“避风港”。

在香港历年增加的人口中，有 97%都是从各地迁居去的中国人，他们是开发和建设香港的主力军。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为人类充分展现其聪明才智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它宛如一张白纸，让人们去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去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

在英国人强行租借了“ 新界 ”后，香港的面积一下子扩大了 10 倍。但随着人口的猛增，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再加上山多平地少，香港需要更大的空间来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上地从何处来？香港大胆地选择了沧海变桑田的开山填海计划。

第一次填海是在 1846 年，将今天皇后大道一带的海滩填平，沿着海岸线开辟了皇后大道。后来又不断地填海，海岸线也不断后退，到 1856 年，海岸线已退至现在的德辅道北，皇后大道也不再是傍海的主要街道了。第四任港督宝灵上任后，为了进一步推动香港的基础建设，计划在海军湾至铜锣湾一带大举填海，因为改变了地理经商环境，伤害了某些英商的利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后来工程只得移至黄泥涌入海处和西盘营海滩进行，这一工程使香港的东西走向扩展了许多。

在早期的开山填海工程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 1887 年提出，1890 年开始实施的中区填海工程。该工程从西盘营的屈地街到中环的海军船坞，全长 3 公里多，前后历时 15 年。工程完成后，香港的海岸线又向北推进，德辅道也不再靠海，一条新的人工马路——干诺道出现，并成为香港中心商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在百余年中，香港共进行了大小填海工程 100 多个，填得土地 20 平方公里，占全香港城市发展土地总面积的 1/5。开山填海对于香港城市发展的作用可以用以下的数字表明：

香港居民约有 60%居住在填海地区；

在一个面积 6 平方公里的港岛填海区里，集中了全港的中心商业区、最大的交通走廊和所有的工业区；

著名的香港国际机场——启德机场以及货柜码头都建在填海区上。

有了土地，便有了发展的基础和资本。伴随着航运和贸易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香港的金融业首先崛起。香港的第一家银行是 1845 年开设的东藩汇理银行，又译作丽如银行。其后，渣打银行、有利银行、阿格拉联合服务银行等也相继开业， 1865 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正式开业。由于实力雄厚，又得到港府的支持，这家银行迅速成为香港金融界的支柱，在吸收存款、发行货币、控制贸易、垄断国际汇兑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2 年，第一家华商银行——广东银行在香港开业。此后，康年储蓄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等华人银行陆续在香港成立或设立分支机构，外商独霸香港金融界的局面逐渐被打破。

在金融业发展的同时，香港的货币体制也进一步完善。为了统一货币，港府于 1862 年初制定了市制改革方案。规定从 1862 年 7 月 1 日起，以香港银元为主市，以香港铜元为辅市，其他各种货币按一定的货币汇率折合成香港货币进行结算。1863 年，在英国铸造的香港一仙铜币、一角银币和一分铜币开始投入流通。1866 年，由香港造币厂铸造的香港一元、半元及一毫银币面市，香港独立的货币体系初步形成。1872 年，港府委托汇丰银行首先发行纸币，但流通量始终不大，直到 1911 年民国成立后，中国内地开始市制改革，香港才乘机颁布条例，禁止其他货币流通，最后统一了货币。

随之兴起的是交通业。早在 1898 年，香港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就联合组

建了中英银行公司，积极筹集兴建中国铁路的资金，准备与英国人争夺兴建华南铁路网的权力，在当时的计划里，广九铁路亦包括在内，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行。1904 年，第 13 任港督弥敦走马上任，他是工程师出身，不仅年轻气壮，精力充沛，而且锐意开拓，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他上任不久，就敏锐地意识到，要想使香港的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就必须学习欧美国家的经验，架桥铺路，发展交通运输业，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打下良好的基础。

经两年的筹划，1906 年广九铁路开始动工修建，1910 年 10 月 1 日，九龙尖沙咀至深圳罗湖之间 22 英里长的广九铁路香港段首先开通，第二年 8 月 14 日，深圳到广州段也全部竣工。这条铁路的兴建耗资百万，但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由于采用了标准轨距，故能与粤汉、京汉以及京沈及中东铁路接通。使香港和内地的铁路网连成一个整体，大大方便了香港与内地的交通，加速了原材料和商品的进出口流通，香港转口港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人们常说：“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意思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周围的环境，尤其是资源条件。香港拥有辽阔的海面和优良的海港，这就是英国人命名的“ 维多利亚港 ”。

维多利亚港处在亚太区的核心地带，居于北京、印尼纵线与东京、印度横线的交汇中心，是世界航道要冲，也是欧美、日本进入南中国的最重要的门户。从时间区域看，香港在伦敦与纽约之间，纽约日落香港就天亮，香港日落伦敦就天亮，使香港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昼夜 24 小时营业的重要环节之一。香港正是依靠这一优势，构筑起经济起飞的高台。

为了充分利用海港的优势，香港加快了港口设施的建设。1861 年，第 5 任港督罗便臣委派海军上尉亨利 · 汤式任香港港务处长兼海事裁判官。汤式上任后，立即制定了一个《港口与海岸法案》，对进出港的船只进行管制，以维持港口的秩序。还在港岛最高峰扯旗峰上，建立了一个讯号台，指挥来往的船只进出港口。1862 年，为了使众多出海的船只在气候骤变的时候有个安全的地方躲避，又在铜锣湾兴建了避风港。 1875 年 4 月，在港岛东南部鹤咀环南端海岸修建的第一个灯塔正式启用。 1883 年，香港天文台落成，港口的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进出香港的船只日益增多，航运业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先导行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香港商人利用欧洲各国忙于战争，经济普遍衰退之机，积极拓展远东市场，给香港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1916 年起，香港航运量直线上升。到 1924 年，航运总重量达到 3500 万吨，比大战前的最高记录增加 50%以上，使香港作为远东最大转运港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随着航运业的发展，造船业和修船业也逐步兴起， 1863 年 7 月，，几家经营航运业务的英国商人，集资开办了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后来，黄埔船坞公司又吞并了联合船坞公司和四海船坞公司两家大企业，成为香港修造船的支柱，进入 20 世纪以后，香港造船业逐步改变了过去依赖英国本土的局面，开始建造大型船只。1917 年 3 月，号称是英国海外建造的最大商船“ 爱图里加士 ”号在太古船坞下水，黄埔船坞也造出了万吨轮“ 战鼓号 ”。继造船业兴起之后，仓储业也逐渐走红， 1871 年，从印度加尔各答来香港闯天下的两个英国商人保罗 · 遮打和凯福 · 晓士合伙向港府买下湾仔一块空地，

创办了香港码头及货仓公司，这是香港第一家专门经营仓储业的公司。后来为了业务发展的需要，迁往尖沙咀，并改组成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一直延续至今，不仅在香港是榜上有名的大企业，在国际上也有较高的知名度。

1869 年埃及苏伊士运河通航后，大大缩短了香港与欧美各国之间的航程。两年后，香港与伦敦、纽约、上海及新加坡的直达电报线路开通，将香港的工商贸易与欧美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商品流通加快，周期缩短，促使香港经济发展速度更加迅速。欧洲越来越多的商人们认识到了香港的价值，纷纷来港投资建厂，从事贸易，建造起风格各异的居住楼房和小区，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香港建立起领事馆，保护自己的侨民，帮助本国的商人。香港已越来越具备国际都市的特殊风采了。

璀璨的华人群星

香港，这个后起的都市，是无数有志之士大显身手、创造奇迹的地方。

在早期开发香港的群体中，华人一直充当着主力军和拓荒者的角色，他们有的是贫寒人家的子弟，有的是流落香港的难民，有的是内地迁去的移民，也有的是土生土长的渔民，然而，他们却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香港人。他们凭借着香港得天独厚的区域特点，以及比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凭借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中国人特有的楔而不舍的顽强拼搏精神，在各种机遇和险境里摸爬滚打，一身泥泞、一身血汗地艰苦奋斗着。在长达数十年的拼搏中，他们失败过，跌倒过，但又顽强地爬起来，咬紧牙关，挺直满是伤痕的躯体，朝着不可预测的前方奔去，在香港经济发展的奇迹中，他们也在不断地创造着个人自我价值实现和超越的奇迹，并将自己当作一砖一瓦融进香港的摩天大厦之中。

在英国占领香港之初，港府的官员都是英人担任，中国人是没有资格和权利参政的。即使是一些由社会名流组成的社会团体中，华人也被排斥在外。后在华人的一再抗议和要求下，情况才稍微有所改变。据记载，最早参与政事的有华人参加的组织是“太平绅士”组成的治安委员会，这个组织的英文原名为“JUS-TICE OF PEACE”，是香港政府进行社会监督并维持社会治安的社会团体，被任命为太平绅士的均为社会上流人士，享有很多义务和权力。如：依据香港治安法例，可以制止非法集会，并有权随时入室逮捕社会危险分子；可以拘捕聚众赌博者和吸食鸦片者等。虽然除警界人士外，很少有人真正履行这些职权，但拥有太平绅士的头衔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首先涉足香港政界的华人是黄胜。黄胜字平甫，就读于英国开埠之后开办的马礼逊学校，通晓英文，接受西方文明较早。后曾赴美留学学习法律，知识广博，在华人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威望。1883 年 12 月，他被任命为香港高级法院的高级陪审员和香港社会治安委员，由于政绩卓奢，最后又进入议政局任议员。黄胜还是第一位被委任为太平绅士的华人。

1880 年，伍廷芳成为第一个担任香港立法局议员的华人。伍廷芳又名伍叙，广东新会人，早年留学英国，返港后执业大律师。晚清大学士翁同龢在日记中曾经赞许伍廷芳，说他“熟悉洋人律例，有志气，非征招不至，不应诸侯之聘也”。可见伍廷芳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人。除了专事法律之外，他还同黄胜等人在香港开办和发行《中外新闻》，影响很大。由于他富有才

干，精通律例，深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邀请他离港赴京辅佐朝政。1897 年起，历任清政府驻美国、日本、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民国成立后，又任外交总长、司法总长等职。伍廷芳离港后在立法院的空缺由黄胜顶替。

在香港最早获得爵士头衔的是何启和韦宝珊。何启字沃生，早年留学英国学习法律，考取大律师资格，并娶了一位英国下院议员之女为妻。返港后在法律界和商界都有较大影响，夫人病逝后，何启捐巨资修建了一座医院以作纪念。今天的启德机场的地皮，当年就归何启和区德二人所有，因此在机场命名时，从他们俩人的姓名中各取一字，叫做“ 启德 ”。韦宝珊是香港初期著名翻译家韦光的儿子。他也在英国留过学，是黄胜的女婿。韦氏主要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1880 年出任东华医院首总理，又创办了保良局。他曾任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十年之久，也是当年的太平绅士之一。港府之所以接纳华人进入政界，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人物具有较高的素质，在建设香港过程中发挥了杰出作用，另一方面也由于香港华人社团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华人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积累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外国人。1870 年以后，他们已不断开始收购英国人的产业，并冲破了英华之间的界限，成为香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20 世纪初，国内的义和团运动、同盟会运动、辛亥革命给整个中国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冲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香港人，已完全不同于他们的长辈，他们充满了进取心和自信心，开始与英国人争取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特别是一些从北美、澳洲和南洋归来的华侨，既接受了外部的新观念和新思想，又拥有相当的资金，理所当然地成为华人经济实力扩展的先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华商先后创办了利民兴国织袜厂、大兴织造厂、均安五金厂、中华电池厂等多家工厂。 1907 年以后，澳洲华侨郭泉、郭乐兄弟和蔡英辉、蔡子辉兄弟又先后开办了永安百货公司和大新百货公司。华侨马应彪、郑干生和香港富商林毓良也集资 2.5 万元，创办了先施百货公司，经营各国百货。马应彪是个很有魄力的企业家，在公司开张的时候，为了吸引顾客，树立新时尚，他大胆地启用女售货员，只此一招，招徕无数围观者，最后不得不求助于警察前来维持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欧洲正忙于交战，向世界其他地区商品供应发生断档之机，香港一些商人办起了生产毛巾、香烟、手电筒、罐头食品和搪瓷制品的小型工厂，产品畅销东亚各地，颇受消费者的欢迎。1919 年，第 16 任总督司徒拔到任，他抓住这个经济发展的好机会，在 1920 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香港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发展规划。两年后，又制定了“ 工厂法 ”等关于工商业的法令，推动港九的市政建设与开发，使香港经济在整个 20 年代都保持着一片繁荣景象。

1921 年，九龙巴士公司和中华巴士公司相继成立， 30 年代，他们又通过投标，取得了九港两地的公共汽车经营权，结束了香港岛上只有电车没有汽车的历史。著名的启德集团也投资建立了启德汽车公司，香港的市内交通全面进入了公共汽车的新时代，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香港的市政建设不断更新， 1927 年全港的最高建筑，9 层高的告罗士大厦落成；1936 年， 12 层高的汇丰银行新楼建成，成为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建筑物。

在几代华人的开发和奋斗下，一个全世界最自由、最开放、最多功能的

自由贸易港在中国的华南沿海落成。一座繁荣富庶的东方都市出现在世人眼前，这就是香港奇迹，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创造的奇迹。

第六章　日寇攻占香港人民奋起反抗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同日，日军开始进攻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日本正式向美、英、荷等国宣战。

次日，即 12 月 8 日，日军进攻香港。

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 黑色圣诞日 ”：总督挂起白旗

1938 年底，日军攻占广州。因为当时日本和英国还未正式宣战，香港得以暂时免遭战乱。在这段时间里，香港在中国抗战中具有不同寻常的特殊地位。

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战略物资运输问题。日本为实现“ 灭亡中国 ”的狂妄计划，竭力切断中国的军用物资供给线，中国沿海的港口多被封锁，只有香港得以保持开放。日本企图独吞中国，因而严重侵害了英国传统的在华利益及其在远东的地位，英日矛盾日益加深，因此，英国政府对从香港向中国内地舰运送物资采取了合作的态度。但在日本的武力恐吓下，英国又怕激化英日矛盾，因此对日政策越来越软弱，1940 年 7 月 17 日英日签订缅甸公路协议，规定自 7 月 18 日开始，在 3 个月时间内停止向中国运送武器、弹药、卡车、铁路物资和石油，并规定在缅甸禁运的物资同样也适用于香港。这样，香港这一“ 黄金通道 ”就被锁住了。

英方的妥协和退让，并未使香港免落饿狼之口。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开始猛烈进攻香港。

香港之战分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的战事在九龙。日军在酒井中将的指挥下对九龙守军展开全面进攻，重点突袭启德机场，并很快占领之，英军在城门水塘的山头上布置了重兵，拉出 11 里长的防线，但到 12 月 12 日，九龙、“ 新界 ”相继失陷。城门水塘山头上的英军起初进行了顽强抵抗。　11 日，日方在香港的“ 第五纵队 ”进行破坏活动，在英军阵地后方挂起太阳旗，英军以为后方已被占领，慌忙撤出战斗，逃回香港岛。

第二阶段战事在香港岛。从 14 日起，日军占据有利地势，炮轰香港岛。炮弹如倾盆大雨泻在兵营、要塞、街道和建筑物上，许多无辜市民惨遭杀害。此后，日军进行了两次小股部队的登陆尝试，均告失败。于是，日军 18 日开始大规模登陆。英方阵地上本来有许多探照灯，把海面照得通亮，限制了日军的水面行动。可是这天探照灯却全部“ 失明 ”，使日军得以在很短时间内顺利登岸。原来，日军指挥官总结了两次登陆失败的教训，决定先打掉英军的“ 眼睛 ”。由日工兵组成的敢死队，于大部队进攻前泅水到本岛，炸毁了电源。

日军登岛后，对聚集在各处的英军围而合击。由于英军多据守山顶等有利地形，日军进展缓慢。到 25 日，英军终于弹尽粮绝，这天早上英军统帅马尔比还发表圣诞文告，激励士气，但到中午，港岛就完全落入日军手中。下午，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统帅酒井中将投降。这次战役，英军死伤 4000 多人，日军死伤 2700 多人。

野蛮的统治疯狂的掠夺

日军占领香港后，矶谷廉介被任命为香港“总督”，在香港实行极为残酷的殖民统治。

为“纪念”在香港战役中死亡的日本军人，日香港“总督”下令建造了“忠灵塔”。塔基里放着一把由日本国内高手制造的宝剑，剑尖直指南方，象征着日本下一步侵略扩张的野心。这座标志着香港人耻辱的纪念塔于 1947 年 2 月 26 日被炸毁。

占领香港后，日军进行疯狂的报复、杀戮和掠夺。

首先是大规模搜捕欧籍人士。包括英国士兵、军官、政府官员、家属在内的共 7000 多人被囚禁于集中营中,饥饿和恶劣的卫生条件使 1/5 的人染上疟疾，很多人不堪病痛和折磨而死去。

同时，为了搜捕“抗日分子”，日军采取了各种手段来限制香港人民的人身自由。白军要求香港市民定时排队点名，在一定时间里禁止出行，在此期间日军在街上到处巡逻，遇到走动的香港人马上捕杀。日军经常分成许多小分队，沿街挨家搜查：先让每家人排到门口，按户籍进行核对，然后进屋搜查，如发现陌生人，一律逮捕。当时有许多家庭因有家人外出未能及时赶回而被视为嫌疑者，全家人因此受到迫害。也有的病重老人、孕妇不能出门排队而遭日本人殴打。

另外，日军以“慰安”为名，强行捕去大批年轻妇女充当“慰安妇”，供他们发泄。这些人大部分从此下落不明。即使有幸回家者，也大都因倍受摧残而神志恍惚。

日本人还经常进行突然性检查，深更半夜闯门入户，使人胆战心惊。

更为野蛮的是，日军以检查为由，肆意凌辱妇女、抢掠财物，无恶不作，居民对此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由于战争的严重破坏，日本强占的香港到处是瓦砾和弹坑，经济萧条，粮食严重不足。为此，日军采取野蛮的手段强行捕人押解离境，一时间香港人口大减。但即使这样，粮食仍要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天仅 6.4 两，最少时只有 3 两。日本运粮军车的后面，经常跟跑着拾取米粒的饥民，日本兵用枪托猛打这些面黄肌瘦的“饿鬼”，许多人倒毙街头。

同粮食一样，燃料也严重缺乏。为解决燃料问题，市民只有上山割草砍柴。山上布满了日军工事，很多人被日军的流弹打中而命归黄泉。许多市民只得用家具代柴。

日军占领香港的目的之一，就是进行经济掠夺。为掠夺港人的财富，日本驻港总督下令发行“军用手票”。这种“军用手票”连编号都没有，却 1 元当 2 元港市使用，后来发展到 1 元当 4 元港市使用。 1943 年 6 月 30 日，日本总督干脆下令禁止使用港币，违者严厉处罚。而日军却把港市回收后去澳门套买大量物资。

成功的香港文化人士大营救

日军的残暴统治，并未吓倒香港人民，各阶层人士不怕流血牺牲，以各种形式同日军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成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这一斗争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及民主人士在香港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营救留港文化人士的活动以及港九独立大队的抗日活动。1938 年 6 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联合中外人士组建“ 保卫中国同盟 ”（简称“ 保盟 ”），呼吁世界上所有向往和平的人们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不少在香港的国际友人参加了“ 保盟 ”，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党的夫人克拉克女士担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教授诺曼 · 法朗士为名誉司库。在香港的邹韬奋、史沫特莱等知名人士也都是“ 保盟 ”成员，其总部设在香港西摩道 21 号。“ 保盟 ”在香港的抗战救亡活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使香港成为国际援华物资中转站，二是动员香港各界资助身陷战火之中的内地民众。随着国际社会对华援助的逐渐增多，捐款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运抵香港，“ 保盟 ”克服了种种困难，利用各种方式把物资运往内地，对中国的抗日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支援。

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把留在香港的内地抗日文化名人作为重点搜捕对象。日军发布公告，命令这些文化名人到“ 大日本军部 ”或“ 地方行政部 ”报到，战前就活动于香港的日本文化特务还在各个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到日军司令部会面，企图威胁利诱这些社会知名人士为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服务。在这种形势下，这些文化名人如有不从，就会遭杀身之祸。

许多滞留香港抗日的文化人士来港时间不长，社会关系不多，又不会讲广东话，长久躲蔽不易，要想逃出更难。人们忧心忡忡，心急如焚，形势十分危急！

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始终惦记着陷入“ 孤岛 ”的文化名人，为解救他们，党中央急电中共南方工委，要调动一切力量、用尽一切方法保护这批文化精英，使他们全部安全脱离虎口。

当时正在香港坚持工作的中共南方工委的廖承志、张文彬、刘少文，粤南省委的梁广、连贯和因事也在九龙的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必须和日寇抢时间，趁敌人立足未稳，户口管理松散的有利时机，把文化人士秘密护送到东江游击区，再向大后方转移。

护送工作十分艰巨。九龙方面传来的情报告之，日军为了摆脱港九地区粮食和燃料匾乏的困境，决定把一批居民强行疏散到内地去。经过精心策划，在港的中共党组织抓住这一绝好机会，从 1942 年 1 月 5 日开始组织港岛的文化人士偷渡到九龙。偷渡指挥部设在湾仔路夹道的一幢洋房里，并在铜锣湾避风塘租用大盘艇作为海上转运站。

早在日军进攻香港前，东江游击队政委尹林平即指示部队：“ 一旦战事发生，就要向香港边界靠拢，以便接应在港同志的转移或撤退。 ”东江游击队在九龙半岛开辟了两条撤退路线：一是从青山道经荃湾、无朗等地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二是从九龙至西贡经过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文化人士偷渡到九龙后，先进入秘密集中点进行休整，然后由水陆两线分别出发。走陆路的文化人士经垄湾、大帽山、元朗、白石龙进入宝安游击区。在九龙至白石龙的百余里交通线上，游击队设立了荃湾、锦田、元朗、落马洲等多处接待站，以确保被护送人员食宿。

绝大多数的文化人士是混杂于回乡难民中经白石龙路线返回内地的，其中包括茅盾、邹韬奋、胡风、胡绳、章混、廖沫沙、袁水拍等。走水上交通线的是那些政治面目已暴露的人士。他们从西贡附近的小港湾乘船，由东江

游击队护航，渡过大鹏湾到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张友渔、韩幽桐夫妇、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女士、国民党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夫人姐妹以及电影明星胡蝶等，就是从这条路线撤退的。

营救过程中又开辟了第三条路线。因为考虑到一些长期居港，并且有很高知名度的文化人士走关卡林立的陆路易遭不测，指挥部便决定组织他们从水路直接出香港。他们中有的经长洲岛过伶汀洋到澳门，再由澳门的中共秘密联络站帮助前往广东台山、湛江等地，如范长江、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王莹、李少石与廖梦醒夫妇等；而何香凝女士、柳亚子父女则是从鲤鱼门乘船到西贡，在东江游击队海上巡逻队帮助下到达海丰的。

仅 1942 年头两个月,就有 800 余名爱国文化人士在中共南方工委的营救下离开香港。

使日寇胆战心惊的港九游击队

日军攻占香港时，广东的抗日游击队就有小批武装进入香港。如第三大队派出黄冠芳、刘黑仔、江水等率领武工队进入沙头角、西贡、大埔地区，第五大队派出曾鸿文、周怕明、黄高阳等率领武工队进入罗湖、元朗、沙田等地区，伺机发展武装。日军进占港九后由于兵员不足，只能驻守市区、交通要道及前沿防线，无力顾及“新界”山区，在“新界”以东沿海，西贡一带也是空白之地，入港游击队便利用这些空白地带谋求发展。

游击队刚刚进入港九，就有了不小的收获。日军进攻香港时，“新界”英军一触即溃，仓皇退却。遗弃了大量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这些成了游击队的军需补给品。游击队在“新界”的沙田、元朗、九龙的牛头角等地拾获轻重机枪 30 多挺，步枪数百支，还有大批药品和粮食。

由于战乱，“新界”地区群匪并起，经常打家劫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游击队迅速肃清了大小数十股土匪，开拓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1942 年 1 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见条件已经成熟，副书记张文彬便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拟坚持展开‘新界’游击战”的意见。同时，他在宝安游击区白石龙村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把几支武工队统一组成港九大队。 1942 年 2 月，港九独立大队宣告成立，香港工人出身的蔡国梁任大队长，香港青年知识分子陈达明任政委。

港九独立大队成立后，马上得到各处响应，人员迅速补充扩大，其中有内地游击队派来的干部和来自洋务工会、中华书局、东华三院等社团和企业的进步青年，还有港九沦陷后进入根据地经短期受训后又重返香港的爱国民众。 1942 年 5、6 月间，中共粤北省委遭到破坏，又有一批共产党员撤退到香港加入港九大队。在以后 3 年多的游击战中，港九大队的建制逐渐扩大。从大队成立到 1943 年 6 月，西贡区有沙田短枪队、坑口短枪队，沙头角区有长枪队、短枪队，上水区有林冲短枪队，元朗区有苏光武工队，此外还有海上队和大屿山队。1943 年 6 月，港九大队将各小队统编为西贡中队、沙头角中队、元朗中队、海上中队等 6 个地区中队，并于 1943 年 12 月组建了市区中队。

黄冠芳和刘黑仔领导的沙田短枪队，在狮子山、茶果岭、牛池塘、大滩海、窝塘等地袭击兵营和哨所，在住宅、酒楼杀敌除好。当时恶贯满盈的日本特务东正芝就是被他们处决的。东正芝通晓中文，经常扮作港人四处活动，

收集情报，捕杀抵抗战士，许多抗日的中坚分子都死在他的手里。正当东正芝得意忘形。急于邀功请赏之时，沙田短枪队的队员设伏将其处死，沙田短枪队最大的胜利莫过于偷袭启德机场。1944 年初，日军对游击区进行扫荡，启德机场作为空军基地和部队集结地威胁着附近地区居民的安全。刘黑仔率领沙田手枪队午夜时分摸进启德机场，疲惫的日军正处于梦中，游击队员迅速干掉哨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炸毁了几架飞机、破坏了日军指挥中枢后，便立即安全撤离战场。这次偷袭策划周密，行动迅速，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仗大大鼓舞了士气，并迫使扫荡西贡、沙田的日军退回市区。一时间，机智果断的刘黑仔成为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英雄。

以“ 新界 ”的南涌、沙螺洞为主要活动据点的林冲短枪队，1943 年夏扩编为沙头角中队。活动于元朗的青山矿场、新田牛潭尾农场的元朗武工队，在斗争中不断扩大，到 1944 年 10 月已发展为一支有 60 人的队伍，编为元朗中队。沙头角中队和元朗中队的战士们以各种方式打击侵略者，他们多次袭击日军，摧毁日军哨所，清除汉好特务。

在游击队的不断打击下，日军恼羞成怒，于 1944 年 4 月对大帽山、沙田、西贡反复“ 扫荡 ”，欲把游击队彻底消灭。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对此，各个游击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反扫荡 ”。市区中队为配合“ 反扫荡 ”，主动出击，一连数天在旺角、深水涉、油麻地、肾箕湾、中环、红磡等地散发《告港九同胞书》及其他传单，并于 4 月 21 日深夜炸了旺角窝打老道街四号铁桥。在游击队的不断攻势下，日军只好一无所获地把队伍拉回市区。

在秘密营救文化人士的过程中，游击队成立了一支护航小队。经过锻炼，小队的船员个个机智灵活，英勇顽强，练就了在海上同敌人斗争的高超本领。这支护航小队很快发展成为近百人的海上中队，他们频繁袭击日军的海上交通线。1943 年 10 月，海上中队在果洲外海缴获一条满载货物的日军运输船，并解救中国劳工 50 余人。1944 年夏天，他们又在大鹏湾截获数艘满载食盐开往香港资敌的汉好走私船。海上中队先后经历较大海战达 10 多次，缴获敌船 13 艘，击沉 10 艘，并截获数百吨货物上交东江纵队总部。

港九大队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与东江纵队互相配合，相互支援。港九大队成立之初，许多东江纵队的队员加入了港九大队。港九大队在香港的武装斗争也有力地支援了东江纵队。抗战初期，由于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鼎力相助，香港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重要补给基地之一。香港沦陷后，其补给作用有所削弱，但港九地区毕竟经济发达，基础雄厚，加之日方也把香港当作中转站和补给地，所以不少工厂逐渐开工，香港的物资供给仍优越于地处穷乡僻壤的游击队根据地。港九大队一方面在水陆要冲设立税站，从护商护航中收取过境税，以税收所得购置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运回东江纵队总部；另一方面在战斗中缴获许多战利品，除供给本队外，还可满足东江纵队的部分需要。1943 年 5 月，珠江游击队就是使用港九大队运回的炸药拔掉了久攻不下的伪据点的。

根据中共中央“ 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这一指示，港九大队设立了国际工作小组，主要进行两项工作，一是营救国际友人，二是配合盟军的军事行动。

香港沦陷后，盟军战俘和尚未撤走的文职官员及其亲属都被囚于集中营。战俘多被囚禁在七姐妹、深水涉、亚皆老街集中营，文职官员、妇孺多被关在赤柱集中营。香港战役刚刚结束后，日本驻香港的兵力本来有限，又

要四处扫荡，力量分散，这就为港九大队营救工作提供了良机。 1942 年 1 月，英军战地医院的赖濂仕上校等 4 人设法从深水涉集中营逃出，在西贡附近经港九大队帮助前往内地。以此为开端，港九大队陆续帮助了许多颠沛逃亡的国际人士，使他们安全离开香港。

赖濂仕上校很清楚，集中营的非人待遇和日本人对战俘的虐待不可能有所改变，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出逃。在他逃往内地的过程中，发现游击队已经控制了九龙山区，并愿意帮助英国逃亡者，于是他决定在广东南部建立军事组织，以帮助战俘逃离香港。1942 年 7 月，英国人成立了英军服务团，中共中央也同意东江纵队给他们以协助。此后，港九大队和英军服务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如 1942 年 10 月，他们成功地合作救出了汇丰银行的芬恩维克和摩利逊； 1943 年 2 月，救出 2 名挪威人，1 名苏联人； 1943 年 3 月，救出 5 名印度人。此外， 1942 年 10 月受英国服务团指示前往九龙破坏日军无线电台的陈伟泉，也是经港九大队协助从香港安全撤回沙鱼涌的。

港九大队还成功地与同盟军进行了一些军事合作，如帮助英军获取情报等。1943 年秋，英军服务团请求港九大队协助拍摄日军在香港的重要军事设施，后由沙田短枪队帮助他们拍下了启德机场、军人仓库、炮台、兵营等重要军事目标的图片。

1942 年 8 月，盟国空军开始轰炸香港，目标集中于造船厂和海面停泊的日本军舰。1943 年 1 月以后，随着同盟国在西方和东方战场逐渐转入战略反攻，盟军对香港的轰炸次数越来越多，太古船坞、海军船坞等设施均遭严重破坏。当时担任轰炸香港任务的主要是在华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激烈的空战中，经常有美国飞行员“ 中弹落马 ”，跳伞降落在香港境内。由于港九大队名声在外，执行任务的美国飞行员多随身携带写有“ 游击队在哪里 ”、“ 游击队离这里有多远 ”等汉字的问路字条，以求得游击队的帮助，因飞行员们早已被告知，如有不测，只要立即找到游击队，就会一切化险为夷。 1944 年 2 月，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在袭击启德机场时，飞机中弹被迫跳伞，港九游击队的战士把他带到山洞中躲藏。日军出动千余人的搜索队围捕 17 天，在游击队的掩护下，克尔奇迹般地躲过搜捕，安全返回部队。克尔的脱险经历被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选为教学范例，以指导飞行员学会寻找游击队援助的办法。

随着在华美军加紧在华南地区的军事活动，美方迫切需要获取有关情报。1944 年 10 月，以欧戴义博士为首的美方情报组来到东江纵队，成立了拥有 200 名工作人员的特别情报工作部。而香港方面的情报来源主要依靠港九大队。

港九大队提供了很多极富价值的情报。1944 年 12 月 4 日，他们获得了启德、西乡南头飞机场图例说明，香港船坞的图例和材料； 1944 年 12 月 18 日，获太古船坞图例和油麻地地区目标图；1945 年 1 月 5 日，获启德机场图、大古船坞图样以及日军在港机关、油仓、船坞等详细大幅图样； 1945 年 7 月 5 日，获得日军在香港、广州防卫力量等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些无疑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香港沦陷时期，港九大队在这片惨遭日军蹂躏的土地上英勇奋战，使侵略者居无宁日。他们的斗争为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香港人民点燃了希望之光。

经过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反法西斯

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德国战败，日本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失败之中。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沼令，日本无条件投降，香港的日军也被迫放下武器。整个日据时期历时 3 年零 8 个月。

第七章　蒋介石丧失收回香港的良机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寇侵占，中英美成为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盟国，这就为中国人民收回香港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

在此期间，中英两国围绕香港问题进行了两个阶段的外交谈判：一是 1941—1943 年关于废除治外法权和在华特权的谈判，涉及收回“ 新界 ”租借地问题；二是 1945 年日寇投降后的中英交涉，涉及由谁派兵进驻香港和接受日军投降问题。遗憾的是这两次重大的外交活动，均以英方无理而致胜、中方有理而失败告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外交、节节退让是一个重要因素；而更深层的因由，则是蒋介石“ 反共优先 ”的政策所致。

收回“ 新界 ”　恰逢良机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英美等国与日本直接进入你死我活的军事较量之中，使中美英成为共同对日作战的盟国。中国是抗日的主要战场之一，1942 年 1 月，中国积极参与签订了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联合国家宣言》，被列为世界“ 四强 ”之一，蒋介石亦被推荐为盟军中国战区的司令长官。第二，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面临着同时在欧、亚两线作战的局面，深知中国战场对牵制日本的重大作用。既为吸引中国更好地对日作战，更为填补战后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 真空 ”，美国也开始批评英国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作法。这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对中国是一支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第三，英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在欧洲，与德国大战正激，本土受到严重威胁；在亚洲，面临日寇强大攻势，兵力单薄，抵抗乏力。香港一战，不到 20 天，港督杨慕倚就竖起白旗，签字投降。随之远东殖民地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相继失守，这标志着大英帝国的衰落。

把香港拱手交给日本人的英国殖民者，还有什么理由“ 重返 ”香港呢？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就要求西方列强放弃在华特权，归还租惜地，英法等国以这“ 不属和会职权范围 ”为借口，加以否决；在 1921—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又重新提出此问题，但英国以所谓“ 防御需要 ”为

由，拒不归还香港“ 新界 ”。

1941 年 6 月 11 日，迫于当时的形势，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战后将放弃在华特权。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英谈判的条件进一步成熟。英国为“ 争取主动 ”，以免被美国抛在后面，于 1942 年 10 月 10 日发表声

明，准备与中国正式谈判以解决有关问题。

“ 草案 ”之争　　泾渭分明

1942 年 10 月下旬，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长宋子文，英方首席代表是驻华大使薛穆。英方提出的草案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 1901 年的《辛丑条约》；将上海、厦门公共租界交还中

国。但草案从头至尾只字未提香港

问题，这是英方一贯采取的拖延回避之策略。

针对英方草案，中国政府于同年 11 月 13 日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中英 1898 年 6 月 9 日在北京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 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当时谈判场外的中国民众，群情激昂，各界舆论强烈要求西方列强归还中国领土。美国等国的公众舆论也对中国寄予同情。

1942 年是英国在东南亚继续大溃退的一年，面对如此恶化的军事形势，面对在香港问题上中美两国和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英国政界、外交界确有一些人士认为要在香港保持英国的战前地位是很困难的，主张战后“ 有条件地归还香港 ”。1942 年 8 月 18 日，英国殖民地大臣克兰伯恩曾将一份备忘录送交外交大臣艾登，主张英国应承认中国是与其平等的大国，要准备在战后和中国政府一起考虑香港的前途问题，香港在地理上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应列入中英讨论范围之外。

就在收到中国的《修正草案》之后，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克拉克首先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接受要求，二是断然拒绝，三是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种方案不可行，因为“ 新界 ”在经济上、战略上对香港太重要了；第二种方案过分露骨，恐遭美国非议。因而他倾向于第三种方案，即可以考虑“ 战后有条件地归还香港 ”，这样，既没有作出一定归还香港的承诺，又可以把“ 新界 ”祖借地的归还问题继续拖下去。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外交大臣艾登等人均反对把香港（包括“ 新界 ”）归还中国。早在中英谈判的酝酿阶段，英国议会政务次官劳，在一次回答议员关于谈判“ 是否包括将香港交还中国 ”的质问时，就赤裸裸地表示：香港是英国的领土。中英谈判开始后，丘吉尔曾针对英国政界关于香港问题的种种议论，用极为强硬的语调重申：“ 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并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 ”这才是英国官方的真正立场。 11 月 30 日，丘吉尔主持内阁会议，正式通过 162 （42）号决议，赞成艾登所主张的“ ‘ 新界，不属本次条约的讨论范围 ”的方针。

宋子文有理而不敢抗争

1942 年 12 月 5 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收到内阁通过的基本方针后，正式通知宋子文，告之英国不同中国讨论“ 新界 ”问题，“ 新界 ”问题不属本次谈判之列。宋子文大惑不解，与薛穆争辩道：既然中英新约要预定取消英国在华租界，而租借地与租界本属同一范畴，故“ 新界 ”问题理应在谈判之列。此条约如果不能解决“ 新界 ”问题，中英间的误解将难以消除。但薛穆仍坚持英国政府的强盗逻辑。

蒋介石得知此情况后气恼难消，表示中英新约如果不包括收回“ 新界 ”，他就坚决不同意签字。

12 月 14 日，宋子文特意派一向亲英的国民党要员杭立武，把蒋介石的态度转告给薛穆，希望英方能改变态度。但是薛穆经急电请示艾登之后，再次无理地拒绝了中方的正当要求，使谈判陷入僵局。

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的宋子文，当英方无理拒绝将“ 新界 ”问题纳入中英新约谈判之列时，不敢据理力争，自己首先就想打退堂鼓，但他又不敢对蒋介石宣言。正在此时，驻英大使、资深外交

要员顾维钧返回重庆。顾维钧是个职业外交家，阅历丰富、能言善辩，且与蒋介石关系较密。宋子文见到顾维钧，便托他从侧面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坚持将归还“新界”的内容写进条约。

顾维钧在蒋介石面前大谈中英新约是英国“首先采取行动同我们磋商的”“友好”行为，英方“该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礼为宜”，“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①]，等等。听了这番颇为老到的话，蒋介石心里似乎有了一种自欺欺人的满足。

英国人玩弄文字游戏　蒋介石最终忍辱签字

1942 年 12 月 21 日，丘吉尔再次召开内阁会议，重申新约只解决治外法权问题，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范围，“我们准备取得战争胜利后再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此次内阁会议通过的决议，连对“战后讨论‘新界’的前途问题”也不再作明确保证，而改为“重新考虑这块租借地的租期问题”的提法。

英驻华大使薛穆将此立场通知中国政府后，连主张妥协退让的宋子丈也十分不满。宋子文和顾维钧曾两次要求英方发表一项今后归还“新界”的声明，中方将保证在战时不再催促英方归还“新界”。但是，英方仍一意孤行。宋子文亦告知英方：如果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能在条约上签字。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英国同中国这个盟国讨价还价、逼得中国无路可退之时，作为侵略者的日本政府，却企图抢先与汪精卫伪政府签订所谓的“亲善”新约。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正好在英国战时内阁提出“战后重新考虑‘新界’的租期问题”的同一天，即 12 月 21 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表示日本将尽速取消在华租界和治外法权，以示“中日亲善”。日本此举虽意在挑拨抗日盟国问的关系，搅乱人心，但这对英国政府——这个中国的战时盟友来说，却是莫大的讽刺。

不得已，丘吉尔于 12 月 28 日又主持召开内阁会议，第三次研究中英谈判问题。此次会议态度虽略有松动，但在会议作出的决议中仅删去了原决议里“重新考虑‘新界’的租期问题”这句话中的“祖期”二字。

面对英方提出要么接受其要求，要么谈判完全破裂的威胁，蒋介石最终同意在中英新约上签字。12 月 31 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不将“新界”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合并提出，这是国民党政府对英国政府的极大让步。战时中英关于“新界”租借地问题的交涉，就这样以中国的外交失败、英国无理却取胜而告终。如此结局固然是由于丘吉尔、艾登为代表的英国政府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所致，但是，宋子文选择妥协退让之路、蒋介石最终委曲求全，也是这次外交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们是难辞其咎的。

英国政府的既定方针：“重占”香港

1943 年 11 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老谋深算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确保中国坚持对日作战，也为了在战后能更好地利用中国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 5 分册，第 15—16 页，1987 年中华书局出版。

这张牌来抗衡苏联和英国在远东的影响，主动向中国作了许多保证，还私下向蒋介石表示，战后美国支持中国收回香港。蒋介石表示赞赏，并请求罗斯福先与英国当局讨论此事。

当罗斯福向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将香港归还给中国的建议时，丘吉尔认为，罗斯福之所以如此，其目的是想削弱“大英帝国”。因此，他气愤地答道，只要他还是首相，就休想使大英帝国解体！“我们的格言是：‘不许干涉大英帝国’。绝不允许为了讨好国内那些悲观的商人和各色各样的外国人，而淡化或玷污这个格言。”“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去任何东西！”①

丘吉尔回到英国后，于12月13日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会议根据他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英国战后“不打算放弃任何领土”。

后来，每当罗斯福提到希望战后英国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时，丘吉尔就勃然大怒。他声称决不会放弃英国旗帜下的一寸领土，并回击说：美国对中国之政策是伟大的美国幻想。

丘吉尔不仅言词强硬，而且机关算尽，暗中加紧准备。

1944年5月，前英国驻华领事默思向政府分析解决香港问题的各种方案，认为“哪怕是有一点点放弃香港的想法，也是愚蠢的”，因为那样会使大英帝国退回到鸦片战争以前的地位，因此他主张战后要恢复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

英国议员阿斯特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当天，即1944年6月6日，公开声称香港“毫无疑问属于英国”，并建议英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明确表示战后英国要重新占领香港。然而，城府很深的丘吉尔则认为，如果把英国重占香港的计划声张出去，不但会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和戒备，而且还会招来美国及国际舆论的非议，结果会适得其反。他主张，英国要不事声张地埋头进行重返香港的准备工作。

其实早在1944年初，英国殖民地部就成立了由前港英官员组成的“香港计划小组”机构负责筹划重占香港后的“行政管理事宜”。”同年9月，该机构的人员大大扩充，并预定该组织成员为重占香港后港英政府的文官基于。

1942年7月成立的‘英军服务团’情报网早已渗透到日军占领下的香港，为英国政府重占香港做了全面而周密的准备。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日本失败也已成定局。这使得英国政府更加担心香港日军向国民党军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游击队投降，于是急忙对重占香港问题进一步进行研究和部署。

7月23日，英国有关部门和“香港计划小组”举行联席会议，研究对策。为不露声色，丘吉尔没有同意会议提出的为接管香港而采取的措施，他决定首先力争与美国达成谅解，然后派出先头部队，抢在中国军队之前占领香港，同时迅速使英国官员进入该地，一俟日军有撤退迹象，就立即成立一个港英临时政府，造成既成事实。

丘吉尔机关算尽蒋介石虚晃一枪

① （20世纪的香港》第216—21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

1945 年 8 月，远东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国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

苏联对日宣战；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向日寇发动全面大反攻；

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敕》，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此时，英国抢占香港的计划也在抓紧实施中。8 月 11 日，即日本宣布接受《波茨但公告》的第二天，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发出了两份密电：一份给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命他立即通过英军服务团情报网，尽快与囚禁在香港岛赤柱集中营的前港英政府布政司詹逊取得联系，授权他在日本投降后立即组织港英行政机构。另一份是给英国太平洋舰队特遣舰队司令夏悫少将的。贝文令夏悫率领舰队立即开赴香港，接受日军投降，并成立军政府。

8 月 16 日，日本驻港部队正式收到天皇的《终战诏敕》。在日军占领下的 3 年零 8 个月中受尽欺凌而又始终坚持斗争的香港市民，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庆祝胜利。

就在 8 月 16 日这一天，即英国政府密令军舰驶向香港的第 5 天，英国驻华大使馆才照会中国政府，宣布英国已派军舰占领香港。

8 月 23 日，尚在赤柱集中营的詹逊收到了英国政府授权他成立过渡政府的正式训令，他高兴之至，立即率一批前港英政府官员离开战俘营，重返市区组织临时政府。

8 月 28 日，詹逊宣布他作为英国在香港的首席代表，已经成立政府，准备在英军抵达香港接受日军投降时，“ 恢复英国政府的统治权 ”。当时詹逊手中无任何武装力量，他传出命令，在英军到来之前，由日军维持香港的社会治安。

8 月 30 日，英国太平洋舰队特遣舰队在夏悫少将的率领下，迅速驶进香港维多利亚港湾，并立即登陆，从日军手中接管了海军船坞和一些民政、军事设施，随后又从日军手中逐步接管了九龙和“ 新界 ”，完成了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军事占领。

9 月 1 日，夏悫在香港电台正式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香港军政府，从即日起取代以詹逊为首的临时政府。米字旗又出现在香港的上空。

1946 年 5 月 1 日，前港督杨慕琦返港重任总督，从军政府手中接管了行政权，在恢复了文官政府的同时，也恢复了大英帝国在这块土地上的“ 威严 ”和“ 荣誉 ”。此时的杨慕琦，似乎早已忘记了 5 年前自己向日军乞降的“ 光荣史 ”。至此，英国重占香港的计划已告完成。

丘吉尔的香港政策是强权外交的典型。他采取了双管齐下的两手政策，一方面不事声张，周密策划，强占香港，造成既成事实；另一方面照会中国政府，强词夺理，宣扬强盗逻辑，施加外交压力，迫使中国承认既成事实。

人们不禁要问，这时的蒋介石正在忙着干什么呢？

蒋介石曾在 1942 年 12 月 31 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英国不归还“ 新界 ”，战后他将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按理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正是他实现誓言的极好机会。他身为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长官，正可派一劲旅进驻香港，接受日军投降，恢复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但是，蒋介石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反共优先，积极准备打内战。因而，他置中华民族利益于不顾，对帝国主义一再妥协，对此，称蒋介石为卖国贼是丝毫不过分的。

早在 1944 年 6 月，蒋介石就通过非正式渠道私下向英国表示，只要英国将来支持他与中共打内战，他可以在香港问题上作出重大的让步。

1945 年 5 月，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党的会议上振振有词地说：“ 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 ”“ 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这次会议强调：“ 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后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 ”这次会议实质上是蒋介石为发动内战对国民党进行的总动员。日寇无条件投降以后，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此时的他早把“ 用军事力量 ”收回香港的誓言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蒋介石为了蒙蔽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在收到英国 1945 年 8 月 16 日那份照会后，采取了两项装装样子的“ 重大行动 ”：

其一，命令代理外交部长吴国帧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声明：英国应遵守太平洋战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没有盟军最高统帅和蒋介石本人的命令，英军不得进驻中国战区的任何地方。

但在宣读完声明后，吴国帧私下以聊天口气对薛穆说，中国对香港没有什么企图，也没有打算利用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有利条件而恢复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只觉得英国的作法不尊重中国，是在给中国施加压力，让中国难堪。这实际上是向英方交了底：中国不会利用这一机会收回香港，但英方要给中国点儿“ 面子 ”。

其二，命令军队进驻香港，但又声言不会派军队去接受日本投降。

8 月 21 日，即英国对华照会的第 6 天，蒋介石才迟迟下令让第二方面军去接受广东战区日军的投降，命令所属第 13 军从梧州开赴香港、九龙。此后，有少量中国军队从广东进入“ 新界 ”，准备接收日军的武器装备，但立即遭到英国的无理反对。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并未据理力争，而竟单方面在 8 月 24 日宣布：中国不会派军队去香港接受日本投降，……以免引起盟国误解。蒋介石的“ 两大行动 ”实际上是自我大暴露：优先反共是真，而派兵进驻香港只是虚晃一枪，障人眼目而已。“ 用军事力量 ”收回香港的旦旦誓言，原来是一句空话。

盟友的背后一刀：美国态度大转向

蒋介石之所以对英屈服，除了反共优先的主要因素外，美国态度转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战时，中国战场对牵制日军至关重要，同时，为了削弱战后英国在远东的地位，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罗斯福总统采取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政策。战争结束后，美国力量空前膨胀，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且美苏矛盾开始突出。美国在与苏联的抗衡中需要英国的支持，在战后的欧洲事务中也需要英国的配合，因而，它不愿意因香港问题而影响美英关系。加上罗斯福总统于 1945 年 4 月病逝，继任者杜鲁门改弦更张，露骨地推行牺牲中国正当权益、偏袒英国的方针。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曾发布第一号受降令，内称：“ 凡在中华民国、台湾、越南北纬 16 度以北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命令写得清清楚楚。香港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又在中国战区范围之内，由中国派军队接受日军投降是不容争辩的道理。但刚刚接替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的工党领袖艾德礼，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立场，

置此明理于不顾，于 8 月 18 日密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香港是英国的领土，英国不同意中国对 8 月 15 日第一号受降令所作的香港“在中国境内”的解释。他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将军，命令在港日军要向英军投降。

接到艾德礼密电的当天，杜鲁门即复电表示理解并尊重英国的立场，只要英方能和中方达成协议，美国不反对英国接收香港，并保证将指示麦克阿瑟就香港日军向英军投降一事“作出安排”。美国立场的大逆转，无疑是对中国的沉重一击。

得到美国的支持后，英国更加有恃无恐。8 月 19 日，薛穆再次将一份备忘录交与中国政府，重弹香港不在中国境内，由英军接受日军投降“事关荣誉”的老调，并称英国欢迎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身份，派代表参加英方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的仪式。同时薛穆还通知吴国帧：杜鲁门已同意由英国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

蒋介石对杜鲁门偏袒英国人的态度甚为不满，他于薛穆送交备忘录的当天，就责令国民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香港享有主权，有权收复该地，应由蒋介石派代表赴港受降。

8 月 21 日，蒋介石致急件于杜鲁门，要求美国澄清立场，希望不要修改《波茨坦宣言》的条款和盟国最高统帅发布的有关命令。为了不致使杜鲁门为难，蒋介石建议在港日军由他本人的代表受降，并邀请英、美两国代表参加受降式。蒋介石保证，驻港日军投降后，他将授权英军登陆收复香港岛。蒋介石希望杜鲁门能支持自己的建议。

可见，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所追求的已不是由谁收复香港的实质问题，而是他作为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面子问题了。

蒋介石：反共优先

杜鲁门收到蒋介石的急件后，立即回电蒋介石，告之他已于 3 天前通知艾德礼，同意英国在香港受降。他完全站在英国的立场上，说什么英国在香港的主权“不容置疑”。

蒋介石原希望此事美国会给自己撑腰，不料这位美国总统竟一点面子也不给。他盛怒之下，煞有介事地于 8 月 21 日发布命令，令驻扎在广西梧州的第二方面军的第 13 军前往接收香港、九龙，并派特使通知英方：中国军队不久将调遣到港，负责接受日军投降。同时他还命令驻广东的少量部队进入“新界”，准备接收日军的武器装备，但此举立即遭到英方的拒绝。

蒋介石本来就没有把香港问题放在应有位置，也没有打算趁机收复香港，只是英国人太不给“面子”，实在令他这个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难以下台，派军队赴港只是气头上的冲动，为的是给自己加些筹码，而并非本意。没想到英国人的反应竟如此强烈，美国也随声附和，蒋介石见状又立即软了下来，被迫作出让步。

8 月 23 日，蒋介石再次电告杜鲁门，不再坚持由他派代表去香港受降，提出由他以中国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授权一名英国军官”作为他的“代表”去香港受降，同时指定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前往参加受降式。为了让英国人完全放心，接受他的这个建议，他竟公开发表声明，说中国不会趁日本投降之机，派兵收回香港，以免在同盟国间挑起所谓的“误会”。

但英国对此仍不领情。8 月 27 日，薛穆奉命通知蒋介石：英国不能接受

大元帅关于英国军官作为大元帅的代表，在此英国领土上受降的建议。英方坚持由英国军官受降，而欢迎蒋介石指定中国和美国的军官作为他的代表出席受降式。为何英国人不给蒋介石一点面子呢？原来，在接到蒋介石的建议后，英国政府的殖民地部、外交部都一致认为，假如英国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授权接收了香港，那么蒋介石就可以继续以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下令驻港英军接受他的命令，使大英帝国在港地位受到严重削弱，以至后患无穷，因此，英方只能允许蒋介石代表以旁观者的身份出席受降式。

面对英国丝毫不肯通融的作法，蒋介石甚为不快，认为这有损他作为大国领袖和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长官的形象。在 8 月 27 日当天，蒋介石再次向杜鲁门致电求助，表示中国此时并无意派兵去占领香港。他建议授权一名英国军官“代表”他在香港受降，这只是出于保持盟国友好之考虑。然而，杜鲁门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的再次求助。

求助杜鲁门失败后，蒋介石不得不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严厉”告之：“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①]这是蒋介石被逼得无路可退时，对英方的最后通牒。

英国政府此时也意识到，确实把蒋介石逼急了，于是决定在形式上稍作妥协，建议夏蠡以英国政府代表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代表的双重身份受降。蒋介石勉强表示同意。

英国当政者心里暗自得意，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实际目的已经达到，而这种方式对中国来说，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1945 年 9 月 16 日，日军统帅冈田梅吉等，在英国政府代表兼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代表夏春将军面前，签字投降。

侵港日军投降，无疑是件好事，然而这个受降式，却是灰色的，它使中华民族又一次蒙受了耻辱。在香港战役中向日军屈膝投降的英国人，却一跃成为“光荣”的解放者，这真是历史的悲哀！

至此，中英关于香港日军投降的交涉，像收回“新界”租借地的谈判一样，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结束。这一段中英交涉的历史表明：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虽然在战后国力严重削弱，但依然坚持其殖民主义政策，决不肯轻易放弃在华特权和殖民利益；美国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一再出尔反尔，背信弃义；而蒋介石过分依赖其美国主子，最终陷入一退再退、任人凌辱的可悲境地。

然而，在国民党方面，在蒋介石退让妥协的背后，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其“反共优先”、集中全力大打内战的根本战略方针。为了换取英国的支持，蒋介石竟然置国家领土主权于不顾，其结果不仅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也使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①] 《蒋总统秘录》第 14 册，第 140 页，1977 年台北出版。

第八章　中国政府的深谋远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家成了世界的超级大国，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逐渐形成；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殖民体系逐步瓦解。此时，昔日的大英帝国进一步走向衰落。

中国战局急转直下　英国准备“防卫”香港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中国的局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对外屈辱妥协，对内积极反共发动内战，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战略反攻以来，到 1949 年初，先后进行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政权崩溃在即。

面对这一形势，英国政府十分焦虑。因为，第一，英国在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1941 年英国在华资产和投资约 3 亿英镑，其中 1/3 在上海。第二，英国还占据着中国的神圣领土香港。所以，中国的政局走向对英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

1948 年 12 月 9 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内阁递交了一份题为《目前中国内战形势的发展》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贝文分析了中国的形势，预测了未来的中英贸易和香港的前途，并就新形势下的对华政策提出对策建议：1.指出共产党人统治中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2.认为在中英贸易方面，“一个稳定的共产党行政机构可能会比现政权做更多的事情。”对同中国新政权进行贸易活动抱很大希望。3.关于香港的前途：一方面，认为中国新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出现对香港经济繁荣的“破坏”，“他们可能愿意暂时使香港继续成为英国操心的对象”；但另一方面又认为“香港殖民地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可能会生活在火山口上。”4。建议应从长远考虑，“尽量留在原地不动，与中共保持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联系，并且调查在华继续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力图在这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站住脚”，“保留立足点”。[①]

12 月 13 日，英国内阁会议接受了贝文提出的在中国“保留立足点”的建议。以后，又多次开会讨论香港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防卫香港”的行动：

首先，英政府开始密切注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英国政府认为，未来的中共政权是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有可能在香港内部“制造动乱”，或组织游击队进入香港，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加以防范。对此，港督葛量洪向英国政府提议实行以下措施：1.强制实行社团登记。2.封闭共产党控制的报刊。3.制定紧急状态条例，如封闭边界，实行严格的移民登记，对食品和燃料实行定量供应等等。

另外，为“阻吓”中国军队进入香港，多次制定香港的防卫计划，增加驻军，增强军事实力。英国国防大臣亚历山大估计，如果中共向香港发动大规模进攻，以香港当时的军力远远不能“保卫”香港。因此，他提出在近期内要大大增加香港的军事力量，其中包括：陆军的兵力及多种火炮；海军的

[①] 《20 世纪的香港》第 172—174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麒麟书业有限公司 1995 年版。

巡洋舰、驱逐舰、快速舰和巡逻艇；空军的战斗机和战斗控制中心及预警雷达。如果香港的军事形势更趋严重，还应迅速特别增配军力。

最后，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外交活动。尽管英国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为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香港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但仍然对依靠自己的力量“防卫香港”信心不足。1949 年 5 月 26 日，内阁会议要求联邦事务大臣和外交大臣将香港局势的发展情况和增派援军的决定，通报美国政府和英联邦其他国家政府，以图摸清这些政府是否愿意支持英国的“保卫”香港、防止共军从大陆发动“侵略”的政策，并在需要时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这一政策。但是，英国政府的这一招并未奏效。对于英国政府的主张，许多国家普遍反应冷淡，大都采取敷衍态度，有的甚至表示反对。

英国调兵遣将，内政外交双管齐下，表面上看起来是“阻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香港，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用意：其一，是英政府对占香港人口 98%的中国居民毫无信任之感，因而企图用军队来加以震慑。港督葛量洪认为，在全香港近 200 万人口中，全心全意支持香港政府并能提供最低限度必要服务的，包括警察部队和政府人员在内，不会超过 1 万人。其二，是为了稳住英国在东南亚殖民统治的阵脚。英国首相艾德礼在 1949 年 5 月召开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不能应付对香港的“威胁”，就会严重损害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威望。要让东南亚国家相信英国有决心有能力抵抗对香港的“威胁”，否则，这些国家中的反共共同阵线极可能被瓦解。这道出了英国政府的真正的恐惧所在。

深圳河风平浪静

当英国政府为了“防卫香港”忙得不亦乐乎时，深圳河对岸却是别有一番风景。

1949 年春，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正为香港“安全”担忧，几乎所有的香港报刊上各种焦虑言论连篇累牍之时，香港两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的进步报纸《文汇报》和《大公报》先后发表社论，阐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

1949 年 2 月 9 日，《文汇报》在题为《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说：“从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态度看，他们似乎对香港的安全问题更表关切。本月 2 日和 3 日，英国国防大臣亚历山大，殖民部大臣琼斯，海军大臣贺尔都有关于如何防卫香港的明显表示，仿佛他们远处伦敦者所闻到的中国火药气味，远比我们置身香港者更为敏感。但我们不能了解此种‘敏感’的现实价值到底有多大？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到目前止，从没有一言一行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同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至于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纠纷。即使有应进行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

接着，2 月 17 日《大公报》也以《乐观香港前途》为题发表了社论，指出：“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绝不如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中英间虽然还有悬案如九龙城问题等未解决，只要彼此谅解，以友好态度处理，并不足以阻碍双方的邦交。英国

对于中国的旧政权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有所企图，予以支持，在中国人民的脑子里，没有大不快的印象。第二，中国的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凡以平等友善与中国相交的国家，只有受到欢迎。无论什么国家总不会关上大门不与外国往来的。将来中国和平安定，加速建设，在商务上必须与外国建立关系。中国许多物产要向外输出，外国许多建设器材要向中国输入……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关系，尽量发挥其货物集散交通衔接的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这两篇社论，语言朴实，直抒道理，使人读后确实感到“言之有理”。它们既真实地反映了民意，也有让人玩味的政策意向，后来的实际情况充分证明其内容确有很高的预见性和准确性。这两篇社论作为一种信息，以一种非正式的途径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持香港现状，保持其繁荣稳定的意图。

新华社既清楚而又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待香港的态度。1949 年 6 月 13 日，香港当局无理搜查了著名共产党人方方的住宅。6 月 22 日，新华社对此事作了报道，其中有这样一句语意双关的文字：“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在香港的中国民主人士一样，从来没打算在香港制造什么‘暴行’。”

听其宣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观其行动。此时，香港人民最为关心的是深圳河畔的风吹草动。他们关注着在河的那一边，在广东，在北京，中国共产党会有何表示。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军广东。 10 月 15 日广州解放， 10 月 19 日深圳解放。但到达粤港边界后，大军嘎然而止，他们并没有势如破竹地向香港发起攻击。英国殖民地大臣琼斯在 10 月 19 日回答议员的询问时表示：中港边界是平静的，香港管界之内也没有发现共产党有任何不合法律和破坏秩序的事情。

中国人民解放军抵达深圳之后，港英当局已在边界布有重兵。而中国却为避免无谓的纠纷，严禁野战部队驻防在边界线上，而另派了一支保安部队，一方面维持边界的治安，一方面监视英方的行动，同英方之如临大敌、重兵防守形成鲜明对照。英方大概已感到自己的精神是有些过于紧张，后来也将军队后撤，只留下少数警察维持秩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和华南、广东等地方军政机关，对粤港边界地区的事态采取了十分谨慎和冷静的态度，基本方针是：“保持边界平静，避免边界纠纷”；“不挑衅、不示弱，后发制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等等。

1950 年 8 月 24 日，就香港英军非法越界问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东军区司令员叶剑英曾发表郑重声明，要求港英当局承担完全责任。但中方在处理上是相当克制的，只是将越界英国军事人员遣送回港而已，甚至将其随身所带的枪械、望远镜、指南针、地图等也交还给香港警方。

在粤港交界处，也发生过一些小的纠纷，主要是英方挑起的。据广州市军管会统计， 1949 年 10 月至 1951 年 6 月，共发生英军飞机越界 232 次，英舰越界 30 次，英军越界 8 次；发生香港警察在出口通道上侮辱中国旅客事件 100 多次，其中开枪射击 14 次。当时中方人员也有过越界行为，主要是少数外事观念较弱的民兵，越界追捕犯人，由于中方的妥善而有分寸的处理，均未造成重大的外交事件。

中国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对边防部队和民兵进行政策教育，要求他们尽力

避免任何外事纠纷，务必使边界保持平静，并明确制定了“不得越界捕人，”“不得擅自开枪射击”等项纪律。

当时，连港英当局也承认“边界平静”这一事实。香港政府在1949年的年度报告中说：中共非正规部队到达中港边界的沙头角，几天以后控制了整个边界的中国一侧，没有发生什么事件。英国与中国当局在边界的关系是正常的，符合一般规则。在1952年的年度报告中说：这一年发生了一些小的边界冲突，幸亏没有一件事足以造成严重的国际后果。现在已有在边界建立更好的关系的途径。

中国政府在处理发生在香港而涉及中英关系的各种事件中,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采取非常冷静和克制的态度。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港英当局以“防卫香港”为名，加强对香港内部的控制，解散了一些爱国社团，并逮捕和驱逐了香港工会领袖、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60多人。这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些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坚持真理，维护正义，对此提出了严重抗议，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949年11月，发生了两航起义的重大事件，即总部设在香港的两家航空公司——中国民航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发表起义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两航起义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欢迎，同时也告示英国政府，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委托人员才有权处置两航在港资产，如果这批资产被非法侵占、转移或损害；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为此，中国政府聘请香港著名大律师陈丕士等出庭辩护，希望在香港通过法律途径取回这批资产。这一做法本身也反映了中国政府暂时维持香港现状的这一考虑。

但是，英国政府在两航事件上并没有认真按英国和香港的法律办事，而是屈从于美国的政治压力，用修改法律的办法来适应美国人的需要，最终将两航的71架飞机和其他资产无理地判给了美国人,使中国方面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损失。可以想象，当时这批财产对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多么可贵啊！即使如此，中国政府仍然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并没有像英国和香港政府所担心的那样,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或在香港地区制造‘骚乱”。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恶劣行为不可能无动于衷，中国政府对此作出了适当的相应回击：除了政府声明和新闻媒介提出严重抗议之外，还下令征用了在上海的英国资产——英联船厂及马动机器制造厂。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在有关香港问题上，从大局着眼，坚持了冷静、克制、沉着、稳妥的态度，采取了经过深思熟虑的特殊政策和策略，谨慎妥善地处理了各种问题。这在当时国际局势和中国局势处于剧烈变化之中、香港人心浮动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正是由于这种态度和政策，才使得香港的人心和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平静和稳定，对香港以后的经济腾飞起到了无法估价的积极作用。与英国政府的许多错误估计和惊慌失措的表现相比，中国政府表现得更主动，更理智，更成熟。这正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全局的非凡胆识和炉火纯青的政治艺术。

中南海的决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 ”，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寇，打垮了气势汹汹的 800 万国民党军队。建国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直接交战 3 年，最后得胜而归。如此辉煌的历史，如此威武勇猛的军队，如果在占领深圳之后，一鼓作气，收回香港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中国没有用军事手段收回香港，不是没有军事能力，更不是外交软弱，而是深思熟虑、审时度势的上乘之策。

其一，当时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美国。中国要集中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就不能搞“ 四面出击 ”。因而，避免和英国发生公开冲突，开辟一条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通道，建立与英国的对话关系并力争与之早日建交，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其二，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对中国实行包围、封锁和禁运。在这种形势下，基于长远考虑，暂时维持香港现状，用以作为中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中转站，出口物产，赚取外汇，引进一些急需商品，这对于打破西方的封锁，推动国家经济建设，有百利而无一害。相反，如果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草率地用军事手段收回香港，地盘是可以攻下来，但以后会引来一系列难题，而且关上了当时中国大陆与西方经济往来的唯一“ 窗口 ”，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对香港的稳定和走向繁荣未必有利。

对此，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一些谈话中，在中央有关文件中都作过明确的分析和说明。

1954 年 8 月，周恩来针对英国的地位和特点提出，要“ 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 ”，“ 我们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将首先从英国开始。 ”在谈到香港时，他指出：“ 香港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但现在时机尚不成熟，我们“ 不要去谈 ”。[①]他还进一步提出，要利用西方国家同美国的矛盾，在保障和平、开展贸易的基础上与之结成统一战线。

3 年之后，即 1957 年 4 月，周恩来还讲过，暂时保持香港的

特殊地位，除了政治上的理由之外，还有经济上的。为此，他提出了“ 为我所用 ”的策略思想。他指出：“ 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是这样想。 ”中国大陆“ 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所以，“ 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 ”[②]

周恩来这一预见和策略很快就得到证实。50 年代后期，中苏

关系恶化，出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与中国为敌的局面，中国在国际上面临巨大的侵略威胁和军事压力。这时，我们正是充分利用了香港这个国际窗口，引进资金和技术，开展进出口贸易，沟通中国的国际交往，为我们克服困难，打破美苏两霸的威胁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9 年，毛泽东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指出：“ 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 ”[③] 1960 年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

[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82—83 页，1990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53、355 页，1984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 39 期，第 15—16 页，1979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利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不谈香港问题。

196D 年，中共中央总结了过去 10 年工作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的方针，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暂不改变香港的现状，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

1963 年，中苏两党大论战正在难解难分，中国共产党批评赫鲁晓夫在加勒比危机等问题上妥协退让，赫鲁晓夫无言以对。当

时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指责中国在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也在搞妥协退让，想以此为赫鲁晓夫开脱。对此，毛泽东同志为《人民

日报》起草了一篇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于 1963 年 3 月 8 日发表。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党报社论的形式首次公开全面地阐述对香港、澳门问题的政策。社论指出：“ 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问题。 ”“ 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 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我们的勇气和坚定性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领教过的。 ”[①]这些分析，言简意深，掷地有声，反映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一代政治家的无比气魄。

在“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的方针指导下，中国政府还制定

了一系列适合香港情况的特殊政策和措施，比如对香港的资本主

义经济采取有别于内地的政策，不允许内地的政治运动波及香港；

以优惠的价格长期地大量地供应香港所必需的物品，包括淡水、食

品、燃料、原材料等，即使在 60 年代内地处于暂时极其困难时期也是千方百计地保证供应。所有这些政策和措施，对安定人心、稳定政局和繁荣经济都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深深体现了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一脉亲情。这一切都为未来香港的回归奠定了经济、政治和感情的基础。

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灵活、务实态度是否是有失原则、过分软弱的表现呢？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毛泽东、周恩来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著称于世的外交大师，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典范，他们在应该灵活之处表现得极为灵活，而在应该坚定之处又表现得极为坚定，在国际国内的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如此，在香港问题和中英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对此，仅从历史档案中抽出几例就可一目了然：

1.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时间是 1950 年 1 月 6 日,是西方国家中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但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却是 1972 年 3 月 13 日，中间经历了 22 年的漫长历程。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英国政府没有充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它一方面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政府，一方面又和台湾保持着领事级外交关系，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追随美国，制造“ 两个中国 ”。而中国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一直到 20 多年后，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解冻，英国也表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并撤销了在台的官方机构。直到此时，中英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联合公报中虽然没有写入香港问题，但却载有“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条文，这其中的含义

[①] 《人民日报》1963 年 3 月 8 日。

是心照不宣的。

2.就在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前三天，即 1972 年 3 月 10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港澳问题的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所谓的“ 殖民地 ”范畴。因此，香港和澳门不应该列入反殖民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同年 6 月 15 日，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接受了中国的要求，在“ 殖民地 ”名单中删去了香港和澳门。11 月 8 日，第 27 届联大通过决议，批准了非殖民化特委会的报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原则立场，从而排除了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企图插手香港问题，搞所谓“ 国际共管 ”的可能性，维护了祖国主权的尊严。连港府的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重申这一立场“ 是一件自然的事 ”。

70 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长期参与决策香港问题的周恩来总理甚至已经预见到了收回香港的确切日期。1972 年 10 月，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客人路易斯·海伦时曾非常明确指出：“ 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期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 ”“ 租约期满 ”四个字已经说得非常确切，只差说出“ 1997 年 6 月 30 日 ”几个字了。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祖国的解放和统一，包括香港的回归，奋斗了一生。虽然他们未能亲眼看到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刻，但他们早已为这一天的到来做了深思熟虑、竭尽全力的安排和准备。这一重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自然地落在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肩上。

第九章　盲动无益于解决“香港问题”

如前所述，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香港采取了沉着稳重的态度和一系列适合国内外形势与香港特点的特殊政策，实践证明，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贯彻执行中国的对外战略，对香港的政局稳定和经济繁荣都发挥了卓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谓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正确政策。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想曾在整个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长达 10 年之久，给国内工作带来了严重危害，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对外工作。香港问题事关国内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中英关系等重大政治问题，尽管其大政方针一直是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定的，特别是由周恩来直接掌握和具体落实的，但也难以完全避免“左”的思潮的干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 1967 年的香港反帝抗暴大罢工中出现的一些“左”的行动和发生在北京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

香港反帝抗暴大罢工声势浩大

香港是一个工商业城市，和世界其他各大工商业城市一样，经常发生罢工潮。进入 60 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中期，香港的经济结构从转口贸易为主转变为加工出口为主，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集中，贫富差别扩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广大民众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日益感到不满，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城市居民运动趋于活跃。以工人运动为例，据统计，从 1950 年到 1960 年，工人罢工总共有 68 次，而从 1960 年到 1970 年，罢工竟达 193 次之多，最少的一年也有 9 次，最多的一年高达 47 次。

60 年代，香港工人运动的基本内容是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福利待遇。那时工人们的工资低，为了维持生活，他们只好加班加点、超时工作，每天工作 12 至 16 个小时是很常见的。但是工人大多不愿采取罢工这种行动去争取生活的改善，只是迫于无奈，在拼命超时工作尚不足以养家糊口的情况下，才运用罢工这个武器，而且只要经过调解，事态很快就会获得缓解。然而，1967 年由香港九龙新蒲冈人造塑胶花厂工人引起的罢工潮，声势浩大，席卷了整个香港地区，给香港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1967 年 5 月 6 日下午，香港新蒲冈人造塑胶花工厂的中国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与资方进行合理斗争。港英当局包庇资方，压制工人，竟然出动了 200 多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队”，对该厂工人和其他中国居民进行镇压，当天殴打致伤多人，拘捕 21 人。事后，又拘捕了前往香港警察局抗议的树胶、塑胶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　11 日下午，港英当局再度动用武装军警和“防暴队”千余人，连续多次使用警棍、防暴枪、催泪弹，并且开来军车和直升飞机，对赤手空拳的工人、各界代表和青年学生进行更大规模的血腥镇压，逮捕多人，其中还包括记者、摄影师等。12、13 两日，港英当局实施宵禁。　12 日以后，继续大肆殴打、逮捕示威的群众，截止 14 日凌晨，被捕群众达 400 余人。从此，罢工、罢市、罢课、示威游行，以至流血冲突频频出现。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在初期发展是正常的，其要求是正当的、合情合理的，由于港英当局对工人运动及其正当要求采取了残酷的镇

压手段，引起香港工人和其他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致使罢工潮扩大、升级。

不久，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以统一指导香港同胞同港英政府进行斗争。该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如到港督府门前举行群众抗议大会、进行示威游行等。

英国政府于 1967 年 5 月 17 日发表文告，表示全力支持香港当局对罢工所引发事件的立场，把全部责任归咎于罢工工人及广大民众。

5 月 19 日，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示威群众轮流涌到总督府前达 7 个小时，人数最多时约有 4000—5000 人。

5 月 20 日，群众游行示威活动进一步扩大，港英政府急忙调集了大批武装警察和“ 防暴队 ”，使用暴力来维护其统治秩序。

5 月 22 日，警察与群众发生猛烈冲突，双方均死伤多人。港英政府随即宣布了“ 紧急法令 ”。

“ 紧急法令 ”的颁布并没有遏止事态的发展。自 5 月 23 日起，港九巴士、电车、邮务、中华煤气公司、九龙船坞、天星小轮、红磡发电厂、北角发电厂、太古船坞、太古糖厂、牛奶公司等部门和机构的工人，相继开始了罢工行动，给了香港政府以猛烈的回击。

从 5 月初到 6 月初的一个月时间里，港英当局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不仅没有使工人吓倒，相反，斗争影响逐渐扩大，工人开展了联合大罢工。港英当局始终顽固地坚持与工人作对、为敌的政策，对罢工工人采取停职、解雇等手段，以迫使工人让步。可是港英当局的算盘打错了，他们的做法招致香港的工人、青年学生和其他各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一致反对港英当局，全力支持工人的合理正当要求，罢工、罢市、罢课、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声势浩大，整个香港沸腾了。

对于香港同胞这一反帝抗暴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

5 月 15 日凌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紧急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代表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要求港英当局接受工人合理要求，释放被捕人员，惩办凶手。他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香港同胞英勇、正义的斗争，并且坚决做他们的后盾。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香港英国当局必须悬崖勒马》的评论员文章。

此后，陆续有首都群众到英国驻中国代办处门前示威，抗议港英当局镇压香港同胞的法西斯暴行。

22 日，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再次召见霍普森，就英国外交大臣布朗汗诬蔑中国群众而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宣布，取消英国驻中国代办处向上海派驻办理侨务人员的安排，并限令其人员于 48 小时内离开上海。

6 月 3 日，英国一些人在英官方的纵容下，到中国驻英代办处门前挑衅，中国驻英代办处向英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痛斥港英当局残害我同胞的暴行，支持香港同胞的正义斗争。

6 月 13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港英当局本月 8、9 两日血腥镇压中国同胞的新罪行，对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提出严重警告。

6 月 24 日，周恩来总理在答谢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宴会上，严厉谴责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对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残酷镇压，表示坚决支持香港同胞的

反帝抗暴大罢工。

“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

1967年正是“文革”动乱最严重的时期，内地的极左思潮也波及到香港，使正义的反帝抗暴大罢工在许多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文革”色彩：

1.“大字报”是“文革”的重要特色之一，这一“新鲜事物”也被移植到了香港，在罢工浪潮高涨时期，港英总督府前凡是能张贴纸张之处都贴满了“火药味”颇浓的大字报。致使港英当局每天晚上都要清洗一次，但第二天又是琳琅满目。为此警方明确禁止张贴各种标语、语录和大字报，但仍无济于事。

2.“红宝书”是“文革”的又一重要特色，参加罢工的香港工人和市民几乎人手一册，在总督府前示威游行时模拟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的动作，摇动“红宝书”，高声朗诵其中的某些内容。

3.在报纸和街头宣传上，出现了一些“左”的口号，如有的报纸通栏标题都是：“抗暴熊熊烈火烧透臭法令”、“红旗大字报遍地扬威”、“从市区到郊区，从浅水湾到云山峰，红旗飘扬振人心”、“港英警察特务不敢轻易触动，疲于奔命，纸老虎显原形”，等等。

街上和商店里还到处摆放着羞辱白人警察和华人警察的工艺品——“白皮猪”和“黄皮狗”。

4.5月中旬以后，出现了毁坏公共设施等行为，如推翻公共交通标志、公共汽车站牌、垃圾箱，打碎停在路边的汽车玻璃，阻止公共汽车的运行，阻断交通，甚至强迫一些商业机构降下英国国旗等。

5。7月份以后，香港和广东交界处的冲突增加，许多红卫兵、民兵和其他群众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手里拿着“红宝书”，唱着革命歌曲，但并未带任何武器，越过边界，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港英政府”、“打倒走狗”等口号。港英当局派出大批巴基斯坦籍和尼泊尔籍的警察前去阻止，双方发生冲突，各有伤亡。

当时社会上还有林彪要派两个师的兵力收复香港的传言。

一方面是香港内的骚乱，一方面是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8月底才逐渐趋缓，到了11月才基本平息下来，前后整整延续了半年多。在此期间，有51名市民死亡， 800多人受伤，被捕者超过5000人，爱国同胞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事件的高潮时，港九问的轮渡停航，市区交通停顿，工厂停业，商店关门，一些学校停课。整个香港地区街市萧条、繁华失色。

罢工高潮初期，广大市民出于对正义事业的支持和爱国反帝的热情，以送茶、送食物、募捐等各种行动给罢工多方面的支持，但随着时间的延长，暴力和骚乱活动的升级，市民的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由同情罢工逐渐转为支持香港当局维持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比如，许多家长冲破种种阻力，坚持送子女去上学；九龙、“新界”一些市区居民自动组织了“自卫组织”，防止骚乱活动在本街区的蔓延；当一批人冲入九龙红磡屠房时，这个企业的工人拿着屠刀出来维持本企业的秩序。

也有一些人对香港秩序恢复失去了信心，通过各种渠道离开香港。在0、7、8三个月中，离港的人数以万计，一些外资也纷纷撤离香港。

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国际城市，持续近半年的不安定局面，给经济带来的损失是可想而知的。正是在 60 年代后期，台湾的经济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新加坡开始建立自己的轻工业体系，缩短了和香港的差距，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韩国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总之，香港同胞反帝抗暴大罢工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给予坚决支持是正确的。这场罢工充分反映了香港广大市民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虽然港英当局对这场罢工斗争加以镇压，但也促使港英当局不得不检讨其政策，对广大市民的利益不能漠然视之，否则将危及其殖民统治。因此，从 1968 年起，港英当局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规，着手改善劳动福利，并专门设立了劳资关系科，协调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矛盾。1971 年，第二十五任港督麦理浩就任后，又采取了一些措施，优先解决市民的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香港的社会矛盾。

当然，这一事件是在中国正进行“ 文化大革命 ” 这一特殊环境下发生的，因此，它明显地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其过程中的一些“ 左 ” 的过火行为，不仅不利于反帝抗暴大罢工的健康发展，而且极大地破坏了这一斗争的声誉，影响了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然而，这种 “ 左 ” 的行动，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把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和极左思潮混淆起来是错误的。

极左派篡夺外交大权

1967 年是中国十年 “ 文革 ” 之乱的高潮时期。元月 1 日，北京 20 余所高等院校 10 万余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所谓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大会宣读了《告全市人民书》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 20 条 “ 大罪状 ”。接着，上海 “ 一月革命 ” 的 “ 夺权 ” 之风刮遍全国上下，“ 搅得周天寒彻 ”。

5 月至 8 月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段 “ 非常时期 ”，可谓新中国外交史上的 “ 冰点期 ”。这一时期，连续发生了 “ 三砸一烧 ” 的严重涉外事件：6 月 18 日，砸印度驻华大使馆；7 月 3 日，砸缅甸驻华大使馆；8 月 5 日，砸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8 月 22 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这使得我国同一些国家的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 极左思潮 ” 的干扰。

1971 年 8 月，周恩来总理会见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在回顾 1967 年中缅间的冲突时他说， 1967 年我们正在进行 “ 文化大革命 ”，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它损害了中国同缅甸等国家的关系，损害了我们整个对外工作。周恩来总理在谈话中还特别提到，“ 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 这里所提及的更多、更大的破坏，就是指 1967 年 8 月 22 日在北京发生的 “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 的重大涉外事件。

1967 年 3 月至 5 月，在近百个日日夜夜里，以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对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等人大兴问罪之师，批判所谓的 “ 二月逆流 ” 分子。当时外事口的造反派们，争先恐后，纷纷把 “ 炮火 ” 集中到陈毅身上，批斗陈毅行动逐步升级。“ 打倒陈毅 ”、“ 揪斗陈毅 ” 的口号满天飞，周恩来不顾个人被责难、攻击的危险，挺身而出，坚决顶住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

5 月，江青一伙为攻击周恩来总理，指使造反派们贴出“ 炮打周恩来 ”的标语和大字报。毛泽东发觉此事后，严厉地批评极左派的观点“ 是错误的 ”，要文革小组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外事口造反派攻击周恩来的气焰顿时有所收敛，但“ 炮轰陈毅 ”、“ 揪斗陈毅 ”的行动却愈演愈烈。

7 月 25 日，趁周恩来赴武汉处理“ 七 · 二〇 ”事件之机，外事口极左派置周恩来的多次批评、警告于不顾，组成千人“ 揪陈大军 ”，涌至外交部门前“ 安营扎寨 ”，声言若不交出“ 三反分子 ”陈毅，决不收兵。于是，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不得安宁，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8 月 7 日，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王力召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时，发表了煽动造反派夺外交大权的王“ 八 · 七 ”讲话，他明显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说什么“ 外交部运动阻力大 ”，拿“ 外交唬人 ”，“ 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 ”他责问为什么“ 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 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 ”他极力鼓吹“ 有权才有威风 ”，并煽动说：造反派“ 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 ”，“ 还是原班人马，原封不动 ”，“ 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 长 ’。 ”对于那些“ 不革命 ”的，“ 不管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 长 ’，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 打倒刘、邓、陈 ’（按指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这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

在王力“ 八 · 七 ”讲话的煽动下，造反派对陈毅的批斗愈发激烈，对外交部的夺权愈发猖狂、急迫，他们于 8 月 16 日砸了外交部的政治部，宣布“ 夺取 ”外交部党委大权。随即，造反派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 检讨 ”……由此，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为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掌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外交大权一时失控，使整个外交工作陷于混乱。

这时的造反派开始行使外交部“ 部长 ”、“ 副部长 ”的职权，他们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 ”的名义发布指示和命令，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有几十封电报发往中国的各驻外机构，其中有的还公然写上“ 打倒刘、邓、陈 ”的口号，强令我驻外使领馆“ 贯彻执行 ”，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一把火制造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这一事件的导火线，还要从 1967 年 5 月份开始的香港反帝抗暴大罢工说起。

香港工人等各界反英抗暴大罢工，受到舆论界的极大支持。港英当局对此极为不满，于是颁布了一系列“ 法令 ”，强行搜查、查封爱国报社，野蛮殴打、拘捕爱国新闻工作者。

5 月 11 日，罢工开始的第 5 天，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司徒强，在香港人造花厂新蒲冈分厂附近进行采访时，遭港英警察殴打。12 日，新华社香港分社派代表前往港督府，向港督戴麟趾提出抗议。17 日，新华社打电报给港英当局，就此事表示强烈抗议。

6 月初，港英当局出动武装警察，对港九爱国书店、银行、百货公司和电影院等进行威胁和恐吓，并强令其拆除宣传橱窗。3 日，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就此向港督戴麟趾提出强烈抗议。

7 月，港英当局无理逮捕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且不断对分社工作人员进行挑衅和迫害。11 日，我外交部西欧司负责人召见英国驻中国代办霍

普森，就此事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7 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抗议港英当局逮捕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陈凤英、陈德穆和其他记者的非法行径。

20 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港英当局“判决”新华社记者薛平入狱两年和非法“审讯”其他中国记者的行径。

21 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召见英国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格雷，郑重宣布：由于英国非法迫害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中国政府决定限制格雷的行动自由，不准他擅自离开住所，要听候处理。（1969 年 10 月 4 日，鉴于港英当局已全部释放了中国新闻工作者，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召见英国路透社记者格雷，向他宣布，自即日起恢复他的行动自由）

8 月份，港英当局又无理拘捕进步新闻工作者多人，并派出警察搜查了《香港夜报》、《田丰时报》、《新午报》等家报纸，还勒令多家报纸停业，且对几家报纸和印刷公司提出诉讼。不料，这一事件成为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直接导火线。

8 月 20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对港英当局迫害新闻工作者的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

8 月 22 日晚，由外事口造反派和高校红卫兵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 1 万多人，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举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指出，英国政府竟敢无视我国外交部 8 月 20 日的照会要求，在 48 小时内尚未撤销对香港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拒不释放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和撤销对爱国报纸以及印刷公司的非法诉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挑衅……中国人民是说话算数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英帝国主义者在香港横行霸道。

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人头攒动，“打倒英帝”、“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等口号此起彼伏。最后，集会者在一些极左分子的煽动下，置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冲进了代办处大院，纵火烧了院内停放的汽车，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办公楼，制造了一起极其严重的涉外事件。这一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发生的，是在外交部被极左派夺权后一小撮坏人所为，这是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驰的，是对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艰辛开创的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严重破坏。这一事件给中英关系带来了极大损害，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坏影响，同样，也不利于香港问题的妥善解决。

自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后，英国政府就开始限制中国驻英代办处工作人员的行动自由，并企图中断代办处正常的外交通讯联系，还派出人员昼夜包围我代办处和我国其他驻英机构，对工作人员进行种种责难。

8 月 29 日，即在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第 7 天，我国驻英代办处也遭到两次袭击。代办处工作人员多人受伤，其中 3 人头部受重伤，被迫送往医院治疗。

当天，即 8 月 29 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紧急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就此事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从即日起，英国驻华代办处会体人员，未经中国外交部准许，不得离开中国境内；英国代办处全体人员只准在代办处办公处和寓所之间活动。

中英两国关系出现如此严重危机，可以说已到了断绝的边缘。

毛泽东周恩来：斥责极左派缓解中英关系

在以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人曾多次谈到“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指出这是极左分子造成的。毛泽东主席谈到此事时说，它是极少数坏分子指挥群众于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周恩来总理也曾说过：“运动发展到 8 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来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们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的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8 月 23 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多小时，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人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当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1970 年 12 月，毛泽东提及这件事时说：“1967 年 7 月 8 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1972 年 6 月，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他们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1967 年 8 月底，在上海的毛泽东看完由周恩来派人送来的王力的“八·七”讲话后，非常生气，当即批了五个大字：“大、大、大毒草！”毛泽东还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决定对王力、关锋二人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9 月，周恩来要求对“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端行为组织清查，肃清极左思潮对外事系统的影响。于是，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又重新恢复了工作，少数造反派头头被审查、处理。外交工作又逐步恢复正常。

作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周恩来，以其独具的博大胸襟和坦诚，坚决、稳妥地处理了这一外交事件的善后工作：一方面追查“火烧英代办处”的煽动者、组织者；另一方面责成中国有关部门加紧对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修复。

1971 年春，经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外交部具体负责的英国驻华代办处修

复工程竣工，英国代办机构的工作人员迁入新居。在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指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向英方代办明确表示： 1967 年人烧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反对；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让我们表示庆贺。

因为招待会上有许多国家的使节在场，这位同志不好开口讲这番话。周恩来知道后，叫来这位同志，语重心长地批评道：你本人也是当时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嘛，这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使节说有什么要紧？而且应该大声说！毛主席几次有关批评“ 火烧代办处 ”的讲话你们都学了，学而不用，不去实践，这就叫极左思潮的影响嘛！我们在对外关系上实行的是“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双方是平等的。人家到我们国家，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们同胞，那是它不对，但不能因此而烧它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那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的路线……

之后，周恩来亲自召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向他讲了上述意思，英代办当场表示理解和感谢。

周恩来总理对此事的妥善处理，表现了其博大而坦荡的胸怀，事后反映极好。就在这一年，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撤销英方在台湾的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升格问题举行谈判。

1972 年 3 月，英方终于接受了我方提出的建交条件，中英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中英关系正常化。

100 多年的中英外交史充分证明，晚清政府的卖国外交失去了香港，蒋介石的软弱外交没有能够收回香港，极左行为只能帮倒忙，只有以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制定的沉着稳重的外交政策，才是高瞻远瞩的上乘之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的实际情况，提出了“ 一国两制 ”的伟大政治构想，为和平解决香港问题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正确道路。

第十章　“小龙腾飞”的背后

从世界地图上看中国漫长的海岸线，香港只是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黑点”，但这一“点”却不能被世界所小视。环视全球，尚有一些国家的名字鲜为人知，但提起香港，却几乎无人不晓。在投资者眼里，香港是世界上最容易赚钱的地方；在消费者眼里，香港是全球屈指可数的“购物天堂”；在旅游者眼里，香港是观光胜地；在美食家眼里，香港是座“美食城”。于是，人们送给它一个美丽的名字——东方明珠。报载：菲律宾政府要在宿务省开设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港；泰国要在泰南王府设置“香港式”的自由经济区，想使之成为“第二个香港”；韩国宣布要把济州岛建成“香港第二”；而俄国则计划在俄、朝、中边境的哈桑地区创设它的“远东香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提议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于是，歌者问道：“香港为什么这么香？”

绝路求生　今非昔比

150 多年前，香港约有 7500 人。那里山峦起伏，平地很少，除了渔业、航海业和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的少量农业外，天然资源比较贫乏。而今，香港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600 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当你走在香港的大街上，两旁直刺苍穹的摩天大楼遮天蔽日，肤色各异的游人摩肩接踵。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墙——会议展览中心 有世界上第一座费用超过 10 亿美元的建筑物——汇丰银行总行大厦；有北美洲以外世界最高的建筑物——中环广场；有全球第二座无内柱大型建筑物——外型像倒金字塔的香港体育馆；有亚洲最大的海洋生物馆和游乐园——海洋公园；有全世界最长的室外自动电梯和过山车，有载客量最大的高空缆车。在这里，　40%的土地被辟为郊野公园，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当你立于水深港阔的香港港湾时，你将看到数不清的大小船舶和豪华的游艇在湛蓝的海面上穿梭往来，五彩缤纷的外国国旗在阳光下争相辉映，具有不同肤色、操着各种语言的水手倘样在繁华的商业大道上。集装箱频繁装卸，各类货物由世界各地向这里汇集，又从这里运往全球各个角落……此时，比美丽更能打动你的是她的繁忙，是它的快节奏。夜晚，登上太平山顶，俯瞰港九，一个灯影交织、华光异彩的世界让你不得不感慨“万家灯火城不夜，灯火迷离不夜城”的奇观……

人们把香港比作亚洲第一“小龙”。的确，香港很小，　109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 631 万人口，但这里却实现了龙的传人的“龙腾”之梦。

香港的发展超越了时间。1945 年，当香港从日寇 3 年零 8 个月的铁蹄蹂躏下挣扎出来的时候，已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然而，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本世纪 80 年代中期时，香港却已神奇般地成为富甲一方的东方明珠，使世人侧目。美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曾无限感慨他说，香港只用了 30 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 200 年的道路。举世罕见的发展速度，不可思议的香港现象，不能不让人瞠目，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不能不让人凝思。

香港的容量超越了空间。她虽在东方一隅，却囊括了整个世界的‘珍奇”。她的资本是国际资本大流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市场是国际商品大流通的中心之一；她的信息也是国际化的，从这里发出的声音可以很快传遍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她的文化也是国际化的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汇流

地……香港，巴掌大的地方，却堪称为世界的缩影和汇聚点。

有人把香港看作“浮华世界”。然而，香港繁华，却也深刻。香港的繁华不仅表现于钢筋水泥的丛林，穿流不息的人群，而且更表现于在这繁华的表征下面渗透出的香港人的精神。

150 多年前，英国由于殖民扩张的需要把香港辟力自由贸易港，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150 多年后，香港的贸易自由已远远超过英国本土，被世界称为“当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典范”。 150 多年的艰辛开拓， 150 多年的执着追求， 150 多年的精神积淀，今天，自由开放已成为香港不可或缺的精神特质。香港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在这里，商品、外汇、黄金和人员进出的自由最多；在这里，企业经营的自由最多；在这里，对一切资本一视同仁，自由竞争的机会最多；在这里，对内对外经济活动所受到的制约是最少的……

香港选择了自由开放，自由开放回报给香港的是一个又一个奇迹。

漫步在香港中区的德辅道中，你会为周围鳞次柿比的银行大厦惊讶不已。在这全长不到 1.5 公里的街道两旁，云集着近 30 家银行总行。中国银行大厦，汇丰，渣打，广东，东亚，廖创业……这些赫赫有名的银行，使德辅道成了有名的“银行街”，然而香港的银行又何止这些！“银行多于米店”，这是对与纽约和伦敦鼎足而立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香港金融业最为直观的描述。世界最大的 50 家银行集团有 44 家在香港设有办事处。 1990 年全世界排在前 100 名的著名银行，有 85 家在香港营业。目前香港各类金融机构及其分支行共有 2000 多家，按全港人口 600 万计，平均每 2800 人就有一个网点，全港平均每平方公里上就有 1.9 家银行。如果我们把今天这个“银行的世界”同 100 多年前的香港相比，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更不可思议的还有香港的股市和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是香港金融业中最火爆的地方。香港股市成立以来，全港共有上市公司 340 多家，其股票值近 1 万亿港元。从 1982 年至 1991 年的 10 年间，香港股市总集资额达 1400 多亿港元。在外汇经纪行的交易室中，3 秒钟的迟疑，就可能招致数以千百万美元计算的损失。行内术语称“一球”生意己是 100 万美元，而香港汇市每个交易日的成交额，更是一个天文数字——490 亿美元。在一天 24 小时中，当纽约的金融市场收市，伦敦不久就接着开市，而伦敦收市，香港不久就开市，香港一收，又轮到纽约重开。纽约——伦敦——香港，美洲——欧洲——亚洲，就这样周而复始，不分昼夜地轮回着。国际金融中心就像一台永动机，一刻不停地转动着。

过去多少年来，无论是中小学的课本，还是各种介绍经济地理的专著，讲到中国的重要港口，总要讲到上海、宁波、青岛、天津、秦皇岛、大连等，可是这百阿争流、商贾云集的香港，才是中国领土上的第一大港，也是东方第一大港。有人说：香港香在一个“港”字。位于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港阔水深，面积达 60 平方公里，吃水仅 12 米的远洋船舶可以自由进出。不仅其海面跨度与深度均属世界少有，港外的天然屏障更使港内风平浪静，船舶往来、停泊相安无事。论港的自然条件，在全球可与美国的旧金山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相比美。香港不仅香在港的深广和港的自然条件优越，更香在港口的现代化。目前香港有 7 个大型集装箱码头，而一艘集装箱轮船的装船时间平均只需 13 个小时。 1992 年香港共处理 7900 多万个标准集装箱，平均每隔 13 分钟就有一艘远洋货轮驶入或驶离码头，成为世界第

一大集装箱港。

繁华的自由港，给勤奋而顽强拼搏的香港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香港的对外贸易业由此蓬勃发展，成为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行业。从外贸在经济中的地位来看，香港的外贸总值，一直大大高于其本地生产总值， 1993 年外贸总值为 2.11 万亿港元，而本地生产总值只有 8478.13 亿港元，前者是后者的 2，5 倍多！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从香港的外贸在世界中的地位来看，虽然她的土地面积不到全球总面积的十万分之一，人白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但外贸总额，多年来却一直保持着国际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三、四左右（1993 年为 3.73%）。香港人“贪”，“贪”在抓了西瓜，也不放芝麻，几亿美元的大买卖不嫌其大，几万美元的小买卖也不嫌其小。香港人“狂”，“狂”在他们常爱说：“世界上如果有什么事香港只算第二，那别人绝不敢自认第一。”这句话虽然不能放之万物而皆准，但在人均外贸额方面却是千真万确的。香港的人均外贸额，远远超过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

香港本身是个奇迹，然而更为神奇的是她的工业。在文人骚客的笔下，香港除了几块石头外，实在找不出什么别的。然而就在这一方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为凭借的土地上，香港人却创造了制造业的“天方夜谭”。香港的产品畅销世界各地，几乎全球每一个角落都会看到标有“MADE IN HONG KONG”字样的产品。香港的制造业可谓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就应了那句歌词：“说也说不清楚。”要想进一步了解这“奇迹中的奇迹”，请看下列资料：

成衣出口量居世界首位，总产值仅次于意大利，为世界“亚军”。

手表出口量高居世界榜首，出口值比瑞士稍低，世界上每 3 只石英电子表，就有 2 只是香港制造的。

玩具出口量一直稳居世界冠军宝座，后来因大批厂商把生产基地迁到内地而下降为第三位，但仅以出口所得收益来说，香港仍居全球首席。

此外，无线电话、音乐贺卡、艺术蜡烛、人造花、手提包、发夹、婴儿鞋、真假珠宝首饰等多种产品的产销量，均居世界首位。

小小香港，赫赫大名。有人说：万国市场、购物天堂只有两个地方可以见到，一个是在梦里，一个是在香港。梦里——香港，方寸之间不知圆了多少人的梦。购物者喜欢香港，因为这里有日本的家用电器、摄影器材，美国和西德的高级卧车、机械制品，法国的美酒、香水，英国的衣料和日用品，北欧的家具、纸张，意大利的皮革制品，非洲的珠宝，澳洲的毛织品，南美的咖啡，瑞士的钟表，荷兰的奶制品，斯里兰卡的鲜花，泰国的大米和水果，中国的丝绸、纺织品、工艺品、粮食、副食品……。在这里，只有想不到的东西，没有买不到的东西。香港因此而被戏称为“吃钞城市”。购物者喜欢香港，天下客商更垂青于香港。全世界最新最好的产品都纷纷在香港上市，因为在这里可以创牌子、赚外汇。面对这块“最好赚钱的地方”，人们不禁会问，是什么造就了这万贾云集的商埠？那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香港的交通业与信息业吧。

中国有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足可见交通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香港，对外贸易不仅有发达的水上运输，还有便捷的航空运输。启德机场是东南亚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在亚洲仅次于东京成田机场。香港的航空客运量居全球第四位，航空货运量名列世界第三。目前 38 家航空公司提供来往香港及世界各地的空运服务，每周超过 1000 班定期客货班机，将香港和

世界上 90 多个大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世界空运业中，香港保持着两项冠军纪录：一是安全程度首屈一指；二是处理货物失误率最低。

在香港，人们把逛大街叫作“游车河”，可见汽车之多。香港山多平地少，人多车也多，但却“行”之井然有序。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人行天桥，机动车天桥，自行车天桥和立体交叉桥举目可见，让你感到香港人使尽了浑身解数，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地面和空间来发展交通。

人们已把行将到来的时代称作“信息时代”。在“为利者争于市”的香港，谁能最大限度地掌握市场信息，谁就能对变化莫测的市场做出迅捷的反应，而在市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开放的香港，全方位的信息网络造就了世界商海中的众多赢家。人们喜欢把香港的信息业称为香港经济的“耳目”，那么，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句中国古话来形容香港的信息业当不为过。香港被称作“不夜城”，因为它一天 24 小时都要对世界的“一举一动”做到“明察秋毫”。人们每天早晨睁开眼，打开电视机、收音机，足不出户，就能知晓世界各主要城市的股票行情，还可以从众多的报纸、杂志上获得市场的参考或分析资料。香港的电讯事业亦很发达，所以信息非常灵通。香港的“眼睛”不仅昼夜不闭，而且是全方位的。从海底到天空，从电缆到卫星，各种各样的通讯设备都很齐备。“信息就是金钱”，这一点无论是来港投资的外商，还是本港商人都无可质疑，他们之所以选择香港作为走向成功的阶梯，正是看重了她对世界市场了如指掌的能力。

然而香港的“腾飞”不是凭空而来的，更不是英国殖民者恩赐的，而是以中国人占绝大多数的香港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换来的。回首来时路，几多艰辛，几多奋斗！

港人：顽强拼搏展尽才华

香港经济的繁荣创造了东方经济的神话。这一神话拥有一个举世震憾的经济实体，却也拥有一个沧桑几许的历程。香港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马平川，而是犹如“鲤鱼跃龙门”，道道险滩横亘。每道险滩都曾出现剧烈的经济波动，仿佛已到山穷水尽之境，但在过滩之后，却又柳暗花明。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香港面对的是这样一幅残破不堪的景象：

城市千疮百孔、伤痕累累，2 万多间房屋被炸毁， 17 万余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人口大减，由 1941 年的 160 余万骤降到 60 余万，其中很多人病饿交加，挣扎在死亡线上。

经济陷于萧条，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市场货品奇缺，物价飞涨，金融混乱。

饱受战火摧残的香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一条身受重创的小龙，在呻吟，在哭泣。

面对战后的香港，港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过渡性措施，稳定了货币，宽松了信贷条件，同时宣布香港可享受英联邦各国的特惠税待遇，为香港商品进入东南亚和欧洲、北美等地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无疑对香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内地大批资金、技术和人口又大量流入，给康复中的香港经济输入了充足的新鲜血液。据估计，从

1946 年到 1950 年间，以商品、有价证券、黄金和外币等形式，从中国内地流入香港的资金不少于几十亿港元。从内地去香港的很多企业家，特别是上海纺织业资本家，不仅带去了资金和技术，而且带去了一批熟练工人和稳定的外销市场。 1947 年出任香港总督的葛量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一时期香港复苏较快的因素是由于中国回流香港大量劳工，香港经济的重建，主要得力于上海人带来的资本和工业技术。香港复苏了，她的臂膀重新蓄满了力量。

然而，朝鲜战争一声枪响，打碎了这一刚刚起步、尚还遥远的美梦。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对中国实行了全面的货物禁运，英国紧随其后，切断了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往来。对内地的贸易在香港转口贸易中一直占很大比重，停止与内地贸易，无异于堵死了香港转口贸易的最主要渠道。从此，香港贸易额急转直下，一落千丈。此时的香港被称为“ 消失中的城市 ”。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无数香港人从痴痴的梦想中惊醒，残酷的现实让他们意识到：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

“ 天无绝人之路 ”。此时的世界市场对成衣需求增加甚快，香港便大量进口棉花，织成棉布和成衣，销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西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但等国，香港的纺织业因此得到了高速发展。在纺织业的带动下，其他轻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新工厂开业典礼接连不断，一派繁荣景象。

朝鲜战争改变了香港经济发展的轨道，使她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而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又为其对外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0 年，香港的外贸总额达到 90.1 亿港元，超过了 1951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出口中，本地产品比重大大增加，达到 72%以上，这标志着香港已从过去的转口港转变为工业化城市。

60 年代，世界经济进入了战后第一个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购买力不断增强，对纺织、成衣等消费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致使国际贸易急剧扩大。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使发达国家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它们全力发展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量外移到一些具有充裕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世界经济分工进一步深化发展。这种发展趋势，如强劲的东风，推动着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条“ 小龙 ”由此开始腾飞。

随着老行业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的大幅度提高、新兴行业的迅速崛起，跨入 70 年代后，香港工业的发展已是硕果累累，许多种产品的出口量或出口值都名列前茅，几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商店里，都能看到香港生产的商品。一时间，溢美之辞四起，“ 世界工厂 ”、“ 玩具王国 ”等各种动听的头衔像采花的蝴蝶一样翩翩而来。然而，“ 福兮祸所倚 ”，发展经济如同爬山，一条路走到山顶了，往往就要下坡了。就在一个个光环在香港头上闪耀时，国际经济形势已悄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进口商品提出了更多的限制；另一方面，亚洲其他三条“ 小龙 ”韩国、新加坡、台湾的工业发展水平已超过香港，成为香港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劲对于。东南亚各国也在积极发展出口工业，奋起直追。尤其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挟其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将工业品源源打入国际市场，对香港造成很大威胁。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此时的香港如风雨中摇曳的小船，不知飘向何方。小龙腾飞的梦想再度受创。香港人擅于

创造奇迹，奇迹是铁铮铮的事实却带有不可思议的味道。面对“绝境”，香港人再度审时度势，改弦易辙，从 70 年代开始走上了多元化与国际化的发展道路。香港的多元化有“两条腿”，一条是工业的多元化，一条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多元化。

工业多元化包括产品多元化、部门多元化和市场多元化。按照这一发展策略，香港着重在高技术产业上下功夫，努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到 70 年代后半期，香港工业的部门结构已不再是纺织一柱擎天，而是形成了纺织、成衣、电子、塑料“四大金刚”和化工、钟表、食品、木材、家具。机械、印刷等“八百罗汉”共襄盛举的新局面。技术密集型高档产品不断增多，开发出了高速计算机储存系统，大型集成电路等高科技产品，畅销国际市场。1976 年美国发射的火星探测太空船“维京”一号和二号的电脑系统装置，就有香港制造的电子记忆配件。

在实现工业多元化的同时，香港的整体经济结构也逐步实现了多元化。一些原处于从属地位和服务性质的行业，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到 70 年代末，金融、商业、旅游、房地产等行业的地位日益上升，成为与制造业、外贸业并驾齐驱的支柱行业。它们密切相联，相得益彰，齐头并进，形成了强有力的整体竞争优势。到 80 年代初，香港经济已实现了现代化，站到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中。

今天的香港在国际经济大舞台上已不再仅仅扮演配角，而成了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和信息中心，在亚大经济中的地位更是其他城市难以取代的。

港人的顽强拼搏、勇于开拓的精神，从华人资本的发展历程中也可反映出一个侧面。自英人占港以后，英资历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济支柱，而华资的实力长期以来比较弱小分散，处于英资的压抑之下。但到了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有眼光、有魄力的华人企业家，惜助香港经济起飞的顺风，白手起家、艰苦经营，为日后的崛起打下了一定的基础。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华人企业家又利用英商错误估计形势、分散资金、将英资撤离香港的有利时机，先从低价购买大量地皮和旧楼宇为契机，在房地产行业站稳脚跟，继而又抓住股市看好的良机，公开发行自己的股票，大量筹措资金，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迅速壮大力量，闯入传统上由英资占据的一些经济领域，逐步形成了华资与英资平分秋色的局面。李嘉诚、包玉刚、霍英东，李兆基等，就是这一批新崛起的华资财团的代表人物，他们大都是白手起家，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多年的辛苦经营而发达起来的。

随着香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靠房地产致富已不是唯一的途径。七八十年代，在香港工业界又涌现出一批光芒四射、领誉海内外的华人企业家，如靠玩具生产风靡美国的徐家鳞、靠“金利来”领带走向世界的曾宪梓、钟表奇才杨启仁、皮革大王区永熙、电业新秀蒋志基等，他们向海外输出大量消费品，为香港争来了纺织品、成衣、钟表、电器等多种产品世界销量第一的美名。近几年来，除工业家之外，在贸易领域也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华人富商，如创办佐丹奴连锁店的黎智英、经营名牌产品的潘迪生、洋参丸大王庄永竞、东欧通张志诚等，他们或闯荡美洲，或进军西欧，或打入东欧，开辟了香港产品走向世界的条条通途，这一批新企业家的崛起，使华资在香港的各个经济领域，都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向世界显示了港人的聪明才智和顽强拼搏的开拓精神。

背靠社会主义祖国：天时·地利·人和

“奇迹”带来的往往不仅是震惊，还会有深深的思考。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之珠在向世界昭示着她的繁荣时，也在人们的脑海中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香港现象”应做何解释？是啊，自然资源极度匾乏，却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富甲一方；只有 1092 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能在世界市场的风云中劈波斩浪，立于不败之巅；背负着沉重的殖民制度，却成为世界公认的“自由经济的圭臬”。这一切似乎有些矛盾却又极其和谐地展现于世人面前，人们不得不问：小龙腾飞的真谛何在？

有人说，香港经济的繁荣依赖的是充满活力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有人说，香港的今天应归功于英政府的治理；还有人说，香港的繁荣是殖民之花……。所有这些论点，毕竟代表了一些人的某些想法。然而，历史绝不可能会因这些观点或想法而改变她本来的面目，改写她发展的历程。

对于只强调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论点，对于夸大英国政府统治职能的观点，对于赞誉殖民制度的言论，我们毋需多言，历史自有公论。我们不否认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和严格的法制对香港发展所起的作用，但只想问一问，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被辟为自由港已经 150 多年之久，却为什么她的崛起仅仅是战后 50 年的事情呢？

龙腾，必有好风凭借。香港腾飞所凭借之风，绝非是来自英政府的统治和殖民制度，而是来自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体恤、鼎力支援和对香港的特殊政策，以及祖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

香港面临大海，背靠祖国腹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社会主义祖国对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香港生死攸关的大事。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推进到深圳河边就停止前进，没有像当年解放上海、广州那样一鼓作气立即收回香港，而是对其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是祖国母亲忘记了身在囹圄的孩子吗？不！这正是慈母对她日思夜想的孩子的深深体恤。社会主义祖国在特殊条件下出于对香港的爱护和关心，给予了它特殊的政策，其实践的结果是：消除了英国的疑虑，促使中英较早达成了互派代办的协议；排除了香港局势动荡的隐忧，使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稳定和繁荣是一对孪生姐妹，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会有经济上的蓬勃发展。而香港的繁荣更是得益于祖国对其“稳定”的政策。1956 年香港右派暴动，中国政府态度明确而强硬——“必要时出动军队帮助英国当局”平乱，促使骚动迅速平息。中国内地虽然也是几番风雨，颇不平静，但历次政治运动却极少波及香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 1967 年，极左思潮曾波及到香港，但很快就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制止，使香港迅速恢复平稳。

稳定带来的必定是人才、资本的流入：在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全球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特别是军事较量，在亚大地区引起巨大震荡。香港因政治局势相对稳定，成了亚大地区的政治避风港，使资本大量流入。中国大陆解放前夕，因香港局势相对稳定，上海和广州等地的资本、人才大量流入，为香港走上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条件。近 20 年来，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来自欧美、日本、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不断增加。有人将香港喻为“聚宝盆”，就是因为它在中国政府支持下政局稳定，全方位开放，有钱可赚，而这也正是香港经济发展的基本优势。

至于近 50 年来社会主义祖国在原料、能源、食品、供水等方面的支援，更是成为香港人民息息相关的“生命线”，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即使在 60 年代初，内地处于暂时困难时期，这一供应也源源不断。据统计，1954—1963 年，香港进口食品的 43%是由中国内地提供的，1964—1973 年为 50%。在价格上，70 年代初由内地进口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便宜 50%以上，原料约便宜 30%，衣服等消费品便宜 25%，这对香港的稳定发展，抑制通货膨胀、生产成本，增强国际竞争能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香港近 20 年的经济腾飞，主要得益于祖国内地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以来，内地资本在香港的投资显著增加，除原有的中国银行、招商局、华润公司、中旅等四大集团外，改革开放后成立的中信、光大两大集团也在香港注册经营，并且各省市也纷纷来港投资。中资机构的经济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内地和香港的经济联系，使双方均收其益，内地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香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转运中心，中国每年大约有 1/3 的外汇是通过香港取得的。同时，香港还利用其背靠内地“近水楼台”的优越地理位置，向内地这一庞大市场投资，并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优势，在内地兴办企业。据统计， 1979—1988 年，香港在内地投资占中国外资合同的 2/3，港资兴办的“三资企业”遍及全国各地。尤其在珠江三角洲，这里的廉价劳动力和地皮吸引了大量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内移，为香港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据不完全统计，珠江三角洲地区香港的独资与合资企业，直接雇用工人在 200 万以上，加上间接雇佣者不下 400 万，这大大超过了香港制造业工人的总数（最多时曾达 90 万人，现约 73 万人），这是香港产品降低成本、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也是香港的其他竞争对手目前尚不具备的特殊优势。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内地和香港的经济联系日臻互补互利，共同发展。正如有些经济界人士所分析的那样，就从经济层面来看， 1997 早已来到香港。尤其是邓小平 1992 年视察南方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中国政顺人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这就为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中国有句古话叫“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香港今天的成就首先应归功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崛起及其对香港的特殊政策，但这从根本上来讲只是香港稳定繁荣的一个源头，而另一个源头则是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从来都活力十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种制度并没有给香港带来生气，因为那时的香港，只是一个转口港，没有多少工业，与内地相比，香港不如广州，更不如上海。究其原因，除了殖民制度本身的缺陷外，还因为当时中国内地的基本制度与香港同属一种类型（私有制及早期资本主义），上海和广州等内地大城市的基础和发展条件比香港好，所以中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没有特别重视和利用香港。但当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由一国变为多国，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世界进入两种制度的尖锐对抗时，生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夹缝中的香港却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要把香港辟为“盼望世界的窗口”，而西方大国又要把香港建为“瞭望中国的窗口”，双方虽然出发点截然相悖，但归宿点却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保持香港的稳定，促进香港的繁荣。

诚然，美英等西方国家对香港的政策，客观上对香港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它们从全球战略出发，需要在社会主义中国旁边保留一

个基地，作为进入中国的踏脚石，香港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条件，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的第一选择。朝鲜战争切断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往来，但却没有切断香港的生存希望，因为美国等西方大国旨在把中国大门口的香港建立成“资本主义文明的橱窗”，造成“繁荣的对比”，以抵消战后初期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利用这些条件，香港不失时机地调整了自己的产业结构，吸收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设备、技术和经验，实现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进而发展了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的多元化。

鲁迅先生曾经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提出“拿来主义”，而香港的发展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拿来主义”的结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只要有利于香港发展的就“拿来”，就为“我”所用。也许有人要提出质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制度,又怎能为一体所用？但事实上，对于香港来说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在两种不同政治制度下却有着相同的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因而两种不同经济制度又存在着一定的互补互利关系。香港需要西方的资本、先进科技、管理经验以及市场经济提供的自由竞争机会，也需要内地的廉价劳动力、土地、原料、能源等生产要素和庞大的市场。香港本身的市场容量很小，但同内地庞大的社会主义市场联通起来之后，其容量和能量就会增大好多倍。香港的劳力缺、工资高、地皮贵，但与邻近的日益开放的珠江三角洲合作，制造业的这些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工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就大为提高。因此， 80 年代以后，中国神州大地掀起的开放改革之风，又使得香港如虎添翼。

奇迹带来的往往不仅是惊叹，还会带来深深的思考，深深的思考之后，带来的是更大的奇迹。中国领导人站在展望 21 世纪这一历史的至高点上，深深地懂得今天扶摇直上的小龙凭借的是什么，因此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香港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不会改变，作为连结两种制度的桥梁的地位不会变。1997 年即将来临，香港将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她的继续腾飞，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大的震惊！

第十一章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对于香港来说是躁动的年代，是迷惘的年代，是人心惶惶不安的年代，尤其到了 1982 年更是如此。从 1982 年年初起，在香港，再也没签订过任何地产和抵押合同。因为这类合同一般为期 15 年，而 15 年后的 1997 年，英国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强租“新界”99 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即将期满。到那时香港的命运如何？是“维持现状”，还是由中国接管？是“天下大乱”，还是更加繁荣？对于这一切英国政府想知道，各国投资者想知道，香港同胞更想知道。世界将她的眼睛紧紧盯住了中国，盯住了中国的首都北京，盯住了中国的高层决策人。

祖国人民：张开双臂翘首以待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 80 年代初,在这 30 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理智、冷静和克制，采取了“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正确方针，保持了香港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但是，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竟然有一小片地方在英国的管辖之下。这种屈辱状况已经存在了 100 多年，难道这种历史还要继续下去吗？不能，绝对不能。到了 80 年代初，中国人民 100 多年的忍耐与等待走到了尽头。

百年沧桑，天翻地覆。在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今天，中国收回香港的机遇和条件已经成熟。

第一，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中国采取了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政策。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中日邦交正常化，中英外交关系升级。后来，国际形势逐渐由对抗走向对话，由紧张走向缓和，由以军备竞赛为中心的竞争转向以经济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与此同时，由于始终坚持正确的和平外交路线和政策，中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1971 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中国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身份活跃于国际舞台。

1972 年 11 月 8 日，第 27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从而排除了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参与解决香港问题（如国际共管）的可能性。这些为中英和平友好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契机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进入 80 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中国各个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整个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 1995 年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为世界第七位，据西方权威经济机构估计,到 2000 年它将跃为第四位，2020 年将居第二位。中国不再是被人耻笑的“东亚病夫”，它已成为一个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的朝气蓬勃的东方大国。

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实现祖国

统一的任务日渐提上议程。实现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收回香港。为了实现香港的平稳回归， 1978 年 8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港澳办公室，以拟定解决港澳问题的政策和研究港澳政治经济情况，这为有计划、有 步骤地解决香港问题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香港同胞：“ 港督专制 ”可以休矣

说香港，道香港，说不尽的是香港的繁华，道不完的是香港的神奇。可是当我们体味着这满目的繁华，惊叹着这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感慨着“ 何幸而为香港人 ”时，掠过心头的也有一丝悲凉。香港人创业的激情和香港人对政治的冷漠同是举世闻名的。它们似乎矛盾重重却又实实在在地伴随着香港风风雨雨百年之久。香港人潇洒，香港人狂妄，因为香港人享受着世界一流的物质生活；香港人富有，他们可以一掷千金甚至挥金如上。然而，香港人无奈，香港人悲愤，因为香港人在这块殖民统治的土地上毫无自主权和发言权。遥遥万里之外的英国王室和政府掌握着香港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的绝对控制权，政治生活的悲歌，让香港人哀叹“ 何不幸而为香港人 ”。

港英当局是讳言“ 殖民统治 ”一词的，他们在时刻标榜着“ 非殖民化进程 ”，可是事实却是香港的政治制度 150 多年来并没有什么变化，堪称英国早期殖民统治制度的活化石。有人曾说：如果第一任港督璞鼎查活着重临香港，他一定可以发现香港政府的基本构架仍是他在位时的老样子。这话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虽然 100 多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迫于内外各种压力，港英当局有限度地扩大了政治参与范围，吸收了一些华人“ 精英 ”参加政府或政治事务，并建立了咨询渠道和网络，但仍无法改变其殖民统治的本质：香港政府的权力不是来源于香港人民，而是来源于英国王室和英国政府。所有权力集一身的港督就是英政府在香港的代言人。

香港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而这片神奇的土地却不是属于香港人的。在 109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比比皆是的是香港人，而看一看香港的政府体制，才会真正懂得在这里实际上没有港人的立锥之地，但英国人并不承认这一点。然而，香港政府的正式文书中白纸黑字，真真切切地写着：香港的政府体制划分为二级，第一级是中央政府，第二级是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第三级是区议会。香港何来“ 中央政府 ”呢？香港总督、行政局、立法局和以布政司为首的行政部门就是香港的中央政府吗？香港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吗？香港与英国没有任何关系而算不得英国的殖民属地了？勿说荒唐，勿说滑稽。100 多年来英政府就是一直在玩弄这种巧妙的把戏。

总督，在香港是“ 权力仅次于上帝的人 ”，根据港英殖民统治的根本大法《英皇制浩》和《皇室训令》，英皇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而港督则是英皇在香港的全权代表。港督由英皇根据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的提名任命，总揽香港的行政、立法大权，并兼任驻港英国陆、海、空三军司令长官。港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无冕之王 ”，他行使皇室委任的种种特权：以政府首脑的身份主持行政局和立法局的会议，各种条例草案经总督批准后才可以成为法律；所有在香港实行的政策决定，都必须经过总督批准；拥有任免官员和议员的权力；享有特赦权，即对判刑的任何罪犯，总督都有权给予赦免；代表英国王室拥有香港土地的处置权；有权获得驻港全体英兵的“ 服从、援助和帮助 ”……在香港，港督是一个真正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人物，其他任何

个人与机构都无法与之平起平坐。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深有体会他说：在英国管辖下的香港，“ 总督的权力仅次于上帝。当他抵达每一处地方时，人人都要起立。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遵从他的意愿。 ”香港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以总督为首的政府高级官员手里，他们只对英国王室和政府负责，而站在他们身后的是实力雄厚的英资财团。广大的香港人民既不能罢免他们，也无法监督他们。在香港有一句流传广泛的老话：“ 实际统治香港的是马会、恰和、汇丰及总督府。 ”

当然，也不可否认香港的法律对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所起的作用。香港的法律多而且具体，举凡保障社会秩序，界定权利责任，调节经济活动，监督官员廉政，管理公共交通，维护环境卫生等等都有法可依，可谓面面俱到。但香港的法律在涉及到居民的政治权利时，却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多半不是保障居民的政治权利，而是限制这种权利。例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都明文规定公民有集会游行的自由，而香港的法律却没有一条从正面规定居民应该享有的集会和游行权；再如，“ 知情权 ”本应是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但香港却没有任何保障居民“ 知情权 ”的法律，而限制居民的“ 知情权 ”的法律涉及面之大，限制之严，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香港这个号称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从法律上来看，似乎并非如此。香港人每日所见所闻，不是既成的事实，就是势在必行的政策。香港人除了有别无选择的权利外，就只剩下了不闻不问沉默的权利了。

香港有最高法院，但却不是终审法院，香港的终审法院是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香港法院分三级：初级法院、地方法院、最高法院，层层法院的法官都是由港督委任的；香港没有独立的检察机关，一切刑事案件的检察起诉工作都由律政司署负责，而律政司署却直接隶属于香港总督。“ 香港总督 ”，多么诱人的名字，这不仅仅在于他的薪金在世界上仅低于美国总统，更在于他在这一片繁华乡里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 1997 年，历史将掀开新的一页。中国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结束已延续了 100 多年的民族耻辱的历史，香港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中走向更加繁荣昌盛的明天，通向这一美丽前程的大道，就是“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的伟大构想。提出这一伟大构想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第二编　谁主沉浮

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

梦圆了，
愿圆了。
圆了一个几辈人想了一百多年、盼了一百多年的梦。
……

这首《天圆圆地圆圆》之歌，唱在香港回归祖国倒计时一周年之际，不知拨动了多少中华儿女的心弦。中华民族翘首期盼的日子——1997 年 7 月 1 日，随着倒计时钟上分分秒秒的跳动，一天天向我们走来。

东方之珠回归的步伐始于新中国诞生 35 周年。198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最辉煌的年份之一。在这一年年底，中英两国政府首脑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庄严宣布：近代史上晚清政府割祖给英国的香港，将于 13 年后的 7 月 1 日回归到祖国的怀抱。中华民族蒙受了 140 多年的奇耻大辱，终于得到了洗雪！

百年国耻，一朝得雪，人民忘不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功劳。在这一年北京举行的国庆盛典活动中，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代表了国内外炎黄子孙的一致心愿。

邓小平此时此刻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非常热爱香港。他对前来参加 35 周年国庆观礼的众多港澳同胞动情他说：“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在今后十三年和十三年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大家共同努力，这个目标肯定可以实现。”“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①]以后，他又多次表达了要亲身参加香港回归盛典的心愿。

邓小平是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他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没有辜负毛泽东的重托，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任。亿万中华儿女和这位世纪老人在一起等待者，等待着香港回归祖国之日的到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2 页。

第十二章　毛泽东的晚年打算与邓小平的三大任务

殷切的期望

1974 年 5 月 24 日，英国保守党领袖希思抵达北京。北京国际机场上悬挂着中英两国国旗，大型横幅标语上写着：“ 热烈欢迎英国贵宾！ ”

这是希思第一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委托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担任主陪。5 月 24 日，邓小平率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外贸部部长李强、副外长乔冠华，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希思。邓小平与走下飞机的希思握手，对客人热情他说：我代表周恩来总理向你表示热烈欢迎。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希恩。毛泽东说，很久以前中国怕欧洲。但这些都成了历史了。这时，他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

说着，毛泽东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总理：“ 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 是 1898 年租给他们的，租期 99 年，到 1997 年期满，距现在还有 23 年挂零。 ”毛泽东对希思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接着，毛泽东用他那巨人般的手一挥，指着坐在不远处的邓小平等人说：“ 是他们的事情了。 ”[①]

显然，毛泽东仍坚持维持现状的方针，在有生之年不打算把收回香港列上议事日程，而是把这一使命委托给了比他年轻的领导人邓小平。

当时，邓小平副总理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曾侧面谈到香港问题，表示在将来的适当时候解决它。可见，他要担负起领导收回香港的重任。

孟子说过，在历史上担当“ 大任 ”起过作用的人物，“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邓小平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造就了治国兴邦的雄才大略。

邓小平 16 岁远渡重洋去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18 岁加入革命队伍，22 岁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学习马列主义，23 岁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投入到火热的中国革命斗争中。 30 年代上半期，邓小平由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受到了中央苏区左倾领导人的排挤和打击，被错误地解除了领导职务。毛泽东后来曾说过，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在这次挨整的日子里，他失去了当时的妻子。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邓小平也出席了这个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并第二次出任党中央秘书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立下了赫赫战功。建国初期，他从西南被调回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秘书长，在 1956 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成为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在“ 文化大革命 ”中，邓小平经历了第二次巨大的挫折，被当成党内第二号“ 走资派 ”，流放江西。

林彪的自我爆炸，使邓小平的命运再次获得转机。他在江西听到关于林

[①] 刘金田：《邓小平与希思》，载《世纪风采》1996 年第 3 期。

彪事件的传达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于 1972 年 8 月对邓小平这封信作了结论性的批示。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并经毛泽东的同意，邓小平于 1973 年 3 月从江西回到北京，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毛泽东一向器重邓小平。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曾指着随他访苏的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那个小个子很有智慧，将来是个了不起的人啊！第二年，毛泽东告诉来访的赫鲁晓夫，他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就是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①]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毛泽东把林彪树为他的唯一的接班人。林彪出逃身亡，才使毛泽东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邓小平复出不久，毛泽东又开始重用邓小平。1973 年 12 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宣布把邓小平请回政治局。他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1975 年初，邓小平被任命力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被选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邓小平担任上述党政军要职还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毛泽东给予邓小平很高的评价，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②]

邓小平也一贯推崇毛泽东。在他身上很有毛泽东的风度。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善于统筹全局，作出非凡的战略决策。周恩来曾经说，他特别欣赏邓小平“举重若轻”的领导艺术。邓小平在敬重毛泽东的同时，又在重大问题上勇于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指出新的方向，从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多谋善断，但不主观盲动。他是一位真正的实事求是派。在这一点上，他是实事求是原则倡导者毛泽东的最好的学生。正因为遵循了这条基本原则，他才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从神还原为平凡的伟大。同样，因为遵循这一原则，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方针，充分考虑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和当地人民的要求。

历经磨难，铸造了邓小平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性格。他永不服输，百折不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不怕鬼，不信邪。他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碰硬，不伯摸老虎屁股。 70 年代中期，他被重新起用后，对猖狂一时的“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敢顶敢斗，不怕捅“马蜂窝”，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对于江青等人处处设陷阱、随手抓辫于的做法，邓小平心里十分明白，他自己就说过：“我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但是，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他不怕江青等人抓辫子，不怕被打倒，不把个人的安危放在心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就是邓小平的人品和性格。 1975 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后，他为了挽救中国濒临崩溃的经济，下决心进行全面整顿，发展生产，扭转“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势力盘根错节，占了上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然而，一年多以后，邓小平又重登中国政治舞台，又以不怕冒风险、敢于试验的顽强意志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

[①] 《邓小平的历程》下卷，第 107 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 年版。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 411 页。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邓小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强大和统一。 1981 年 2 月 14 日，他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说：“ 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奋斗了 30 年。中国人民站起来后，他又为中国的富强和统一而努力工作。

“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邓小平果断地抛弃了过去一些“ 左 ”的做法，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他把振兴中华民族与祖国统一结合起来，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强烈的爱国主义，使他始终把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在主权问题和其他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毫不让步。

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是邓小平领袖才能的重要特征之一。毛泽东说他“ 绵里藏针 ”，十分形象地道出了邓小平的这个特点。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不封闭，不僵化，善于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因此，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引上了一条充满生机、全面开放的道路。他在处理外交问题时，也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坚决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原则，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善于妥协，善于做出必要的让步。他倡导的“ 一国两制 ”方针，既坚持了祖国统一的基本原则又充分显示了善于妥协的灵活性。

人们一般都很了解邓小平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组织、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卓越领导才能，而对他在外交方面的才能和艺术往往注意不够。事实上，邓小平是个非凡的外交家。他具备了外交家所需要的各种素质。像周恩来和陈毅一样，他在青年时代有过多年留洋的宝贵经历。他留学法国 5 年多，又留学苏联近 1 年。这种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锻炼了他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才华。

建国后，邓小平参加和领导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显示出了杰出的外交才能。50 年代，他多次访问苏联、东欧国家。60 年代初，他曾率团赴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进行会谈。1974 年 4 月，他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 三个世界 ”的理论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 最好的代理人 ”。1975 年 5 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法国。这是代表当时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对法国总统蓬皮杜 1973 年 9 月访华的回仿，同年 12 月初，美国总统福特访华，邓小平参加了中美会谈。他代表中国政府向美方斩钉截铁地提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项条件：同台湾断交；废除美蒋条约；撤军。但美国总想把台湾当成“ 不沉的航空母舰 ”，1978 年至 1979 年初，邓小平根据形势的发展，促使中美建交谈判取得突破，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邓小平随即访问了美国等国。

希思首次访华那一年，邓小平已是 70 周岁。按照孔子的格言，“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邓小平此时已经从事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事业，长期担任地方和中央领导职务，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领导经验，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不可多得的罕见领袖人才。他所具备的卓越领导才能，使他完全胜任毛泽东所期待的收回香港的历史重

托。

历史的重任

1977 年 7 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的这次出山，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问世。

1978 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到来。邓小平把中国引上了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然而，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又是紧密相联的。毛泽东在 70 年代初打开的外交新局面，为后来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国际战略思想。

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打开了长期紧闭的中美关系的大门，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1974 年 4 月 4 日至 16 日，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美出席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他代表中国政府在大会上发言，获得了广泛的响应。邓小平在发言中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互相争夺，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实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构成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西欧、日本等国家则是可以联合反霸的力量。

邓小平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的大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把它作为新时期的三大任务之一。反对霸权主义，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十分有利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邓小平于 1978 年 9 月视察东北时，第一次提出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意见的形式提了出来，最后成为全会决议的中心内容之一。邓小平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勾画了宏伟蓝图。 1979 年底，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的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目标。此后，他又把“小康”目标分解为二步，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他还进一步提出到 21 世纪中叶，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目标。

在中国进入了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的同时，中美关系也完全实现了正常化。在这种极为有利的条件下，实现祖国统一的战略目标被提上日程。1979 年元旦，他在全国政协的一个座谈会上兴奋他说：“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①]

1980 年 1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发表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阐述了 80 年代中国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说，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他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54 页。

指出，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因为这是中国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中国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

这三件大事，就是邓小平对 80 年代中国政府施政基本目标的规定。三者构成了战略全局。其他一切事情都是队属于这个大局，作为这个全局中的一个环节。

邓小平时代开始时就提出了香港问题，而且把它与三大任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香港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进入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后，香港的作用不但没有降低，相反更加重要了。邓小平后来解释中国承诺香港现行制度在回归祖国后 50 年不变的根据时说，“ 五十年不变不是为了安定香港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发展战略所需要的时间是下个世纪五十年。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 ”[①]可见，香港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对外开放，是邓小平推动现代化的基本国策之一。而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就是创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办在哪里呢？思路也是从香港等地打开的。

1979 年 4 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会上，当时的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

会议期间，邓小平对他们说：在你们广东省划出一块地方来，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后不久，广东、福建两省省委分别于 1979 年 6 月 6 日、6 月 9 日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7 月 15 日，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委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深圳特区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如今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繁华异常，为香港的平稳过渡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香港作为自由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给邓小平以新的启发。他要在一些沿海城市试办自由港。

1984 年 2 月，邓小平与王震到厦门视察。通过实地考察并听取当地领导人的设想，邓小平开始酝酿一个重要决策。回到北京后，他邀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他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大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岛全部搞成特区，就能吸收一批华侨资金，不仅华侨，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这样就能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为它服务，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如果一下子建不成自由港，可以先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华侨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是为了发展我国东南部经济，特别是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

[①] 《邓小平论祖国统一》第 59 页，团结出版社，1995 年 2 月版。

国统一大业而作出的重要部署。 1985 年 7 月 29 日，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总面积 131 平方公里，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1988 年，邓小平提出再造几个香港的构想。“ 再造香港 ”，是加快对外开放的又一个大战略。中国又在厦门以外的有条件的沿海城市，试办更多的自由港。

邓小平还从中国统一这个全局通盘构思解决台湾、香港以及澳门问题，因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是一致的。实质上就是后来明确表述的“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 的战略构想。邓小平虽然把台港澳问题统筹考虑，但并没有把它们等量齐观。台湾回归，一直被当作三者之中最重要的，香港问题排在第二位。因此，中国对台政策支配着对港澳的政策。同时，邓小平又实行 “ 中间突破 ”，把妥善解决香港问题作为顺利解决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先导和典范，他意识到，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于是他后来说，“ 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 ”。香港问题解决得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与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紧密相联。他要通过妥善处理香港问题，为用和平方式解决某些国际争端提供范例。“ 一国两制 ” 政策及其在香港问题上的成功运用，获得了世界各国的一致好评，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邓小平通过成功地解决香港问题，既收回香港，又考虑到英国的利益，使之成为中英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也充分照顾其他国家在港投资和贸易利益，这又为发展与这些国家的良好关系提供了新的共同点。

总之，在邓小平胸怀的全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成为一着内联现代化建设、外接国际关系、打通祖国统一道路的活棋。

第十三章　“请香港投资者放心”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这句俗语可以作为 1982 年之前邓小平对待香港问题态度的恰当写照。70 年代未至 80 年代初，所谓“1997 问题”开始引起一些人的不安，也给一直处于平静状态的香港经济带来了时大时小的波浪。邓小平冷眼静观香港的局势变化，同时反复安慰那些为香港前途而担忧的人们，回答英方的探询。

探虚实　拟派港督访北京

70 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并没有宣布放弃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但是，一些人却开始对香港的前途担心起来。

在香港，一般人是不会对前途担心的，因为中国政府早已表示，“长期打算”的底线是 1997 年。而 1997 年离当时还有近 20 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不会受到直接的影响，所以用不着那么担心！

然而，对于准备向香港投资的中外大财东们，　1997 却是个很近的年份。特别是人们最热衷的土地投资，虽然利润极大，却是一项长期性投资。对他们来说，一二十年是个很短的时间。所以，1997 这个年限已经对他们的投资行为造成了巨大的限制，迫使他们把资金只投向短期项目，对那些投资大、周期长的项目则不敢问津。

毛泽东在世时，　1997 这个年份就已经开始影响香港的投资者了。1976 年 3 月 26 日的英国《卫报》发表一整版“特写”，报道香港投资者当时的行为和心理。文章说，因为到了 1997 年“新界”租约期满，香港将归中共管辖，所以投资者都作尽快归本的打算。而对于长期性的投资没有兴趣。因此，香港可以得到急功近利的经济兴旺，但长期的繁荣是难以保证的。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英国政府首先向邓小平提出了他们过去一直避而不谈的香港前途问题。

英国以前不提香港前途问题，是为了继续占据它，现在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也是为了长期保持对香港的统治权力，因为香港对英国来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经济上，香港是英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商业据点，在政治上，香港是英国对华关系的一枚棋子。70 年代以来，英国对香港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视。从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正好是麦理浩任香港总督。他曾表示，香港可能成为伦敦通向北京的一道“桥梁”，或者成为一种“障碍”。他上任后，还是力求使之朝前者的方向发展的。1972 年中英外交关系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后，港英政府把同中国的关系作为整个中英关系的重要一环来处理。其目的有二：一是以此配合英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政策；二是英国从远东撤减驻军后，使香港成为英国推行远东政策、维护和扩大它在东南亚利益的一个基地。

总之，在所谓“九七大限”临近之际，英国不能不为保全香港这个“会下金蛋的鹅”而想尽一切办法。选择合适的人来向中国挑明这个问题，进而诱使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作出让步，是当务之急。

经过一番思量，英国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

麦理浩是一位有建树的总督，他自 1971 年就任总督以来，为香港民众做

了一些实事。比如，他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解决了上百万人的居住问题，大得中下层港人的民心；他创立廉政专员公署，使港府在廉政建设和端正社会风气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他还实施新市镇发展计划，开通海底隧道、地铁，大量增设港府医院和辅助医院，推行 9 年免费义务教育，设立工业发展委员会、消费者委员会、香港训练局等。香港经济在 70 年代的骄人表现，与麦督是无法分开的。所以，香港舆论称赞他把香港带进了“麦理浩时代”。

作为第一位外交官出身的总督，麦理浩对 1967 年形成的内地与香港间的巨大隔阂也作了一些努力，使内地和香港关系迅速不断升温，到 70 年代末已达到十分密切的程度。他提出了与内地“经济合作，双方受益”的口号。

英国政府选择麦理浩向邓小平提出 1997 问题，不仅因为他的身份适宜，而且由于他正得到一个来自中国政府的邀请。1978 年 12 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访问香港的第一位部级官员。

在总督府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外贸部长对香港大实业家们说，希望他们“帮助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计划”。李强还向世界银行家们宣布，中国“需要几百亿美元的外汇来支持实现现代化计划，香港在这方面会发挥作用的”。

李强访问香港，是两地关系非常密切的象征。为了促进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李强在总督府午宴上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返回北京后，李强又向港督发出正式邀请书。中国政府热情邀请麦理浩总督，希望与他商量大陆与香港合作，尤其希望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香港，在中国走向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发挥重大作用。

中国外贸部长对香港总督的邀请，可以说是个天赐良机。英国政府不会错过机会，只让麦理浩作个走过场的官式访问。它要抓住时机，让总督麦理浩试探中国领导人对 1997 的态度，一来可以向香港的投资者作个交代，稳定他们的信心；二来为外交大臣访华起到某种探路的作用；三来可以根据中国政府的态度，确定今后管治香港的策略；如果中国政府决定于 1997 年收回香港，那么英国今后就得做“殖民撤退”的准备；如果中国政府同意英国在 1997 年以后继续管治香港，那么英国还可以在香港一切照旧。

1979 年初，英国外交部研究了麦理浩访京的安排。他们计划让总督同中国领导人主要谈三方面问题：第一，香港与广东的关系问题；第二，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中的作用问题；第三，也是总督访京的主要目的，即趁机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一下香港的前途问题。

英国决策者感到前面两个话题都好谈，只有香港的前途问题太敏感，需要仔细研究出一个万全之策。

经过左思右想，智囊们终于提出一条计策：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前途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祖期问题，也就是只提出一个商业性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强调英国此时不想谈 1997 年之后英国的管治问题，而只是试图从香港的利益出发来促进对其长期的投资。

麦理浩还建议，可以设法使中国领导人不再提 1997 这个租借到期日，比如对有关土地的租约问题，劝中国领导人同意用“在英国管治这个地区的期限内有效”的声明，来代替 1997 年 6 月 27 日这个香港土地租约的到期日。其目的是要使香港继续置于英国人的管治之下，永远脱离祖国的怀抱。

一些英国决策官员对会谈结局持乐观看法。他们觉得，邓小平很讲道理，注重实际。此外，主管港澳事务的负责人廖承志与邓一样，富于灵活性。然而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邓小平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绝不会在涉及祖国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让步！他后来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几次谈话中所表现出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坚定的立场，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他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①]

同时，英国还有个想法，就是希望采取澳门形式，因为葡萄牙想把澳门交还给中国，中国不仅没有接受，还请他们再管一个时候，所以，英国想同中国“续约”。

确定港督访京试探中方关于香港问题态度的策略后，英国外交部又要求对访京的内容绝对保密，以便防止邓小平一旦否定英方的要求，使英国失去其在香港的既得利益。

大智大勇　邓小平主动出击

1979 年 3 月 24 日，麦理浩离开香港，经广州于 26 日到达北京。随行的有港督夫人、港督政治顾问魏德巍（即以后的港督卫奕信）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在北京的前两天，麦理浩的活动包括会见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外交部长黄华、宴请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等。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举行了欢迎港督的宴会。

3 月 28 日晚，中方通知，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在会见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 1997 香港问题。

第二天上午 10 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　行，李强和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也在场陪同。

出乎港督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前提是香港系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实业家到大陆投资，特别要帮助发展深圳，使深圳变成一个大城市。

他再次声明，即使香港回归祖国，它仍然享有特殊地位。中国尚未决定何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也许 1997 年前收回。但不管中国如何决定，香港都会保持现状，投资者的利益都将受到保护。

此时，麦理浩趁机提出英方关于土地租期问题的方案。他对邓小平说，1997 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提出英国解决这个似乎是纯商业性质问题的方案：消除土地契约中 1997 年届满日期，代之以“只要英国管治这个地区就有效”的内容。

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英方提出的这个老谋深算的问题。他机智他说，告诉投资者“放心好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 页。

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提出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 1997 这个截止期限。

面对港督的再次挑战，邓小平作了更加深思熟虑和字斟句酌的回答。他说：不管怎么去说土地租期，但必须避免提及“ 英国的管治 ”。说未来的香港“ 将保持不变 ”，并不是指其政治状况，而只是指未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不变，同时投资者不受损害。他再次明确地告诉麦理浩：请投资的人放心。不管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 1997 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港督与邓小平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英方没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经济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保证。

回到英国驻华使馆后，麦理浩看到来自伦敦的电报，它送来不好的消息：工党在英国下院选举中受挫，外交大臣欧文取消 4 月份访问北京的原定计划。

当天下午，麦理浩会见中国外交部长黄华。黄华说，向邓小平提出土地租期问题是“ 不合适的 ”。总督则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提出，中方应该给予明确回答。黄华外长说，邓小平的保证就足够了。晚上，麦理浩会见廖承志，没有获得新的信息。

3 月 30 日，麦理浩一行离京去西安、兰州参观游览 。4 月 4 日，港督乘坐第一班穗港直通客车从广州返回香港。

4 月 6 日，麦理浩在豪华的总督府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对记者们说，这是一次友好访问，并非为了谈判而去，而是为了通过接触获得一个概括的印象：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香港在中国现代化计划里将担任何种角色，以及这种计划又可能怎样影响本港。至于香港前途问题，邓小平副总理已郑重地让他转告：“ 请香港的投资人放心 ”。

港督访问北京带回来的讯息，在香港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各报迅速以头版头条报道麦理浩访华的结果。中外投资者的信心大增。结果， 1979 年香港民用楼字的平均价格上升幅度达到 67%。1980 年又上升 30%。恒生指数 1979—1980 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再讨“ 定心丸 ” 英外交大臣亲自出马

然而，由于香港前途仍然没有真正明朗起来，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搅扰，港人尤其投资者的信心又开始发生大的波动。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外交大臣亲自出马，准备向邓小平再讨个“ 定心丸 ”。

1981 年 3 月 10 日，港督麦理浩在伦敦会晤外交大臣卡林顿时说，英国新国籍法已使香港产生一连串恐慌浪潮。他促请英国政府从速处理香港“ 新界 ”租约问题，以挽回投资者的信心。卡林顿很重视麦理浩的建议，不久即飞赴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讨论香港问题。

4 月 3 日，邓小平会见卡林顿。这位外交大臣告诉邓：我来前在香港逗留了两三天，离开时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英国是依靠法律办事的，也许有点过份，所以尽管你作出保证， 1997 年这个日子仍使香港的人感到不

安。你和我都认为这种担心不必要，但事实是，由于 1997 年这个日子日益逼近，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须要考虑期限和合同的合法性问题，这将会碰到不少困难。我不想夸大这个问题，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我曾经向黄华副总理提议过，我们双方是否可以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将认真考虑中国在这方面的明显利益和重要立场。

邓小平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我们可以郑重他说，我在 1979 年同麦浩理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你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至于其他的话，现在不能说得更多。不能说别的，我们要考虑中国有 10 亿人民。

卡林顿表示：我可以澄清这一点，英国政府和我本人对你所作的权威性的保证毫不怀疑。我们希望中国政府仔细考虑香港难于捉摸的舆论。

邓小平不愿继续探讨此问题，就坚决地回答说，我们了解这一点。但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已经说得不少了。

外交大臣只得作罢，调转话题，同邓小平谈起中英双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特别是两国经贸关系问题。

事后，卡林顿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告诉盼望得到新精神的人们说，邓小平又一次讲：“ 投资人完全可以放心。 ”

记者们马上意识到，这位勋爵大人从邓小平那里得到的信息显然不比两年前的麦理浩更多。

可是，英国外交大臣谈到这件事时，却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邓小平所说的话虽然相同，但伴随的情况却不同了。第一，邓小平以非常强调的语气来说，而且极为明确地表示，他是得到中国政府全面授权而说这句话的。第二，邓小平认为这样的保证，已足够消除香港方面的任何疑虑。第三，邓小平对香港前途所作的保证，是一个全面的保证，或者说是“ 充分的保证 ”。因此，卡林顿对此感到满意，认为“ 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声明 ”。“ 我听了邓副主席所说的话，非常放心，我想投资人应当放心，香港人应当放心 ”。

英国和香港的舆论对邓小平的再次保证报以积极的反响。人们普遍认为，邓小平新的保证比以前更具权威性，性质、范围和分量都升级了。

第十四章　伟大的构想有力的举措

1979 年至 1980 年初，邓小平反复作出“请香港投资者放心”的保证，这个口头保证对建立信心确有好处，对港人无疑是巨大的安慰。人们非常相信邓小平保证的极大诚意和权威性。但港人尤其是香港的投资者还有更高的要求，期望有一些更具体的东西。他们想了解中国政府对香港前途问题的完整、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希望这些方针和政策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和利益。实际上，邓小平在这几年里，一直在考虑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确定思路——“一国两制”

在会见港督麦理浩前后，邓小平已经对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有了清晰的思路。更确切他说，思路是先从台湾问题上打开的。在中美谈判建交过程中，台湾问题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了新的构想。从 1978 年下半年至 1979 年初，他在会见日本、美国、缅甸等国外宾时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祖国要统一，但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动。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就是后来所说的“一国两制”的雏形。

邓小平没有孤立地构思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而是把台、港、澳回归祖国问题统筹考虑。　1979 年 1 月 18 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说，台湾回归后，首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就是说，邓小平认为，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也必须采取回归后保持现状的政策，或者叫“一国两制”政策。

果然，在同年 3 月会见港督麦理浩时，邓小平明确地告诉他：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　1997 年后，乃至到下个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正是根据邓小平有关讲话的精神，　1978 年底成立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随后开始酝酿把 1997 年后的香港作为特殊地区处理的具体方针和政策。

同“一国两制”构想源于台湾问题一样，对港特殊方针政策的具体化也与对台特殊政策的具体化联系在一起。

1981 年 9 月底，叶剑英委员长宣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其中提出，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等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等等。对港政策虽然与对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许多基本政策上是相通的。所以，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决定依照对台政策的路子，加快制定具体的对港政策。

1982 年 1 月 4 日至 8 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兼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中国，中国总理会见了他。艾金斯发现，中国开始把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提出了处理香港问题的进一步政策。

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保持香港的繁荣。香港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商业、金融中心的地位。对此，中国将广泛征求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在吸收港人意见的基础上来修改自己的方案。

希思来华听风声

英国获得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新态度后，立即决定当年秋天派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与中国领导人正式展开关于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

然而，中国领导人提供的信息仍然不能令英国政府满足。他们还想了解中方在香港问题上更权威、更系统的方针政策。

1982 年 4 月上旬，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作为民间使者，为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专程访问中国。

4 月 6 日，邓小平会见了老朋友。希思回顾了 1974 年 5 月毛泽东同他会见谈到香港问题时的情景，对邓小平说：“ 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 1997 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 1997 年只有 15 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期间处理这个问题？ ”①

邓小平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包括“ 新界 ”，即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他十分诚恳地告诉希思：“ 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中国到时不收回香港，我们这些领导人谁也交不了账。 ”②

邓小平还向老朋友透露：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 九条 ”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他问希思，英国是否同意按中国的这种思路来协商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还请希恩把中国的这种考虑转告撒切尔夫人。

希思提到如何维持香港投资者信心的问题。邓小平对他说，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自己管理香港。

希思回国后，向英国首相转达了邓小平的话。

邓小平调查研究　　耐心做各方工作

中英两国确定于 1982 年 9 月开始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后,为作好充分的准备，邓小平采取了有力措施，一是亲自与许多香港人士进行交谈；二是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对香港问题作详细的调查研究，以制订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具体方案。

邓小平亲自做调查研究，与香港人士交谈，一方面向他们阐述中国政府的对港政策，另一方面，虚心倾听港人的心声，以补充和完善这些方针政策。1982 年春夏，他会见了大量香港访京的各方·面人士，对香港民意有了全面真切的了解，对采取“ 一国两制 ”构想来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可行性已具备充分的信心。

1982 年 6 月初，邓小平会见了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黄向邓谈了自己的想法。邓小平也向黄重申了中国政府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说香港问题将在明年或稍后的时候解决。

同年 6 月 15 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大公报》负责人费彝民、工商界知名人士王宽诚等 12 人。邓小平在会见时提出，　1997 年前后中国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同时还要找出一个妥善的办法，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让这个

---

①

② 刘金田：《邓小平与希思》，载《世纪风采》，1996 年第 3 期。

自由港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他非常诚恳地对客人说：你们在外面的见闻比内地同胞广泛，看问题会包括各个方面，对香港将来的问题，希望多听听你们的意见。

这一天谈话的气氛非常和谐。 12 位香港人士都发了言，谈了自己对香港前途问题的认识和建议。邓小平听得很认真。他的右耳有点重听，在别人讲话时，只要没有听清楚的地方，他都及时询问，有时还建议发言者对准扩音器，有时也插上几句，尽量使大家的情绪轻松一些。有的发言者对政府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意见，邓小平也欣然听之。

在做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邓小平了解到一些香港投资者怕“ 如来神掌 ”的忧虑。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纵然神通广大，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但最终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香港有些投资者担心，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就会“ 事事出主意，分分钟发指示 ”，因而香港一样是在中南海的如来掌心之中。

英国人管治香港这个自由港时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不会因为英国想多出口一些英国货，就通令香港限制其他国家的商品输入，也不会因为工党下台，保守党上台，就要香港总督推行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倡导的货币主义经济政策。香港投资者担心的是，中国自 1949 年以来，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中央对地方也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所以怀疑北京做不到英国人已经做到的事。

有关部门把香港投资者怕“ 如来神掌 ”的情况向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听后立即说，我们也不来如来神掌，让香港的中国同胞继续自己管理香港。

可见，邓小平比英国做得更加彻底：英国虽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但还是派总督直接统治香港。中国则放手得很，让未来的港人自己管理香港。1997 年以后，北京不会像当年解决上海、广 州等城市那样，对它进行改造；中央将不派大员到香港，也不事事向香港发指示，对它进行“ 遥控 ”，而是给回归后的香港以高度的自治权。

为了制定“ 不来如来神掌 ”的具体方案，同时也为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提供咨询服务，邓小平和当时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决定成立一个香港问题研究小组。

香港前途问题专门小组成立后，由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负责。小组成员多数比较年轻，包括港澳问题、金融、贸易、税务、国际法等方面的专家，也有在香港工作几十年以上、了解香港情况的人士。小组的工作方式是，进行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如实地反映香港繁荣兴旺的过程，广泛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从而制定出一个全面系统的解决香港前途问题、能使香港在回归后继续繁荣稳定的政策方案。

出台切实可行的“ 十二条 ”

现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就是当时那个专门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回忆说，邓小平曾多次派人到香港进行实地考察。那个专门小组按照邓小平的要求，首先分析了香港经济获得成功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形成的条件，然后又认真研究了这些因素能否在“ 九七 ”后存在下去。结果，答案是肯定的。于是，中国政府对香港的“ 十二条 ”基本政策制定出来了。鲁平还特意说明，这些基本政策并不是中英会谈的结果，而是早在中英谈判开始前就确定了的。“ 事实是，中英谈判一开始，我们就把‘ 十二条 ’基本政策摆到谈判桌

上了。”[①]

与对台九条方针政策相比，对港“十二条”方针政策更加周洋、更加具体。它的基本内容如下：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2.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负责；

3.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

4.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由行政长官提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外籍公务人员可以留用，可聘请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

5.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依法保障居民的权利和私有财产；

6.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

7.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市自由兑换，继续流通；

8.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财政收入不上缴中央，中央政府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

9.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英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

10.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

11.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负责维持社会治安；

12.中国将以“基本法”来规定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及对这些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而且这些政策 50 年不变。

这“十二条”特殊政策应该让香港投资人和其他各方面人士真正放心了。投资人和其他各界人士最担心的是，一旦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就会“一切都变”，而“十二条”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恰恰是讲“不变”、“保持”。香港工商巨子王宽诚曾经用下面几句生动的话来概括这些特殊政策：“到了 1997 年，总督没有了，英国旗没有了，‘御用’没有了，其他不变：社会制度不变，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下变，等等。交易所照样开，跑马照样跑，要跳舞照样跳。港人治港，怕什么？”[①]是啊，有了这么多的特殊政策，港人确实什么也不用怕了！

当然，英国和其他外国人也不用担心自己在香港的利益受到损害。上述特殊政策的宗旨之一，就是照顾到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利益。1997 年以后，英资以及其他外国财团在香港还可以大赚其钱，英国等外籍人士还可以在特区担任公职或顾问。

总之，这些政策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既坚持了主权原则，又照顾到香港人民的愿望，同时适当照顾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利益，是可以为各方面所接受的。切实可行的正确政策。

[①] 鲁平在“香港迈向金融新纪元”研讨会上的讲话：《“一国两制”是中国的长期国策》，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 年 6 月 3 日。

[①] 查良镛：《香港的前途》第 111 页，明报有限公司，1984 年 6 月版。

陆续了解到在邓小平指导下制定的上述特殊政策后，曾经担心中南海的“如来神掌”的香港投资者异常高兴。他们没有想到条件是这么好，不由得大加称赞。

一些报刊发表文章说，香港同胞对于邓小平“不来如来神掌”的治港方案，理应感到满意。有位作者在一篇文章中感叹地发间：“难道有其他更佳的又维护民族尊严，又维护香港人现实利益的方案吗？没有了。香港同胞应当体会到邓小平的苦心。”①

第十五章　唐宁街主人的如意算盘

1979 年至 1982 年，正是雄心勃勃的撒切尔夫人登上英国首相宝座后，推行强硬的内外政策，以使英国重新振兴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之下，撒切尔夫人也酝酿了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方案。

“铁女人”撒切尔夫人

“铁女人”的称号是由苏联人赠予撒切尔夫人的。

1976 年 1 月，担任英国保守党领袖不久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肯辛顿市政厅发表了一个演说，触痛了苏联人，她说：“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保护人民不受外来侵略，并保证我们的生活方式能保持下去，现政府却在不断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俄国是独裁国家，他们正迅速地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重要的海军和军事大国，他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防御。……我们如果不从他们在葡萄牙，以及当前在安哥拉的阴谋中吸取教训，我们必将——用他们的话来说——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苏联人对此反应迅速，苏联官方喉舌塔斯社称她为“铁女人”、“冷战专家”，并在国内发动了一场攻击她的运动。有幅漫画，画着玛格丽特骑着扫帚飞越在英国议会大厦上，漫画上写着“西方的邪恶巫婆”。

撒切尔夫人对这个外号并不恼火。相反，她还非常高兴他说：“这是他们对我的最好赞扬。”3 年后，她在一次竞选演说里讲：“他们说对了，英国需要一个铁女人。”

这位“铁女人”有一股大丈夫式的豪气。但在她身上，女人的气质也极浓。她总选择穿着舒适的款式与质料，尤为喜欢黑色、宝石蓝色的纯羊毛英国套装。当她出国时，特别注意她所携带的衣服，不只是高雅，简直无可挑剔。她拥有春天般的容貌——金黄色的头发与玫瑰色的脸庞，这些是英国女性非常羡慕的。在家中，她是一位贤妻良母。

玛格丽特·撒切尔是英国北部安普敦郡格兰森小镇一个杂货商的女儿。青年时，她就读于牛津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但是，她发现政治才是她醉心的事业，于是改学法律。毕业后，她曾短暂服务于律师事务所，以后帮助保守党人竞选，随后自己参选，于 1959 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从此开始走上从政之途，并逐级而上。1975 年取代希思成为保守党领袖，1979 年挫败执政的工党，正式进入唐宁街 10 号，成为英国首相。

撒切尔夫人的民族意识十分强烈。她在开始从政时，没有想到会当首相，她只希望找到一个能承担拯救英国重任的人。她很爱英国，不愿看到英国的衰落，但是，保守党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力挽狂澜。在这种情况下，她毛遂自荐、挺身而出，亲自来完成这个使命。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保守党领袖不久就说：“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有两个使命：克服我国的经济和财政困难；重新建立我们对英国和对自己的信心。”[①]她深信，把英国从日渐沉沦的颓势之中引向自由和基督教的光明是她的使命，她的目标是使英国变得富强。

撒切尔夫人常说：“上帝赋予我某些才能，由我来利用，我很幸运，能

[①] 《征服：铁女人撒切尔夫人首相生涯》第 187 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 年版。

够将这些用在工作上，而这正是我要全力发挥的。”她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适宜当首相！”“做任何事情，女性和男性一样，都会全力以赴。”[①]这是她以女性身份从政的哲学。

撒切尔夫人敢于独树一帜，不怕别人的批评和攻击。她曾说：“如果我不能引起人们的争论和批评，那就说明我不称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总会引起批评。一个人如果总是一味迎合别人，不要别人的批评，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必将一事无成。”

玛格丽特·撒切尔还有一种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不论她重振英国的主张是否正确，她对自己的主张始终坚信不移。她的坚定不移，使她根本不把路上的任何障碍看在眼里，使她从不会轻易地作出妥协和让步。由于她的决心、执著以及对妥协的鄙视，使她在处理香港问题时必然与坚忍不拔的邓小平发生激烈的冲突。

马岛之战胜利的鼓舞

关于香港前途问题，中国的最高决策人是邓小平，而英国的最后拍板者则是首相撒切尔夫人。她以态度强硬、决策果断甚而颇带个人专断作风而著称于世。在香港问题上，她虽然征询下属的意见，也了解各方面包括港人的看法，但她有自己的立场。她像历任保守党领导人尤其是丘吉尔一样，坚持强硬立场，竭尽全力维护英国的海外殖民利益，而且企图重振大英帝国的威风。爆发于 1982 年春的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岛之战，典型地反映了撒切尔夫人的这一特点。

马尔维纳斯（英国称之为福克兰）群岛是英国在南大西洋的一块殖民地，由两个大岛和 200 个荒无人烟的小岛组成。大岛上人烟稀少，居民约 1800 人，但羊群遍地，它距英国有 8000 英里之遥。距该岛仅有 300 英里的阿根廷，一直反对英国占领该岛。

英国历届政府都对该岛的管治感到头疼，因为此岛距离英国太远，不但运输补给十分不便，同时该岛的安全防卫得不到有力的保护。而且岛上又没有什么资源，尽管人们认为该岛的周围有丰富的石油和矿藏，但是开掘这些资源并不经济。尽管如此，出于殖民主义者的心理，英国政府并不愿意把这些岛屿交还阿根廷，还说这是岛上人民的意愿。

在“非殖民化”的高潮中，联合国于 1965 年 12 月通过决议，要求英阿两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可是经过 17 年时断时续的谈判，双方仍未达成协议。

1982 年 2 月谈判再次破裂后，阿根廷当局根据人民要求收回马岛主权的强烈愿望和有利的国际形势，出兵马岛。

这一突然事变把撒切尔首相置于一种两难境地：要么作出让步，要么就冒险派兵到 8000 英里之外去打一场没有胜利把握的战争。

实际上，这一事件为撒切尔夫人提供了振奋英国民族精神的良机。战后，英国的经济急剧衰落，致使其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但英国人对此表现麻木不仁，自鸣得意、不求进取的心理和习性仍然盛行。撒切尔夫人从 1979 年至 1982 年在国内经济方面推行的“振兴”政策虽然初见成效，但并没有改变英

[①] 《征服：铁女人撒切尔夫人首相生涯》第 1 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 年版。

国萎糜不振的国民精神。

一些英国外交家认为，仅仅有新的经济政策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使英国公众感到受屈辱，那时他们才会惊醒，如同 1945 年以来的德国人那样，急切地要从灰土中站立起来。阿根廷出兵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事件使英国人感到莫大的耻辱，撒切尔夫人可以使他们从灰土中站立起来。

这一事件对撒切尔夫人的个人声望和政治前途也至关重要。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让阿根廷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她本人就会很快失去首相的职位，而要想保住首相的地位，别无选择，只有宣战。她决心宣战还有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重振旧日英国的雄风。

撒切尔夫人清楚地记得，她在童年时期所看到的世界地图，那时的大英帝国幅员辽阔，有“ 日不落国 ”之称。但是，后来英国的国土日益缩小，如今，连英格兰本身的一些地方也出了问题。

出于以上各种考虑，撒切尔夫人立即作出强烈反应，决定进行一场战争赌博。英国出动舰船上百艘，参战兵力达 3.5 万人，耗资 7 亿英镑，终于在 6 月 14 日迫使阿军撤出该岛。

马岛之战的胜利提高了英国政府在英国民众中的声望，大大巩固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地位，也使她进一步增强了维护英国海外殖民利益的决心。

撒切尔夫人 7 月 3 日发表演说论述什么是“ 福克兰精神 ”，她说：“ 我们这个民族停止了退却。相反，我们有了新发现的信心……我们为重新唤起过去曾激励许多代英国人的精神而兴奋，今天这一精神如同以往一样朝气蓬勃。英国在南大西洋里重新找到了自我。 ”“ 福克兰精神 ”在一段时间对英国内外政策都产生了影响，也同样影响了撒切尔夫人在香港前途决策和后来谈判时的立场。

访华前的决策

1982 年 7 月 28 日，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召开会议，以决定 8 周后她访华时将持的英方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与会者有柯利达、尤德和外交部主管亚大事务的助理次官阿兰·唐纳德。

会议先研究了年初艾金斯访华情况报告，并着重研究了 4 月邓小平会见希思时表明的中方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撒切尔夫人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想让英国接受中方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以下方针政策，即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港人治港，社会经济制度不变，保持自由港和金融中心地位等。弄清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后，与会者就开始讨论并确定对策。

撒切尔夫人在会上首先强调，关于香港的三个历史条约按照国际法都是有效的，其中只有关于“ 新界 ”的条约是租借性的，另两个条约把香港岛和九龙永远割让给英国。如不续约，则 1997 年“ 新界 ”应还给中国。但是，中国要想收回港岛和九龙，就必须与英国磋商、修改条约。

这时，撒切尔夫人问道：是否港岛和九龙离开“ 新界 ”就无法独立生存？港督尤德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预料到首相会提出这一疑问，故准备好详细材料。他拿出一些照片，上面标着“ 新界 ”与九龙之间的界限街。港督还把“ 新界 ”地图上所标的城市、村庄、工厂、道路、水库、铁路指给首相等人看，说这些都是整个香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的结论是，“ 新界 ”与九龙和港岛不可能分离，只能结成一个整体考虑。

撒切尔夫人被尤德说服了，不再设想把“新界”与香港其余部分分开考虑。

既然香港三个部分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英国是否可以抗拒中国关于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要求呢？柯利达认为不可以在主权问题上同中国对抗，因为中国政府会强行收回香港，这样一来，英国从中国那里得到的让步就会更少。柯利达和唐纳德建议撒切尔夫人访华时对中国作出某种妥协，当然不是按邓小平会见希思时设想的那样，而是承诺英国正式放弃对香港的主权，但要求修改条约，换取英国继续管理香港的权利。这是外交部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

但是，撒切尔夫人反对承诺让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可她又提不出自己的可行战略。

这时，柯利达提出了一个纯粹策略性的谈判目标。鉴于中英两国早已声明共同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也许这是两国唯一的主要共同立场，其他方面均属未知数。因此，首相访问北京时可以首先同中国领导人发表一个声明，说两国政府将在维护香港“稳定和繁荣”的目的基础上，开始正式谈判。这样一来，首相访问北京时就不必作出其他如主权等方面的承诺了。等正式谈判开始后，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就会更清楚一些了。

首相采纳了柯利达的这一建议，会议就此结束。

撒切尔夫人访华前决策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方案时，没有采纳当时英国、香港已有的方案，包括英国外交部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当然更不会接受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构想。她根本不准备向中国领导人表示要承诺让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又找不出一个可行办法，于是听从了柯利达的建议，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谈判策略。

为了表示尊重香港人的意愿， 1982 年 9 月 5 日港督尤德带了行政局、立法局非官守议员返回伦敦。

撒切尔夫人 9 月 6 日在唐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接见了他们,听取他们对即将开始的中英谈判的建议。这几位非官守议员提出，在访华谈判时，主要应注意倾听中国人说什么。撒切尔夫人会见他们之后表示，当她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会充分反映并代表 500 万香港居民的意愿及利益。英国和香港报刊都渲染首相对香港两局非官守议员的这次邀请和会见。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英国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个行动，来表明自己在作出香港前途问题的决策时，很注意听取港人的意见，维护港人的利益，并在今后的谈判中也代表香港的“民意”。第十六章 “决不做李鸿章第二！”

两年谈判开始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1982 年 9 月访华。她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拉开了双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激烈交锋的序幕。

了解英国首相和邓小平的人们，对中英首脑在香港问题上即将举行的会谈并不抱多大希望。香港报界认为，撒切尔夫人在“福克兰事件”结束不久就到北京，是不合时宜的，会扮演不当的角色。马岛的阴影，无疑将影响这两位个性刚烈的人的谈话气氛。人们还意识到，“铁娘子”不善于温和的、暗示式的外交辞令，她在外交经验上也远非邓小平的对手。这些预测是很有些见地的，在后来的会谈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984 年 10 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一次全会上回顾了当时的情景。他说：“两年前撒切尔夫人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

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个香港。”[①]

从邓小平这段回忆中，我们既看到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香港主权归属问题上不肯轻易退让的“战斗”精神，也看到了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坚定的立场。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决心通过谈判来彻底洗雪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奇耻大辱。

“提着篮子”而来的撒切尔夫人

英国首相访华前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在唐宁街 10 号对她做了专访。撒切尔夫人很自豪他说，作为第一个英国在职首相访华，她这次访问“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

撒切尔夫人不是第一次访华。1977 年 4 月，她曾以保守党领袖的身份应邀访问中国。中国政府给予撒切尔夫人极高的礼遇。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出来工作，因此无缘与这位“铁女人”相见。撒切尔夫人游览了北京、苏州、杭州、上海等地的名胜古迹，参观了工厂、农村和学校。

首次访问中国，给撒切尔夫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在苏州时十分感慨，赞赏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引人入胜的地方。她还相信，未来的半个世纪将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和最有吸引力的时期。[①]访问中，她看到中国正在兴起一场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并从中看到了中英之间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关系的良好前景，因此她在访华期间表示希望英国能在中国四化建设中起更大的作用。她的话虽带溢美之味，却不乏大政治家特有的那种战略眼光和预见。

谈到眼下的访问，撒切尔夫人说，她这次访问中国最重要的是将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等举行会谈。谈什么呢？她提到要与中国领导人交换对一些国际问题尤其是安全问题的看法，还要讨论双边问题。实际上，她到北京主要是为了磋商香港问题。但她却没有强调这一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她“将有机会谈谈香港问题”。

英国首相这次远东之行，除了访问中国外，还要访问日本。9 月 14 日，她在接见日本记者时表示，她将在东京准备把话直截了当他说明白：“事情应当是互惠的，生活中应该有来有往。我们开放市场，同时也希望别人向我们开放市场。”首相这番话表明，她出访日本的主要目的是为解决英日贸易由于日方的巨大顺差而引起的磨擦。她要努力争取日本同意英国向日本出口更多的产品，并增加日本向英国的投资。其实，任何一位英国首相出国访问的首要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与被访国的双边贸易。促进本国的对外贸易，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显然，撒切尔夫人在东京将扮演一个“推销员”的角色。

9 月 16 日，撒切尔夫人离开伦敦。从 17 日至 22 日，她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

在日本，撒切尔夫人同日本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进行了一系列的讨价还价。尽管她对于商业谈判是个外行，但仍然不愿意让随行的贸易部官员代

[①] 《邓小平论祖国统一》第 38 页，团结出版社 1995 年 2 月出版。

[①] 《人民日报》1977 年 4 月 11 日。

她出面，而她要亲自出马。

然而，铁娘子对日本的访问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日本领导人虽然彬彬有礼但在原则问题上才步不让。撒切尔夫人希望尼桑公司在英国建立一个欧洲汽车制造厂，尼桑公司董事会却不同意。为了完成访日使命，这位英国首相甚至不惜掩盖若干事实。比如，她为了说服日本人到英国投资，竟然说英国现在没有罢工，工人的劳动热情极高。她还向日本商人打保票说，他们在英国的投资将获得巨额利润。

访日快结束时，由于对即将开始的北京会谈心里还不大踏实，撒切尔夫人把驻华大使柯利达召到东京。在英国驻日大使官邸，首相和她的智囊们对北京会谈的行动计划又仔细地研究了一番，特别是对撒切尔夫人将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措词，作了认真的推敲。柯利达向首相介绍了她将与之会谈的中国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

驻华大使柯利达是个地道的“ 中国通 ”。他的中文水平很高，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颇深。 1962 年，柯利达第一次来到中国，在英国驻华代办处担任中文秘书，但不久调离。从 1966 年至 1969 年，他又回到英国驻华代办处，起初担任政治参赞，接着升为代办。那几年正值“ 文化大革命 ”狂潮初兴，天下大乱。柯利达目睹这场运动发展为打倒一切的大动乱。眼见一大批中国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等被打倒，并被画进大幅漫画，贴在北京街头。他还亲身经历了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全过程。

1978 年，柯利达又回到北京，担任驻华大使。从这一年至 1982 年 9 月英国首相访华，正是中国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最初几年。勃勃的生机，无限的希望，给柯利达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柯利达把对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认识，向撒切尔夫人一一作了汇报。这位首相最感兴趣的，是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精神。柯利达说，邓小平有句名言，意思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段话曾使邓小平在“ 文化大革命 ”中受到严厉的批判。撒切尔夫人很欣赏这种“ 白猫黑猫 ”论。

按照外交礼节，国家领导人出访，总是要携夫人同往。此时，英国首相却为女性，相伴的只能是她的丈夫丹尼斯·撒切尔先生。据有人估计，丹尼斯陪同妻子的次数大体上要比历任的首相夫人还频繁得多。他对上层圈子并不感兴趣，只是一心想着保护她，给“ 头儿 ”（他往往这样称呼她）一些心理上的支持。丹尼斯是她的最狂热的崇拜者，玛格丽特也非常倚重他。在内阁会议上，她经常宣称，她就这事或那事征求丹尼斯的意见。

这次远东之行是撒切尔夫人几年执政以来唯一感到精疲力竭的一次。在这种关头，丹尼斯对她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后盾。作为丈夫，他要给担任英国政府首脑的妻子以更多一些心理上的安慰。

还有一个背景值得重视。这就是，在撒切尔夫人的访华使团中，没有英国外交大臣。香港前途问题谈判，是中英关系中的头等大事，作为英国外交大臣，理应随首相一同前往北京。 1984 年 12 月，撒切尔夫人是与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一道赴北京举行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的。实际上，问题恰恰在于： 1982 年时的英国外交大臣不是杰弗里·豪，而是皮姆。

可以说，撒切尔夫人要撇开外交部，独自与中国领导人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为什么她撇开外交部？这是因为首相觉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外交部总是帮倒忙。比如，在关于削减英国为欧共体承担的费用谈判中，外交部错

了；在英阿马岛危机（这是一场几乎断送了她的政治前途的危机）中，外交部又错了。撒切尔夫人认为，外交部的这些措误是不可饶恕的。至于她为何不与外交大臣皮姆一道访问北京，首相的助手一语道破了天机。这位助手说，撒切尔夫人觉得与外交大臣呆在一个房间里都非常难受，更不用说要与他挤在一架飞机里了。[①]

皮姆与首相非常不合。在香港问题上，这位外交大臣也持与撒切尔夫人不同的主张。据柯利达回忆，在有关香港问题的会议上，皮姆往往一言不发。所以，铁娘子是不愿意让皮姆一起到北京来的，这件事也意味着她要像在英阿战争中那样，撇开外交大臣乃至外交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以马岛之战的姿态远征北京的铁女人，希望获得一些战利品。她带了一只篮子，准备去装邓小平的礼物。结果会如何呢？明眼人预言说，邓小平给的只能是“水”，所以，撒切尔夫人带回的也不过是空篮子而已。

与中国总理交锋

1982 年 9 月 22 日下午 1 时 20 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丈夫丹尼斯·撒切尔、港督尤德、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贸易部副次官格雷等陪同下，从日本抵达北京。

撒切尔夫人一行乘坐中方安排的车队，飞快地驶过飘舞着中英两国国旗的长安街，进入了钓鱼台国宾馆。她下榻国宾馆里的 12 号楼的总统套房。这是一幢样式很普通的二层小楼。总统套房分总统和夫人卧室，都在二层，各有 50 多平方米。总统套房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重达 1.2 吨的龙床，上边雕刻着 116 条千姿百态的龙。楼房窗外有成片的欧洲甜樱桃树，以及无数各种名贵花卉。9 月下旬的北京，秋高气爽，景色十分迷人。

当天的《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并在第一版的《新闻人物》栏中对撒切尔夫人作了介绍。

9 月 22 日下午 4 时，中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天安门广场上空飘扬着中英两国国旗。军乐队奏两国国歌。中国总理陪同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政府首脑开始了首次会谈。撒切尔夫人首先介绍了英国对欧洲形势、裁军问题、欧美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中方则介绍了中国对外政策以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日关系等。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两位领导人达成了许多共识。

晚上，中国总理在为撒切尔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撒切尔夫人这次访问将会是有成果的，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将进一步得到加强。他接着指出：“当然在我们双边关系中也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有待解决。但是，只要我们双方都能用长远的战略观点看待并发展中英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这类问题是不难解决的。”[①]

撒切尔夫人说：从我 1977 年第一次访华以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变化。中英关系发展的变化，使我特别感到鼓舞……今天我们已

[①] 雨果·杨格：《铁女人撒切尔夫人传》第 280 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7 月中文版。

[①]

经进行了第一轮有益的会谈。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香港问题。我期待着明天同您研究这个重要问题”。[②] 第一天的会谈气氛很融洽，因为话题围绕国际问题，双方谈得颇为投机。但接下来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却是非常棘手的。

第二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中国总理主要围绕香港问题展开了会谈。

会谈开始前，各国记者向提前来到会场的中国总理进行了采访。一位香港女记者问：“请问总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未来有何打算？”

中国总理回答说：“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国当然是要收回香港的。我这里所说的香港，不仅指的是‘新界’，而是包括整个香港地区。关于香港的主权，我不打算与撒切尔夫人商谈。”

香港女记者紧接着发问道：“那么你打算与英国首相谈些什么？”

中国总理告诉她：“我们要谈的事情很多。在香港问题上，我们希望得到英国方面的合作。只有双方真诚合作，香港地区从现在到 1997 年才能实现平稳过渡。”

接着，中国总理又针对记者围绕香港问题提出的其他问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的未来对港政策，诸如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和措施，以保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他强调，香港伺胞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因为中国收回香港并不会影响香港的繁荣。

看来，中国总理提前来到会场，也许是为了向记者吹点风，让他们知道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会谈开始后，中国总理向撒切尔夫人说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特别是将在 1997 年全面收回香港的决心。

英国女首相对中国领导人以毫无回旋余地的口气声明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很有些气恼。她想，这简直不是在谈判，而是在接受指示。在她看来，谈判就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双方先摆出各自的最高价码，然后一点一点地互相让步，最后达成一个妥协性的价格。不过，撒切尔夫人忘了，上个世纪英国在逼迫清政府签订三个不平等条约时，中国无法同英国进行讨价还价。那完全是城下之盟！如今，中国对英国已经是够宽容大度的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从整个国际战略的大局出发，十分理智地处理香港问题，耐心地等待了几十年，如今仍然以友好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两国的历史遭遇完全相反。一个曾经通过征服世界众多弱小国家建立了大英帝国的民族，是很难理解另一个曾经饱受列强欺侮的民族的心理和感情的。

撒切尔夫人用一份事先拟好的声明首先阐述英国的立场。她说：“香港是中英良好合作的无与伦比的典范。我注意到，中国观点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关于主权和香港继续繁荣。繁荣依赖信心。如果香港的行政控制发生剧烈变化或者甚至现在宣布这一点，将必然导致资金整个外流。英国决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无法防止它。香港的崩溃对我们两国都是不光彩的。信心和繁荣依赖于英国的管理。”

撒切尔夫人自认为她这番话可行又现实，因而具有说服力。资本主义的香港毕竟给中国带来了大量外汇和投资。她对中国总理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在相当程度上不具备约束力的官方联合声明，表示我们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并且规定双方最初的官方谈判将围绕这个问题进行。

[②] 《人民日报》1982 年 9 月 23 日。

英国首相软硬兼施，既赞扬中英在香港的合作，表示“关注”中国的立场，同时又强调港人的信心和香港的繁荣全仗着英国的管治；并威胁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则香港必然崩溃。她抓住中国诚心维护香港繁荣稳定这一点大力利用，企图说服中国领导人，要做到这一条，最终得放弃主权原则。她还始终坚持：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上仍然有效，任何修订必须以三个条约为根据。

中国总理坚决驳斥英国的错误立场，在主权问题上毫不妥协。他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 1997 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香港将变成一个特别行政区，由当地人自己治理，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自由港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港市的作用和性质也不变。针对英国首相关于港人信心有赖于英国管治、如果宣布中国收回 香港信心将丧失的论点，中国总理指出：如果非要在主权和繁荣稳定二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不客气，中国宁愿首先选择主权。总之，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前提，决不能为了保持繁荣而不收回香港或推迟收回香港。中国总理还重申，中国政府不承认有关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不受它的约束。

两国政府首脑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一次会谈由于双方基本立场对立，而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是，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高层谈判毕竟已经拉开了序幕，观点已经摆在桌面上。新华社随后报道说，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开始讨论了香港问题。会谈是有益的。两位领导人还就中英经济技术和贸易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天下午，撒切尔夫人参观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还参观了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北京举办的图书展览。一群正在参观英国书展的中国儿童引起了首相的兴趣。她高兴地与这些天真烂漫的小朋友交谈。

她还来到了海淀区的农贸市场，在那里购买了一大袋葡萄。

在北京的参观游览，使撒切尔夫人几天来高度紧张的神经稍微得到了一点松弛。次日，她将与邓小平进行最关键的一场会谈。

“绵里藏针”：邓小平的一贯风格

在与邓小平会谈之前，撒切尔夫人尚存一丝幻想。她认为邓小平是现实主义者，正是他有效地打开了解决香港问题的门，而且主张一国之中可以允许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存在。他似乎可以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而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某种让步。

撒切尔夫人完全想错了，这是她一厢情愿的幻想。这表明她对邓小平很不了解。她看到了邓小平灵活性的一面，但对他的原则性的一面没有真正认识。她知道邓小平曾经提出过世人皆晓的“白猫黑猫论”，但对此论的真正含义却没弄清。

作为伟大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主义者，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坚决维护，谁也别想丝毫动摇他在这方面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他作为精通唯物辩证法的大师，是彻底的“实事求是派”，懂得相反相成的古老哲理，善于把坚定的原则性和恰到好处的灵活性做最好的统一。美国前总统布什对邓小平的这一杰出特点评价甚高。他说，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问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毛泽东当年非常欣赏邓小平的才干，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正是看到他

能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1973 年 12 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们的面，说了自己对邓小平的评价：“柔中寓刚，绵里藏针。”这个评价，表明了一位伟人对与自己一道工作了几十年的同事的深刻了解。

“大跃进”失败后，邓小平意识到当时的一些“左”的错误，因而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做法进行了探索，在 60 年代初提出了“猫论”。他对当时农村开始出现的包产到户、责任田等经营形式非常支持。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接着引用刘伯承经常讲的一句四川俗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①] 可见，邓小平提出的“猫论”，的确显示了很大的灵活性。但同时，这种灵活性又是建立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的前提之上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全面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是如此，一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同时又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

邓小平在 1977 年复出之后，进行了拨乱反正，批判了“两个凡是”，纠正了过去一些“左”的错误，使全党终于走上了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以全面的改革开放为主要途径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一些人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号，试图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等。邓小平立即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①]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思想政治保证，是因为这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共产党员具有坚定不移的远大理想和信念。

由于邓小平既倡导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国外许多人很迷惑，不知该把他划人“改革派”呢，还是划入“保守派”。邓小平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1987 年 3 月 3 日，他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我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他说，我是实事求是派。”[②]邓小平是最大的改革派，但不是保守派。彻底的实事求是派是与保守派无缘的！实事求是派的基本风格之一，就是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也就是毛泽东送给邓小平的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在香港问题上，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同样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他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照顾香港、英国和内地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用保持香港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办法，来保证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可见，邓小平表现了多么大的灵活性！然而，在 1997 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个原则问题上，他却绝不会做半点妥协让步。只有坚决地收回香港，才能洗雪一百多年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323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7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09 页。

中国蒙受的屈辱。历史不容再加等待，中国领导人绝不会做晚清政府做过的有损民族主权的事。同时，形势变化，峰回路转。现在的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不是晚清时代的中国了。而英国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气势汹汹的大英帝国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连超级大国也不敢小视中国，而英国则早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流强国沦为现在的二流国家。因此，中国绝对有能力、有办法来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前面说过，邓小平曾专门组织班子，到香港进行实地考察，并亲自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已经找到了使香港继续繁荣稳定的妙方，即对港“十二条”方针政策。在这种胸有成竹的情况下，他更要打掉英国在主权问题上的一切幻想。

撒切尔夫人只知道邓小平提出一个“猫论”，但不懂得此论的要旨。她更不可能懂得邓小平具有“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风格。不过，铁娘子很快就会领教中国邓大人的厉害了。

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主权不容讨论！

9月24日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中方陪同会见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驻英大使柯华。英方陪同会见的有香港总督尤德、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驻华大使柯利达。会谈原定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50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撒切尔夫人知道这次会谈最为关键，早早就做好了准备，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

她穿的是一身蓝底红点的丝质西装套裙，脚蹬一双黑色高跟鞋，手提一只黑色手袋，脖子上挂着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高贵动人。

撒切尔夫人首先来到大会堂的新疆厅。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已经在门口仁立恭迎。首相与邓颖超亲切握手，同时又献上了一束美丽的鲜花，5年前作为保守党领袖访华时，撒切尔夫人曾经与邓颖超相见。此次重逢，两人谈得十分高兴。

从新疆厅告别邓颖超后，撒切尔夫人就向福建厅走来。那将是与邓小平会谈的地方。但是，与邓颖超早早在门口迎候的情形不同的是，在福建厅的门前迟迟看不到邓小平的身影。直到首相快走到门口时，大门才缓缓打开。中国这位智勇双全的人物邓小平笑容可掬地走过来，与撒切尔夫人握手。

在会谈大厅落座后，撒切尔夫人向主人寒暄道，“我听说你刚从外地回来，一路辛苦了。”

邓小平回答说：“我陪同朝鲜的金日成主席去了一趟四川。”

会谈开始时，两位领导人先聊了一下轻松的话题。他们说起了在伦敦住了几十年的马克思。撒切尔夫人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可他恰恰最缺资本！

会谈进入正题后，英国首相如同前一天与中国总理会谈那样，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摆出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张牌，坚持三个条约必须遵守。她恐吓邓小平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治它。所以，任何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以继续维持英国对它的管治为前提。

面对英国首相的挑战，邓小平寸步不让，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且讲话更加有理有据。他首先指出，这次谈判，除了要解决香港回归中国问题之外，还要磋商解决另外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 1997 年后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它的繁荣；另一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 1997 年的 15 年中不出大的波动。简单地讲，实际上这三大问题就是 1997 问题、1997 后问题和 1997 前问题。这些才是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完整议题。

说到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时，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他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①] 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在此，邓小平重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承认 19 世纪三个不平等条约的一贯立场。因此，虽然他把主权问题作为谈判的三大问题之一，实际上英方只能在这个问题上认同中国政府的立场，无需进行什么讨论。

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他强调，如果 1997 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②]这样的政府和领导人就应该自动退出政治舞台。然而，邓小平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决不做李鸿章。相反，他要代表全国人民的心愿，完成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在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内，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 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 ”[③]所以，他劝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的这个决策，以便与中国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

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管理的观点，邓小平说：“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①]这些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地区政治、经济制度现状。他告诉撒切尔夫人，之所以中国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以便制定我们在 15 年中和 15 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是香港人民、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都能够接受的，因为对各方面都有好处。邓小平还指出，中国不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他认为，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但是在程度上并不像一些人估计的那么大。

中国宣布 1997 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邓小平回答：小波动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3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3 页。

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②]他还告诉英国首相，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③] 邓小平说，他所担心的就是今后 15 年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制造混乱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但主要的是英国人。他希望从撒切尔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官员讨论如何避免这种混乱。

撒切尔夫人这时打断邓小平的话说，严重的波动将不会是由英国人造成的。但如果中国进行干涉，那么世界就会知道怎么一回事了。

这场激烈交锋过后，两位领导人商量起会谈公报问题。此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走到旁边准备起草这份公报。

邓小平建议这次与英国首相的会谈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十五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十五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①]

但是，撒切尔夫人坚决不同意邓小平的这个建议，特别是拒绝以 1997 年中国收回香港为前提。

经过一阵争执，双方同意发表一个不做任何实质性承诺的会谈公报。

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显然仍然被邓小平上述极其坚定而严密的话所震撼着，以至于神思恍惚，在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

英国女首相这一跤引起了敏感的舆论界的浓厚兴趣。记者针对这个细节，充分施展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

有人评论说，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的会谈针锋相对。铁娘子碰了硬钉子，受挫折极深，内心如翻江倒海，以致于神情恍惚。

一位深知铁娘子和邓小平性格的记者分析道：撒切尔夫人锋芒毕露，邓小平绵中寓针。尽管撒切尔夫人受丘吉尔影响极深，尽管她坚持“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的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记者是善于观察和分析的，虽然他们的评论想象和推测的色彩浓重，但聪明深刻的想象和分析是接近事情的实质的。撒切尔夫人没想到邓小平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会那么坚定，毫无通融余地。她心中不由得充满失望和痛苦。

英国首相没有想到邓小平如此强硬。回去之后撒切尔夫人私下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哎唷， 邓小平真残酷啊！

下午，撒切尔夫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向记者宣读声明时，她的声音一时变得嘶哑，但她仍然坚持念完全文只有 83 字的声明。

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铁娘子把由于与邓小平会谈受挫而憋足的火，向记者们发泄出来。她对一位手忙脚乱的英国记者大加嘲弄，对香港和另外一些记者的提问置之不理，而且横挑提问者的毛病，使招待会不欢而散。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4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4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4—15 页。

撒切尔夫人把心中的火发在了无辜的记者身上，然而记者也不是好惹的。他们对铁娘子口诛笔伐，奋起还击。在英国的报纸上，也有毫不留情地批评她的文章。文章讽刺说：她缺乏打动普通人的本领，麻木而迟钝，却不肯放过任何显示不饶人作风的机会；她像一个狂热的斗牛士一样，她冷漠而强硬，但是她笨拙得像那头她逗引的牛一样，赢得喝采声。有的记者还教训说：北京之行充分暴露了她的弱点，她需要先磨掉一些锋芒，才能成为合格的政治家。

撒切尔夫人并没有被邓小平说服。她认为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法律条件和政治条件了解大少。因此，她觉得“需要慢慢地、彻底地开导他们”，让中国领导人知道要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应该怎么办。

这位首相还认为，虽然她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预定目的，但她使邓小平同意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即“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①]这个声明没有把中国要收回香港作为谈判的前提写进去。

正如人们先前所预料的那样，撒切尔夫人带着一只准备装中英关于香港“新约”的篮子来到北京，结果又拎着空篮匆匆离去。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铁娘子以“新约”续“旧约”的幻想，注定要彻底破灭。

[①] 《人民日报》1982 年 9 月 25 日。

第十七章　给英国人一个台阶下

撒切尔夫人访华后，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政府对抗了将近半年时间。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主权问题不容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首相接受了“中国通”柯利达等人的建议，在主权问题上有所松动，但并没有作出1997年交还香港的承诺，邓小平从大局着眼，给予灵活的回应，作了必要的妥协，推动了谈判的进程。

僵　　局

北京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一行飞往上海和广州参观访问，在飞赴上海途中，她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同中国会谈的“气氛都是友好的。我们承认有分歧，但认为共同的东西、共同的目的大于分歧”。

实际上分歧大于共同的东西。囿于双方已达成的关于谈判内容保密的协议，撒切尔夫人没有透露分歧在哪里。然而，中英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共识则是人所共知的，即双方要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事实上，香港已经很繁荣了，现在需要做的的确是予以保持。但还不能说已经很稳定了。因为香港的前途尚不明朗，中英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刚刚开始，结局是凶是吉也不可知。所以，中外人士特别是广大港人虽然注意双方的共识所在，但更注重两国领导人的分歧及其化解。

1982年9月26日下午，撒切尔夫人飞抵香港。第二天下午，她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亮出与中国政府的分歧：虽然中国领导人向她表示不承认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但英国方面却一定要承认，“因为这些条约是有法律根据的”，“是有效的，不应单方面推翻，而只能由双方加以修改”。她说：英国立场是根据三个条约，其中一项是占香港面积92%的土地的租借，将于1997年到期。另外两项条约是关于割让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尖端，占整个土地面积的8%。英国遵守它的条约，因此，这意味着，租惜在1997年期满时，将归还中国——我们遵守我们的条约，如果有人不喜欢这些条约，解决的方法是由有关双方进行讨论，经双方同意而生效，但不能毁约。如有一方不同意这些条约，想废除条约，则任何新的条约也没有信心执行。

撒切尔夫人还表示，她会承担作为英国首相对香港的责任，英国要向港人负责。

英国首相的讲话立即使人们意识到，中英双方的分歧原来远远大于共同的目的。香港金融市场顿时作出强烈反应，随后的一周内，股市下跌幅度达25%，　10月底恒生指数降至772点；一月后的10月27日，香港外汇市场每100美元兑换694港币，创战后以来最高纪录；港市汇率指数跌至79.7，为空前低点。

香港经济评论家认为，港币对外汇走势疲软，主要是英资财团从中运作操纵，企图影响中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

撒切尔夫人的“三个条约有效”的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几个条约都是侵略战争的产物，因而从国际法角度讲也是无效的。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侵略战争是非正义战争，是非法的，非法的行为并不产生权利，所以，作为19世纪大英帝国侵华战争产物的三个条约是无效的。但是，时处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居然还坚持这种无效的条约，就必然遭到中外人

士的猛烈批评。

英国领导人大打“条约牌”，首先在香港遭到了强烈抗议。在 9 月 26 日，香港浸会学院学生会时事委员会就发表声明，指出过去的三个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应予废除”，收回香港“是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英国首相 27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前述讲话后，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两校学生代表，高举“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侵华条约不容肯定”等标语，在招待会的场外示威，并递交抗议书。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的两个学生会还发表联合声明说：“我们不能接受英国首相‘修改’条约的建议，这样等同于承认这些条约，无疑令我们的民族尊严再次受损。”当天晚上，香港专上学联所属的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采取集体抵抗行动，不派代表出席当局为撒切尔夫人在总督府举行的招待会，以示抗议。

香港舆论界也对英国首相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星报》评论说：“中国重申对香港的主权，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乎意料的是英国的坚持条约，因为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又是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不光彩的鸦片战争之结果。”评论指出，坚持条约，损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虎报》也发表社论指出：“紧紧基于过去年代发黄了的条约的英国立场，显得顽固，甚至是不合时宜的。”

由此看出，撒切尔夫人所坚持的“三个条约有效论”是极不得人心的。广大港人是支持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立场的，因为他们是炎黄子孙，血毕竟浓于水。香港尽管已被英国统治了一百多年，但广大港入仍然以属于中国人而自豪。

对撒切尔夫人坚持不平等条约的顽固立场，中国政府明确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并进行了宣传反击。

针对英国首相 9 月 27 日在香港发表的言论，9 月 30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代表中国政府重申自己的一贯立场：“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收回整个香港地区。”

10 月 1 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我们对香港问题的严正立场》。文章指出，撒切尔夫人 9 月 27 日在香港发表谈话，一再声称三个条约是“有效的”，应该“继续遵守”，“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文章还针对这位首相关于英国对香港居民负有“道义责任”的言论，强调指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有权利说，对香港居民负有一个主权国家的责任。”[①]《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报刊都发表了批评撒切尔夫人观点的文章。

英国舆论界也传出了批评首相的声音。伦敦出版的《新政治家》周刊发表评论指出：“必须正视的现实是，香港完全是已经过时的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时代错误。”“在一个 98%都是中国人的社会里，英国没有合法的政治权利去保持白厅对它实行直接的盎格鲁撒克逊统治的门面”，“为了香港居民的最大利益而举行老实坦率的谈判，以便把香港平静地归还中国，是唯一切实的香港政策。”[②]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在 10 月 27 日“时事”电视节目中指出，撒切尔夫人把英国在 19 世纪强加给中国的关于香港地位的三项不平

[①] 《人民日报》1982 年 10 月 1 日。

[②] 《新政治家》周刊 1982 年 10 月 9 日。

等条约说成仍然有效，是“缺乏历史常识”。

铁娘子在英国上下议院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有的议员指责她高傲和不通事理的态度，给香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1 月 10 日，英国上议院辩论香港问题时，肯纳勋爵发言说：香港问题不能与福克兰群岛问题相提并论，对香港而言，根本不存在要作外交上保护的问题。因为英帝国当年强迫中国所签的条约是真正的不平等条约，坦白地承认这一点对英国政府并无害处。他呼吁，现在已是政府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香港不是福克兰群岛，中国不是阿根廷，英国不可能凭武力保住其对香港的统治。同样，从三个条约的法律效力来讲，英国也处于无理地位。撒切尔夫人“自己非常清楚这两点”。但她“明知不可而为之”，在主权问题上不作让步。比起福克兰群岛来，香港对英国确实要重要得多，撒切尔夫人怎么舍得痛痛快快地放弃这块风水宝地？

撒切尔夫人离开北京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继续就谈判的前提和程序问题进行磋商。中方要求英方放弃不平等条约，以承诺让中国对整个香港地区行使主权作为前提，然后进入同中方讨论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繁荣与政权交接等问题。但是，英方坚持，谈判不应有任何先决条件，主权问题只能作为更广泛、更具体的议题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双方各执己见，谈判形成僵局。

1983 年 1 月底，刚接替章文晋担任中方谈判代表的姚广，与柯利达举行会谈。姚广重申，主权问题不容讨论，中国不允许英国在 1997 年后以任何形式继续统治香港。中英谈判必须以英国承认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为前提，谈判议题只能是在 1997 年前如何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柯利达则说，英方只希望以 1982 年 9 月 24 日联合公报为基础进行谈判。也就是说，仍不同意按中国所要求的以允诺交还香港为基础开始谈判。这次会谈最后不欢而散。

两手准备

中同政府把主权这个“球”踢给了英方，但英方迟迟不把它踢回来。此时，中方只能对谈判的前景作出两种估计：一种是英方在主权问题上与中方合作，会谈就可以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达成协议；另一种前景则是，英方在主权问题上毫不相让，双方不能达成谅解和协议，会谈走向破裂。

邓小平实际上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一开始，就作好了两手准备，尤其作了谈判破裂的最坏打算，并为此制定了有力的对策。

在中英谈判陷入僵局期间，中国有关部门从两方面为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努力。第一，中央领导人和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继续完善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他们加紧调查研究，反复征求各方面人士特别是广大港人的意见，以“一国两制”构想为指导，制订了对港政策的“十二条”，准备在第二阶段谈判一开始，就把它作为谈判的基础提到英方面前，或在必要时单独加以公布。第二，全国人大加紧对香港的政策立法工作。1982 年 12 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 31 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1983 年 6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一次会议将要召开。如果到那时中英谈判仍然处于僵持状态，中方就可

能通过全国人大，单独宣布自己的对港政策。

当然，中国政府并不希望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破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也不愿意单独宣布收回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避免出现这种结局，中方一面继续向英国领导人提出忠告，一面希望通过港人代表来做英方的工作。

出于对香港前途和中英谈判的关注，港人不断派代表来到北京。中国领导人热情地会见他们，向香港同胞宣传解释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以消除疑虑，增强其信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竭尽全力做多方面人士的工作。

1982 年 11 月 20 日，廖承志会见香港厂商联合会参观访问团时，向他们阐述了“ 港人治港 ”、繁荣香港的方针。他说，主权问题没有什么可谈的，至迟 1997 年我们就行使主权，收回香港。问题是收回后怎么办。香港回归后，香港维持现状，并由“ 港人治港 ”，内地不派人。但英国领导人还不接受中方的这些想法。

有人向廖承志传话说，英国人希望延期。廖回答说，这不是巴士、电车，不能随便延期。他还警告说，如果在过渡时期，英国或其他方面的人捣乱，中国政府就迫不得已要重新考虑有关问题。

由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继续僵持，香港同胞非常焦急。1983 年 1 月，香港“ 新界 ” 人士参观访问团来到北京。1 月 12 日，廖承志会见了他们。他告诉“ 新界 ” 代表，中英谈判依旧在僵持之中，其中很大的问题与英国首相的看法有关。他认为，主权应该是很简单的问题，容易解决，一泻千里。但英国朋友对此尚未想通，于是现在这个问题顶住了。

“ 新界 ” 代表说，香港同胞非常着急，要求中英双方尽快提出解决办法。廖承志对他们说：我比你们更急，希望中英达成谅解。我们会努力。他同时希望在座的香港同胞“ 也对英方加以催促，要他们迅速解决。不下第一步棋，第二步下不了 ”。廖承志恳切地请“ 新界 ” 人士联手向英国建议，不要再拖，拖没用。如果英方“ 再讲三个条约有效，中英友好关系就基本破裂 ”。他还透露，如果英方能尽快解决问题，“ 具体问题可以商量 ”。 [①] 廖承志把“ 新界 ” 代表送来的材料和会见的情况，都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在这次会见“ 新界 ” 代表时，廖承志曾形象他说，中方在撒切尔夫人 9 月访华之后，已将“ 球 ” 踢给了英方。事后，一些香港的报纸，把此报道说成中国已向英方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建议，还有的把它说成是“ 方案 ”。1 月 17 日，廖承志再次会见这个访问团时，又向他们指出，香港报纸报道不准确，并解释说，他所谈的“ 球 ” 是指主权，是大球不是小球。

英方回了一个刁钻的“ 球 ”

谈判出现僵局，不仅中国政府和广大港人着急，英国领导人也焦急不安。1983 年 1 月 28 日，撒切尔首相召集政府高层官员和港督尤德开会，讨论香港问题。与会者表示，这年 6 月中国可能会单方面宣布其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计划。这种结果必须防止。撒切尔夫人提出，在谈判无进展的情况下应在香港发展民主体制，使它能在短期内获得独立或自治，正像英国过去在新加坡所作的那样。她还提议在香港搞全民公决。但其他与会者不赞成首相的设想。

[①] 《廖承志文集》下卷，第 676—678 页。

由于撒切尔夫人不向中方让步，中国政府就加紧进行完善关于香港方针政策的工作，并准备提交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

柯利达和尤德深怕中国政府会以中英在主权问题上形成僵局为理由，而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中止两国间的谈判。他们急忙于 1983 年 3 月 5 日赶回伦敦，打算会见首相，劝她采取措施，争取回到谈判桌上来。

3 月 7 日，撒切尔夫人在同柯利达和尤德商讨对策时，最初仍然持强硬态度，甚至建议由联合国在香港主持一个全民投票，以向中国证明，英国的继续管治不仅是英国所希望的，而且受到港人的欢迎。柯利达不赞成这个办法。他主张由撒切尔夫人写一封信给中国总理，表示只要在香港的管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她就愿意就主权问题“考虑”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撒切尔夫人让柯利达起草这封信，并决定 3 月 9 日再次开会。

在 3 月 9 日的会上，撒切尔夫人修改并批准了柯利达草拟的信。这封信以英国首相的名义表示：“只要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能够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与稳定，又能既为中国政府又为英国议会和香港人民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回归中国”。[①]

柯利达回到北京后，立即将这封信通过姚广呈给中国总理。英国首相在这封信中并没有痛快地承诺让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是附加了一大堆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两国政府要达成能保证未来香港繁荣和稳定的行政管理安排。这种安排并不一定是按照中国的“一国两制”构想作出的。以后的事实证明，英国要用主权换治权，即香港回归中国后，不是由港人来治港，而是由英人来治港。撒切尔夫人一直强调，香港要想保持繁荣和稳定，就必须由英国继续管治，最好是既保留主权又行使治权。第二个条件是，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要能被英国议会所接受，也就是说，英国议会具有否决权。第三个条件是，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要能为香港人民所接受。这一条件显然为英方打“民意牌”、“信心牌”及玩“三脚凳”手腕埋下了伏笔。

总之，英方踢回的这只“大球”很不好接，非常圆滑。用此信设计者柯利达的话说，“这封信玩了一个把戏”。[①]

然而，同撒切尔夫人让香港独立或就香港前途进行全民公决等对抗性方案相比，柯利达的方案表明英方在主权问题上开始具有灵活性，使死结有了解开的可能性。

邓小平巧解死结

尽管英方来信充满机巧，但邓小平却很清楚地读出了对手立场的微妙变化，并以自己的灵活姿态积极回应，适时地给英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准备与英国代表举行正式谈判，以便迅速打破谈判的僵局，解开主权问题上的死结。

柯利达大使 4 月份接到中国总理的回信。此信肯定了英方的新态度，同意 5 月底和 6 月初举行两轮谈判，商讨纯粹程序安排问题，并建议正式谈判

[①] 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第 6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年 10 月出版。

[①] 柯利达：《在华经历》第 186 页。

可以先谈第二个问题，即 1997 年后怎么办。中国政府的灵活姿态，为双方开始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

1982 年 9 月至 1983 年 6 月，中英两国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约定按以下顺序磋商香港问题：第一，先谈 1997 年以后对香港的安排；第二，商讨从现在开始至 1997 年过渡期的安排；第三，有关政权交接的事宜。至此，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近 10 个月的“ 第一阶段 ” 谈判，以撒切尔夫人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有条件的让步，以及中国同意暂时搁置主权之争而结束。接下来的将是“ 第二阶段 ” 的 20 多轮谈判。

谈判原计划于 6 月开始。但由于英国提前举行大选，双方同意会谈 7 月开始。

此时，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于 6 月 20 日逝世。在廖公病重期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任命原外长、中顾委常委姬鹏飞为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姬鹏飞在 6 月 22 日，即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主持召开了他上任后的首次港澳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南海国务院第 4 会议室举行，与会者有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李钟英、李后（兼秘书长），副外长、第二阶段中英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姚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陈楚等人。

会议主题是关于中英香港谈判问题。先谈到了撒切尔夫人给中国总理的一封信。姚广读了信。此信显示，英国终于退却了，不得不放弃“ 三个条约有效 ” 的立场。姚广读完以后，会场笑声一片。姚广又把外交部关于与英方就谈判开始时间以及谈判代表问题进行交涉的情况向与会者通报。大家都认为，中英之间可以开始正式谈判了。

李后将港澳办准备的一份文件发给与会者。这是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收回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方针，对香港回归和 1997 年后的香港政策，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既成为和英方谈判的根据，又是 1997 年后实践“ 一国两制 ” 的根据。

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对中英谈判策略的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1.谈判开始不先谈主权问题，先谈 1997 年以后如何管治的问题；此问题解决后，主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是中方的一条主要策略。2.谈判日期要设限，以 1984 年 9 月为最后期限，不能任由英国人无限期拖下去。要让英方知道，届时如仍未谈成，中国会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

在 6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个会议期间，邓小平曾会见参加两会的港澳人士。他在谈到中方在主权问题上的灵活策略时说：我们考虑到若要英方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先决条件下进行谈判，英国方面会认为“ 有失面子 ”，因此，“ 要给英国人下台阶 ”。他还指出，如果先谈“ 1997 年后 ” 怎么办的问题，就可避开主权问题的障碍。而“ 1997 年后 ” 的问题谈好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也就没什么可谈了。

邓小平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大师。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时当然也不例外，他对港澳两会代表谈完灵活策略后，又讲了谈判的一些原则。他强调，中英谈判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拖久了对信心不利。此外，“ 新界 ” 租约不予延长。我们决不步清廷后尘，决不做李鸿章第

邓小平的这些策略，成为中英谈判过程中中方的主要策略。中英两国的谈判进程基本上依此设计展开。

1983 年 7 月 1 日，中英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公报。公报说：“ 在 1982 年 9 月两国领导人会谈以及近来进行的有益的交换意见之后，双方同意关于香港未来的第二阶段会谈将于 1983 年 7 月 12 日在北京开始。 ”[①]

7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参加中英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已经组成。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姚广，代表团成员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长李菊生、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外交部西欧司顾问鲁平等；英国代表团团长是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代表团成员有英国驻香港总督尤德、港府政治顾问麦若彬、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欧威廉、二等秘书毕瑞博等。齐怀远说，双方商定，谈判内容是保密的。

经过主权问题上的一场鏖战，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终于突破僵局，真正要坐下来好好地谈一谈了。

[①] 《人民日报》1983 年 7 月 2 日。

第十八章　用“主权换治权”的较量

撒切尔夫人在1997年后香港主权问题上的抵抗没有奏效，于是退而求其次，准备在1997年后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与邓小平再做一番较量。

唐宁街主人现在确定的策略是，“用主权换治权”，也就是说，英国不再谈三个条约“有效”，不再提“续约”之类的要求。同意在1997年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政府。但是，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英国可以受中国之托继续管理香港。如果按照英方的这种设想，　1997年后香港的模式将是：香港回归，英人治港，而非港人治港。

邓小平在主权问题上毫不退让，在治权问题上也决不妥协。他的立场是，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治权是主权的具体表现。他决心挫败英方在这方面的一切进攻，以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国家主权完整力根本原则。

“三脚凳”：老谋深算的一招

撒切尔夫人1983年6月提前实行大选，保守党获得空前胜利，她再次登上首相宝座。大选后的新内阁中，支持撒切尔夫人的势力大大加强。温和派代表人物原外交大臣皮姆被解职。首相的亲信杰弗里·豪接任外交大臣，理查德·卢斯任负责香港事务的国务大臣。

在连任首相职位巨大胜利的鼓舞下，撒切尔夫人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正式会谈开始后，向中方发起了新一轮进攻，她要运用各种手段来使中国同意在1997年以后由英国继续保持对香港的治权。英方为实现这个目标所采用的基本策略是，用主权换治权。

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外交部其他官员，却主张尽快在谈判中向中方表示不再谋求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但是，撒切尔夫人认为“没有理由作出这种让步”。她甚至主张，“要把每张讨价还价的牌都使用到最佳效果”。于是她使出了“三脚凳”这张牌。当然，撒切尔夫人并不是“三脚凳”论的始作俑者。

所谓“三脚凳”，是在中英开始对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港英当局企图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造成中、英、港三方共室的事实，以达到“还政于港”、使香港成为一个政治独立实体的目的。1982年12月，负责香港事务的英国外交部次官鲍斯达访问香港时曾提出，可以“让香港作为一方参与谈判，发挥独立作用”，因为香港前途好比一个“三脚凳”，“其稳定性依赖于英国、中国和香港”[①]

在鲍斯达提出“三脚凳”论半年之后，英国政府开始企图将这一方针贯彻到第二阶段谈判中去。

1983年6月30日，港督尤德奉召返回伦敦。撒切尔夫人准备同他以及其他有关官员商讨即将展开的香港谈判问题。但随同尤德来到唐宁街10号的还有9名港府行政局的非官守议员。显然，铁娘子是把他们与港督作为另一只“脚”来加强英方同中国谈判的阵容。

尤德一行飞抵伦敦后，稍事休息就受到了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负责香港事务的国务大臣卢斯的接见。7月4日，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

[①] 香港《快报》1982年12月11日。

尤德及香港议员代表，杰弗里·豪和卢斯在座。这次会见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这天晚上，首相府发言人宣布：“首相和外交大臣重申他们对香港承担的义务和他们设法达成协议的目的，这些协议应该是议会、中国和香港人民都能接受的。……他们强调了坚持行政局意见的重要性，在会谈中将继续征求行政局的意见。”

与此同时，首相向国会递交了一份书面答复：“在中英谈判的每个阶段都要继续充分考虑香港人民的意见。”

这些话暗含暂时还不可泄漏的天机。但是，几天后英国政府密谋的天机终于泄漏出来。

7 月 7 日，尤德自伦敦返港举行记者招待会。这时记者们已经获悉英国谈判代表团的名单中有尤德，而且排名第二，便问他：中英第二阶段的会谈与第一阶段有何不同，尤德意味深长地回答道：“不同之处是有我参加。”

有的记者问，英国是否准备放弃香港。尤德重复英国外交部的声明，说那纯属猜测。

记者们终于向尤德问了最要害的一个问题：“你是代表英国参加谈判，还是代表谁？”

在记者穷追不舍地逼迫下，尤德打开天窗说了亮话：“我是以港督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参加谈判，我不代表他们又能代表谁呢？”这位总督大人到底还是一语道破天机。

总督的话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香港的左翼报纸立刻表态说：“你尤德是英国人，怎么能代表香港人呢？”“你是香港总督不假，可是你这个官儿却是英国人封的。”“中英两个国家谈判，把香港人弄进去干什么？”

一些头脑清醒的港人马上意识到，这是英国玩的“三脚凳”策略。他们分析说，“英国人现在玩的花样可以称之为‘三脚凳’，也就是在中英双方会谈中挤进一个代表香港的席位，这样在谈判中就可以以香港民意为借口，来进行讨价还价，香港回归祖国，北京自会尊重并征求香港同胞的意见，那是中国政府应做之事，无需英国代劳。”他们进一步指出，“英国人正在玩弄一个阴谋。如果中国政府落入圈套，那么就会面对着与自己的同胞——香港人

作战的尴尬处境，如果香港人落入圈套，就会为英国人尽义务，把

辛辛苦苦从大陆争来的好处全都让给躲在后边的英国人。”

面对英方摆出的“三脚凳”进攻架势，北京及时地作出了强

烈反应。7 月 8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消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双边会谈。尤德先生是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参加会谈的，因此他在会谈中只代表英国政府。”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迫使撒切尔夫人收回刚刚打出的“三脚凳”牌。英国外交部急忙发表声明，说尤德“当然将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会谈”。

尤德赴京之前，港英政府现职新闻处长曹广荣向中国有关方面递交了入境申请，理由是以港督私人新闻主任的身份随同尤德赴京参加会谈。

7 月 9 日，中国外交部拒绝了曹广荣的入境申请，因为曹广荣系港英政

府的文职人员，不在英国政府代表团名单之列，因而没有资格参加涉及中英两国事务的会谈。

中方的强烈反对，再次迫使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代表撒切尔夫人宣布，英国政府不坚持曹广荣赴北京参加会谈。

英方企图将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谈判摆成“三脚凳”的重大尝试，一出场就被中国政府坚决顶了回去。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英方在后来的谈判中继续或明或暗地摆‘三脚凳”。

英方打出“民意牌”和“经济牌”

从 7 月中旬开始的第一轮会谈到 9 月下旬的第四轮会谈前后，英方软硬兼施，会场内外互相配合，大打“民意”、“经济”两张牌。

1983 年 7 月 12—13 日、25—26 日和 8 月 2—3 日，中英举行了第一至第三轮会谈。在这三轮会谈中，中方代表继续阐述中国政府关于香港前途尤其是 1997 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的既定方针政策。

英方代表不再提“三个条约有效论”，并在名义上同意承诺让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又要求中国同意 1997 年后英国保留对香港的治权。也就是说， 1997 年后香港除了米字旗换成五星红旗外，其他均不变，英国人继续受委托管治香港。中方代表问：就换一面国旗？英方代表说，换一面国旗已经不简单了！

为了“说服”中国代表，英方代表搬来了大批精心汇集的材料，按照撒切尔夫人 1982 年 9 月访华的想法，开始耐心地给中方代表“上课”。柯利达说过，看来中国不大了解香港，我要给他们上上课。因此，在头几轮会谈中，他似乎把会场当成了课堂，说香港如何繁荣；香港繁荣的原因是什么；香港的法治、自由；为什么没有英国人香港就无法繁荣稳定……总之，英方所讲的一切，归结起来就是一条：香港离不开英国的统治。在宣传英国对香港无比重要的同时，英方又说香港人对中国接管没有信心，港人不愿意中国收回香港，怕收回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等等。

英国代表为了论证 1997 年后英国保留对香港治权的必要性，还提出了“过渡论”。他们说：英国撤出香港，把治权转移到港人手中实现本地化，需要有个很长的过渡时期。然而，从 1983 年至 1997 年只有 14 年的时间，时间不够。过渡时期至少需要 30 至 40 年，这样香港才可以保持繁荣和稳定。在这个过渡时期，可以在中国主权名义之下，由英国继续管治。

中方代表坚决驳斥英方的观点，强调指出，主权与治权不可分离， 1997 年以后要收回的不仅是主权，而且包括治权。香港过渡期到 1997 年结束。中方表示，香港回归之后，中国政府不会委托英国人继续管治，而只会让“港人治港”。

1983 年 7 月 29 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官员接见香港中学生访华团时，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中国 1997 年后在香港实行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并指出“主权和治权不能分离，否则主权就没有意义了。”

在前三轮会谈中英国没有迫使中国在治权问题上让步，谈判形成僵局。于是，香港人心大受影响，股票、房地产市场大幅下跌，港市也迅速贬值。8 月 4 日，恒生指数下跌 36 点，几乎降了 5%。8 月 5 日，港市的汇率降到 7.5

港币兑换 1 美元以下。面对香港经济的剧烈波动，英国当局和港英政府并不采取措施稳定局面，却反而利用这种形势，在谈判会场外继续大打“ 经济牌 ”和“ 民意牌 ”，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港英政府鼓励一些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港人对中国收回香港没有信心。有几家报纸也大造舆论，宣称“ 1997 年之后要再有 20 或 30 年的过渡 ”、“ 主权与治权分开 ”、“ 港人治港行不通 ”、“ 两种社会制度不能融合 ”、“ 没有英国人参与治理，香港不能繁荣 ”等等。

有些香港知名人士提出，中国稳定香港人心的最好办法是，采用香港经营公司的通常作法：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当香港这家“ 公司 ”的“ 董事长 ”，聘请英国担任“ 总经理 ”，继续管治香港。因为英国驾轻就熟。他们认为，采用这种管治模式，香港人心就可以稳定，投资者就会放心。

港英政府乘机发起一场征集“ 民意 ”的运动，将上述人士的这些言论作为香港的“ 民意 ”。

中英谈判再次出现僵局。

9 月 5 日，唐宁街 10 号举行会议研究对策。除了撒切尔夫人外，与会者还有尤德、柯利达、卢斯和国防部长迈克尔·赫塞尔廷，以及港府布政司和几位行政局非官守议员等。

英国外交部此时对继续坚持“ 用主权换治权 ”持动摇态度，主张对中国再作让步。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柯利达等人认为，如果不向中国让步，会谈随时可能破裂，香港经济已出现严重波动的危险局面，难以控制。

但是，与会的港府布政司和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反对向中国作出让步，主张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经济压力。他们认为，中国非常依赖香港经济，香港一旦出现经济崩溃的前景，中国政府就会退缩。他们还预言，即使中英谈判破裂，其影响也不会太大，很可能转入“ 绅士式 ”的长期休会。因此，他们建议在下旬召开的第四轮会谈中不向中国让步。

外交部官员不想违背港府官员和行政局非官守议员的意愿。撒切尔夫人更是站在行政局一边。柯利达只好同意在第四轮会谈中继续维持原先立场。英国决策者实际上打算用香港经济作赌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企图迫使中方在治权问题上向英方让步。

在第四轮会谈前后，英国继续大打“ 经济牌 ”，企图迫使中国作出让步。由于英资财团首先在伦敦大量抛售港币，引起港币暴跌。9 月 16 日，港币兑美元汇价狂跌，破 1 美元兑 8 港元大关。港府财政司彭励治、汇丰银行总经理雷兴悟等在香港宣称，如果 1997 年中国收回香港，香港的繁荣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会丧失。他们还说，中国对香港谈判所发表的言论及做法直接影响了港币的信誉。除非中国在谈判中有明确的表示（即对英方的要求作出让步），否则，港元的弱势将会持续。 19 日，美元兑港元几乎每隔一小时破一关，但港英政府仍不采取措施遏制港币跌势。

9 月 23 日，撒切尔夫人在伦敦对美国记者说，香港由于前途不明正面临重大的金融和政治动荡，英方谈判是为了香港人的利益，英国未从香港拿走一个便士。她甚至说，香港若非地位特殊和有个“ 新界 ”的租约问题，应早已独立成为另一个新加坡。别人不应指责英国还在搞殖民主义，因为许多与新加坡差不多的地区，亦已经独立很久了。她把香港的动荡，完全归咎于中国未向英国作出让步，并且否认英国在香港实行的是殖民主义统治，把自己视为港人的救星。

在第四轮会谈过程中，柯利达按照既定方针丝毫不让步。他重申，要保证香港在 1997 年后继续繁荣和稳定，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中方代表团团长姚广也重申，主权与治权不可分离。双方互不相让，致使会谈无法进展。

由于人们期待已久的中英第四轮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又触发了更为凶猛的金融动荡。9 月 24 日，港币与美元汇价破九算，跌至 1 美元兑换 9.7 港元的历史最低价，被称为“ 黑色星期六 ”。许多人拥到银行购买美元，一些超级市场出现市民抢购大米、食油和罐头等食品的现象。一时间，香港人心惶惶，社会极为不安。

中方开始反击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英方不仅在会场内、在谈判桌上向中方发起一轮又一轮进攻，而且在会场外一次又一次掀起阵阵波澜。针对英方打出的“ 民意牌 ”和“ 经济牌 ”，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以及香港民众、舆论界和各爱国团体纷纷进行反击，发表大量文章，组织各种活动，批评英国的做法。中国领导人更加明确表示了对香港前途的态度。 1983 年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宣布，中国政府将于 1997 年 7 月 1 日收回香港。[①]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日期。

8 月至 9 月，港九工会联合会以及摩托工会、洋务工会、海员工会等几十个工会组织连续举行“ 香港前途问题研讨会 ”，表示反对英方“ 以主权换治权 ”的做法，强调主权和治权不可分。

香港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指出，在香港前途问题上，英国打“ 民意牌 ”实属虚伪。当时的一篇文章说，根据 1982 年 10 月“ 新香港学会 ”发表的调查，约有 2/3 的被访者接受“ 港人治港 ”方案。 1983 年中，大专同学社会研究小组发表的调查也反映出，大多数人认为“ 港人治港 ”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文章指出，至于英国派驻香港的总督，以至香港行政局、立法局，百分之百地只能代表英国的利益和声音，根本不代表香港的民意。一些报纸还列举事实，指出港英当局长期以来一直漠视民意，而现在却“ 临渴掘井 ”，是很难收到什么效果的。

9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驳英方“ 以主权换治权 ”的观点和要求。文章说，这种论点和做法既违背历史潮流、又不符合国际法的主张，同时也将阻碍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结果只能损害各方包括英国本身的利益。9 月 21 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著名法学家史良发表谈话说，“ 主权与治权分开论 ”在法律上和法理上都是说不通的，都是对国际法公认的主权原则的侵犯。

9 月 23 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国内地的大力支援是香港繁荣的重要因素，驳斥了英国当局宣传的香港的繁荣完全是由英国的统治所创造的、因而香港的未来发展也离不开英国的管治的论点。

当月下旬，正在香港访问的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对记者说：“ 英国有些人对形势作错误的估计，在香港制造混乱，企图迫使中国在谈判桌上让步，以便继续维持他们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态度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中国政府一定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收回治

[①] 香港《文汇报》1983 年 8 月 16 日。

权。英国应该珍惜中英关系，及早改变错误态度。”宦乡希望英国政府尽早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承认香港主权和治权属于中国；二是把香港现时不稳定的经济尽快稳定下来。他针对当时香港的经济形势指出，当前港英当局自称对港元采取的是“不干预”政策，但实际上却采取了许多打击港元的干预措施；三是给香港工业发展以指导性帮助。[①]

10 月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敦促英方放弃不切实际的要求，以诚意和合作态度，与中方一起使谈判尽快获得积极结果。

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会希思

中英谈判再次面临危机，英国前首相希思深感忧虑。他急忙飞到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打算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再次做沟通两国领导人的工作，为打破谈判僵局贡献一点力量。

这是希思自 1974 年以来的第 6 次访华。他每次访华都要会一会邓小平。这一次就更有必要见一见老朋友了。

9 月 10 日，邓小平会见希思。两位老朋友亲切地寒暄了一番。他们畅谈国际问题。在这方面，两人的共识颇多。接着，他们谈起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希思目睹了“文化大革命”末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不同景象。他对邓小平的杰出治国才能和人格非常钦佩，对中国正在加速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由衷地感到高兴。

当话题转到香港问题时，气氛一下子变得格外沉重。邓小平对英国政府在当时谈判中的做法极为不满。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22 日要会谈（指第四轮会谈），我希望不要再纠缠在治权问题上。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联合声明的方式对两家都好，不是说对哪一家更好，特别是涉及到中英长期的关系。

谈到过渡期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从现在到 1997 年的 14 年要过渡得好，关键在于 1997 年收回香港能顺利进行，而不会引起动荡。比较顺当地接收对各方都有好处。英国利益不会受到损害，美国、西欧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害。他又强调，过渡期有个香港人参与管理的问题。无论政治、经济、商业和金融方面，不知道怎么办，一下子拿过来怎么行！[①]

邓小平告诫说：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他最后再次强调，他希望英方在 9 月 22—23 日的第四轮会谈时，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如果英方不改变态度，中国就不得不在 1984 年 9 月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希思向邓小平表示，他将把这番话转告撒切尔夫人。回国后，希思向英国政府传递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并劝首相改变以主权换治权的做法。

撒切尔夫人后退半步

[①] 《人民日报》1983 年 9 月 25 日。

[①] 刘金田：《邓小平与希思》，载《世纪风采》1996 年第 3 期。

英国在谈判会场内外使出各种招数均告失败，中国政府毫不妥协。而且经济政治形势却对英国愈加不利。迫于形势，英国政府在第四轮会谈后开始考虑采取措施稳定香港经济，并准备在谈判中实行退却。

1983 年 9 月 24 日，尤德参加第四轮会谈后返回香港，立即召开行政会议讨论港元汇率问题。25 日晚，他发表声明劝告市民不要轻信谣言，强调港元兑换率相当不合理，不能反映香港经济和政治实况。 26 日，港英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稳定港币地位的措施。会议最后采纳金融学家约翰·格林伍德的建议，政府出面干预外汇市场，转变过去奉行的“ 不干预 ”政策。然而，港英当局无权决定对香港货币体制作出重大改变，还须请示伦敦当局。

就在港英当局开始研究对策时，正在北美访问的撒切尔夫人于 9 月 25 日清晨接到她的经济顾问阿兰·沃尔特斯（当时正在华盛顿）的电话。沃尔特斯告诉首相，阻止港币完全崩溃及其引起的所有严重政治后果的唯一办法，就是支持港币，将它与美元的汇率固定化。他指出，香港政府的外汇储备很充裕，足以做到这一点。

撒切尔夫人基本接受了这位经济顾问的建议。9 月 27 日，她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召见财政大臣尼戈尔·劳森、英格兰银行行长和阿兰·沃尔特斯，起初，劳森和英格兰银行行长都不大赞同沃尔特斯的建议，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沃尔特斯提出的方案。

会后，英格兰银行官员查理·古德哈特和财政部官员戴维·皮利兹立即被派赴香港研究实行这一方案的具体办法。

10 月 14 日晚，尤德与港府有关高级官员开会，最后决定将港币与美元的汇率固定在 7.8 港元兑换 1 美元上，同时，决定取消 10%的港元存款利息税。第二天，港英政府公布了这一重大决定。香港经济社会状况很快恢复稳定。

英国政府也开始考虑在治权问题上向中方让步。9 月 24 日，负责香港事务的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卢斯来到香港，于 27 日参加了行政局扩大会议，讨论英国的退却问题，柯利达亦在场。但一些非官守议员不主张让步。柯利达认为如果再不退却，下几轮谈判就无法进行，中国就将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到那时，中方的条件就将是非常苛刻了。主管金融事务的官员赞成柯利达的看法，认为如果谈判破裂，香港金融市场就很难稳定。卢斯此时也倾向于柯利达的观点，认为谈判如果再僵持下去，给英国和香港带来的风险太大。

虽然卢斯开始赞同英方对中国让步，但又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横加指责。9 月 28 日，他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中国政府方面公开评论英国的立场，对于找到一项解决办法这一共同目标没有帮助，这种做法既无益又可悲。 ”他还说，香港的会谈“ 如果失败而找不到顺利的解决办法 ”，“ 就会出现骚动，就会受到冲击 ”。他还批评说：“ 我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想给会谈定一个最后期限 ”，“ 这个期限未必有帮助，而且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 ”。

中国政府对卢斯的指责作出强烈反应。 10 月上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卢斯 9 月 28 日的谈话以及撒切尔夫人 9 月 23 日的谈话进行反击。

在中方发起的强大舆论攻势下，英方加紧研究退却的方案。9 月 26 日，英国政府宣布英驻华大使柯利达调回外交部任次长，负责中英会谈，并任首相外事顾问。

柯利这回到伦敦后，就建议撒切尔夫人修改关于治权问题的谈判立场：也像 3 月修改关于主权问题的立场那样，向中方作出“ 有条件的 ”让步。柯利达提出，英国一方面应公开声明其基本立场仍然不变，仍然认为只有英国对香港的管治延续到 1997 年以后，才能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另一方面又应该表示，既然中国政府不接受英方的这个方案，英国政府准备“ 在完全有条件的基础上 ”来“ 探讨 ”中国关于 1997 年后香港的任何其他安排。然后，如果能以中国构想为基础修改形成一个方案，而且英国对它抱有信心，英国政府就予以支持，并“ 考虑向议会推荐一份含有各项安排的双边协议 ”。

如同这年春天在主权问题上的让步一样，柯利达没有建议全盘退却，而是后退“ 半步 ”。这是英国外交家极其老练圆滑的典型表现。撒切尔夫人接受了柯利达的建议。为表示“ 尊重 ”港人的意见，又让尤德率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到唐宁街 10 号讨论这个方案。 10 月 7—8 日，撒切尔首相和外交大臣杰弗里 ·豪会见港方来客，在首相府开会讨论并通过了柯利达为“ 避免对抗 ”、推动谈判提出的书面建议。

柯利达为撒切尔夫人拟就一封致中国总理的口信， 10 月 14 日中方接到这个口信。中国领导人对英方的新姿态表示欢迎。

10 月 19 日和 20 日，中英代表在北京举行了第五轮会谈。中方代表在会上指出，撒切尔夫人的口信确实表明英方作出了重要让步，即同意以中方构想为谈判基础，但并没有取消英国关于 1997 年后继续管治香港的要求。柯利达解释说，英国只是把自己视为香港的“ 照管人 ”。他还建议设立工作小组来讨论各种具体问题。这次会谈总的气氛良好，所以公报又恢复了用“ 有益的和建设性的 ”修辞语来描述会谈。

丢掉幻想准备合作

英国虽然不再提“ 以主权换治权 ”的要求，但又通过提交工作文件的方式，提出许多企图在香港最大限度地保留英国影响和使香港脱离中央政府领导、甚至使之成为某种独立政治实体的建议。

10 月 30 日，香港电视台记者问撒切尔夫人， 1997 年后英国是否仍希望参与香港管理？她回答说：这些正是谈判中在讨论的问题。显然，我们认为英国与香港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香港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香港成功乃华人之勤奋与创造性，加上英式管治体制的结果。如果现在的生活方式不能保持，则会面临灾难。因此，中英谈判即是解决港、英如何保持联系以继续繁荣。

撒切尔夫人企图利用中国政府关于 1997 年后香港制度等不变的政策，达到她促进香港“ 走向尽可能多的自治 ”，保持港、英特殊联系的目标。为此，她授意港英政府准备大量关于香港法律制度、金融制度和对外经济关系等工作文件，提交到第六轮和第七轮的谈判桌上。英方代表提出要在 1997 年后继续发挥英国的行政管理作用，比如，保留一名英国总督。理由是，香港必须同英国宪法相联系，只有保证英国人以某种形式仍然留下来，香港人才会接受妥协。

英国谋求 1997 年后参与管理香港和让其走向最大程度自治的做法，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抵制。 11 月 9 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希望在 1984 年 9 月前能与英国达成协议。如果届时还达不成协

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对香港的方针政策。

11 月 15 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接见黄立光为团长的新闻界人士旅行团。他在回答该团提出的有关 1997 年后 50 年原有制度不变的问题时说，香港回归后，香港人仍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出入境的自由。

中国政府的强硬姿态，迫使撒切尔夫人放弃不切实际的要求。目前她最担心的是谈判破裂，中国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因此，她授权柯利达再向中方传递口信，更加清楚地解释 10 月 14 日信的意思：“ 我们不设想 1997 年以唇英国与香港之间在政权或管理上的任何联系。 ”

柯利达在 11 月 14—15 日举行的第六轮会谈中，向中国代表表达了英国首相的这个解释。中方表示欢迎。

11 月 16 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齐怀远一改以往强硬的姿态，以很温和的措词详述了中英谈判和中英关系状况。他说，中国副外长、中方代表团团长姚广和英国驻华大使、英方代表团团长柯利达进行了不止一次的非正式磋商，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代表团成员之间也经常进行事务性的接触。第六轮会谈是“ 有益的建设性的 ”。当记者问，中英近期政治经济关系如何？齐怀远说：“ 目前中英关系正常，发展是良好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少往来。 ”[①]

在英国代表正式进入中方的“ 十二条 ”轨道之前，中国领导人继续向来访的香港各类代表团展示中国为香港未来绘制的蓝图。11 月 22 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向王宽诚率领的港澳工业家代表团阐释中国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方针政策。他说， 1984 年 9 月之前，中英谈判将达成“ 满意的 ”协议。然后将制定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83 年 12 月 8—9 日，中英两国代表举行了第七轮会谈。英方代表提交了两份新的工作文件。其中一份是关于香港的法律制度。它建议，如果中断与英国枢密院的联系，则应允许外国法官参加上诉法院，以加强其权威性。中方代表则把中国政府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 十二条 ”方针政策文件，交给英方代表。第七轮会谈公报以小结式的措词说，双方回顾了谈判的过程和已经取得的进展。

从 1982 年 9 月撒切尔夫人访华到 1983 年 12 月，这一年零三个月的会谈进行得极为艰难。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两年谈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她没有让。 ”[①]双方的最大分歧在于主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英领导人之间和双方谈判代表之间都进行了极为激烈的较量。

当撒切尔夫人带着马岛之战的余威来到北京时，中国领导人曾告诫她，中国可不是阿根廷。这位“ 铁女人 ”对这一点心里是很明白的，但她仍然要使出浑身解数与中国相搏。她为何而奋斗呢？奋斗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维护英国在海外的利益。

英国保守党精英有一个传统，就是坚决维护已经获得的殖民权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大名鼎鼎的丘吉尔曾经狂热地为恢复和保护大英帝国在远东利益（特别是香港）权益而战斗。

1943 年 11 月下旬，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及战后问题。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提议由中国在战后先行收回香港，

[①] 《人民日报》1983 年 11 月 17 日。

[①] 《邓小平论祖国统一》第 39 页，团结出版社 1995 年 2 月版。

然后即宣布与九龙合成为全世界的自由港。蒋介石赞成这一建议，希望美国帮助疏通，使中国至少能收回九龙。但罗斯福这一建议被丘吉尔断然拒绝。丘吉尔对罗斯福说：“ 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去任何东西。 ”在谈此问题时，他具体提到新加坡和香港。丘吉尔的顽固态度使美国总统不得不取消这一建议。罗斯福向他保证不改变英国在远东所占领土的状态。蒋介石非常恼火，他在日记里写道：“ 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 ”，“ 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 ”

撒切尔夫人继承了丘吉尔的遗风。为了维护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统治，她开动了战争机器。在与中国进行的关于香港前

[1]途问题的谈判中，她虽然没有使用军事手段，但运用了其他各种心理、舆论、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手段。

然而，今非昔比， 80 年代的中国和英国的力量对比与 40 年代两国的力量对比截然不同，中国的国力已大大增强。同样重要的是， 80 年代中国的掌舵人是 20 世纪的世界伟人邓小平，且真理和正义在中国方面。撒切尔夫人再有“ 铁女人 ”的本事，也无法同邓小平抗争。

经过谈判会场内外的反复较量,英国企图在 1997 年后在香港保持其统治的所有努力均告失败，最后终于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到了邓小平设定的轨道上去，与中国政府一起以“ 一国两制 ”的构想来解决香港前途问题。

[1] 《中国外交史 1911—1949》，第 556 页。

第十九章　谈判的春天终于到来

1984 年的春天来得很早。1 月的南国，鲜花盛开，翠绿满目；腊月的北国，也透出了缕缕春光。早来的春天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中英谈判的新气氛。

由于根本分歧已经解决，从 1984 年初开始，中英两国在邓小平“ 一国两制 ”原则和“ 十二条 ”的基础上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谈判。

相互合作已经成为会谈的主旋律，但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仍然存在，在若干问题上甚至出现了比较尖锐的争论和僵持。处理这些争议问题时，邓小平继续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指导中国代表抓大放小，善于妥协，因势利导，推动谈判不断前进。

合作基调下的争议

1984 年 1 月 25—26 日，中英举行了第八轮会谈。此时，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都换了新人：中方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后升任外交部副部长）接替姚广出任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恩接替柯利达出任代表团团长。

周南是位资深的外交家，他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 12 年，英语流利，外交经验甚丰。他的中国古典诗词功夫极好，佳句妙联脱口而出。此外，他也以豪饮贵州茅台而令人惊叹。这些经历、功底以至爱好，造就了周南独特的谈判风格，使他的对手既佩服又生怵。

接替柯利达的英国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文思也是一个“ 中国通 ”。　50 年代中期，这位当时很年轻的英国绅士来到中国，担任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参赞。从此，他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不断增进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伊文思还对邓小平产生了极大兴趣。兴趣是由邓小平 1956 年在党的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引起的。他为这个报告所深深吸引，并把它传递回英国。经过几十年的了解和研究，伊文思后来写出了一本书，题为《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的诞生》。这本书展示他对当代中国和邓小平的广泛深入的认识。

两位团长在会谈开始前都向记者表示，要在会谈中很好地合作。由于已经消除了英方设置的阻碍谈判的根本障碍，从这轮会谈开始，两国代表的确进行了较好的合作。

会谈从第八轮到 3 月底的第十一轮，每次一般是英方提交一至两份文件，然后用半小时至 50 分钟阐释文件的内容和含义，接下来是翻译。英方讲完后，周南对英国代表的建议作出评论，或者接着上次会议的文件发表意见。会谈第二天临近结束前，双方议定下次会谈的日期。

在这几轮会谈中，英方提交的文件与 1983 年 7 月至 8 月的前三轮会谈中使用的第一套文件非常相似，但在使用目的上又有实质区别。这些文件都是围绕香港如何运行、操作这个中心，分别介绍行政管理体制、司法制度、运输体制、经济管理制度等等。它们是由港英政府有关部门准备的。第一套文件所得出的结论，是要证明英国的管治对香港是多么必要。而第二套文件则根据恢复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和治权的原则，作出的相应的调整、改写。

尽管进入 1984 年以后中英会谈的基调是合作，但英方通过上述提交工作文件的方式，提出许多企图在香港最大限度地保留英国影响和使香港脱离北

京政府领导，甚至使香港成为某种独立政治实体的建议。中国代表团的对策是，对于英方提出的建议，凡符合或基本上符合“十二条”精神的，就予以肯定或基本肯定；凡违背“十二条”精神的，尤其违背主权原则的，就坚决驳回；凡属于应由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决定或必须在达成协议后在过渡期中由中英双方继续探讨解决的细节问题，先挂起来或只作原则的规定，留待以后解决。

在 1997 年后香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问题上，双方代表发生了争论。中国的立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要在中央政府直辖下实行高度自治。而英国则想把“直辖中央政府”几个字删去，把“高度自治”改成“最大程度自治权”。

乍看起来，英方似乎只为一个修饰词语而争。实际上，这里面大有玄机，反映了“铁娘子”的新谋略。谈判被纳入中国设定的轨道之后，撒切尔夫人把英方的谈判目标修订为“从现在起，我们必须集中精力于 1997 年后（香港的）自治和现存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保留问题之上”。她还决定，在谈判的每一关键时刻，都应该向香港人民的代表——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咨询。这是撒切尔夫人为实现使香港获得“最大程度自治”的目标的重要手段。她让行政局非官守议员间接参与中英谈判，同时让港英政府加速政制民主化改革，推动香港“民主自治”的进程。

争取 1997 年后香港的“最大程度的自治”，是英国深谋远虑的一招，旨在尽可能保持英国对香港的长远影响，只不过借助最大程度的自治，即借助特区政府最大程度地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响这个间接形式，以削弱乃至割断中央与香港的联系，使回归后的香港实际上变成某种独立的政治实体。

中方代表完全清楚英国在此问题上的目的，所以坚决地拒绝了“最大程度自治”之类的要求。英方无奈，只得退缩回去。

此外，中国政府主张中央政府管香港的外交，同时又给香港一定的权力，它可以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一些国际会议或组织（非政治性的，如经济、体育、文化等）。但英国不满足，在谈判中要求中央将来处理有关香港外交事务，首先要同香港特区政府磋商。也就是说，香港同意的中央才能做，不同意的就不能做，想让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在外交事务上有否决权。英方甚至想让香港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式的政府。

在谈判中，中国代表提出各国政府可以在未来的香港设领事馆，甚至总领事馆。然而英方代表在一次会议上竟提出，别国在香港设领事馆，我们英国在香港可以设高级专员公署。

对此，周南问伊文思，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才派这种公署，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难道要把 1997 年后的香港变成英联邦成员国或准成员国吗？你能找到任何例子说明在任何非英联邦国家里英国设高级专员公署吗？伊文思回答说也有，比如在某些国家设商务专员公署。周南说，商务专员与高级专员是两回事。最后，伊文思讲不出能说服人的道理，只好理亏地放弃这个要求。在这个问题上中英两国代表进行了两次争论，表面上看似乎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处理，实质上反映了英国仍欲管治香港的根深蒂固的思想。

在香港主要行政官员安排上也发生了争论。中国代表为贯彻“港人治港”的方针，主张主要行政官员如特区最高行政长官和重要的司级正职官员，都要由香港本地人来担任。陈云当时还在一个提交中央的报告中批示：警察署长也得是中国人。因为这是专政工具。其他无关紧要的部门或下边的机构，就可以让外国人充当雇员，甚至担任司级副职。

但是，英国代表得寸进尺。他们提出，你们说最高行政长官主要是中国人，我们不好反对。然而除此以外，别的职位都可以由英国人或其他外国人担任。

如果按照英方这种安排，就会把特区首长架空，变成孤家寡人，会形成名义上是港人治港，但实际上是英人治港或变相英人治港的局面。对这样的过分要求，中国谈判代表当然坚决予以驳回。

中英代表还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讨论。

其一是关于达成协议的期限问题。中国政府从谈判初期就强调 1984 年 9 月是最后期限。在第九轮会谈时，英方代表提出形成正式协议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草签协议；第二个阶段是正式签署协议（在正式签署之前，要公布协议，对协议进行讨论和辩论）；第三个阶段是批准和换文（在此之前，协议必须提交议会 40 天，以进行提问，执政党或反对党可以进行辩论）。

中国政府经过考虑，同意按照英方建议完成上述三个阶段的协议过程，但中方代表希望在 7 月完成协议草案。中国谈判代表团的一位主要成员李菊生当时说，我们希望会谈能在 7 月结束。香港人民急于知道结果。

中国政府之所以始终强调谈判不能超出 1984 年 9 月这个期限，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尽快形成协议，以增强港人及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二是防止英方采取拖延策略，使香港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英国与阿根廷从 1965 年起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了几十年的谈判（以至军事冲突），至今尚未最后解决；英国与西班牙关于直布罗陀主权的争端，经历长期谈判后，也未获得解决。香港问题作为历史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当然不会让它再长期拖延下去。

另一个细节，是关于最后达成的协议的形式问题。中方代表说，鉴于中英两国对主权问题仍有不同的立场，协议可以采取基辛格在中美关系和解初期建议的办法，双方作“ 平行的声明 ”：两国都表示支持中国关于 1997 年后的构想和政策，但并不要求英国赞同中国关于主权问题和 19 世纪条约的观点。

此外，中英双方还就协议内容的阐述方式进行了探讨。中方倾向于简洁明了，列出政策要点即可；而英方倾向于问题的阐述要详细，仅仅列出几条基本方针政策还不够，还须附上足够的具体规定和说明。在 3 月中旬的第十至十二轮会谈中，中方代表提出，协议的主体是“ 十二条 ”政策，前面要加一个关于主权的声明，后面附一个关于 1997 年前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的提议，中方还建议对“ 十二条 ”另加详细的补充说明。后来这一补充说明成为联合声明的附件一。

就在双方代表紧张地磋商香港前途问题的时候，会场之外发生了几件令中国政府很不愉快的事情。

1984 年 2 月 23 日，英国保守党议员迈克尔 · 布朗在国会提出：“ 中英政府任何有关香港前途的建议，除非采取适当步骤，保证已考虑了香港人对建议的接受，否则本院将不予认可。 ”

与英国国会议员相呼应，2 月 24 日，香港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罗保（葡萄牙人）拟提出一项动议：“ 任何有关香港前途之建议，在未达成最后协商前，必须在本局辩论。 ”当天下午，港英发言人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欢迎罗保提出的有关动议。3 月 14 日，立法局通过罗保的动议。同日，英国外交部

发言人对记者表示，香港立法局议员有权提出并且辩论任何他们认为是适当的问题。这位发言人还重申英国的立场：将来达成的协议不仅要为中国和英国议会所接受，而且要为香港人民所接受。发言人最后说：“探测香港民意的手段，尚待拟定。”

中国政府对英国和港英政府重弹“三脚凳”老调作出强烈反应，劝告英国和港英当局珍惜当前良好的谈判气氛和香港的稳定局面。香港报刊也纷纷加以批评。

另一件影响很大的是怡和迁册事件。 1984 年 3 月 28 日，英资怡和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西蒙·凯瑟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公司董事会建议在百慕大设立一家新的最终控股公司代替怡和，此建议将于 6 月召开的股东会上提交各股东通过。他解释说，怡和迁册的动机是，“面对香港的长远前途问题，令本集团处于不利位置”。

周南就此事质问英方代表。伊文思等辩解说，怡和声明迁册百慕大，与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没有关联，是一项纯粹商业性的决定，政府无权干涉。

尽管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中英谈判的主调仍然是积极的，英方继续沿着中国政府设定的轨道前进。

外相春季来访

为了尽快解决上述争议，推动谈判取得更大进展，英国政府在第九轮会谈以后，宣布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将在 4 月中旬访华。

杰弗里·豪虽然是撒切尔夫人的亲信，但与首相也有分歧。他很欣赏柯利达的谈判策略，即为了取得最好的结果，英国在香港问题谈判中需要做出重要的政治让步。不过，据柯利达说，这位外交大臣讲话时声音低沉，给听者造成明显的困难。

杰弗里·豪如期访华。4 月中旬的北京，春光明媚，鲜花烂漫。外交大臣的心情也格外好，他已打算与中国领导人展开良好合作，为谈判增添更多明亮动人的色调。

4 月 16 日，他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两次会谈。上午的会谈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如东西方关系和欧洲形势等，并就香港问题和其他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下午的会谈全面深入地就香港问题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讨论，双方阐述了各自的立场，估价了已经取得的进展，并且研究了为达成协议还需要做的工作。当天晚上，吴学谦在为豪外交大臣举行的宴会上说，早日达成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不仅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也有利于中英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杰弗里·豪表示，英中两国当前十分良好的关系使我认为，我们双方可以达成能维持香港稳定与繁荣的协议。[①]4 月 17 日，中国总理又与英国外交大臣举行了会谈。

4 月 18 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杰弗里·豪，豪向邓小平提出，1984 年 9 月只能作为协议草签的期限，而不是最后批准生效的时间，邓小平问，草签以后为什么不马上正式签字？豪回答，议会 9、 10 月份要休假， 11 月份才能复会，所以只能到年底以前签字。邓小平表示理解。双方于是确定在 1984 年 9 月底以前草签并公布协议，年底前正式签字。

[①] 《人民日报》1984 年 4 月 17 日。

邓小平还赞同英方关于在以“十二条”作为协议主体的前提下，把对1997年后的安排的具体说明作为附件放在后边，而且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豪又提出，不久以后应另外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协议的实际起草工作，使双方谈判代表能够集中精力继续磋商政策和原则问题。邓小平表示同意，他还保证，最后形成的文件将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关于1997年后中国在香港驻军问题上，邓小平强调，这是中国对香港主权的一种象征。杰弗里·豪表示，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权力，但他希望中国在行使这个权力之前作出慎重考虑。他担心当地驻军会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内部事务，损害“高度自治”，因此仍希望中方不在香港驻军。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关于1997年之前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问题，双方分歧更大。怡和宣布迁册百慕大，显然更使邓小平认为建立这个机构很有必要。他对英国外相说，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他告诫说，1997年之前，香港政府不要把财源搞尽，比如卖掉大量土地，或用光政府财政储备，或进行大规模巨大的建设项目等。邓小平表示，可以考虑这个机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杰弗里·豪表示同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

邓小平与英国外交大臣两小时的会谈，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中国新闻媒介的评价和介绍是，双方“就有关香港的重大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的见解。邓小平对杰弗里·豪说，我们已经多次宣布，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的现行制度50年不变。我们采取这一主张是同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联系起来考虑的。”[①]

第二天，杰弗里·豪抵达香港后，当即向行政局私下透露了北京会谈情况。晚上，他在总督府与尤德等高级官员商量第二天将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的声明内容以及对记者的提问作准备。

20日下午，豪在立法局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我认为我应该在这时告诉大家：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因此，英国集中力量去寻求能够确保香港的稳定、繁荣及生活方式得以延续的其他方法。有人认为英国“出卖”（香港）的想法是错误的。豪表示确信，中国领导人都想看到香港的制度在基本上维持现状。双方都抱着同一意愿，达成一项能够确保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协议。

杰弗里·豪指出：“我们距离协议还有一段路程，但事情已有长足的进展。”他还表示，在1997年前的13年内，英国政府要负责香港的管治，继续维持它的繁荣安定，“使1997年时的转变，尽可能带来最少的干扰”，届时英方不会把一个“烂摊子”交回中国。[②]

杰弗里·豪发表的这个声明，在香港引起了强烈反响，普遍认为大局已定，香港的前景真正“明确”起来了。大多数港人欢迎英国这一姿态，但少数“高贵的”港人却不甘心。

5月9日，由香港行政和立法两局9名非官守议员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启程访英。他们行前在启德机场发表《新闻公报》和《香港前途问题的声明》，

[①] 《人民日报》1984年4月19日。

[②] 《人民日报》1984年4月21日；香港政府新闻处，杰弗里·豪在香港答记者问中文稿，1984年4月20日。

说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会晤英国政府部长及国会议员，以便在下周国会辩论前，先行反映及明确表达香港人的意见和愿望。代表团亦将出席旁听辩论”。《声明》大谈香港与英国“宪法上的深厚联系”，说“这个联系，形成有效的隔离作用”，“能避免中国当权政府的干扰”。《声明》说，香港人“对于与英国的联系即将撤除”“觉得非常失望”。《声明》不顾中国政府一再宣布 1997 年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的事实，说“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仰和香港现时享有的各种自由与制度比较之下，即使不致于互相敌对，也是互不相容的”。“中国方面日后可能会借着协议与基本法有所抵触的理由，单方面不顾协议”。因此他们劝告英国不应“冒这个险去签订协议”，并要求英国“坚持在 1997 年后仍然保留若干程度上的地位，借以进一步保证协议的履行”[①]

内地和香港舆论都纷纷批评 9 人代表团的《声明》和赴英游说行为。新华社观察家评论说，这一《声明》不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报刊和知名人士指出，《声明》“是与香港大多数人的意愿相违背的”。

9 人代表团赴英后的游说也很不成功。前港督麦理浩与他们会晤时，指出其《声明》是“不明智和不合时宜”的。前首相希思敦促政府不要理这些游说者，因为他们“并不代表香港人民的观点”。保守党和工党议员在议会里对他们亦非常冷淡。英国国会香港事务小组主席布时克说，这些非官守议员对香港前途的看法太悲观，似乎英国国会议员比他们更有信心。[②]撒切尔政府既然已作出公开声明，当然不为非官守议员们的游说所动。因此，9 人访英团碰壁而归。

在北京的春天里，尽管间或刮起一股冷风，掀起阵阵尘沙，但满园春色是谁也关不住的。春华秋实，　1984 年注定要迎来一个硕果累累的秋天！

---

① 《人民日报》1984 年 5 月 12 日。

② 《人民日报》1984 年 5 月 15 日。

第二十章　未雨绸缪

英国外交大臣 19S4 年 4 月对北京的访问，对中英谈判完成第一个议程——关于 1997 年以后对香港的安排起了积极的作用。从 4 月中旬举行的第十二轮会谈起，谈判主题转入新的议程，即过渡时期的安排及有关政权交接的设想。

防混乱邓小平再谋良策

邓小平一直对香港过渡期问题存有忧虑。早在 1982 年 9 月与撒切尔夫人谈话时，他就坦率他说：“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①]此后英国在主权、治权等问题上不断设障，特别是在 1983 年的 8、9 两月大打三张牌，把香港搅得天昏地暗，使邓小平对香港过渡期问题更加重视，他怕英国利用这十几年管治香港的机会，继续制造麻烦。他决定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或减轻这种可能性。

在 1984 年 2 月下旬举行第九轮会谈时，中方在提交的文件里，除了主要规定 1997 年以后的安排外，还涉及 1997 年以前的香港管理问题。令英方尤其不安的是，中方代表提出了在香港过渡期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的建议。所要监督的是公务员的任命、财政金融政策、土地拍卖和政制发展等。

设立这个组织，是邓小平的主张。他主要出于担心英国在过渡期内可能会搞点名堂，所以提出在香港回归祖国前的 13 年过渡期内，双方通过这个专门小组就有关执行协议的问题进行联络和磋商，处理可能发生的事情。胡耀邦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说过，英国人过去撤出殖民地的纪录太差。香港回归还有十多年的过渡期，他们会不会不负责任，做些小平同志说的“拆烂”的事？还是要防范它一手。设联合联络小组，主要考虑是这样，当然，还有些事可能需要两国商量解决。这对两国都有好处。

港英怕当“跛脚鸭”

中方关于设立联络委员会的建议提出后，遭到了英方的坚决反对。港英政府不愿意当“跛脚鸭”[①]，害怕在 1997 年前联络小组会成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甚至凌驾于港英政府之上的权力组织。

撒切尔夫人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英方在谈判后期遇到的唯一最困难的问题，就是中方提出建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我所担心的是，这个机构会变成并列于总督的第二权力中心。更糟糕的是，它会造成某种英中‘共管’的印象，以至于摧毁人们的信心”。

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关注的焦点，是中英联合机构的性质、功能及其驻在地等。4 月中旬杰弗里·豪访华时，曾与邓小平商谈这一问题。邓小平对豪说，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他还表示，可以考虑联合机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和伦敦三地开会。外交大臣当时答应，英方将在邓小平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但是，在此后几个月的会谈中，英方坚持己见，使谈判无法进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4 页。

[①] 这是个美国俗语。新总统当选而旧总统尚未卸任时，旧总统实际上已难有所作为，被称为“跛脚鸭”。

为了打破僵局，英方考虑派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次访华。1984 年 7 月 4 日，撒切尔夫人召回尤德和伊文思，在唐宁街开会研究外交大臣访华事宜。

尤德汇报了香港行政局的看法：杰弗里·豪不应该去北京。因为英国已作出足够的让步，如再去北京，必然会作出更多让步，这样不行。英国应该拒绝邓小平关于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宁肯使谈判濒于破裂。柯利达反对尤德的行政局的意见。他认为，如果豪不尽快赴京打破会谈僵局，那就不可能在 9 月之前达成协议。因此，柯利达认为豪访华是正确的步骤，但同时要发表一个声明，说明只有在条件妥善的情况下，英国才会签署香港问题的协议。

撒切尔夫人采纳了柯利达的建议。英国外交部随后把英外交大臣将要访华的信息传递给中国政府，中方表示同意，并将其访华日期定在 7 月 27—31 日。

为了进一步说服香港行政局议员，为豪再次访问北京作准备，英国外交部助理次官卢斯 7 月 12 日飞抵香港。

在行政局会议上，卢斯说，英国政府认为，为防止中国单方面宣布对香港前途的构想，某种形式的协议必须在 9 月达成。为此，宁肯再作出一些让步，甚至在设立联合委员会问题上作出妥协。卢斯劝行政局赞同这种让步，并准备接受最终达成的协议，因为不管它有何种缺点，但这在目前情况下可能是最好的协议。

行政局议员不再反对豪访华和作出更多让步，但主张联合委员会不能削弱 1997 年前香港政府的权威。他们建议采取各种方法来降低其影响：如推迟到 1990 年再成立；使之成为临时组织，而非常设机构，他们还建议英方谋求中国同意让这个机构在 1997 年后继续存在。豪 7 月底访华时，运用了行政局议员提出的策略。

杰弗里·豪访华之前，英国外交部向中国发出了一些公开的信号。豪曾书面回答议会提问，透露英国在草签协议后立即发表中英协议白皮书的计划。他还排除了在香港就协议举行全民公决的可能性。

7 月 18 日，杰弗里·豪在伦敦宣布，协议的“可接受性”将由在香港成立的民意估评处检测。此机构负责整理及评价香港市民对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协议的意见，并编制报告韦公布。同时，又派出一个独立小组，监察该估评处的工作。

英国一些报纸对豪访华的结果和内容也作了预测和评论。《金融时报》7 月 20 日文章称，外交部 19 日透露，英中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仍然是北京不愿意形成一个详细的协议；外交大臣访问北京要解决的主要议题，是有关中英联合委员会问题。

到达北京之前，豪与柯利达、安东尼·高斯沃西四易其稿，才最后拟就关于中英联合委员会的英方设想文件。文件开头称，联合委员会不是“一个权力机构”，而是一个“联络机构”。7 月 26 日晚，外交大臣一行在香港与行政局成员开会，对访华事宜和准备的方案作了最后商讨。

邓小平与杰弗里·豪谈过渡期问题

7 月 27 日下午，杰弗里·豪到达北京。第二天，外交部长吴学谦与豪举行会谈。在上午的会谈中，双方商讨了协议文本、联合委员会等问题。

这天中午，英方接到周南的一个提议。他对柯利达和高斯沃西说，中国

认为香港问题谈判已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中方将作出最后的重要决定。为与英方在 9 月达成协议，中国准备对主要争议问题作出妥协特别准备接受英方关于限制联合委员会的权力和地位等多数要求。但如果英国外交大臣不准备在此时此地利用这个机会，那么中国就会撤回妥协的考虑，谈判将实际上结束了。

在钓鱼台国宾馆，英方紧急研究周南这个突如其来的提议。柯利达认为，这个提议是郑重的，它提供了英国所能希望的最好条件。当豪继续同吴学谦会谈后，柯利达回到英国驻华大使馆，起草发给撒切尔夫人的电报，说明了周南的提议，建议她授权豪以此为基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傍晚，当吴学谦在钓鱼台为豪举行宴会时，首相复电到达，同意按柯利达的意见办，让豪全权处理，以取得最好的结果。

7 月 29 日上午，吴学谦与杰弗里·豪继续会谈。在联合委员会问题上，吴学谦采纳了英方提出的多数意见，将其易名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明确规定它是“一个联络机构，并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它应在 2000 年 1 月 1 日之前结束工作（撒切尔夫人当时写信给中国总理，坚持联合联络小组应该跨越 1997 年，以便在香港政权移交之后继续发挥维护人们信心的作用）；它于 1988 年开始设立，并轮流在香港、伦敦、北京举行会议。

当天下午，伊文思和周南及其他谈判代表团成员举行会议，磋商协议文本，商定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事宜等。魏德巍和弗雷德·布柔斯与周南讨论协议主体部分的措词，一直到晚饭时才结束。

7 月 30 日上午，中国总理会见杰弗里·豪，并对豪于会谈关键时刻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外交大臣这次访问同 4 月的访问一样，都给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提供了新的动力。两人在会谈中主要商定 29 日拟就的协议草案，协议主体对“十二条”方针政策的规定以及将来以基本法体现这些政策的提议；关于英方继续管治香港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在此期间中方予以协助的规定；关于协议及其附件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问题，等等。至于土地问题、协议的批准、国籍等较为复杂的问题，留待以后继续磋商解决。

第二天上午，刚从北戴河休养返回北京的邓小平会见了杰弗里·豪，他为几天会谈取得的巨大进展感到高兴。会见开始前，他对中外记者说，豪外交大臣同中国领导人谈得很好，效果也很好，值得祝贺。他还向豪展示自己晒黑了的皮肤，风趣他说，你看我都变成了非洲人了。

会谈中，邓小平表示赞同已经达成的重要协议。他还重点谈了对 13 年香港过渡时期的担心和对英国的希望。他说：“坦率地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十三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一九九七年后的事情。”[①]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希望香港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

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7 页。

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

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②]

.邓小平还指出：虽然“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③]

英国外交大臣向邓小平表示，英国政府愿意与中方合作，以保证香港在今后 13 年里继续繁荣和稳定。

邓小平与杰弗里，豪的会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邓小平表示信任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希望撒切尔夫人来北京正式签字，并希望英国女王访华。他还对陪同豪参加会见的英方阵容颇感兴感，并开玩笑说，我被王国的这么多爵士包围了。豪回应，中英会谈如果没有周南，就会像“没有茅台酒的宴会”。

周南在会谈后陪送客人去飞机场，他吟咏了宋代诗人陆游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诗句含蓄地点明了中英谈判业已取得的重大进展。

7 月 31 日下午，杰弗里·豪离京飞往香港。8 月 1 日，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英双方在达成有关文件的形式和内容的一致意见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这些文件将会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清楚和明确地列出对香港前途的各项安排。他详细介绍了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尚在继续商谈的问题，如土地、民航和国籍等，同一天，中英双方公布了成立联合联络小组的协议。

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访华活动，对推动谈判起了积极作用，中国领导人对豪作了高度评价，撒切尔夫人也对他大加夸赞。她说，“虽然我们对谈判的可能结局有时发生争吵，但杰弗里总是善于推动谈判的实际进程”，他与柯利达等 4 月和 7 月的两次访华，“成功地达成了在联合联络小组问题上的妥协”；他经过“耐心的会谈，最后保证了协议的达成”，“使我们重新获得中国人的信任，因而为我返回北京签署联合声明铺平了道路”。

的确如此，杰弗里·豪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直接对话，双方从大局出发，互谅互让，保证了香港问题谈判的成功，为中英关系全面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契机。

杰弗里·豪与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取得了重大成就，双方就联合声明的文本和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问题基本达成了协议，谈判取得了突破。7 月 31 日的《人民日报》对此评论说，会谈取得突破的原因是，双方都发扬了以大局为重、以长远利益为重、以友谊为重、互谅互让的合作精神。评论还说，希望双方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使之成为中英关系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从而使中英关系进一步全面发展，并出现新的高潮。

从 1984 年上半年至 1989 年初夏，或者说在香港前过渡期里，以大局为重、互谅互让的合作精神成了中英关系的主旋律，维多利亚港湾风平浪静。然而，邓小平对英国人的担心却在香港后过渡期得到了应验。这也没有什么。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7—6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8 页。

总设计师与第三代领导人一道，处惊不变，应付裕如，经受了重重考验。

第二十一章 “五十年不变，不是随随便便的感情冲动”

在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不明朗时，港人最担心的是将来出台的政策好不好。然而，随着中国对港政策在中英谈判过程中不断披露，日益受到各方的欢迎，并且即将形成中英协议时，人们的担心又转为怕“变”。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实际上，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对中国政府执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时常流露出怕“变”的情绪。

邓小平针对不少港人经常流露的怕“变”心理，苦口婆心地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邓小平对香港知名人士说，“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1984 年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由北京赶到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他郑重宣告：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 1997 年以后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

这一声明打碎了某些人希望将来香港仍由英国管治的幻想。但是，不少香港人对将来英国管治结束后，香港人能否自己管理好香港，中国政府会不会信守诺言，归根结底，香港还能不能继续繁荣和稳定，十分担心和怀疑。5 月份，有几位香港知名人士发表题为《香港的前途》的声明，大谈香港与英国“宪法上的深厚联系”，说香港人一对于与英国的联系即将撤除”，“觉得非常失望”。声明还要求英国在 1997 年后还应在香港保留一定的地位。

针对一些香港人的悲观情绪及怀疑心理和言行，邓小平亲自作了耐心诚恳的说服工作，以打消他们的疑虑，建立起坚强的信心。

6 月 22 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以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总商会主席唐骥千和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倪少杰为首的香港工商访问团。他告诉香港客人，中国政府已多次讲过，收回香港后，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他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两个传统：第一是不信邪，在世界的大风大浪面前稳如泰山，对什么样的风浪也不害怕；第二是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这一点也是被世界公认的。因此，不必担心将来政策会变，只要政策对就不会变。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6 月 23 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邓莲如和利国伟。钟士元是香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他们想反映自己及其他港人中存在的一些疑虑，如中国未来的政策会不会变，英国人走后港人能否治理好香港等问题。

邓小平对他们说，“欢迎你们以个人身份到北京”，“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北京、了解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一下中华民族是有好处的。”他强调，“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 500 万香港人的利益的。”他还有针对性地说：“我听到好多不同意见，但我不承认那个是代表香港人的利益。”“香港真正的民意我们是知道的。”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邓小平重申：“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

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针对他们提出对港人能否治理好香港的疑虑，邓小平说：“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于出来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他还谈到，“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最后对客人说：“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三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为此作出努力。”[①]邓小平的谈话亲切倍至，论证非常严密，极富感染力，使原先执有偏见的香港人士也不得不为之所动。

邓小平与港澳国庆观礼团同胞一席谈

经过两年无数的风风雨雨，中英谈判的帷幕终于落下。 1984 年 9 月 26 日上午 10 点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两国谈判代表团举行了庄严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

中英联合声明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部杰作。它一问世，就博得了广泛而高度的赞誉。

国内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欢迎中英联合声明。

香港各界人士对这个协议的反应更热烈。

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感慨他说，回想起邓小平主任曾让麦理浩爵士带给香港人一个口信，说“请投资者放心”，当时还不甚理解，如今看了协议，很多人都放心了，对香港有了信心。展望前景，香港大有可为。

一位曾经对谈判有过一些非议的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代表全体非官守议员发表声明，认为协议内容“比许多人所期望的好得多”，全港人“对香港前途重获信心”，并能“继续维持香港繁荣和稳定”。

然而，正因为体现“一国两制”原则的联合声明太好了，所以人们更怕它有朝一日被抛弃。这种担心似乎有一些“根据”。目前在几百万港人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自 1949 年以来陆续从内地跑到香港居住的,他们对过去几十年中的“左”病是心有余悸的。

总之，港人怕变。中国政府透露未来对港“一国两制”政策之前，他们怕 1997 年以后“舞不能跳”，“股不能炒”，“马不能跑”；得悉中国的政策之后特别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他们怕在将来“煮熟了的鸭子”又会飞走。

有人断言，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谁实行过“一国两制”，没有先例的事情是靠不住的。

邓小平非常理解这种怕“变”心理，所以他继续利用各种机会向大家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8—61 页。

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几天后，北京举行了规模空前盛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5 周年庆典。香港各界的大批人士满怀喜悦地来到北京，参加国庆大典活动。

10 月 3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的全体成员。他十分欣喜他说：“ 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 ”[①]在谈话中，他再次表示，他愿意活到 1997 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接下来，邓小平又谈起观礼代表们最关心的中国对香港政策（也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 变 ”的问题。他笑着对大家说：“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 ”[①]

说到刚刚草签的中英联合声明，邓小平坚定地表示：“ 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肯定是不会变的。我们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过去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不是我们这一代才有的。 ”[②]

说话算数，信守若言，正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风度。中国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讲究取信于民。孔子说：“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意思是说，治理一个国家，务必谨慎政事而取信于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民族的优良传统，历来守信用。1949 年确定了维持香港现状的政策后，中共中央就始终不渝地加以执行，即使在“ 文化大革命 ”时期极左思潮盛行之时，也不例外。

因此，邓小平告诉观礼团代表们：“ 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 ”[③]

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从前的世界远不同于现在的世界。人是从猿变来的。但是，一般来讲，事物是越变越好，不会向坏的方向去变。这就意味着好的东西得到保留，差的、不合理的东西被淘汰。这就是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

邓小平是辩证法大师，谈到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时也透彻地论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他对在座的同胞说：“ 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他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 ”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 ”[①]邓小平还提醒大家说，尽管中国政府相信自己、英国人和香港同胞会遵守中英联合声明，“ 但是应该想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2 页。

①

②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2—76 页。

①

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他又提出：“要说变，人们议论的总是北京方面政策会不会变，没有想到其他方面会不会发生变。”他坚定地表示：“只要香港同胞团结起来，选择好的政治人物来管理香港，就不怕变，就可以防止乱。即使发生乱，也不会大，也容易解决。”[②]最后，邓小平向观礼团的同胞们说，协议签订后会遇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他但言：“将来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也不清楚，但问题出现了我们会合情合理地处理。”[③]他衷心希望在座的同胞们根据这些意见，回去后向香港各行各业500万人做点解释工作。参加国庆观礼的香港同胞对邓小平的一席肺腑之言，感到既亲切又信服。回到香港后，他们又向其他同胞宣传了邓小平的这些观点。

邓小平对英国首相说：“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1984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在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陪同下，应邀来北京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英国首相这次来访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渡过的。艰巨的谈判已经结束。撒切尔夫人看到，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在作出某些保留的情况下支持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撒切尔夫人把来京签署协议的主要目的，看作促进中方对英国在过渡期管治的信任和执行《联合声明》的责任感。

第二天上午，撒切尔夫人与中国总理进行了大约二个半小时的会谈，主要围绕过渡期问题。中方阐述了中国保持香港繁荣与稳定的原则及其具体措施。撒切尔夫人谈到基本法的起草，要求基本法必须适应资本主义制度，与香港法律制度一致。全国人大将制定体现中英协议精神、符合香港人民愿望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在起草这项基本法过程中将广泛征求香港广大人民的意见。她还提及更敏感的香港代议政制发展问题，主张用温和的方式加强民主化和自治。中国总理说，中国政府不打算在过渡时期代议政制发展问题上作任何评论。原则上，中国也想让港人更多地参与管理，但这个过程不能损害稳定和繁荣及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

19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撒切尔夫人。胡耀邦说：《联合声明》是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主要是首相阁下和我们的邓小平同志共同建造的，你的同事们和我们中央的其他同志是这项伟大事业的热情赞同者。[①]

同天下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时说，香港问题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友好一片光明。

撒切尔夫人完全赞同邓小平这一评价。她说，回顾我两年多以前初次在这里同您见面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双方的了解也加深了。她特别赞扬了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富天才的创造。

她接着问，为什么“一国两制”政策要保持50年不变呢？邓小平回答说，

[②]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2—76页。

[①] 《人民日报》1984年12月20日。

之所以在 1997 年后还要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 50 年不变，其根据是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和要在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他接着讲，所以中国政府承诺“ 五十年不变 ”，“ 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 ”“ 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 ”至于在 21 世纪后 50 年中国对港政策变不变,总设计师也给予了十分的肯定。但是，邓小平同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 50 年间会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在小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在十亿人口的主体发展社会主义。撒切尔首相感到，邓小平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谈保持香港制度不变和繁荣稳定，确实是可信的，是现实主义的。[①]

邓小平还对英国首相说：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 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②]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5 时 30 分，中英两国最高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仪式。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代表各自政府在《联合声明》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互相交换了文本。

550 万香港市民、 10 亿中国人和全球无数双眼睛，从卫星转播的电视荧光屏上，观看到中英关系发展史上这闪光的一页。蒙在：东方明珠 ” 上面的尘垢，终于被冲洗干净。

与中国领导人一起签署完声明后，撒切尔夫人又赴香港。她欣慰地对港人宣告：“ 经过两年谈判而达成的协议，包括了你们所要求的一切。 ”

1984 年 12 月 21 日的香港《明报》就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发表一篇社评，题为《两位决策人有大功》。文章对两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英国各界也热烈拥护联合声明。最大的反对党工党明确支持政府同中国签署这个协议。英国舆论以大量篇幅报道和评论联合声明及其签署，认为这是一项有远见的协定，它为长期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当然，中英联合声明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两国的范围，在全球引起了良好的反响。许多国家和地区在香港有投资和贸易利益，所以非常关心香港的前途命运。现在他们对摆在面前的协议十分满意，认为它既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又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是一个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文件。

中外各界人士的一致称许，充分表明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联合声明里写进的政策是正确的。

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说：“ 在香港生活中，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 ”香港的未来完全明朗： 1997 年 7 月 1 日将回归祖国怀抱，1997 年后将长期保持现行制度，由港人治港。香港人民欢迎这个前景。 12 月 20 日，恒生指数上升到 1187．54 点，成为当年的新高潮。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解决了中英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重

[①] 《人民日报》，1984 年 12 月 20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1—10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2 页。

大问题，给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推动力。中国领导人应邀于1985年访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接受访华邀请，表明两国政治关系将出现高潮。中英经济技术合作、贸易关系和文化关系也将掀起新的发展热浪。

中英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也在全世界引起了积极热烈的反响。世界舆论认为，这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好典范。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认为：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该大力提倡，这恰恰是我们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

对于中国来说，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不仅排除了影响中英关系发展的历史障碍、有利于两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一步合作，而且是实现统一大业的一个巨大胜利。邓小平在协议草签后说，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现在已经走了重要的一步。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他告诉参加国庆观礼的港澳同胞，1997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但是在行动上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有一个外国人问他，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邓小平回答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在解决台湾问题方式上，中国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始终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图谋的。“这是一种战略考虑”。邓小平还指出，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如果用于台湾，将对大家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解决了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香港问题的谈判解决，更为中葡两国顺利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榜样。总之，中国在解决香港问题上取得了意义远远超出问题本身的全局性战略胜利。

对于英国来说，《中英联合声明》尽管维护了它的面子，使它在香港1997年前的统治和1997年后的经济利益得到了保证，但是，如同撒切尔夫人后来承认的那样，这个“协议不是也不可能是（英国的）胜利，因为与我们打交道的是一个不妥协的、力量上占据压倒优势的大国。”她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与阿根廷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而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世界一流强国，迅速沦为二流强国。因此，虽然撒切尔夫人同抗战前后的丘吉尔一样，要竭力维护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但结果却截然不同。丘吉尔政府凭借当时尚存的大英帝国的余威，用威逼欺诈的手段迫使刚被捧起来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放弃收回香港的努力，而且让后者丢尽面子。而撒切尔夫人在谈判开始时很强硬，想进攻，让中方按她设想的轨道走，但邓小平态度更加强硬。英方只好步步为营，实在没有办法时才退一步。两年谈判有一年多是拖在香港归属和主权问题上，最后半年多英国才进入中国设定的轨道。

邓小平在协议草签后不久讲到谈判成功的原因时精辟地指出：“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中国的形象变了，国内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①

第二十二章　指导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1985 年 2 月 7 日，英国国会下议院三读通过《香港法案》。这个法案规定：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英国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即告结束。3 月 28 日，英国上议院又三读通过《香港法案》。4 月 7 日，英国女王在这个法案上签字，遂使之成为一项法律。4 月 10 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批准了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及其三个附件。5 月 27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各自代表本国政府交换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其三个附件的批准书，并签署了互换批准书的证书。从此以后，香港进入了过渡时期。

进入过渡期以后，中国在香港问题上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可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一历史性文件，将把体现“ 一国两制 ”方针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及“ 五十年不变 ”的承诺，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保中国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具有最大程度上的权威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为未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成功管理，提供完整的规范和依据，增强“ 港人冶港 ”的信心，保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基本法具有高度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首先因为它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属于地位仅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法律；更重要的是，它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的最高法律，其他一切制度、政策和法律，均以它为立法基础，不得与之相抵触。

从 1985 年 7 月至 1990 年 2 月，经过 4 年零 8 个月的辛勤劳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完成了。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自始至终给予关怀，做了重要的原则性指导。

“ 基本法宜粗不宜细 ”

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中国政府开始研究如何组织起草香港基本法。首先是如何组成起草班子，要不要港人直接参与？中国领导层和有关部门经过研究，决定邀请港人代表参加起草班子。1985 年 4 月 10 日，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通过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由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各方面的人士和专家组成。具体名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公布。

1985 年 6 月 18 日，全国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11 次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规定该委员会由 59 人组成，其中内地委员 36 人，香港委员 23 人。

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十分重视港人参加起草基本法。在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前，彭真委员长亲自向各委员颁发聘书，仪式空前隆重。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筹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于 1985 年 12 月 18 日在港正式成立。姬鹏飞以草委会主任身份，在会上作了讲话。咨委会成员共 180 名，包括了工商、金融、地产、司法、专业、教育、传媒、劳工、公务员、政见团体、学生、社会服务、街坊、社区、宗教等各界代表人士及少数外籍人士，安子介在《关于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经过的报告》中称它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具规模和代表性的咨询组织”。

香港基本法的起草班子和咨询组织建立起来后，基本法就真正进入了起草阶段。基本法起草工作的首要原则是什么呢？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基本法不宜大细。宜粗不宜细，原则一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正是按照他的这一原则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议进行的。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是以内地为主、吸引广大港人参与的方式运作的。由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中国的内政，因此理论上英国是不得参与的。但是，从某些实际需要考虑，中国政府并没有排斥英国对基本法起草工作的间接参与。英国政府实际上始终参与了这项工作，主要通过外交途径——两国外交部和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多数问题，他们在北京接触；部分问题，他们与新华社香港分社沟通。港英政府通过草委会的香港委员了解情况，他们不仅找任职于港府的人士，有几位没有政府职位的，也经常被找去询问会议情况。

基本法起草过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85 年 7 月 1 日草委会第一次全会到 1986 年 4 月，确定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整体规划和基本法的结构等。在草委会第一次全会上，决定把基本法起草工作分五步走，即半年规划；两年写出第一个草案讨论稿；再用一年左右讨论修订，写出第二个草案讨论稿；然后再广泛征询各方面和香港各界同胞的意见，修订完成最后一稿； 1990 年上半年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并颁布。从这个设想来看，基本法的起草是非常周密，也是十分民主的。

1985 年下半年，草委会和有关部门集中力量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询香港各界同胞对基本法的设想和建议，在此基础上研究基本法应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划分专题，为下一步进行具体起草工作奠定基础。

第二年 4 月 18—22 日，草委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三个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结构（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起草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关于设立专题小组的决定》。基本法结构（草案）包括一个序言和 10 章正式条文内容。草委会工作规则计 8 条，分别就全体会议、主任委员会、专题小组和秘书处的工作程序。对委员的权利和义务等，分别做了规定。第三个文件规定草委会下设 5 个专题小组，即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专题小组（包括特别行政区对外事务、基本法的法律地位和解释、修改）；政治体制专题小组；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专题小组；经济专题小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专题小组（包括区旗、区徽）。专题小组的任务是对草委会交办的有关基本法的专题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报告和方案。这三个文件的通过，标志着基本法起草第一阶段工作的完成。

第二阶段，从 1986 年 5 月至 1988 年 4 月，用了两年时间按照大纲起草出基本法草案第一稿。两年内，开了 5 次全体会议，5 个专题小组开了几十

次会。部分内地起草委员会委员第五次全会时，基本法序言和各章条文草稿已大体拟出并经过数次讨论修改。因此，会议责成秘书处将经各专题小组修改后的各章条文草稿汇编起来，提交下一次全会讨论。这次会议期间，主任委员开会，决定成立基本法总体工作小组，负责对基本法各章条文草稿进行总体上的调整和修改。总体工作小组由包玉刚和胡绳两位副主任委员主持，参加者为各专题小组负责人和正、副秘书长。

经过 3 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年底在广州召开草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讨论已经形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各专题小组拟订的各章条文草稿汇编》。会后，各专题小组对条文草稿做了进一步修改，然后由总体工作小组对全部条文草稿从整体上进行调整和修改。1988 年 4 月底，草委会在北京召开第七次全会。会议听取了总体工作小组的工作报告，并对它提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在香港和全国其他地区广泛征询意见，确定其期限为 5 个月，即自 1988 年 5 月至 9 月。

第三阶段，广泛征求意见，修订基本法（草案）第一稿。

草委会第七次全会后，内地委员应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邀请，分两批到香港，同香港委员一起听取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部分内地委员还分赴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省市，征求了内地各方面人士的意见。

在 5 个月的咨询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踊跃发表看法。据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统计，该会秘书处在 5 个月内收到香港市民个人或社会团体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的意见共有 73　000 多件。咨委会秘书处按来源和性质分类，将这些意见编号登记，并根据各章专题，进行综合整理编成咨询报告，送交基本法草委会参考。内地各方面人士也对基本法草案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建议。

1988 年 11 月中下旬，各专题小组在认真研究各种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一系列重要修改。　12 月上旬，主任委员扩大会议审议了各专题小组的修改意见。第二年 1 月 9—15 日，草委会第八次全会在广州举行。委员们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修改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对该稿提出了 58 个修改案，其中 12 个提案获得了 2/3 多数赞成，被纳入该稿。最后，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条文和附件逐一表决。除第 19 条外，所有条文和附件均以 2/3 多数票通过。会议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区徽图案作了评选，但没有一件图案获得出席会议委员的多数通过。于是，主任委员会议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给区旗区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再做研究。

第四阶段，再次广泛征求意见，修订基本法草案。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1989 年 2 月 21 日举行第六次会议，决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同时宣布在香港和全国其他地区广泛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期限为公布之日起至 1989 年 7 月底。但由于这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这次征求意见活动受到妨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将征求意见期限延长到当年 10 月底。

1989 年底至 1990 年 2 月中旬，从各专题小组会（1989 年 12 月）、主任委员扩大会（1990 年 1 月下旬）到草委会第九次全会，在研究广泛征向来的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讨论和通过了基本法草案和区旗、区徽图案草案等。

最后一个阶段，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和颁布香港特别行政策基本法。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990 年 2 月 23 日审议通过了基本法草案。当年

4 月 4 日，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全文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国家主席杨尚昆同日下令颁布基本法。

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还通过了若干决定。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怯的决定。它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它还明确指出，基本法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2.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它规定，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其区域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以及所辖的岛屿和附近海域。3.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4，关于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关于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建议的决定。

至此，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全部完成。在将近 5 年的起草过程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先后举行了 9 次全体会议、两次主任委员扩大会议、3 次总体工作小组会议、 73 次专题小组会议，并两次在香港和内地进行大规模征求意见活动。咨委会在收集和反映港人的意见方面，作了大量工作，除了在两次全面征询意见期间收集整理了港人大量意见外，在其他阶段也活动频繁。还不断去北京反映情况。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在港中资机构，都通过个人、社团以及各方面的接触，收集了许多港人意见。党和国家领导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港澳办在会见港澳各界人士时，也都听取了不少意见。所有这些意见，绝大多数获得重视，在草委会上被反复研究讨论。

“香港应有适合自己特点的模式”

对于未来香港的制度模式以及如何建立这种模式，邓小平都有自己的基本思路。1987 年 4 月 16 日，他在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时，就“一国”与“两制”、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限划分、香港政治制度的模式和发展速度、基本法的内涵与要旨等重大问题，均作了精辟阐述。

邓小平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起草工作还有三年时间，要把它搞得非常妥当。”[①]

在阐述了这部法律的重要性之后，邓小平又说：“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大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这了一个半世纪了。”[②]

小平的这些话，言下之意人们不难理解。他讲的虽然是香港现行制度，但又提醒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起草基本法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

接着，小平又对自己的上述观点加以引申。他说：“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他分析说：“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1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0 页。

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①]。

小平的话既结合中国国情，又联系香港未来，人情人理。这是听者的感受，讲者并未意尽。

邓小平又说：“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惧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②]

人们听到这里，已经明白小平是在告诉大家，基本法的起草与制定一定要从香港实际出发。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之后，香港成立特区政府，特区政府是地方政府，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呢？中央要不要管特区的事呢？这也是基本法必须着重阐述的内容，也是港人极为关心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这中间有好心人，更有些是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邓小平对此十分关心，他在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时，针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而又循循善诱的阐释。

他说：“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①]

说到这里，小平要大家“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②]

说完香港一头后，小平接着又说中央一头。他说：“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③]

为了具体说明自己的观点，小平还给听讲的人举起实际例子来，他说：“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0—221 页。

[①]

[②]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1 页。

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①]

邓小平对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讲了这么多话，确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最后，他还语重心长他说：“总的来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②]

总之，邓小平关于未来香港制度模式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第一，香港制度不宜全盘西化，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不赞成搞“三权分立”。第二，不赞成立即实行普选，即使搞普选，也要逐步过渡，一步一步来。第三，对特别行政区，中央要管一点。中央不去也不需要干预香港的具体事务，也允许“九七”后香港有人骂中国，骂共产党。但是，如果变成行动，把香港变成打着民主幌子反对内地的基地，那么中央政府就非干预不可。怎样干预？首先是香港特区政府干预，不一定要动用中国驻军，只有出现动乱，驻军才会出动。

邓小平的上述看法，成为中方起草基本法时遵循的原则。

然而，发扬民主的过程，就是让各方面、各阶层的人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过程。由于人们具有各种各样的立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产生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意见，进行各种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在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内地委员与香港委员之间，内地委员之间，香港委员之间，内地各方面人士中，香港各界人士和传媒中，甚至在英国政府、议会和传媒方面，都进行了不少争论。各种不同意见和争论，最后都归到草委会那里，经过草委会不同层次会议的讨论、争论、妥协、合作，最后获得解决，反映到基本法里。

一般来讲，比较单一、合理的议题，草委会就容易接受和通过，比如，在讨论“新界”原居民的土地继承权问题时，由于只涉及“新界”居民，同其他方面没有冲突，所以很快就通过了，反映在基本法第 40 条中。又如，关于宗教界顾虑宗教财产的使用、继承和接受资助等问题，因为较少牵动其他方面的利益，也被草委会很快确定下来。

那些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议题，就产生了矛盾的意见，导致了大的争论。例如，对于港人自治问题、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彼此关系如何界定、尤其是政制改革问题，等等，内地委员与香港委员之间、港人之间，都爆发了很大的争论。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当时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先易后难：先把容易的、争议少的问题定下来，以便打下基本法的部分基础，然后再集中精力来考虑和解决比较困难的、争论大的问题，从而使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1—222 页。

1990 年 4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三个附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

基本法的内容包括序言和正文共九章，160 条。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四章政治体制，第五章经济，第六章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工和社会服务，第七章对外事务，第八章本法律的解释和修改，第九章附则。

基本法首先对回归后的香港现行社会制度作了明确规定。在第一章第 5 条中这样写道：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其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是港人最为关心的。

香港的一家报纸这样写道：基本法规定了“保护私有财产所有权”，这就从根本上保护了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

基本法公布后，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讲话，称赞这部法律。他们说，基本法从财政、金融、贸易各方面对维护和保持香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具体而详尽的规定，为香港的持续繁荣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经济环境，从根本上保证了香港经济的运作方式，这就使港人相信，香港将会保持和发展其无比的活力。

有关理论界人士对基本法的一些条文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一位资深法律教授说，基本法把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都不变，并列写进法律中，这就使港人坚信中央的决策不是泛泛的承诺，而是经过理论的论证后向港人作出的郑重保证。

邓小平对在他指导关怀下所产生的香港基本法十分关心，对参与起草的人们更是给以很大的鼓励和表扬。

1990 年 2 月 17 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们。这天，正值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期间，大地回春，春色满园，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对邓小平来说，除了节日带来的快乐和喜悦之外，更使他感到兴奋的也许是因为看到了丰收的成果。

邓小平会见起草委员会成员时心情十分好，他谢绝了会前有关部门要为他准备讲话稿。来到会见厅，见到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后，邓小平马上即席发表讲话。他深情地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①

出席会议的委员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小平同志对他们的鼓励与嘉奖。会场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接着，小平高度评价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意义，他说：“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①

国内外舆论一致认为，邓小平对香港基本法的肯定与评价，以及他对起草委员会委员们的表扬与嘉奖，一点也不为过。基本法的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把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是一个体现“一国两制”方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52 页。

针的全国性法律。人们相信，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将保证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在香港顺利实施。

邓小平的高度评价，精辟地概括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重要意义，它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的确，基本法的诞生，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可靠保证，同时也为继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起了示范的作用。说到基本法的国际意义，首先在于它为和平解决国际上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从而显示了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贡献。

第二十三章　后过渡期风波迭起

邓小平在 1982 年 9 月会见英国首相以及在两年后会见港澳国庆观礼团时，均明确预言：在香港过渡期肯定会出现某种“捣乱的因素”，因为“总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中英联合声明。“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①]他甚至明确地指出，“主要的是英国人”会在香港制造人为的混乱或风波。事实证明，邓小平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他的预言更是惊人的准确。在香港后过渡期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人的确不断兴风作浪，在香港“搅局”。

既然对香港过渡期将会出现的各种可能包括最坏的情况皆作了思想准备，邓小平及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就能够处变不惊，勇敢地面对一切严峻的考验，以实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目的。

英方酝酿“搅局”方案

1989 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一内部问题反应强烈，迅速采取对华制裁措施。英国也积极加入西方特别是欧共体制裁中国的行列，在香港问题上改变了多年来的合作态度，从多方面向中国政府设置障碍。英国朝野人士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性也产生了争论。一些人要求英国政府“撕毁”联合声明，与中国重新谈判香港问题。但是，联合声明的英方制定者撒切尔夫人和杰弗里·豪，反对“撕毁”联合声明。虽然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政府排斥了主张放弃联合声明的一派意见，但英国领导人开始怀疑中国政府能否在 1997 年接管香港之后有一个稳定的和负责任的政府，以履行在联合声明中作出的承诺。事实上，英国政府此时对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不信任乃至猛烈批评的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在香港问题上，首先就是英国政府充分运用港人“信心牌”和“民意牌”，开始向中国施加压力，企图做那些在 1982—1984 年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期间未能办到的事。

北京风波发生后，英国政府于 6 月 14 日单方面宣布推迟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 13 次会议，这是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改变对华合作政策的开端。中国政府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

1989 年 6 月底，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特别委员会在关于香港问题的报告中，比较完整和清晰地表达了英方对港政策的变化：一是竭力对中国施压，以促使中国政府按照英方的意见修改基本法草案。二是建议港英政府尽快制定和实行一项人权法案。三是建议港英政府必须采取主动行动，大大加快香港民主化进程。建议香港立法局在 1997 年以前实行完全直接的选举， 1997 年完全实行普选，并在 1991 年的选举中，使 50%的立法局议员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甚至提出要“使香港立法局拥有主权”。四是建议当局尽快作出关于动工兴建香港第二个机场的决定。下院外交委员会这篇报告贯穿始终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尽量隔离中国大陆与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政府采纳了报告中主要的政策建议。外交大臣杰弗里·豪 7 月初访问香港时说，待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重新展开工作后，将会非常仔细地考虑香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5 页。

港的防卫和公共秩序问题以及人权问题。他还强调英国政府将把香港 1997 年前加快民主化进程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把香港“ 民意 ”作为它改变对港政策的依据。

英国议会和政府共同提倡的、以香港“ 民意 ”为制定对港政策的出发点的原则，是经不起推敲的。英国政府在港人“ 居英权 ”问题上的一贯政策，遭到了香港绝大多数公民的强烈反对，证明英国并非以港人的意愿来制订对策，而主要是以英国的利益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只是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并谋取自己在香港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之时，英国政府才打出“ 民意牌 ”。

随着英国政府对港政策的改变，此后在香港后过渡期许多重大问题上，英方不同中国磋商、单方面作出决定的事件频频发生，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大大小小的风波。

伦敦当局接连打出几张“ 牌 ”

如果说在 1982—1984 年中英谈判时，英方自己觉得可打的“ 牌 ”不多的话，那么 1989 年 6 月以后，英国领导人则觉得有许多“ 牌 ”可以向中国打来。如“ 民意 ”、“ 信心问题 ”、“ 居英权计划 ”、“ 两局共识 ”、“ 人权法案 ”等。

其中，所谓港人的“ 信心问题 ”和新的“ 民意 ”，成为英方最得力的“ 王牌 ”。因此，英国政府抓住所谓香港市民“ 信心危机 ”和“ 民意 ”问题大做文章。

北京政治风波后，相当多的香港民众对香港未来的前途产生了某些疑虑。当时香港市民到中银集团所属银行大量挤提存款，人才外流陡增，反映了这种心理状况。6—9 月间不断提出的在海外购地重造香港的建议、设想，也部分地反映了港人的一时心态。

英国领导人对此大加渲染，并夸大为“ 信心危机 ”。同时，英国政府趁机把自己扮成港人利益的代表者。撒切尔夫人宣称“ 我们第一位和最大的事情必须是关心香港人民 ”。杰弗里·豪 1989 年 6 月 6 日在国会下议院的讲话中也说，英国政府“ 正在紧急地考虑还能采取什么步骤来保证和维护 1997 年后香港的自由和生活方式 ”。

中国政府反击英方说，由于种种原因，香港有许多人产生了一些疑虑和误会，这是可以理解的。造成当前香港信心问题的重要原因，是英国方面一些不负责任的行动。英方还纵容极少数人利用香港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对香港的繁荣稳定也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 英方对于香港的信心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①]

英国领导人认为香港现在有了新的“ 民意 ”，于是就以港人利益维护者面目出现，要求加快香港民主进程，寻求更大程度的自治等，甚至挑战中方，包括在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最后阶段，进行公开干预。

这时，港英政府打出一张“ 两局共识 ”牌。

按照邓小平关于香港民主化进程应当循序渐进的原则，基本法草案曾经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局议员每届 60 人，其中第一届直选产生议员 20

[①] 《人民日报》1989 年 10 月 9 日。

人，1999 年的第二届直选议员 24 人，2003 年的第三届时直选产生议员 30 人。但是，在港英当局的支持下，香港行政、立法两局提出了一个旨在加快立法局直接选举步伐的“共识”方案：1991 年立法局首次引进直接选举议员，而且直选议员人数为 20 人，1995 年增加到 30 人，1999 年增加到 40 人，而到 2003 年全部议员都将由直选产生。

从 1989 年 7 月开始，英国政府不断干预属于中国内政的基本法起草工作。7 月中旬，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敦促中国推迟颁布预定于 1990 年 4 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国政府对英方这一不合理的要求理所当然予以拒绝，决定按期颁布基本法。7 月，香港负责监督基本法起草进程的最高官员、常务司巴里·威格哈姆赴伦敦同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英方成员麦若彬、保罗等举行一系列会议，讨论了 1997 年后中国政府在香港实行戒严、驻军、政治改革的速度和人权等问题。

8 月 14 日，港英政府专责处理香港过渡期事务的常务司屈珩，公开批评基本法草案。

8 月 17 日，多名港府高级官员（包括一名本身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成员的官员），就解放军 1997 年进驻香港问题发表谈话，说中国主权无需以驻军香港来体现，中共不应派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据联合联络小组英方人士讲，港府高官尤其是屈珩的讲话，旨在引发香港大众发表意见，让英方提出的一套得到民意支持，免遭人指责为英方单方面的意愿。[①]香港一些人士指出，屈珩的讲话充分反映了中英双方在基本法若干问题上的歧见，屈珩想利用舆论，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

港府常务司屈珩和其他一些官员关于基本法的这番言论，立即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8 月 19 日发表谈话指出，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容任何外国进行干预。然而，一些英国官员近来对基本法起草工作横加指责，粗暴干涉，甚至违背《联合声明》的规定，提出中国不要在香港驻军的荒谬主张，干预了中国内政。发言人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上述错误做法。[②]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压制了英方企图对基本法起草大加干涉的势头，使广大港人以更加清醒的头脑参与基本法草案咨询工作。

在一段时间里闹得很凶的是所谓“居英权”风波。这场风波可以说源于英国 60 年代以来的国籍法。 1962 年，英国颁布《英联邦移民法》，宣布撤消香港公民以及绝大多数其他英殖民地和英联邦公民自由进入英国和在英国居住、工作的权利。 1981 年颁布的英国国籍法，又把香港居民身份规定为“英国属土公民”，同样没有居英权。按照中英联合声明所附英方备忘录的规定，凡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前出生的香港人，可以领取“英国属土公民护照”，并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继续使用这种护照，但不再是英国属土公民，更没有居英权。港人对于英国国籍法极其不满，认为是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他们强烈要求英国政府重新赋予香港公民以居英权。

卫奕信担任香港总督以后，支持港人争取居英权的要求，呼吁英国政府修改国籍法。但是，英国政府坚持不修改国籍法，不愿意重新给予港人居英权。

---

① 香港《星岛日报》1989 年 8 月 17 日。

② 《人民日报》1989 年 8 月 20 日。

1989 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香港居民申请移民数量剧增，港人要求英国政府赋予自己居英权的运动空前高涨，香港总督及两局议员也加紧了说服英国政府修改国籍法的活动。在这种背景下，撒切尔夫人等开始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变通国籍法。

英国政府面对港人强烈呼吁重获居英权的压力，一方面允诺将有“较大的灵活性”，考虑修改国籍法以让少部分特殊的香港人士获得居英权，另一方面试图把这个问题“国际化”，即所谓寻求国际援助。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 6 月 14 日召开的下议院会议上和 7 月初访问香港时,两次说明了英国政府这方面的计划。8 月 21 日，撒切尔夫人复函香港立法局首席议员李鹏飞时又表示将继续寻求国际援助。为此，她曾向欧盟各国提出这个问题，并曾与美国总统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两国总统分别展开双边接触。10 月中旬，英国使这一问题“国际化”的活动达到高潮。英国把港人国籍等问题带到在吉隆坡召开的有 49 个国家参加的英联邦首脑会议上进行讨论。与此同时，香港总督卫奕信在访问美国期间，与美国有关部门讨论拟订一项多边的“移民保障计划”。

1989 年年底，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改变部分香港居民国籍。对于英国单方决定给予部分港人居英权的错误作法，中国政府给予了严厉批评。12 月 30 日，外交部发言人就此事专门发表谈话指出，英方这一做法，严重违反了它自己在联合声明中的庄严承诺。英国政府的决定已经在香港居民中引起相当的混乱，显然不利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因此，“中国政府要求英方以大局为重，改变上述错误做法，否则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外交部发言人最后声明，“中方保留对此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在 1990 年英国国会通过《1990 年英国国籍（香港）法》后，中国政府重申上述立场，表示不能接受。

英方打出的又一张新“牌”，就是“人权法案”。伦敦当局的意图是，要趁 1989 年后的“良机”，迅速推出“人权法案”，以便在 1997 年以前，根据这个法案来任意修改或废除香港的一些现行法律,使 1997 年以后实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被架空。 1990 年港英政府抛出“人权法案”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发表谈话，批评英方的“人权法案”完全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关于香港法律基本不变的精神，必须停止实施该法案。

“玫瑰园计划”引起的纷争

进入 90 年代以后,围绕香港总督 1989 年 10 月正式提出的新机场以及其他大型基本建设计划，中英两国之间发生了很大争论，一时成为世人关注的中心问题。经过一番艰巨谈判后，终于取得突破。梅杰首相亲自赴京签署新机场问题备忘录，才使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由于启德机场日趋饱和，愈来愈不适应香港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因而早在麦理浩担任香港总督期间，就已开始酝酿兴建新机场。 1972 年初、香港政府着手考虑兴建新机场问题，积极研究建造新机场的方案。到 1980 年年中，各种设计和准备工作已大致完成。然而，不久就开始了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港英政府遂把新机场建设问题搁置一边。

“基本法”起草工作开始后，香港一些工商界人士重提兴建新机场问题。不久后，港府决定由自己亲自主持这个宠大计划。

1989 年 10 月 11 日，港督卫奕信在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里，正式宣布香港政府制定的一项“ 港口及机场发展策略 ”。港督在提出上述计划的同时，也为港人描绘了一幅完成这些项目后香港在 2000 年极为美好动人的图景。为此，人们后来把这个新机场和港口建设计划又称为“ 玫瑰园计划 ”。

“ 玫瑰园计划 ”在香港和中国内地都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庞大工程。它将要耗费极为巨大的资金，还有其他许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卫奕信推出这项计划后，有些香港人士提出了异议。香港大学地理地质系教授薛风旋说，他最关注的，是未来七八年问每年将投入的 200 亿港元左右的庞大工程费用如何妥善解决。他担心“ 港府在未来 8 年内纯粹是一个消费的政府，不仅花现有的钱，还会用未来的钱。 ”结果使未来香港特区政府背上沉重的负担。他认为只有两个可行的途径能用来保障将来特区的利益：一是现在的香港政府通过公开聆讯，让本地专业人士和各阶层人士公开质询，以便使新机场和其他大型基建计划可以被市民确认或否决，而不致因为这些计划给将来的特区背上一个既成的消极的负担。另一个渠道是‘ 中方对庞大工程要有一个评估和监察，以防止有人在过渡期间好大喜功，乱花费，造成将来严重的经济、财政和社会上的负担 ”。香港其他一些人士和团体，对“ 玫瑰园计划 ”也陆续发表不同意见或提出质疑。

港英政府在研究制定和推出“ 玫瑰园计划 ”过程中，并没有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然而，由于这项大型基建计划的完成必然跨越 1997 年，甚至跨越 2000 年，无论从财政方面还是工程建设方面，都与未来的特区政府紧密相联，因此，中国政府责无旁贷地要介入这项计划，何况如同上面所提及的，港人也希望中方“ 评估和监察 ”新机场等大型基建工程。

1989 年 12 月，一些访问北京的香港客人向江泽民总书记谈起香港新机场、港口等兴建大汁，需要动用 1200 多亿港元。江泽民对此没有作正面的回答，他只是说：我是个工程师，在上海市长任内，对于每一项建设工程，在开始之前，要考虑三个问题，即行政措施、技术安排和资金调动。一定要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才能开工，否则非从头研究不可。江泽民还强调：有两句话很重要，就是要“ 量体裁衣 ”，“ 看菜吃饭 ”。他指出，如果演变为“ 你请客，我付帐 ”，那就有问题了。讲这番话时，江泽民自始至终没有提到香港两个字，但显然句句是针对“ 玫瑰园计划 ”的。江总书记这番委婉的话语，也表明了中国领导人正在关注着规模空前、耗资巨大的新机场建设问题，并且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

香港特区基本法于 1990 年 4 月初通过并颁布以后，中国政府增加了对新机场建设计划的关注。中国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认为，香港确实需一个新机场，中国和英国对于香港大型基本建设计划的发展并没有很大分歧，中国只是忧虑大规模工程会为未来特区政府造成财政困难。中国要求港府提供有关计划可行性报告及详细资料，让内地专家研究。只有在专家们对可行性报告作出评估之后才能表态，这是符合逻辑的。

9 月，双方提议就新机场计划问题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 9 月 20 日下午向外国记者宣布了这个决定。她还透露，中国方面的专家小组不久将同英国方面的专家们，就香港大型建设问题进行会晤。

然而，就在中国专家小组准备应邀赴港，同港英专家小组就香港大型基础建设工程问题进行会晤磋商的时候，港英政府突然宣布，决定改由政府自行斥资兴建拟议中的青马大桥，并即将开始招标。中国港澳办发言人于 1990

年 10 月 12 日向记者发表谈话，批评港英当局这一行动，“ 对此表示难以理解 ”。指出双方都应表现出足够的诚意，而不要设置任何人为的障碍。当然，这件事没有改变中国政府的决定，中方专家小组仍然按期赴港。

1991 年 1 月上旬，港府派专家代表团赴北京，与中方专家组就新机场和其他大型基建计划进行第二轮会谈。会谈仍然未能取得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港督卫奕信应副外长田曾佩邀请，于当月 21 日亲自来京商谈新机场问题。 1 月 23 日下午，李鹏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卫奕信。谈到香港大型工程建设问题时，李鹏指出，我们所关心的是，能否找到一个投入少、效益高，能为香港人民造福而不使他们背包袱、不给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带来财政负担的最佳方案。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私利，我们的中心出发点是如何更好地贯彻中英联合声明，维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卫奕信表示，英国政府将遵照联合声明的精神，同中国政府进行充分的合作。[①]

中英双方在后来的谈判中不断出现分歧、争论，陷入僵局。它使中英关系紧张化，英方内部也出现明显分歧。

梅杰内阁在新机场问题上走到了十字路口，它必须迅速作出抉择。英国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采纳外交部 “ 中国通 ” 的意见，以加强合作的方针解决新机场问题争论。英国首相外事顾问柯利达爵士再次受命作为首相特使，赴京排除横在中英关系道路上的又一巨大障碍。

1991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柯利达访华，同中国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就加强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合作，特别是就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交换了意见。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会见了柯利达。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同柯利达就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很快取得了共识。柯利达作为联合声明的英方设计师，现在又为新机场问题的突破作出了贡献。

双方草签了《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后，中方提出关于请梅杰首相亲自赴京正式签字的要求。起初，柯利达坚决不同意，与鲁平争得面红耳赤。但在中方寸步不让的情况下，柯利达最后还是同意了中方这个要求。7 月 4 日，英国外交部宣布梅杰首相即将访华，访华的目的是，同中国领导人正式签署英中关于修建香港新机场的协议。以后的事实表明，梅杰是不愿意亲自赴北京签这个字的，并认为这是由于当时的港督和首相外交顾问太软弱所致。因此，他在第二年便解除了这两位 “ 中国通 ” 的职务。

《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从现在起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港英政府将在最大程度上，负责完成列在谅解备忘录附件中机场核心计划的 10 个项目。第二，中国政府对新机场及其有关项目的建设将予以支持。第三，将成立一个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领导的机场委员会，中英双方成员人数相等，其任务是磋商跨越 1997 年 6 月 30 日的与机场项目有关的重要事宜。第四，中国政府对于须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以后偿还的必要的和合理的港英政府的举债将采取积极态度。第五，港英政府在安排财政计划时，将以于 1997 年 6 月 30 日留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使用的财政储备不少于 250 亿港元为坚定目标。第六，为便于进行香港的新机场建设，将成立机场管理局和咨询委员会，港英应听取中方意见和委任中方成

[①] 《人民日报》1991 年 1 月 24 日。

员加入该机构。第七，规定了中英之间解决跨越九七、涉及政权交接和重大事务的重要磋商机制，即 1997 年 6 月 30 日前，作为加强磋商的一部分，两国外长将每年会晤两次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和香港总督也将定期进行会晤。

新机场协议的草签，受到内地和香港各方的普遍欢迎，也在英国得到很高的评价。7 月 4 日，赫德在英国下议院就香港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双方达成谅解一事，使几个月来关于香港机场工程悬而未决的局面宣告结束，并使我们同中国关系上的一个难题得到解决。政府相信，这一结果将受到下院、香港以及更广泛的地区的普遍欢迎。英国《卫报》7 月 5 日发表社论，称中英香港机场问题协议等于“第二个联合声明”。

7 月 25 日，鲁平在深圳与港督卫奕信会晤，双方就新机场的一些问题，包括机场委员会和机场咨询委员会的设立及机场管理局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会晤，是为《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

9 月 2 日下午，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及夫人抵达北京。随同他来访的有，英国外交大臣赫德、英国驻华大使麦若彬、首相议会私人秘书布赖特、港督卫奕信、首相外事顾问珀西·柯利达等。9 月 3 日上午，李鹏总理和梅杰首相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在访问期间，李鹏同梅杰举行了会谈，江泽民总书记和杨尚昆主席分别会见了梅杰。钱其琛同赫德举行了对口会谈，鲁平同卫奕信就实施新机场谅解备忘录事项交换了意见。江总书记会见梅杰时说，“香港是连接中英关系的纽带”，他希望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要同舟共济，在双边关系中要高瞻远瞩，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①]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人权问题。在李鹏与梅杰的会谈中，梅杰谈到了反对党的一封信，李鹏也谈到了中国历史学家关于百多年来受侵略的历史和人权状况的信。

梅杰访华对改善和发展中英关系，尤其对解决香港问题起了积极作用。在香港问题上取得的其他成果是：双方同意加快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进度；香港可以自行同贸易伙伴谈判，签署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双方同意早日在香港设立终审法院；双方争取早日在为香港军事用地前途问题达成协议；英国在 1997 年后在高云楼设立一个适当规模的总领事馆，港英为 1997 年后的中国外交部驻港机构提供建筑用地；中英双方关注越南船民问题，认为应设法解决，支持香港为此而采取的措施，等等。

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使中英之间在香港新机场问题上的争论告一段落。然而，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末代总督彭定康来到香港后，不仅挑起中英政改大战，而且又使双方陷入关于新机场财务安排问题的长期争吵之中。

[①] 《人民日报》1991 年 9 月 4 日。

第二十四章　邓小平说：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分毫不让

1991 年以后，国际局势再次发生剧变，英方对中国形势作出新的估测，对华政策又向对抗的方向急速转变。彭定康走马上任后，推行“ 三违反 ”的政改方案，导致了中英之间异常激烈的争论。香港后过渡期又出现了惊涛骇浪。

虽然邓小平在 1989 年 11 月已经正式退休，但他仍然极为关注改革开放事业和香港后过渡期的动态，并在关键时刻提出自己的建议，在战略上为党中央出谋划策。

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 1992 年上任后，以加速政制改革为核心，推行与中国对抗的既定政策，导致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尖锐冲突。邓小平密切关注英方在香港问题上的一举一动，给予深刻的分析，为在第一线指挥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供了宝贵的原则性指导。

英方又打新的“ 如意算盘 ”

英国政府在 1991 年底突然提前宣布撤换港督卫奕信。梅杰首相决定让卫奕信退休后，数月间没有定下新港督的人选。一段时间里，关于新总督人选的建议或推测有过许多。据柯利达回忆，撒切尔夫人在下台之前，曾经对他说过，末代港督应当找一个政客，不要找一个外交家。意思是政客可以玩一些手法不受外交承诺的约束。当时柯利达说：“ 我不赞成！ ”首先，他认为中国人不吃那一套，其次，中英之间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达成了协议，而且已见诸于文字，派任何人去，都不会有多少回旋余地。除非撕毁已达成的协议，那样就一定会惹翻中国人。

但是，撒切尔夫人及后来的梅杰等英国领导人，都没有听从柯利达的劝诫，仍然坚持从政客中选港督。工党也赞成这个原则。就是说美国执政党和反对党都一致决定要选一位政治家来担任末代港督，表明了英国准备在香港后过渡期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1991 年下半年香港和国际政治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对中国形势的错误判断，是英国对华政策强硬化的直接背景。

1991 年 9 月，香港立法局首次引入直接选举，而且香港右翼民主派取得了大多数直选议席。这些议员赞成对中国政府持更强硬立场，英国领导人对这批通过直选上来的立法局议员非常重视，经常予以破格接见。英国政府在考虑新港督时的主要意图之一，是让新总督能充分利用这批亲英港人政治力量，并在 1995 年立法局选举上获得更大的胜利。只有政治家才能更有力地贯彻英国政府的这个基本意图。

从国际政治形势来看，　1991 年 8 月中旬苏联剧变，共产党地位急剧削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落人低谷。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整个西方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再次加重对中国的政治压力。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等，都成了西方对华施加压力的热点。英国国会等要求对华政策、对港政策强硬化的呼声日高。

苏联的解体，促使英国政府对中国政局和未来发展趋势作出了几种错误估计。第一种预测是，认为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一定会陷入四分五裂状态。英国外相赫德曾经说过：我们现在对香港政策要建立在对中国形势发展的这样估计之上。第二种估计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要依靠香港，中资企业

在香港力量很大，如果英国采取强硬政策，中国就要投鼠忌器，也许不会以强硬对强硬。

总之， 1991 年下半年从香港政治形势到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使英国和整个西方都增长了对华政治上进一步施加压力的倾向。英国政府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选择末代港督，以配合这个大气候的，贯彻英国对华强硬化政策，企图趁机谋取英国在港更多的长远利益。

彭定康选择了“ 港督 ”

英国 1992 年大选于 4 月 9 日结束，保守党连续第 4 次大选获胜。4 月 24 日，英国首相府宣布任命当时保守党主席

克里斯托弗·帕滕（中文名为彭定康）接替卫奕信，担任英国第 28 任香港总督， 1992 年 7 月就职。

彭定康是英国政坛一位引人注目的政治家，有关资料是这样介绍他的，1944 年 5 月出生； 1965 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系,后留学美国一年； 1966 年回国后参加了保守党研究部的工作， 1974 年至 1979 年担任该部主任，并任保守党主席卡灵顿的私人助理和政治秘书，曾为撒切尔夫人撰写保守党年会报告及党内重大政纲文件，是出名的笔杆子； 1979 至 1989 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自 1983 年以来，先后担任过北爱尔兰政务次官、负责科学和教育的国务大臣、海外发展署国务大臣； 1989 年被撒切尔提升为环境大臣，进入内阁； 1990 年 11 月被任命为保守党主席。

彭定康之所以被任命为末代港督，不仅因为他是身居高位的政治家，而且由于他为保守党 1992 年大选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忙于伦敦的保守党竞选活动，却丢失了巴斯选区的议员席位，因而失去连任 13 年的下议院议员，无缘再入内阁。在这种情况下，梅杰首相为感谢彭定康的贡献，对他失去议员席位给予安慰，在大选胜利后的第二天便给了他三种选择：（一）通过补缺选举，把彭定康重新选入议会，然后再授予内阁职位；（二）进入上议院；（三）出任港督。

经过一番考虑，彭定康认为第一种选择不一定保险；第二种选择不可取，因为这将结束他年轻的政治生涯；至于第三种选择。又意味着他将离开英国政坛 5 年，下次大选也无望。但他还年轻，才 47 岁，即使 5 年港督任满也不过 53 岁。而且也可以在末代港督任内大出风头，捞取更多政治资本，为重返英国政坛奠定基础。当电视台记者问他是否想当首相时，他回答说：“ 是的 ”。当然，港督这个职位是世界上少有的肥缺。首先，总督的权力极大。曾任港督的葛量洪在回忆录中说过，在香港，“ 总督的权力仅次于上帝而已 ”。其次，待遇极其丰厚。在世界各国或地区领导人中，薪水最多的是美国总统，仅次于美国总统的便是港督。 90 年代初，总督的月薪达 17.8 万港元，年薪达到免税的 14 万英镑，比英国首相的年薪高两倍。除薪水外，港督每年还有 46.3 万元的交际费，以及其他如居住、交通等方面的特殊优待。

总之，与前两种选择相比，第三种选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更有吸引力，于是彭定康接受出任香港总督。

彭定康是职业政治家，基本不懂中国问题。他本人曾与中国打过一些交道，如他当海外发展署国务大臣时，谈判处理过对华援助包括留学生奖学金事宜，并两次访华落实这些谈判内容。除此以外，他对中国毫无知识、毫无

经验。为了临阵磨枪，他曾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突击进修一段时间有关中国和香港的课程。

梅杰首相在任命彭定康为港督的同时，又决定让担任近 10 年首相外事顾问的柯利达于 1992 年 6 月退休。柯利达和卫奕信都是英国职业外交家，而且是中国问题专家，具有长期与中国打交道的实际经验。他们的退休，意味着英国外交部“ 中国通 ”影响乃至决定对华政策时代的结束，为彭定康在一定程度上操纵英国对华、对港政策的决定权扫清了道路。彭定康可以凭借与梅杰首相、赫德外相密切的个人关系和他自己在英国政界的地位，抛开英国外交部（除外相以外），直接征求最高层的意见，甚至可以全权处理一些重大政策问题。

走马上任前后的不寻常迹象

英国和香港各界对彭定康接替卫奕信担任港督，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人们认为彭任港督的好处主要是，他是英国政坛新秀的代表者，置身权力中心多年，他可以直通首相、外相府，又可随时与英国各界领袖直接打交道，办起事来可以当机立断。这样一位重量级政治人物必然加重与中方谈判时的份量，人们也普遍感到，彭定康会是一位强势港督，不会轻易与中方妥协。彭定康这样一位政客担任港督，对中英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呢？尽管彭定康本人表示，他要同中国建立尽可能最好的关系，但一些有识之士料定，彭定康由于不熟悉香港和中国事务，毫无知识，而且习惯于英式政治谈判，要适应与中国大陆沟通的方式，是非常之难的，很可能会出现误会，令中英关系倒退。即将退休的卫奕信也奉劝他的继任者，在未来 5 年内需要努力与中国领导人保持最良好的关系，不应触怒中国，而是要解释困难所在，并且尝试找出可行办法来满足（香港）各方面。

4 月 24 日下午，候任港督彭定康在英国外交部新任专责香港事务的次官顾立德的陪同下，来到记者招待会会场。彭告诉记者，他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管理香港的出色人物，他要把维护香港 600 万居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对中国，他表示建立良好关系是处理对华关系的首要事项。他还说，他本人与首相和外交大臣个人关系密切，这有利于他在港开展工作。此后，彭定康又多次表态要结好于四方，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办事，以保证香港的平稳过渡。

可是，就在彭定康赴港上任前夕，一些迹象却让人们很不安心。

这年 5 月 22 日，香港立法局内最大的反对派——港同盟主席李柱铭和杨森到伦敦访问。李柱铭对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都非常不满，曾鼓吹要重写联合声明。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却在伦敦受到了英国保守党的高度礼遇。梅杰首相破例接见了他们。李柱铭和杨森受宠若惊，在长达 45 分钟的会谈中，两人反复向梅杰表示，他们此次访英的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敦促英国向中国提出加速香港民主步伐的要求，并乘机向英方提出希望 1995 年立法局直选议员的议席能够有所增加。梅杰则表示，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一向主张把维护“ 自由民主 ”放在维护“ 稳定繁荣 ”之前。

李柱铭和杨森受到英国最高领导人的厚待，甚受鼓舞，于是又在伦敦四处发表演说，以获得更多的支持。此时，彭定康也与他们亲自交谈，会谈后还亲自送到门口。这使李、杨二人感到，新港督还未上任，就已经成为了他

们的知音。

5 月 24 日，英国外交部次官顾立德抵港，进行为期 5 天的访问。

在此期间，顾立德也大放厥同，他不顾中英双方已达成的有关协议，说什么“ 若中方下决心，基本法是可以修改的 ”。

为了赢得港人的好感，末代总督在就职仪式和工作风格上大做文章。7 月 3 日，彭定康在伦敦接受香港《南华早报》总编辑的采访时透露：“ 从我上任的第一天起，就要采用我自己的风格，抛弃外交的繁文缛节和传统的礼仪，尽可能与更多的港人打交道。我要在办公室外花费更多的时间。我在公开场合里说的和私下里说的一样，我没有秘密议程，我希望人们知道我所讲的就是我要做的。 ”

1992 年 7 月 9 日下午 3 时，彭定康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结束了在新加坡的 3 天休假，飞抵香港，正式走马上任。他在启德机场受到了布政司霍德爵士等人的欢迎。

这天下午 4 时 30 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里举行了新任港督宣誓就职典礼。仪式开始时，彭定康身着便服，而不是传统的总督制服，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使人感到很意外。此外，他没有像以前那些港督那样先被封授爵位，而是以彭定康先生的称呼上任，这也叫人感到新奇。

彭定康就职典礼的程序是：首先伸出右手，按在圣经上，由首席大法官杨铁梁监誓，分别作效忠、就任与司法宣誓，接着签署誓章，再接下来是霍德爵士和邓莲如议员致欢迎辞，最后是末代总督发表就职演说。

在听彭定康就职演说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新总督没有提及他所代表的女王陛下，相反，却反复强调他同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异乎寻常的私交。

就职典礼结束后，彭定康开始显示与以往历届总督部不同的“ 亲民 ”姿态。他身穿便装到外巡视，和老百姓一起乘地铁、喝茶，碰到路边有小孩，还抱起来亲几口，还去电台主持古典音乐节目，甚至开放总督府举办音乐会。在港府内部，他也与从前的总督不一样，鼓励人们对自己当面直言，开展平等讨论。这位新总督还组织“ 智囊团 ”，为他出谋划策。

末代总督的“ 亲民 ”举动，果然取得了一些成效。香港的街头巷尾都有人在说，这位新港督很平易近人，有些爱民如子的感觉。

新总督作出如此不同凡响的举动，不是没有用意的。实际上，彭定康在笼络人心，以便为不久以后推行与中国政府对抗的政策打下“ 民意 ”的基础。

彭定康执行对抗政策　政改方案出台

彭定康 7 月正式就任港督后，加紧了谋划政改方案的活动。7 月 14 日，他首次出席行政局会议。会议讨论新机场问题和 1995 年立法局选举问题。当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国雄说，1995 年立法局直接选举涉及衔接问题，要由中英双方共同研究作出安排及决定，其中一个原则是要做到各方面均衡参与，使立法局更有代表性。彭定康在加紧构恩政改方案时，也声称要与中方商讨，以保证平稳过渡。8 月 20 日，他在港督府首次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会面。

8 月 27 日，港府和新华社同时宣布，港府彭定康应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的邀请，将于 10 月 12 日至 14 日访问北京（后来推迟 10 天）。鲁平当天对记者发表谈话，希望 10 月份他与新港督的首次会面，能够建立起正常的联

系。至于将要会谈的问题，他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香港新机构、政制等等。他表示， 1995 年选举问题并不是中方急于要谈的问题。他强调，1995 年产生的一届立法局，并不等于 1997 年的首届立法会。如果 1995 年立法局的产生办法和组成与基本法的规定相符合，就可以过渡，成为第一届立法会。因此，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急于要谈的，问题是要不要与基本法衔接，如要衔接，就需要双方磋商，磋商的问题是整体的，包括选举方法、组成等等。如果不能衔接， 1997 年需要重新产生首届立法会。总之，“ 我们希望平稳过渡，整个立法局过渡九七年，不希望一个人要下车。 ”[①]鲁平对彭定康和英国政府在政改问题上的重大企图，作了郑重警告。

彭定康经过 3 个月的加紧工作，拟好了 10 月将要发表的施政报告。9 月中旬，他第一次返回英国述职。9 月 14 日，他与首相梅杰和外交大臣赫德进行了会谈。彭定康详细端出拟出的香港政改方案，包括行政立法两局分家方案，强化立法局的职能，在地区选举及功能选举等方面，也作了改动。英国领导人完全赞同彭定康的新方案。

返回香港时，彭定康在启德机场上得意洋洋地告诉记者们说，他在伦敦度过了紧张而又有趣的 36 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会见了首相、外交大臣和 10 名高级内阁部长。他还向记者们透露，他的治港蓝图已经得到英国最高层的认同。

9 月下旬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向中国外长钱其琛通报了彭定康将要发表的施政报告内容，尤其是将要公布的政改方案。英方还通过其他渠道，向中方透露了政改方案，中国政府表示不能赞同，并劝其不要在未与中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单方面推出这个将危害香港平稳过渡的方案。但是，英方并不听从中国政府的劝阻，仍然一意孤行。

1992 年 10 月 7 日，彭定康在立法局作首次施政报告，公布了新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这个政改方案包含以下几方面重大变动：

1.把行政局同立法局分开，扩大立法局的权力。香港一贯实行行政局和立法局的双重委任制，行政局有的议员委任为立法局议员，立法局有的议员委任为行政局议员。两局的关系是行政主导，立法局向行政局负责。这一政治体制是与基本法第 62 条规定吻合的。彭定康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把两局分开，取消两局议员的双重委任。新组成的行政局议员皆为社会独立人士，无政党背景，仅向港督提供有限的政策、策略咨询。

同时，彭定康从几个方面大大加强立法局的权力。第一，准备改变由港督任立法局主席的体制，“ 尽快把主持本局会议的责任，交予由各位议员互选出来的主席负责 ”，而港督将会“ 以行政机关首长的身份向本局负责 ”。第二，建立一个制度，以确保行政机关“ 能充分向立法机关负责 ”。第三，建议成立“ 政府及立法局事务委员会 ”，以便政府当局可与立法局议员商讨有关处理立法及财务计划的事宜，让立法局介入政府施政过程，同行政局分庭抗礼。这三项措施完全改变了过去香港的“ 行政主导 ”的政治构架，而规定行政首长和行政机关充分地向立法机关负责，而且立法机关直接介入政府工作，因此转变成为“ 以立法为中心 ”的政治构架。这样一来，立法局在政府决策中的权力与制衡作用大大增加，控制了香港政制的实权，使 1997 年以后的立法机关掌握未来的特区首长和政府，导致“ 行政主导 ”名存实亡。

[①] 香港《文汇报》1992 年 8 月 28 日。

2．通过改变 1995 年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办法来增加立法局选举中的直选议席。提出选举委员会的全部或大部分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出任，使立法局直选改变相直选产生的议员达 40 名，大大超过中英双方已同意的 1995 年直选议员为 20 名的数目。这一变动，将有可能使代表英方利益的“ 拒中民主派 ”获胜，使他们坐“ 直通车 ”进入 1997 年香港主权回归后的第一届立法会。

3.把功能组别一会一票间接选举改为全行业直接选举。彭定康在政改方案中，把已有的 21 个功能组别议员的法团投票代之以个人投票；新增的 9 个功能组别（渔农矿产、电力及建筑界；纺织及制衣界；制造界；进出口界；批发及零售界；酒店及饮食界；运输及通讯界；金融、保险、地产及商业服务界；公共、社会及个人服务界）的议员，其选民从 45 万人增至 270 万人，范围包括香港的全部工作人口。这一改变，将阻碍对维系香港前途信心和繁荣稳定关系重大的专业人士及工商企业家参与政府管理。

此外，彭定康取消两个市政局和区议会的委任议席，变成全部直选，扩大区议会的职权，使之具有政权性质，政改方案还提出把选民投票年龄从 21 岁降为 18 岁，以及变双议席选区制度为单议席单选票制。

可见，彭定康在施政报告中提出了对香港现行政制进行重大改变的“ 宪制方案 ”。这一政改方案是在没有与中方磋商的情况下强行推出的，其内容同中英联合声明是背道而驰的。它拉开了中英在这个问题上激烈较量的序幕。

中国强烈批评“ 三违反 ”的政改方案

彭定康提出的这个政改方案，对香港的政治构架和选举制度，作出了重大变革，与香港基本法严重背离，抛弃了香港民主化“ 循序渐进 ”的发展原则。因此，中国方面作出了强烈反应。

10 月 8 日，国务院港澳办和外交部发言人分别发表谈话，表示对港督提出的政制方案深感忧虑。他们指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是在没有同中方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布的，是蓄意挑起一场公开争论。他们重申，中方一向主张，香港现行政制不应大变，政治体制的发展必须与基本法衔接。他们警告，如果香港在过渡期任何政制发展不能同基本法衔接，其责任完全不在中方。届时，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其有关机关将按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的规定加以设立。

然而，彭定康并不理会中方的强烈反应和警告，继续在香港大造声势，发动“ 民意 ”。港英政府开动所有宣传机器为政改方案呐喊，英国政府也大力为彭定康撑腰。在彭定康公布施政报告的当天，首相梅杰在唐宁街 10 号办公室发表声明支持政改方案。梅杰说：“ 总督就未来 5 年的议事日程在香港广泛地征求了意见。我完全赞成他的计划，我肯定这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最佳途径。 ”在香港，尽管彭定康鼓动起不少支持他的“ 民意 ”，但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出来批评彭氏政改方案，认为这是“ 自搞一套 ”，不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平稳过渡。

10 月 20 日，彭定康抵达北京进行他任总督后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没有到机场迎接他，只派了副手陈滋英到北京国际机场。彭定康在北京机场对记者承认，自他 7 月上任以来，中英两国间的敌意增加了，但他又明确表示，在关键问题上他将勇敢地面对北京政府。

10 月 21 日上午，鲁平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始同彭定康进行会谈。两人就政改方案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会谈长达 6 个多小时，但由于互不妥协而毫无结果。10 月 22 日上午，彭定康与姜恩柱副外长就香港的政治体制等问题举行了会谈。下午，钱其琛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彭定康一行。钱外长见到彭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向我们提出了严重挑战 ”。他并在记者面前拒绝与彭握手，以抗议后者提出的政改方案。在会谈中，钱外长指出，刚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将对香港的政治体制进行重大改变，这明显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有关规定和精神，违背了英方关于要使香港政制发展同基本法衔接的承诺，违背了中英双方已达成的有关谅解。这种做法损害了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为香港 1997 年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设置了障碍。钱其琛说，我们希望合作，不希望对抗，港英当局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合作的挑战。他说，要解决问题，还是应该回到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进行认真磋商的轨道上来。[①]由于彭定康坚持错误立场，会谈仍然毫无结果。

10 月 23 日下午彭定康结束对北京的访问。鲁平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我们认为目前双方分歧的实质不是什么加快不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的问题，而是究竟要合作还是要对抗。我们不希望见到对抗，因为这对香港不利，但对方一定要对抗，我们也只能奉陪。 ”[②]他还警告说，如果英方不改变政制方案，中国政府将按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组成 1997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

回到香港的彭定康仍然一意孤行，与中国对抗。他一再声明政改方案没有违背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还要求中方提出“ 反建议 ”。

彭定康搞对抗激起各方批评

1992 年 11 月 7 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和人大代表尖锐批评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但彭定康对此置之不理，甚至诬之为“ 背景音乐 ”。11 月 11 日,港英当局操纵立法局通过麦理觉所提出的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的修订动议。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英国首相梅杰、外相赫德等人反复声明，“ 完全支持 ”彭定康的香港政改方案。英国国会大多数议员也支持彭定康。

但是，英国仍然出现了不同意见。外交部许多官员并不赞成彭定康的对抗政策。10 月下旬彭定康访问北京失败后，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同唐宁街进行了接触，恳求梅杰和赫德谋求一项妥协方案。但是，梅杰和赫德不予理睬。前港督麦理浩勋爵在英国上议院发言，指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与中英协议相抵触。

前首相外交政策顾问柯利达爵士， 11 月下旬写信给英国《泰晤士报》，回击该报 11 月 20 日社论对“ 老中国通 ”的批评。他反对彭定康及梅杰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强调拥护中英合作。他说：“ 我过去和现在都拥护的政策是静悄悄地但又坚韧不拔地为香港的利益与中国谈判，要施加压力但又要避免关系破裂，避免因较量实力而使香港付出代价。工作的宗旨是香港的福祉有

[①] 《人民日报》1992 年 10 月 23 日。

[②] 《人民日报》1992 年 10 月 24 日。

赖于中英合作”。他指出，彭定康如果在政改问题上一意孤行，只能迫使中方“另起炉灶”，使中英关系破裂。 12 月初，柯利达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抨击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已促使中英关系倒退到“文革”以来的最低点。他认为彭定康在英国公众面前“作英雄状”，却害了香港。

英国国会资深议员艾德礼发表文章，批评彭定康的政制改革方案。他说，彭氏‘在比赛中擅自改变游戏规则是不明智的’。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也批评彭定康，说彭的主要错误在于把香港当作一个“好像英国将永久呆在那儿的殖民地”来对待，从而把中国排除在进行必要协商程序之外，而这正是中国所要求进行的程序。随着中英在政改问题上对抗的进一步发展，英国内部反对其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的人愈来愈多。

在香港，从彭定康政改方案一公布，就遭到了当地备界人士的批评。香港数百个商会、政治及社会团体，香港市政局、地方议会，以及 500 名金融界人士、几十名太平绅士等，先后发表声明或谈话，强调香港政制发展必须与基本法相衔接，以实现平稳过渡。到 1992 年 11 月下旬，香港的民意开始向更加不利于彭定康的方面演变。《南华早报》11 月 22 日发表的调查显示，彭定康的支持率已从原来的 56%下降为 34%。

在中英就彭定康政改方案激烈交锋的时刻，朱镕基副总理 11 月 15 日抵达伦敦开始访问活动。17 日上午，朱镕基会见了梅杰首相和赫德外相，双方除了交换关于双边经济关系和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外，还着重讨论了香港问题。朱镕基代表中国政府重申反对彭定康政改方案的坚定立场，希望英方以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大局和两国共同利益为重，回到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磋商和合作的轨道上来。朱副总理的声明引起强烈反响。香港各界纷纷表示赞成朱镕基的立场，敦促英方与中国重新磋商香港政制问题。

英方与中国对抗的政策还受到了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批评。李光耀 1992 年 12 月 13 日应香港大学 80 周年校庆之邀抵港。12 月 14 日，李光耀在演说中指出，距“九七”还有 4 年多的过渡期里，香港总督应该与中国磋商，培养未来接管、治理香港的人才，以保证“一国两制”的顺利推行。这项工作比在立法局内增加直选议席更重要。他认为，英国应从现实出发与中国合作。 12 月 15 日，李光耀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时，对彭定康政改方案的背景作了独到分析。他认为，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向中国挑战，“这不是彭定康的改革，是梅杰和赫德的政策，运用英国人的压力。这是去年决定的。他们在元旦日辞退了卫奕信。”总之，在 1992 年 1 月前，“这个剧本已经由梅杰的班子拟好”。李光耀还指出，全面施行直接选举对香港不利。他认为，英国在香港加速民主化，有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就是一个“民主的中国”对美国和西方非常重要，香港只是一个棋子，而英国政府预备把英国在香港及中国的利益（数千亿美元）作赌注。

但是，在英国的全力支持下，彭定康毫不理会中国的反对和各方面的批评，顽固地坚持“三违反”的政改方案。不仅如此，他还在香港其他方面的问题上，如新机场财务安排谈判、9 号码头合约问题、终审法院问题和军事用地安排问题等，也采取了不合作的政策，从而使中英对抗局面更进一步加剧。

奉陪到底

朱镕基副总理访问英国之前，曾得到邓小平的指示，要他坚决反击彭定康提出“三违反”政改方案的对抗姿态。11 月 16 日，朱镕基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演说后回答提问时表示，英方挑起了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对抗。这是中方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但是，不要以为对抗可以迫使我们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朱镕基的讲话坚定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使英国上下为之震撼。

1993 年 1 月，邓小平就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而引发中英对抗向有关方面发表了谈话。他深刻地分析说，英国在撤出香港之前“搅局”，是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退让，不用说一寸，一分一毫也不能让。越让就越被动，局面就越复杂、混乱。邓小平接着说，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香港的局势好转，但是同时也必须做好香港在过渡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出现最坏情况的一切准备工作。你英国可以单方面撕毁两国联合声明、两国谅解协议，但是我们中国贯彻执行基本法、实施“一国两制”则是坚定不移的。他最后提出，我们同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是一再打招呼，希望按声明、协议办，少些纷争，多些合作。但是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硬要搞对抗的话，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奉陪到底。[①]

邓小平的谈话对中英政改对抗形势及中方的立场和策略作了透彻的分析，说明他对英国人的用心了如指掌。实际上，早在 10 年前，邓小平就对英国将惜机“搅局”作出了准确的预测。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各方情况皆知的邓小平，坚信主动权掌握在中方手里，彭定康挑起政改对抗不得人心，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从 1993 年 4 月至同年 11 月，中英又就香港政改问题举行了 17 轮会谈。但由于英方没有诚意，谈判以破裂而告终。彭定康操纵香港立法局，于 1994 年上半年通过了他的政改方案。针对港英当局一意孤行的顽固态度，中国政府在内地和香港人民的支持下，果断地“另起炉灶”，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提前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体现了邓小平的战略策略方针，使我方立于主动的地位。

形势比人强。挑起中英在政改问题上的尖锐对抗，虽然使彭定康大出“英雄”风头，但对香港的大局，对英国在华利益尤其是经贸利益却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英国和香港批评彭定康的声浪日高，英商指责彭定康在政府的支持下与中国搞对抗，使他们在对华贸易中大受损害。在日益增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最终还是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同时也为了能实现“光荣撤退”，英方从 1994 年下半年起，逐步调整政策，重新摆出了与中方合作的姿态。 1994 年 11 月初，历时两年半之久的关于香港新机场财务安排问题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从 1995 年至今，中英高层互访增加，在香港其他若干重大问题上又达成了协议。但是，英方对按照彭定康政改方案于 1995 年选出的立法局，仍然持与中方对立的态度，加上在人权等问题上的争执，使香港后过渡期的最后日子里依然风波时兴。

[①] 《北京党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第二十五章　从“预委会”到“筹委会”

1989 年下半年以后，英国政府不是按照中英联合声明的原则搞好合作，而是在香港后过渡期不断制造麻烦，严重损坏了中英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了“以我为主”的方针，为使香港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以及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另起炉灶”

彭定康政改方案抛出后，英国的对抗政策和姿态，迫使中国政府作出相应的反应，开始着手酝酿并实行一系列有力措施，以保证香港过渡期内平稳过渡。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并分专题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

1992 年 10 月下旬，港督彭定康赴京会谈毫无结果。中共中央领导人意识到英方很可能在政改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下去；因此，中方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准备采取相应的有力措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首先向新闻界透露了中方的立场和设想。10 月 23 日，鲁平对记者吹风说，如果彭定康完全不考虑我们的意见的话，那么无非到了时候，我们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来组成第一届的立法会，以及第一届的政府和司法机关。当香港《华侨日报》记者问，中方是否要另起炉灶、是什么炉灶时，鲁平回答说：这个问题不在我们。如果英方置基本法于不顾，根本不考虑衔接的问题，那他是要另起炉灶。因为已经有了炉灶——基本法摆在这里，没有必要另起炉灶。但是，如果英方的的确确要另起炉灶的话，那我们也要另起炉灶，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证到 1997 年能够做到平稳过渡。[①]

英方所采取的立场，使中英在香港问题上面临严峻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专门会议，研究中英关系和香港问题，制定对策。会议文件指出，英方采取对抗方针，政治局的基本对策是：绝不妥协。中方要考虑全面的应付办法。如果彭定康一意孤行，最后必然使英方陷于被动局面。

12 月上旬，一位领导人在谈到香港问题时又指出：中央的态度是，一定要港英当局回到中英联合声明的轨道上来。否则，中方肯定另起炉灶。他说，从各种情况分析，彭定康不顾一切推行他抛出的宪制方案，首先是想为个人树立威信，为其有朝一日重返英国政坛做准备，中方已向英方提出，如果英方不遵守联合声明，强行单于，我们肯定另起炉灶。我们要准备出现最坏的情况，但是，要争取通过多做工作，取得好结果。

根据中央决定和中英对抗形态的发展，国务院港澳办和其他有关部门加紧考虑如何在英方不合作情况下“另起炉灶”。1992 年 12 月 22 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在接见香港民建联访京团时，谈到了新的设想。他说，所谓“另起炉灶”，只是针对首届特区政府的组成及立法会的选举方案而言，中方在 1997 年以前除了可能会考虑设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听取港人对平稳过渡的意见，以研究平稳过渡问题外，绝对无意设立第二权力中心或影于政府。

1993 年 2 月上旬，鲁平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广州先后分 10

[①] 香港《文汇报》1992 年 10 月 24 日。

批会见并听取 37 位港事顾问关于香港政制及后过渡期其他事务的意见。一些港事顾问建议，中方一旦确定无法与英方合作，便应尽快成立一个组织，为特区首届政府作筹谋。这个组织除了处理政制问题外，还应同时处理涉及过渡期的其他问题，包括审批公约和专营权在 1997 年后是否继续有效，审核香港现有法律哪一些违反基本法等。这个组织只具有咨询性质。香港工商专业联会主席罗康瑞称这个组织为“负责政权移交的计划委员会”，希望这个委员会制定工作报告，在 1996 年交给届时已成立的特区筹备委员会决定及执行。2 月 7 日，新香港联盟创会会员罗德丞说，他也赞成尽快成立该委员会，地点最好在香港，若英方不合作，可改在深圳。他认为，这个组织必须要有中方人士参与，因为处理过渡期工作是中方的“责任”，而并非干预。在会见过程中，鲁平和周南要求罗德丞返回香港后更详细地研究该组织的具体组成及功能。这次会晤港事顾问，为中方就“另起炉灶”问题进行决策，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彭定康于 1993 年 3 月 12 日公布政制方案，关闭了谈判的大门，促使中国迅速采纳港人的提议，在日后召开的第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了“另起炉灶”的具体组织措施。

“凡事预则立”

在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开幕的当天（3 月 15 日），港澳地区 32 位全国人大代表发表声明说，“鉴于当前严峻的香港局势，我们建议中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做好准备，以保证香港政权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①]

3 月 16 日，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李伟庭进一步建议，为了保证 1997 年平稳过渡，中央政府应考虑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咨询委员会，负责研究 1997 年过渡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问题，包括每届政府和立法委员会组成的有关办法,供中央政府和 1996 年将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参考。在会议

中，广东省代表团提出了建议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的议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审议了这个议案。

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中规定， 1996 年全国人大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但是，考虑到 1997 年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时间日益临近，尤其鉴于英方的不合作态度，为了保证 1997 年的平稳过渡，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于 1993 年 3 月 31 日通过决定：“授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机构，着手进行各项有关准备工作。”[①]

经过三个多月的酝酿，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于 7

月 2 日通过了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说，该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其职责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前，为 1997 年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①] 《人民日报》1993 年 3 月 16 日。

[①] 《人民日报》1993 年 4 月 1 日

实现平稳过渡，进行各项有关准备工作。预委会由内地和香港的各方面人士和专家组成，其中香港委员不少于 50%，预委会设立政务、经济、法律、社会及保安、文化 5 个专题小组。钱其琛担任预委会主任。

预委会的成立，使英方和一些港人担心它影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以及干预港英当局的行政管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 7 月 1 日发表谈话指出：我们认为，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这一机构，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设立预委会不会影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本身工作的正常进行。同时它也不会干预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止英国政府对香港的行政管理。

1993 年 7 月 16—17 日，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首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钱其琛主任在开幕词中列出了预委会的具体职责：第一，为设立香港特区筹委会的有关事宜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第二，在筹委会成立前，对其工作预先作探讨，特别是就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进行思考、研究并提出建议，供筹委会成立后参考；第三，推广和宣传基本法；第四，对香港现行法律中与香港基本法相抵触的条款提出处理意见；第五，研究跨越 1997 年并可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并提出意见：第六，研究同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现平稳过渡有关的其他事宜；第七，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交办的有关事项。他说，预委会大体将有两年半的工作时间。1993 年下半年要制订出工作计划， 1994 和 1995 两年要逐步深入展开各项研究工作，形成各项建议。钱其琛强调，预委会既不是什么“ 第二权力中心 ”，也不是什么 “ 影子内阁 ”。

这年 12 月 9—11 日在北京召开的预委会第二次会议，适逢中英关于 94/95 年选举问题会谈濒临破裂之际。中国政府决定为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加紧各项准备。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各专题小组提出的工作规划。这些工作规划把握了两项原则：一是紧紧抓住与 1997 年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有关的问题作为工作规划的主题和基本内容；二是把香港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和关系到港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同小组的工作规划联系起来考虑。这两条原则，使预委会的工作同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维护香港同胞的利益一致起来。此后预委会进入了具体研究各项工作的实质性工作阶段。

钱其琛评价说：“ 预委会 ”是一部 “ 发动机 ”

成立整整两年半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即将完成历史使命，1995 年 12 月上旬，它举行了第六次即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它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并为筹委会的成立及其今后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预委会第六次全会 1995 年 12 月 7—8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政务、经济、法律、文化、社会及保安 5 个专题小组的工作报告，以及向大会提交的 46 份书面建议和意见。由于这次预委会各专题小组提出的工作报告是它们两年半以来辛勤工作的总汇,并且成为 1996 年初成立的筹委会工作的基础，我们不妨在此对它们浏览一下。

预委会政务专题小组研究的问题共有 12 项,对其中 9 项议题提出了书面建议和意见。政务专题小组建议：筹委会于 1996 年 1 月成立，设在北京，由 120—150 名委员组成，其中香港委员所占比例多于 50%。筹委会设全体会

议、主任会议、秘书处和工作小组，在香港设办事处。筹委会有 10 项职权：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包括确定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筹组特区第一届政府；决定在第一届立法会产生前设立临时立法会，并负责组建；组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包括规定此会的具体产生办法；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包括作出原在香港任职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留用的具体安排；决定在特区第一届区域组织产生前设立临时性区域组织，并决定该组织的具体产生办法；研究、提出确保香港经济、金融以及社会、保安、教育、文化等方面平稳过渡的政策性建议和措施；研究、处理与平稳过渡有关的法律问题，包括对与基本法相抵触的法律提出处理建议；负责筹备特区的成立仪式和庆典活动，等等。对筹委会将研究、处理的若干重大问题，如第一届政府、临时立法会、司法机关及临时区域性组织等，政务专题小组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建议。

经济专题小组两年半来先后设立了跨“九七”大型工程及合约、财政金融等 7 个课题研究小组；完成了退休保障问题、香港政府资产分布管理及交接、香港政府财政预算编制、香港特别行政区土地基金的交接及 1997 年后管理、联系汇率制度、香港与邻近地区基建衔接和香港与内地贸易统计共 8 份课题研究报告，完成了拟提交筹委会的 12 项建议和意见，如《关于处理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经贸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的建议》等。经济专题小组完成的主要工作有三个方面：关于与 1997 年政权顺利交接相关的财经事务；关于对平稳过渡和特区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如新机场建设问题等；关于 1997 年后两地经济往来的政策研究，即经贸关系、金融关系和航运关系方面的原则和政策建议。

法律专题小组完成了对香港原有法律的初步审查工作，对其中存在的与基本法相抵触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处理建议。小组着重研究了港英当局单方面制定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和依据该条例大幅度、大面积修改香港现行法律的问题，提出了初步处理建议。由于目前基本法附件三所列的适用于香港的全国性法律只反映了 1990 年 4 月基本法公布时的情况,不可能反映近几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陆续制定的一些新法律，法律专题小组对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增减问题提出了建议。

文化专题小组围绕香港文化领域各方面与 1997 年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有关的重要事项以及广大港人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就 14 项专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包括基本法的推介工作、关于处理文化领域内殖民主义色彩问题、关于加强公民教育等。

社会及保安专题小组就出入境、居留权、两地合作打击犯罪、纪律部队和社会福利及服务 5 个方面的 11 个议题,提出了 4 项具体建议和 5 项原则性意见。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预委会将在筹委会成立时结束工作。这就意味着预委会在 1996 年 1 月完全结束它的历史使命。中国领导人对预委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钱其琛说，顶委会为筹委会的最终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它像“一部发动机，动员了香港社会各个方面都来关注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情”。江泽民 12 月 8 日会见预委全体委员时说，预委会为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做了有益的准备工作。实践证明，当初作出成立预委会的决定是果断的、必要的、正确的。

筹委会：新的里程碑

1995 年 12 月 28 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7 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筹委会共 150 名成员，内地委员 56 人，约占 37%，香港委员 94 人，约占 63%。与预委会组成人员相比较，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筹委会名单有三个特点。第一，香港代表占较大多数，比预委会中的香港代表几乎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这反映了在最后进入具体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阶段时，贯彻了面向港人、依靠港人和吸引更多港人参与特区具体筹备工作的既定方针，为 1997 年后“ 港人治港 ” 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第二，具有十分广泛的代表性，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预委会，照顾到了香港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和各个界别。第三，预委会成员基本上都加入了筹委会，保证了工作的连续性。

1996 年 1 月 26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出席大会并向等委会全体委员颁发了任命书。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会见了全体委员。筹委会的成立，宣告预委会的使命圆满完成。

当天下午，筹委会举行首次全会。主任委员钱其琛在开幕词中说，今年是筹委会工作的关键性的一年。首先是要组建全部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的 400 人的推选委员会。推选委员会组成后，将推举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之后，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行政会议、临时立法会和终审法院等的筹组工作，也要开展起来。筹委会仍然坚持“ 以我为主，面向港人，依靠港人 ” 的方针，同时，又真诚希望与英方继续合作下去。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一次全会讨论通过了筹委会的工作规则，决定设立推选委员会小组、第一任行政长官小组、临时立 法会小组、法律小组、经济小组、庆祝活动小组等六个工作小组，并确定了各级的组成。

与预委会不同，筹委会不仅是一个工作机构，而且是一个权力机构。它肩负着筹组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筹备其他有关事宜的重大历史使命。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是香港回归祖国道路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齐心协力完成历史使命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后，随即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96 年 3 月 23—24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会讨论通过了几项重要的决定：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决定》，它规定了临时立法会的组成、产生办法、条件、任务等，这个机构工作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产生为止，时间不超过 1998 年 6 月 30 日。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 1997 年下半年和 1998 年全年香港公众假日安排的决定》。第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成立香港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活动委员会的决定》。第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实施作出解释的建议》等。

在筹委会第二次全会期间，百余名委员们参观了人民大会堂西南面即将装修设立的香港厅。香港厅的设立是香港同胞的夙愿。早在七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港区人大代表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很快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并正式决定香港厅设立于人民大会堂南大门西大厅即原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厅。香港厅的总体设计要求是，要体现出一种民族自豪感，既要有中国传统特色，又要突出香港的地方特色。为体现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及香港作为祖国一个重要的门户和窗口，香港厅设计将力求庄严、务实、体现特区特色。香港厅设立了两个门，即南门和西南门，“一厅两门”寓示着“一国两制”。香港厅的设立是香港回归祖国的象征，同时也表明香港在祖国大家庭里有着重要的位置。

筹委会第二次全会后，推选委员会小组于 4 月 13 日和 14 日在香港开展了咨询活动，征询香港各界人士对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的意见。随后，推选委员会小组和经济小组还在香港举行了小组会议。这是筹委会成立后第一次在港开展活动。由于咨询活动真正做到了“面向港人”，做到了民主、开放，并且咨询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所以，咨询活动得到了香港社会的积极反应。在咨询港人意见的基础上，推选委员会小组集中各方面的建议和想法，在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涉及的有关问题上，形成了一些原则性共识。其他小组如庆祝活动小组、法律小组等，都作了大量工作。

1996 年 5 月 24—25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珠海召开了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作出了以下重要决定：第一，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推选委员会产生办法的原则设想的决议》。第二，决定建立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建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筹建。第三，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教科书问题的决议》。

同年 8 月 9—10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使用暂行办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的通过，标志着筹委会为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所进行的工作开始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

筹委会于第四次全会以后，在香港公开组织了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报名工作。这项工作从 8 月 15 日开始，为期一个月。香港各界热烈响应和踊跃参与，共有 5789 人报名，使报名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

经过充分的准备， 1996 年 10 月 4—5 日在北京举行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全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入选的产生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这两个文件的通过，标志着与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几个重要办法都已出台。下一步推举第一任行政长官和选举临时立法会的有关工作将相继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众望所归

1996 年 11 月 15 日上午，由 400 名委员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举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并举行首次全体会议。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在会上讲话时指出，组建推委会是港人第一次真正民主参政，筹组特区的过程是香港真正民主的开始，而不是什么“ 香港民主的终结 ”。推委会完全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并兼顾了香港社会各阶层的均衡参与和各界别、各方面之间的大体平衡。

当天下午， 400 位推委会委员在已公布的八名第一任行政长官参选人名单的范围内提名第一任行政长官候选人入选。这八位行政长官参选人是：杜森、李福善、吴光正、余汉彪、区玉磷、董建华、杨铁梁、蔡正矩。根据《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候选人入选的提名办法及有关事宜的决定》，凡获得推委会 50 名以上委员提名者，当场可宣布为第一任行政长官候选人。因此，这次推委会首次全会举世瞩目。提名工作由筹委会主任委员会议主持，从下午 3 时开始，历时两个多小时，终于产生了 3 名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候选人：吴光正、董建华和杨铁梁。其中，董建华获得 206 位推委会委员的提名，杨铁梁获得 82 位推委会委员的提名，吴光正获得 54 位推委会委员的提名。

12 月 11 日——香港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董建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港人自己选择最高行政首长，体现了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和“ 一国两制 ”、“ 港人治港 ”、“ 高度自治 ” 的精神。它标志着英国在香港 150 多年的殖民统治即将结束，香港新时代即将开始。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深在开幕式的讲话中说，不久前，3 位候选人与推委会的委员们进行了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这种别开生面的答问，加深了大家对 3 位候选人的认识，既引进了公平、公开竞争的机制，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富于建设性。舆论称赞此举创造了香港的选举文化，这说明香港社会对这样的民主形式是欢迎的。

董建华当选后，海内外热烈祝贺。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任行政长官入选顺利产生是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它为香港特区实行“ 港人治港 ”、“ 高度自治 ”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香港舆论认为，董建华以 320 的高票当选，多项民意测验领先，说明他是众望所归的人物；他很强的根基是得到了广大市民支持，是个合适的人选；董建华当选，从北京到伦敦皆大欢喜，对香港来说是个吉祥之兆；董建华当选后所发表的讲话，为香港揭示出美好的未来。台湾舆论认为，董建华当选体现了“ 港人治港 ”，是“ 九七 ” 回归精彩的前奏，相信“ 九七 ” 后两岸交流将更趋密切。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对董建华当选也表示欢迎。英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相信他将成为香港特区一位值得信赖的第一任行政长官；美国务院发言人指出，董建华是第一位不是由英国任命而是经选举产生的香港行政长官：法国外长说，董建华担任此职“ 对法国所珍视的这个地区的未来是极其重要的。 ”

第二十六章　中国驻港部队诞生始末

1996 年 1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发布公告：中国驻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队组建完成。

公布这个消息的新华社电讯说：驻港部队由陆、海、空军部队组成，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驻港部队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使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防务的规定，力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和稳定，经过精心准备而组建成功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将于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时正式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支部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必要时，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请示驻军协助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驻军人员除遵守全国性的法律外，还要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驻军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英国在香港的驻军历史

英国侵华史特别是霸占香港 150 多年的历史告诉人们：英国人是靠“炮舰”政策把祸害人类的鸦片送入中国的；同样，他们统治香港，也要靠军队作后盾。

19 世纪中叶，英国强占香港的重要初衷之一，就是要把香港作为保护其在华利益的军事基地，作为进攻中国的大本营。为此，他们在香港驻扎了大量海军和陆军。飞机发明并用于军事上后，香港又成了英国陆海空三军的基地。平时，驻港英军一般在 1 万人左右。但在特殊时期，英国会向香港大量增兵。

1949 年，英国为防备解放军进攻香港，而向香港大量增派援军，使驻港英军从 1 万人上升至近 4 万人，拥有 4 个旅的陆、海、空兵力。皇家海军陆战队旅有 1 艘轻型运输船、4 艘驱逐舰和护卫舰、1 艘补给航空母舰和 1 艘医疗船；空军有一个战斗机中队（16 架喷火式战斗机）、一个远程战斗机中队（16 架黄蜂式战斗机）；陆军配有大量反坦克炮、野战炮、重型高射炮和坦克。力量不能说不强。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下令进攻香港，英国人虚惊一场。

此后，驻港英军虽然人数减至 1 万上下，但仍有巡逻艇、潜水艇，空军有 8 架直升机，还有守土的战斗机，军力一点也不弱。到了 1967 年，香港出现暴动，基于政治上敏感的因由，才把战斗机撤走。但纵使这样，香港还有不少重装备，例如陆军有侦察战车，海军还有驱逐舰等等。70 年代中期，英方削减军费，由于经费不足，各种重军备大量撤走，当时便有 36 架战斗机飞回英国，海军的驱逐舰亦被调走。

1976 年撤军后，香港虽然少了不少重型军备，但驻港三军的结构未变，数目也不少，男女军人总数约 1.1 万人。驻港三军的成员，大多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以来自尼泊尔的人数最多，约占军队的一半，其余一半则是本地招募的香港华人以及来自英国的军事人员，而唯一招募华人的英军单位，便是香港陆军服务团。香港陆军分驻在石岗与赤柱。

驻港英军待遇优厚，福利甚佳。据 1991 年的数字显示，普通英兵年薪

6660 镑，相当于月薪 7200 港元，但他和家眷所得到的享受比月收入 3 万元以上的家庭更豪华更舒适，这包括：位置好面积宽敞的住宅，家用设备齐全，租金低廉；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教育；私人会所及专用泳滩等。驻港英军的生活享受，即使高级白领亦望尘莫及。

自从英国占据香港以来，驻港英国三军指挥部一直设在添马舰基地。时至今日，添马舰的驻港英军总司令，一直出任香港行政局的当然官守议员，排名第二，仅次于港督，直接参与香港的行政决策。

添马舰基地不仅是驻港英军的总司令部，而且一直是英国海军的远东总部，此外，这个基地还是英国海军、外交部和经济主管部门设在远东的重要情报中心，拥有先进的设备和一批受过特殊训练的情报人员。据说，在香港总督府和汇丰银行总行里，都有秘密通道直达添马舰的地下室。

人们都知道香港是一个著名的商港，它为英国带来了不尽的财源。但大家却很少知道香港又是一个大军港，它给英国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军事价值。

英国凭着“船坚炮利”割占并“拓展”了香港，也靠着这支军队维持它在这里的统治，享尽了它提供的巨大军事利益。但是，在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过程中，英国却一直劝中国政府不要在香港驻军。

“驻军是中国主权的体现”

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央政府派不派军队去驻扎？这是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立场坚定，排除了任何阻止中国驻军的企图。

大约在第八轮会谈中，双方提出了后来引起长期争论的中国政府是否在未来香港驻军的问题。中方代表提出， 1997 年既收回香港，就必须驻军，因为这是国防的需要。但是，英方代表在谈判中多次提出中国不要去驻军。理由是：中国驻军问题敏感，人民解放军一到香港，港人就会惶惶不安，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中方代表问，你们英国可以驻军，为什么我们收回香港后作

为主权国不能去驻军？英方代表辩解说，这不一样。英国伦敦离香港很远，临时调兵很困难。你们离香港很近，驻军驻到深圳那边去嘛！后来英方又退一步说，你们有驻军权我承认，但平时不要来驻，只有在产生外来威胁情况下再去，没有外来侵略威胁不要去。有了外来侵略威胁要驻军，也要事先同特区政府磋商，特

区政府可以否决。这实际上是要对中国进行种种限制。

邓小平对驻军问题非常重视。 1984 年 5 月全国人大会议期

间，有关这一问题的个别说法，一度引起外界的误解。5 月 25 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会见前，他了解到这一情况，十分气愤，甚至拍了桌子。在东大厅会场，港澳代表、委员们与邓小平合影留念，记者拍照三分钟后本来可以退场，但邓小平突然说，你们别走，我有话，你

们要宣传出去。有人说中国不要驻军，这是胡说八道！英国外相跟我谈的时候也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香港，就有权在香港驻军。他接着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有权力在此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邓小平严厉辟谣，旨在批评英方对中国在香港驻军的再三干扰。过后，他又温和地同参加会见的港澳代表谈起如何认识驻军

问题，他说：驻军是象征性的，是维护中国主权的象征。港人治港是最广泛的自治了，除了驻军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象征了。驻军人数不必太多。

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跑到中国外交部去。他当时神经很紧张他说：听说昨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为驻军问题发了脾气，我们很惊讶。周南说，你有什么惊讶的！我们在谈判中一直在讲要驻军。这件事我们已经决定，不要另外打算盘。中方在香港 1997 年后驻军的坚决立场，迫使英国最后只好作出让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5 周年之际，中英联合声明刚刚草签。大批港澳同胞来到北京，庆祝这两件大喜事。但他们中有人对驻军问题仍心存疑虑。邓小平在会见他们时讲了下面这番语重心长的话：

“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我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①]

中英联合声明对驻军问题作了如下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驻军军费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中央政府派军队进驻香港，却一点也不要当地负担军费，与英国形成了鲜明对照。就在中英谈判期间，香港负担的驻港英军军费高达 2 亿美元。1988 年，港府与英国国防部达成新的协议，即香港负担驻港英军 65%的军费开支，英国则负担余下之 35%。随着驻港英军的逐步撤离，港府在支出在港英军军费方面开始减少，但在 1993—1994 年度仍然支出 16 亿元军费。正是依靠香港纳税人的大量金钱，驻港英军才得以享受极其优厚的薪俸和福利。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后，一些港人对中国驻军香港重起忧虑。英国以恢复港人的信心为由，又在驻军问题上大作文章，英国有的官员甚至声称，虽然中英联合声明赋予北京在未来香港驻军的权力，但因为北京政治风波影响到港人信心，所以这一问题仍需要谈判。在 1989 年 9 月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开会前，英方一直考虑要在这次会议上向中方提出重新谈判驻军问题。为此，英国曾酝酿出几个方案，一是准备建议中国在未来将军队驻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如驻在毗邻的深圳；二是准备建议中国在收回香港后削减驻港的解放军人数，比如只在香港驻不到五千的军队。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多次发表谈话，重申中国在驻军问题上一贯立场，使英方打消了上述计划。

逐步撤出香港的英军

进入 90 年代以后，驻港英军开始逐步撤离香港。

几年来，驻港英国海军已陆续卖出军舰，如巴基斯坦曾买走 6 艘，印尼也买去了一些。至 1994 年下半年，驻港皇家海军只剩下 3 艘军舰。这 3 艘军舰将服役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然后再出售，所得款项将由未来特区政府与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5 页。

英国军部按前者 75%、后者 25%的比例摊分。

英军驻赤柱炮台始于 1841 年。现在这个军营内的建筑物大部分于 1903 年兴建，驻守赤柱的是黑卫士兵团，共有 350 名单身士兵、300 个军人家庭及 20 名职员。1994 年 8 月 10 日傍晚，在黑卫士兵团第一营的号角手及风笛手的吹奏下，赤柱军营内的旗帜徐徐下降，驻守该营的黑卫士兵团陆续撤出。9 月 22 日，最后一批共 12 名士兵离开香港，从而结束了英军驻守赤柱炮台 143 年的历史。

1995 年，皇家香港军团被解散。皇家香港军团又名义勇军，于 1854 年 5 月成立，有近 1000 名成员，其中常规人员有 55 名，包括 10 名从英军惜调的正规军人，而其他人员均属志愿参加，有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士，其中主要是华人。义勇军的编制约 4 个侦察连、1 个本地护卫连、1 个训练连和 1 个总部连，还有一支由 60 多名女成员组成的队伍，负责提供支援服务，此外，另有一个少年领袖团，由约 300 名 14 至 17 岁的少男组成。皇家香港军团解散后，它在香港跑马地的总部，以及各种军需物品，包括大批来福枪、轻机枪、手榴弹、 110 部吉普车及 1 辆可运载 40 至 50 人的军用卡车，均转赠予港府其他部门。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须到 1997 年 7 月 1 日才能进驻香港,但要为进驻早做准备。其中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就是要为未来的中国驻军商定好住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也经历了一番波折，比如 1989 年后冒出了添马舰基地迁址风波。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经过长达 7 年的军事用地谈判，终于在 1994 年 6 月 30 日结束的第 29 轮全体会议上就军事用地移交问题达成全面协议。中英双方同意将 14 幅军事用地在 1997 年 7 月 1 日移交给中国驻军作防务用途，并将 25 幅军事用地在驻港英军毋须使用时交还港府。港府预计该 25 幅总面积达 140 公顷的军事用地将带来高达 650 亿元收入。港府相信转为民用的军事用地可兴建约 1.5 万个住宅单位，将有助于压抑楼价。

英方同意在 1997 年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的 14 幅军事用地，包括地价高昂的金钟威尔斯亲王军营，威尔斯亲王大厦将成为解放军驻港总部，其他市区用地还有尖沙咀枪会山军营、九龙塘的澳士本军营， 14 幅用地占地总面积达 2750 公顷，其中 2263 公顷为青山练靶场，而余下的 13 幅用地，总面积约有 485 公顷。军事用地协议是自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成立以来，双方所曾达成的众多协议中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协议之一。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郭丰民指出，中国政府在军事用地问题上的一贯态度是，首先满足防务军队的需要，同时要照顾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1994 年 8 月 15 日，在海陆空三军组成的仪仗队欢迎下，最后一任英国驻港三军司令邓守仁少将抵达添马舰威尔斯亲王大楼，举行就职仪式。他表示，会尽快认识香港的情况，并希望与中国保持接触，确保香港能平稳过渡。51 岁的邓守仁，是第 61 任，即最后一任驻港三军司令。令邓守仁最伤脑筋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不断大幅减少驻港英军人数。英军驻港的人数到 1995 年初要大幅度下降约 6 成半，由 1994 年的 8000 人，减至 3000 人左右。

由于中英双方已就军事用地安排达成协议，以后的工作就是按协议进行详细规划。因此，最后一任英国驻港三军总司令的另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会面，并就香港军事用地及设施移交安排进一步具体磋商。在防务交接问题上，能否做到减少磨擦和误解，增强双方合

作，的确也是对中英两位司令的考验。

到 1996 年 8 月底为止，驻港英军人员共约 3250 人。8 月 29 日，英国驻港三军司令邓守仁公布了英军撤离香港和各种设施陆续关闭的计划和详细日程： 1996 年 8 月 30 日关闭第 50 香港修理厂，同年 9 月 15 日关闭驻港皇家空军石岗基地，同年 12 月 14 日解散香港军事服务团，1997 年 4 月上旬关闭添马舰海军基地，5 月至 6 月间解散香港常规支援兵团、关闭九龙塘军营，6 月 30 日关闭威尔斯亲王军营等。

江泽民主席关怀驻港部队的组建

1994 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的要求，开始组建驻港部队。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民都对这支部队给予极大关怀并寄予厚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自关心这支部队的建设。 1995 年 6 月，他为香港驻军亲笔题词：“ 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

早在 1990 年 10 月 2 日，有关部门起草的一份《关于组建驻港部队的报告》送到了中南海，放在了江泽民主席的办公桌上。这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41 周年国庆的第二天，又正值亚运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政务繁忙的江泽民主席认真地审阅了这份报告，写下了他对驻香港部队的第一个指示：关键是进驻的部队政治上要特别过硬，事先要做过硬的思想工作。这一重要指示，为驻香港部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此后，江泽民主席一直关注、关怀着这支部队的组建进程，对组建工作做了一系列指示。他特别关心驻港部队的兵员质量，强调这是一个要十分重视的问题。

一年后，以陆、海、空三军编成的驻香港部队初具规模，各方面建设迈出了新的一步。在这期间，江泽民主席多次向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不同于全国解放时大军南下，不同于“ 好八连 ”进南京路，是按“ 一国两制 ”的原则办事，香港是“ 港人治港 ”，对此驻港部队思想上要有充分认识。

此后，江泽民主席在几次会见有关部队领导的谈话中，都谈到驻香港部队建设问题，希望将来派到香港的部队，要在香港市民中树立一个非常好的形象。

在驻香港部队组建过程中，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等军委领导都先后到驻香港部队了解情况，调查研究，解决组建中的问题。

1995 年 3 月，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主席在解放军代表团会议上讲话时，系统地提出了驻香港部队的建设标准。他指出，驻香港部队建设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在政治思想、军事训练，作风纪律、管理教育等方面，都应该是一流的，一定要充分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为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地区的领土、领海、领空的主权，香港驻军由陆、海、空三军部队组成，主要编成有步兵旅、海军舰艇大队和航空兵团，总兵力将根据香港地区防务的需要确定，不超过多年驻港英军的规模。驻港部队装备有执行防务任务所必须的现代化武器。

中央军委还规定了这支部队进驻香港的主要任务：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防务。必要时，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请求，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部队进驻香港后，将实行封闭式管理，不会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

威武文明的英雄部队

在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关怀下，驻香港部队都是由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英雄部队组成。

驻港部队步兵旅的前身是著名的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即“红一团”）。“红一团”诞生于 1927 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过历史上著名的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平型关战斗和辽沈战役。这支部队曾先后涌现出击毙日寇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功臣炮连”、举世闻名的强渡大渡河“十六勇士”、表现出中华民族宁死不屈伟大气节的“狼牙山五壮士”等一大批先进单位和英雄模范人物。罗荣桓元帅、粟裕大将、杨得志上将等 142 名将帅，都曾在这支部队战斗和工作过。在香港驻军的陆军部队中，还有一部分官兵是从著名的“塔山英雄团”等英雄团队中抽调来的。

香港驻军海军舰艇大队是一支海上劲旅，在解放万山群岛战役、“八·六”海战等战役中，建立过卓越功勋，涌现出了“海上先锋艇”、“海上英雄艇”、战斗英雄麦贤得等英雄集体和个人。近年来，这支部队多次圆满完成了边境战备执勤以及海上重大演习任务，受到上级的好评。

香港驻军航空兵团同样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为保卫祖国领空作出过卓越贡献。他们参加过保卫祖国领土等重大军事行动，多次完成保障导弹、卫星、军事科研任务的飞行任务，还担负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专机飞行任务。这支部队多次参加抢险抗灾，在营口地震、唐山地震、河南驻马店水灾和大兴安岭火灾等抢险抗灾中，他们团结奋斗，屡建功勋。

香港驻军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在人员素质方面也堪称一流。

军官来自全军各个部队，绝大多数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经过院校正规培训，选调军官时，除政治上必须合格外，对工作、业务能力和身体素质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

这支部队的司令员刘镇武是一位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将军。他是 1964 年大比武的尖子，也是一个“书迷”，曾在解放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深造过。他在负责某集团军工作期间，运用科学管理方法管理部队，收效显著；他负责组织并参与撰写的《军队科学管理》一书，成为部队的畅销书。

该部队政治委员熊自仁政治工作经验丰富。他在任师政委期间曾一年接待过前来参观的 35 个国家的驻华武官，深受好评。他所在的师被广州军区评为全面建设先进单位。

这支部队的士兵文化程度都在高中以上，男军人要求身高在 1.65 米以上，女军人在 1.60 米以上。入伍后要经过一年的教导队“学兵”训练，然后再补入部队。

驻港部队从组建起，努力学习、工作，就是为了让港人放心。驻港部队有个法律处，一批取得法学硕士学位的青年从高等学府被选调进来，成为部队普及法律知识的“专家”和“教授”。驻港部队的干部和战士都能自觉刻苦学习法律知识，他们还把学到的有关知识运用于实践，用法律手段处理、

解决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收到很好的效果。来部队参观的嘉宾们听到这方面的情况介绍后纷纷赞扬官兵法制意识强。

据了解，驻港部队组织官兵先后学完了《香港法律读本》、《香港现行法律选编》、《基本法一百问》等。他们还多次聘请法律专家讲授有关法律知识，举办学习法律知识竞赛，并专门研究制定了《香港驻军军人道德行为规范》，人手一册，要求官兵熟读熟记、学好用好，以增强官兵在特殊环境中遵纪守法的观念。

驻港部队士兵们文化素质较高，而干部的文化素质更高，他们多数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在一些技术单位里，还有研究生、博士生群体。在步兵旅，连队每周都安排专门时间学英语和粤语。有不少战士的英语阅读、会话能力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可以这样说，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强将。

展望未来， 1997 年香港回归后，将在这颗“ 东方明珠 ”上空飘扬的，不仅是鲜艳的五星红旗，而且也有雄伟的八一军旗。这两面旗帜是中国在香港行使主权的象征，缺一不可。

第二十七章　“我愿活到 1997 年，到香港站一站、看一看”

1997 年 7 月 1 日是一个光辉的日子。

1997 年 7 月 1 日是中华儿女的盛大节日。

1997 年 7 月 1 日的零点、零分、零秒，高悬在这块中国土地上 150 多年的英国米字旗将颓然降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香港上空。

香港回归犹如一个梦，百年一觉香港梦！此时此刻终于梦醒成真！

这一天，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将灯火通明，璀璨晶莹，迎来一个狂欢的不眠之夜。在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将欢声雷动，彩旗飞舞，人们将载歌载舞，欢呼雀跃，欢庆这一光辉的时刻。祖国母亲敞开她的双臂，热烈拥抱久别的游子……

为了这一时刻，许多海内外华人和国际友人，早就在香港的丽晶酒店、香格里拉酒店、新世纪酒店、海景假日酒店预订了 1997 年 6 月 30 日沿海临街的千余套房间，他们要亲眼目睹这一振奋人心的瞬间，以免留下终生的遗憾。

为了这一时刻，香港人开始挑灯学习中国法律和普通话；在许多商店里人民币已开始流通；矗立在香港大街小巷的带有皇冠标志的邮筒将不知不觉地全部消失；取消了女王头像的新版邮票和硬币不知何时已悄然出现在香港市面上……

此时此刻，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起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为香港回归祖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邓小平。

邓小平“五下香港”的历史

邓小平作为力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一生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香港情结是与生命俱在的。这情结不仅表现在他的晚年，呕心沥血，大智大勇，为香港的回归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正确道路，而且扎根于他童年的爱国抱负之中，扎根于他青年时代的革命征程之中，扎根于他在民主革命时代奔走革命而五次赴香港的经历之中。

邓小平在 1920—1931 年间这段革命生涯中，曾经五赴香港，或路过，或停留，或参加会议谋划革命大计。这位坚强的革命者那一次次风尘仆仆、来去匆匆的身影，将永远留在香港史册的画卷上，他追求真理、勇往直前、奋斗不止的光辉足迹，深深地印在了祖国的这片热土上。

一经香港：赴法国留学

邓小平，　1904 年 8 月 22 日诞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童年名叫邓先圣，学名邓希贤，邓小平是他在以后从事秘密工作时的化名。他有一个姐姐、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父亲邓文明，清末就学于成都政法学校，以后长年在外做事。母亲淡氏早逝，继母夏氏，是一位船工的女儿。

邓小平 5 岁开始读私塾，主要学习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7 岁转入新式小学读书，　14 岁考入广安县中学。此间，“五·四”运动爆发，也波及到四川，正在中学读书的邓小平积极参加了学生的游行、罢课、宣传，

组织爱国团体等活动。“五·四”运动使他萌发了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通过对民主和科学的宣传，使他认识到，国家要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同年，在父亲的支持下，他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校期间，他又和同学一起参加了抵制日货等活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向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迫切希望去法国勤工俭学，学成后报效祖国，报效家人的培养和希望。

1920年夏，他从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与同学邓小圣，胡伦等共85人从重庆去上海。9月11日从上海乘轮船起程，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等地赴法国。 10月10日，他们在船上举行武昌起义9周年纪念活动，大家聚集在大厅，向国旗三鞠躬，高唱国歌，演新戏等，以表示满腔的爱国之情。 10月19日邓小平抵达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开始了他人生之旅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留学法国。

当时的法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中的一批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邓小平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启发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各种宣传活动， 1922年，经周恩来介绍，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周恩来开始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赤党》月刊的主编，邓小平参加了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专门负责刻版油印。同年下半年，他转入千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人之一。 1925年，他受党组织委派，任中共里昂区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由于他从事革命活动引起了法国警察当局的注意，党组织安排他离开法国，去苏联学习。 1926年1月7日，他和傅钟、任卓宣等一道，从巴黎乘火车经柏林赴莫斯科。

在法国勤工俭学的5年时间里，邓小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锻炼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二过香港：前往广西领导百色起义

1926年1月，邓小平到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先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后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主要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与军事等，他尤其热心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有关知识，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由于他擅长辩论，被同学们称为“小火炮”，他的组织才能很快被人们所熟悉。

1926年5月，中国著名民主派军人冯玉祥到达苏联，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名誉学生”，他要求派一批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到他的部队工作，邓小平等20多人被选中。遵照党组织的安排，邓小平于1926年冬离苏回国，1927年3月到达西安，应聘在冯玉祥创办的“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还担任了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捕杀革命工人和共产党人。6月10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前往郑州，与被反革命逆流所动摇的冯玉祥举行和谈，密谋反共。6月20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举行会议，达成反共反苏协议。随后，冯玉祥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名曰“训练”，实力礼送出境。邓小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离开西安转赴当

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任中共中央秘书，列席了著名的中共中央 1927 年召开的“ 八七会议 ”， 1927 年 8 月至 1929 年 7 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李维汉、任弼时等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处于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邓小平在协助党组织转入秘密斗争、掩护共产党员转入地下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9 年 3 月，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因争夺势力范围而爆发蒋桂战争，蒋介石通过与李宗仁有矛盾的桂系名将俞作柏为媒介，策动驻兵武汉的桂系师长李明瑞倒李拥蒋，结果李宗仁、白崇禧部队全体崩溃，俞作柏、李明瑞率部占领广西南宁，俞作柏任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省绥靖司令。俞作柏的胞弟俞作豫是中共党员，俞作柏、李明瑞想借共产党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故暗中与共产党接触，请求帮助，回广西后又酝酿反蒋。在此重要时刻，中共中央抓住有利时机，在同年 7 月，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做他们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全面领导中共广西党的组织，准备武装起义。不久，邓小平在龚钦冰的陪同下，由上海来到香港，听取了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介绍广西的情况，然后到达南宁。在南宁时，邓小平化名邓斌，以秘密方式同广西省的党组织负责人联系，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研究部署了广西省党的工作，并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卓有成效地对俞、李做说服工作，使关在狱中的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获释，有些被任用在军队和政府中工作。俞、李还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开展工农运动，支持恢复工会，同意成立农会，赞成武装左右江地区的农民自卫军。同年 9 月 27 日，俞、李通电反蒋，并出兵攻打广东，但因没有听从邓小平的劝告，仓促发兵，使反蒋斗争陷于失败。

在俞、李反蒋失败后，邓小平一方面继续说服俞、李，动员他们坚持反蒋。另一方面又积极筹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准备武装起义。9 月底，邓小平、张云逸把已经掌握的部队开赴左右江地区，秘密将南宁军械库的武器弹药送往百色。10 月中下旬，邓小平在百色召开军委会议，具体制定了百色武装起义计划和行动纲领。 11 月上旬，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在左右江创立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七军，任命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1929 年 12 月 11 日，即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之日，巨色起义开始，起义军迅速占领了百色地区，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权。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任政委，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雷经天。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重要起义，给予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三赴香港，商讨筹划对广西红军的工作部署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赴广西开展革命活动以后，进一步推动了广西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对广西的工作非常关心，决定 1929 年 12 月上旬在香港召开对广西红军工作部署的讨论会，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要求邓小平代表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前往汇报工作。12 月上旬，邓小平从龙州出发，中旬到达香港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 补充报告 ”，对广西起义准备工作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作了扼要的说明。

在补充报告中，邓小平阐述了广西的武装起义的地点不能在南宁，因为那里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准备好，群众也还没有发动起来。关于起义的具体时间，他认为不能机械地确定，要根据准备的情况和其他条件来决定。关于正

在准备中的龙州起义，邓小平汇报了在广西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进展情况和起义的准备情况，提出发动龙州起义的关键是发动群众斗争和解决动摇的不坚定的旧军官问题。关于起义以后的发展方向问题，他认为，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发动以后，首先是左右江两支武装要取得联系，然后向湘粤边界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等部队会合的前景。邓小平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由于他实事求是，十分注意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和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使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四过香港：重返广西主持召开左江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指示

进入 1930 年以后，广西的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2 月 1 日，按照邓小平和广西前敌委员会的部署，李明瑞、俞作豫率部在龙州举行起义，宣布成立左江苏维埃政府和红八军，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邓小平任红七军、红八军前委书记和总政委，还兼红八军政委，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李逸任左江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的左右江红色革命根据地，已拥有 20 多个县， 100 多万人口，是全国瞩目的一块红色根据地。

2 月上旬，红八军主力离开龙州，转道隆安，准备与红七军一起攻打南宁，在隆安与敌人展开激烈遭遇战，敌我双方伤亡惨重。

2 月 7 日，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从上海出发，经香港，越南，回到龙州。他认为，当时攻打南宁的时机尚不成熟，立即电告红七军停止攻打南宁，命令红八军撤回龙州。红八军撤回龙州后，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左江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并根据当时故我形势的分析，建议红八军撤出龙州。

在启程前往左江根据地的路上，邓小平与红八军第一纵队共走一程，途中召开党员会，帮助一纵建立了党总支委员会，3 月 7 日，还率领红八军围攻靖西县城。

五经香港：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1930 年 3 月 10 日，邓小平离开左江根据地到右江根据地和红七军驻地传达中央精神，在此之前，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七军也退出百色，5 月中旬，蒋桂战争再次爆发，红七军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挥师攻打百色，使这一山城重新回到人民革命政权手中。

同年 9 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奇到达右江根据地，他大力推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路线，宣传“ 要迎接革命高潮，争取一省和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 ”，并指示红七军离开左江根据地，向东发展，去攻打柳州、桂林等中心城市，目的是阻止两广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北上增援，以保证中央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然后攻占广州，完成南中国革命。

邓小平不同意邓奇的意见，他认为，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的统治已经恢复，红七军（这时红八军因在左江根据地受挫，也并入红七军）只有几千人，力量不足，要攻下这些中心城市是没有把握的，现在应该团结内部，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红军，壮大自卫的力量以逐步向外扩展。但邓奇以“ 谁不执行命令，谁就是反对中央 ”相要挟，前敌委员会多数成员也主张服从中央指示。11 月，红七军在攻打柳州的途中遭敌袭击，伤亡惨重；

12 月，在北上攻打桂林的途中又严重受挫。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张云逸耐心说服中央代表邓奇，果断地修改了作战计划，不再攻打中心城市，而是向湘桂边界挺进，再通过湘粤边界，向江西挺进，争取与中央苏区靠拢，同朱德、毛泽东的中央红军会合。

1931 年 1 月，红七军进抵广东的乐昌县境内，得知中央已结束李立三路线。2 月，到达中央苏区的游击区——江西崇义县境内，并与中央赣南特委取得联系，这时，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已改为团委。经团委集体研究决定，由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于是，邓小平离开崇义经香港赴上海。到达上海后，起草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地叙述了红七军的发展过程，总结了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

当年 7 月，英勇顽强的红七军，经过 7000 余里的长途跋涉和艰苦奋战，终于到达中央苏区的于都、兴国境内，与中央红军会师。

同年 8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邓小平也前往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 1933 年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举行长征。邓小平在长征途中于 1934 年 12 月第二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以此身份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回首往事，在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年代，在香港这片被人强占的祖国土地上，谁能知道，一代英豪邓小平，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留下了多少来去匆匆的足迹，留下了多少挫铬有力的声音，留下了多少痛心疾首的愤怒和抗议，留下了多少热切的救国豪情和沉甸甸的思考。

盼再下香港的那一天

香港的百年历史，是中国人民的国耻史。百年国耻，一朝得雪。香港即将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人们在盼望着 1997 年 7 月 1 日的到来，曾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了 70 多个春秋并同香港有着深厚情结的邓小平，更是热切而深情地期盼着这一天。

他曾多次谈到， 1997 年他要去香港。 1997 年 7 月 1 日，即香港回归之日，邓小平将是一位 93 岁的老者，但他决心已下，要去香港看一看。看一看这片曾经被人宰割而今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中华热上，看一看过去饱受凌辱而今扬眉吐气的 600 万香港同胞！哪怕去香港“呆一分钟也好”，“就是坐着轮椅也要去”！

多么朴实无华的语言！

多么坚强的毅力和决心！

邓小平爱国的赤子之心，爱港的一往深情，淋漓尽至，溢于言表，令人肃然起敬！

1984 年 10 月 3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喜气洋洋。此时，邓小平的心情格外喜悦，他就要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节观礼团的代表。

早在这一年的 9 月 18 日，中国与英国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该协议于同年 9 月 26 日在北京草签：12 月 19 日由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从此，香港开始进入过渡期。邓小平听说，部分港人对香港的未来还有些信心不足，他要利用会见的机会，给港人加把劲！

邓小平在会见厅落座后，看到满屋子都是港澳代表，非常高兴，他说，“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①]

在会见前，他已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参加观礼的人员是港澳各行各业各方面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以，他向有关人员表示，要利用这个机会多讲几句。他说：“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这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在今后十三年和十三年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大家共同努力，这个目标肯定可以实现。”[①]

说到这里，邓小平神采奕奕地环视了一下接见大厅，对被接见的人群深情他说，“一九九七年以后，在座的六六十岁的人，那时精力就差些了，但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年轻人有优势。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②]

听了邓小平的这番讲话，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倍受鼓舞。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 1987 年 4 月 16 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讲话，他十分关注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同样深情他说过：到那时，就是坐着轮椅也要到香港去站一站，看一看！

到香港去站一站，看一看！这反映了邓小平对香港回到祖国怀抱的热切盼望之情，也反映了他对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

山常绿，水常青。

人虽老，心尤青。

从邓小平第五次赴香港的 1931 年算起，到 1997 年已是 66 年的悠悠岁月。在弹指一挥之间，中国已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为今天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将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也已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繁华之地。当 1997 年的那一天，邓小平再一次站在香港这片热土上时，他会有多少感慨啊！

让我们共同为这位老人祝福！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2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2 页。

第三编　天堑变通途 “一国两制”启示录

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符合香港同胞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英国的利益。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是非常伟大的决策，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向前看，英方要承认现实，明白平稳过渡的重要性。

香港问题的解决为“一国两制”率先垂范，将使祖国统一大业展现非常美好的、广阔的前景。

——江泽民

“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一九九七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①]邓小平不止一次表达过这样的愿望，甚至说过：就是坐着轮椅也要到香港去站一站，看一看！[②]邓小平，这位本世纪屈指可数的风云人物，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愿望呢？世界如此之大，特色各异的名城胜地不胜枚举，为什么偏偏要去香港呢？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曾经五去香港，为什么对香港还如此恋怀呢？答案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 1997 年中国将收回香港。这意味着香港被外国人统治的历史将彻底结束，香港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而这一进程的实现是与邓小平的名字分不开的。曾几何时，大英帝国用炮舰和鸦片迫使清王朝将香港束手割让出去，而今，英国人不得不将他们心目中的“东方明珠”归还中国。1997 年，还标志着祖国统一大业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特别是“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得到了第一次实践。这一构想不仅指导了香港问题的解决，而且也指导了澳门问题的解决，更为今后进一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一国两制”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它还为解决其他国内问题，甚至国际上的各种争端提供了新思路。“一国两制”在难以跨越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而这一伟大构想的发明人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作为一位久经考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在被人为分裂的国家实现统一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广阔视野。他崇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依据中国国情和世界现实而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使和平统一祖国有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使维护世界和平又增添了一份希望。“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青对祖国献上的一份厚爱，是这位超凡的政治家给人类社会奉上的一份厚礼。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73 页。

② 《再造中华辉煌》第 232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第二十八章　中国“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这是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说的一句话。这表明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正是他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心使得他执著地追求实现祖国统一这一目标，发出了中国“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铮铮誓言。这誓言表达了全中国人民要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强烈愿望和坚定决心。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

俗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中华民族却一贯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追求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征。历史上的分裂，从来只是暂时的，而且是不得人心的：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祖国大陆几十年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各族人民所期盼的国家统一。然而，这种统一还是不完全的：宝岛台湾还同大陆处于分裂状态，被英国殖民者和葡萄牙殖民者所侵占的我国神圣领土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恢复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一直是全中国人民的崇高愿望。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条件已日趋成熟，因此，妥善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中国恢复行使对这两个地方的主权，尽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的局面，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成了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就是适应这种形势和使命的需要而确定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它顺乎全民族要求统一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爱国主义的最好体现。

当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和飞跃，使占世界 1/5 人口的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并迅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振兴之路的时候，他并没有忽视祖国的统一大业。他及时提出，由于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解决台湾、香港问题，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强调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①]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既是对海内外所有中华民族子孙的殷切希望，又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情感和意志的集中表达，是共产党人告示天下要付诸实践的行动誓言。

为何统一问题如此重要，令中国共产党人为之不懈努力，让邓小平难以释怀呢？

纵观世界历史，凡强盛兴旺之民族都是统一的，统则兴，分则衰。实现统一成了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为之奋斗的事业，穆罕默德曾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持宝剑，统一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帝国曾雄居西亚、北非数百年；俾斯麦用“铁血政策”统一了德国，德意志民族自此脐身于世界列强之列；当美国南方奴隶主们举行叛乱，分裂联邦时，林肯奋起反击，进行了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9 页。

场被马克思称为“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战争”[2]的内战，从而维护了美国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赞成国家统一的。恩格斯在谈到当年德国的分裂状态时说：“统一会使我们不蹈华沙和布隆采耳的覆辙，只有统一才能使我们在国内和国外强大起来。”[1]斯大林曾经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2]可见，邓小平关于国家一定要统一的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就会感触到其中那浓浓的“一脉相承统一情”。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由分裂到统一，从小统一到大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同时，其间充满着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正是由于不断统一，才使我们伟大的祖国今天成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世界大国。历史表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统一的时间要比分裂的时间长得多。如果从秦始皇灭六国，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算起，大的长时间的分裂共有 600 年左右，只占这段历史的 1/4 的时间。而且，统一与分裂交替发展的规律是：大的分裂、时间越来越短：而统一的时间，则越来越长；统一的规模，越来越大；统一的程度，越来越高。

正因为这样，很多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在统一问题上有所作为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之所以为后人赞颂，就是由于他们在国家统一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实现和维护统一也是中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一个共识。孔子提出“大一统”的主张；孟于主张“定于一”，认为统一之后才能安定；荀子一再称道商汤、周武王天下为一的业绩，认为“天下不一，诸侯欲反”；吕不韦提出“一则治，两则乱”的观点；董仲舒发挥了孔孟“大一统”的主张，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康有为面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爪分，大声疾呼“中国只可一统，万元分立之理，更无分为联邦之理也”；为国家统一奋斗了一生的伟大的孙中山先生说，“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统一起来才是“真民治”，才能“与列强共跻于平等之域”。这些主张都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各兄弟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民族间有过相互的战争，甚至建立过不同的政权，存在过整个民族内部的割据和分裂，但是，实现国家统一则始终是各民族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为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固然，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为国家的统一打下了基础，起了主导作用，但各兄弟民族也都为结束国家分裂的状况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中国处于严重分裂状态的南北朝时期，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氐族人行坚建立的前秦，都一度统一了北方许多地区；鲜卑人拓跋煮统治的北魏，最后消灭了北方割据的小政权，结束了十六国的分裂，统一了整个北方，为国家重新走上大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后，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女真族完颜部建立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344 页。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299 页。

[2] 《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 503 页。

的金国，也曾统一了北方的广大地区，为国家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创造了条件。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则统一了全国。特别是清朝，使国家实现了超过历代王朝的大统一。正如周恩来所评价的那样：“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清朝起了统一的作用。”[①]

在中国走向大统一，民族实现大融合的过程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之所以没有因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战争而受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大统一有着坚实的基础，它是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加强并相互促进发展的结果。而统一的实现，又进一步推动了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使各民族、各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分裂时期，大都是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心不稳，经济停滞。国家统一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国家太平，环境安定，人民群众可以较为安心地从事生产，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同时，统一也有利于各民族、各地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在每次大的统一之后，经济文化都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为人们所称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在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时期是难以出现的。有理由说，只有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相对稳定，才有利于国家励精图治，有利于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也才能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中华文化，使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对亚洲乃至对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消除割据、分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始终是主流，尽管统一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一事实也表明，中华民族是有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各族人民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都心向祖国，愿意亲和共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愿意从祖国分裂出去。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是人心所向，民意所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趋势。

要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她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爱国传统，从成立时起就勇敢地担负起反帝反封建以争取革命胜利、结束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重任。在 1922 年“二大”的《宣言》中，明确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为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奋斗目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打倒军阀、消除内乱的北伐战争中，共产党积极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发动群众，英勇战斗，给北洋军阀以沉重打击，统一了半个中国。在以后 20 多年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以解放全中国为己任的。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祖国大陆获得了真正的统一。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①]

但是，在 1949 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退踞台湾后，出现了中华民族被人为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62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63 页。

地分割在台湾海峡两边的局面，祖国未实现完全的统一，这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同时，被英国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占领的香港和澳门，也尚未回归祖国，这是我们民族肌体上的巨大创伤。这些都是有关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尊严的大事，因此，作为集中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的政治家们，自然是深切关注的，并且要为解决它而努力奋斗。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直到 80 年代之前，解决这一问题一直未能真正纳入议事日程。

到了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振兴之路。而指引中国人民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便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他在大力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的同时，已开始了对如何实现国家统一这个重大政治工程的设计。早在 1978 年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邓小平就说："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不久，他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又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但是要统一。"[②]到 1979 年元旦，邓小平更明确地提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能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①]1982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他又将"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列为中国人民 80 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②]1984 年 6 月，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时，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需要解决。同年 10 月，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③]这样，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了祖国统一的任务，而且还指明了具体目标，即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由于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属于同一种性质，都是要收回被外国殖民主义者所占领的领土，而且前者又没有后者那样引人注目，所以邓小平当时并没有再单独提出澳门问题。实际上，香港问题解决了，澳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邓小平所提到的"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前者涉及到国穹国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国内战争造成的、但间接地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关于香港，本书已有专门部分介绍。

就澳门来说，那是葡萄牙人利用明王朝的腐败无能强行占有的。1557 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远航东来的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广东地方官吏得以在澳门定居，但他们被要求必须向中国地方当局缴纳地租和税款。直到 19 世纪中叶以前，澳门仍为中国所有。可是，到了 19 世纪中叶，正当殖民地摆脱宗主国的奴役，建立独立国家已成为一股新的历史潮流之时，当葡萄牙国力日趋衰弱，其最大的海外殖民地巴西已于 1322 年宣告独立之时，腐败的清王朝反而在鸦片战争之后丧失了澳门。 1849 年，葡萄牙人赶走了清朝驻澳官员，并相继侵占了澳门半岛南面的凼仔岛和路环岛。 1854 年，葡萄牙人又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同时任命葡"兵头"为总督，拒绝再向当地政府

---

②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 304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5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9、84 页。

缴纳租税。1887 年，腐朽的清政府先后在里斯本和北京与葡萄牙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北京条约》，其中规定：“ 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澳门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 ”。这样，澳门便成了有不平等条约为依据的葡萄牙的占领地，澳门人民深深陷入了与祖国相脱离的痛苦之中。

曾经有这样一首诗歌，充分表达了澳门人民的心声：

你可知 “ 妈港 ” 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枢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 “ 澳门 ” ！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可见，澳门问题的性质，同香港问题一样，也是一个恢复中国对其行使主权的问题。选择适当时机，解决澳门问题同样是势在必行的，收回澳门，同样是 “ 解决中国统一问题 ” 的一项重要内容。

台湾也曾有过沦为外国人占领地的历史。早在 1624 年和 1626 年，荷兰、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就曾入侵台湾，将台湾变成他们的占领地。 1662 年，民族英雄郑成功赶走了殖民主义者，收复了台湾，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894 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除大量赔款外，还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直到 50 年后，即 1945 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才归还中国。

然而，随后由于国共和谈破裂，国内战争重起，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战败，于 1949 年退踞台湾，造成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的局面。这是我们民族的不幸，它给海峡两岸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40 多年的隔离，如一觉长梦。昔日跟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将士当年少小离家，而今却垂垂老矣，他们何尝不想返回故里寻旧梦，怎能不大声呼喊：“ 我要回家！ ” 对于在台湾长大的青年人来说，他们虽不见长江水，但梦里时常把长江回；虽不见黄河壮，但梦里常见黄河美。据台湾民间的一次民意统计资料表明，大多数台湾青年大学生赞成统一，认为中国统一比一切其他个人价值更重要。1950 年 6 月，香港调景岭难民营，有极少数的人为了表示其对国民党的忠贞不二，在手臂上刺上了 “ 反共抗俄 ” 四个字，但在 1987 年国民党当局允许回大陆探亲之后，这些手臂上刺有 “ 反共抗俄 ” 四个字的人为了回家探亲，不惜忍受痛苦，使用腐蚀剂法除这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羁居台湾后一直思恋故乡，在他辞世前两年（1964 年 4 月）写下了这样动人心弦的诗句：“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 亲莫过于骨肉，痛莫大于分离。台湾海峡本来是中国人民往来的通道，现在却成为隔绝两岸人民的鸿沟。这是人间悲剧。只要台湾与祖国大陆一天不统一，这种悲剧就一天不能结束。人心思合，心向统一，此乃理所必然，势所必至。

总而言之，我们国家存在的无论是香港、澳门这类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是台湾这种国内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是终究要解决的，都必将要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条件成熟之后被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十九章　同为炎黄子孙和为贵

为实现祖国统一，海内外的政治家们提出了许多方案，然而，最切合实际、最行得通的方案就是邓小平所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称“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邓小平集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而提出来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创见。而提出这一科学构想，如同他在其他方面的创见一样，首先就是依据中国的现实国情。正如他本人所说：“‘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①]这个“中国的实际”，既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的实际，也包括大陆的实际。而这个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的统一方案的精神实质就是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是人心所向

实现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然而，如何实现统一，却是一个关系到统一能否顺利实现、民族是否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大问题。纵观中外历史，统一的实现大都是通过战争，或以武力为基础来解决问题的。手持三尺定山河。然而，用这种方式实现的统一，往往都是以生灵涂炭、民生调敝为代价的。正所谓“疆场上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后，毛泽东便号召“宜将剩勇追穷寇”，而国民党军队负隅退守台湾之初，中国共产党乃积极准备渡海作战，并庄严宣告：“绝不能容许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的任务就是要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解放军厉兵秣马，万船待发，为渡海解放台湾而弓上弦、剑出鞘。而国民党政权在退守台湾后惊魂未定，全岛笼罩在一片沮丧气氛中时，仍高弹“反攻大陆”的滥调。朝鲜战争的爆发，虽然没有给蒋介石集团“反攻复国”的机会，但却使之意外地得到一张“人寿保险单”，台湾海峡有了美国第七舰队的把守，同时美国又承认了国民党政权，恢复了对之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蒋介石集团又绝处逢生。于是，中国共产党预定的渡海作战的计划受到阻碍，统一台湾便成了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在海峡两岸处于紧张的敌对状态时，大陆的口号是：“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当局的口号是：“反攻大陆！”双方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都意欲将对方消灭干净之。　1958 年 8 月 23 日，大陆采取“万炮齐轰金门”的行动，金门方面也不示弱。炮火中，距金门不足 3000 米的大峪岛上，大多数民房化为废墟。如此大规模的炮战，　1962 年又发生过一次。长期的军事对峙，使国共双方在这一带形成了一条以“白哈”（厦门与金门之间的一块巨大白色礁石）为习惯标志的“楚河汉界”。

40 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大陆没有解放台湾，台湾也没能反攻大陆。统一何时才能实现？该怎样实现？提出解决这一任务新思路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身上。邓小平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超凡气魄和胆略，勇敢地面对现实，在提出“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的同时，又提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①]“我们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84 页。

[①] 《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1 日。

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和完成我国的统一。”[②]因为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是历史的呼声和全中国人民的心声。

为什么邓小平在 70 年代末提出和平统一祖国，不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呢？这当然不是随意所想，或标新立异。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当时客观情况的变化和条件已趋于成熟。

就国内情况来看，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由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合现实情况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继之，在经济、政治、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推动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使各项工作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新局面。

从国际上看，中国在外交上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别是进一步改善了同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在台湾问题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的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尽管两国之间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恢复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和国家利益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使中日关系正常化，作出了巨大努力，同时也得到了日本广大人民及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热烈响应。许多日本友人也为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有人终生为之奋斗。1972 年 9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中日两国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声明中说：“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

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但公告第八条立场。” 1978 年 8 月 12 日，中日双方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又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同年 10 月，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日本朝野上

下对此极为关注。访问期间，邓小平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条约的缔结和生效，标志着两国的和平

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条约明确规定：中日两国不谋求霸权，同时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既是两国的自我约束，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也是对霸权主义这一正在威胁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的沉重打击。邓小平高度评价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 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和中

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

加巩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将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他还说：“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我们愿意同

[②] 《世界知识》1979 年第 5 期。

各国人民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日两

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两国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处。”日本各界人士也认为这个条约的签署，“结束了过去不幸的时代”，说邓小平访问日本，结束了自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

日中两国之间的黑暗关系，是两国根据互利互助的精神发展两国关系，并为确立亚洲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进行相互合作的开端。[①]日本在台湾有着很大的经济利益，与台湾关系密切，中日关系的发展，无疑扫除了解决台湾问题中的一个障碍。

对台湾问题影响更大的是美国。人所皆知，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插手中国内部事务，推行分裂中国的政策，这既是导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海峡两岸继续分裂、统一不能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进入 70 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美国国力日益衰落，在同苏联争霸中越来越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增强。美国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不得不调整它过去的对华政策，开始对中国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 1968 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冷静地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当时的世界已形成美、苏、中、日、西欧五大力量中心，提出以实力、伙伴、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尼克松主义，并且认为富于创造性、富于生产力和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民的中国“将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力量”。他提出美国“必须跨出主动的第一步”来改善中美关系，否则就不能对抗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并同中国领导人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在《上海公报》中，中美双方同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同时，美国声明，它对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原则“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这是中美关系史上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件，它使中美之间存在的鸿沟被跨越，结束了两国长达 20 多年的相互对立、抗衡、隔绝的局面，也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前 1978 年 12 月 15 日宣布建交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国政府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在 1979 年 1 月 1 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它关系。”[①]中美建交，使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失去了法律依据，使台湾当局丧失了合法的安全保护伞，进而使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去掉了一个更大的障碍。

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①]接着， 1979

[①] 《人民日报》1978 年 10 月 24 日。

[①] 《人民日报》1978 年 12 月 17 日。

[①] 《三中全会以来》[上]第 3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最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史可见潮流所至，实非任何人所能阻止。目前祖国安定团结，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大陆上的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同心戮力。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②]

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的主张不仅顺应了历史潮流和民族意志，而且在海峡两岸还存在着许多共识基础。首先在经济上，海峡两岸都在大力发展经济，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相当大的成效。双方都注意到并承认各自的成绩，特别是都感到海峡两岸都需要相互合作，进一步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希望中国振兴和富强起来。而海峡两岸的经济也确实存在着互补性和互利性，各有长短。

其次在政治上，海峡两岸都主张“一个中国”，都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台湾独立。尤其是，尽管国共两党所选择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政策、社会结构乃至生活方式有本质的差别和分歧，但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及国家领土问题上，双方有着共同的立场。当 60—70 年代，中国同某些周边国家之间发生边境冲突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对这些周边国家都提出了严重抗议。这表明，国共两党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存在着“一致对外”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无疑会成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积极因素。正如邓小平所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

语言。”[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民意上。大陆和台湾的绝大多数人都拥护统一。台湾自古就同大陆有着割不断的骨肉般的亲情联系，虽曾几度与大陆分离，但最后都归一统。1624 年因殖民主义者入侵，台湾同大陆分离， 1662 年被郑成功收复；不久郑成功之子郑经在台湾实行割据，又使台湾脱离祖国大陆，到 1683 年被清康熙皇帝派大军收复，这次统一持续了 200 多年； 1895 年，台湾被日本割占，50 年后又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这种多次的分而复统、离而又归就充分表明了台湾与大陆的斩不断、割不开的骨肉关系。 1983 年 5 月 31 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文章也指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尤如枝叶之与根源，不但生死互赖，不可分离，且本枝一体，荣辱与共”。1984 年 4 月 3 日台湾《中国时报》所载的一篇报告说得更简明：“台湾的前途、希望和出路都在大陆。”台湾同胞 98%以上都是根在大陆，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他们与大陆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语言文字和共同的生活习惯。即使是居住在台湾的少数高山族同胞，也早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1978 年，台湾中央图书馆分馆举办了题为“根——台湾的过去与现在”的特别展览，展出了有关台湾与大陆在地缘、血缘关系和中华民族开拓台湾方面的历史资料 200 多件。中央研究院的学者通过研究挖掘出来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黑陶等历史文物，发现这些文物都是来自大陆，证明台湾史前文化是“中

[②] 《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1 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0 页。

华的一环”。台北的一些报纸还分别以“根”为题目发表文章，说明台湾的“根”在大陆，与大陆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 70 年代末，在台湾曾一度出现了“寻根”热，这些都反映了广大台湾同胞要求“归根”，返回祖国大陆怀抱的愿望。 1986 年 9 月，邓小平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的电视采访中回答关于“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的问题时，强调的“第一点理由”就是：“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我们的老祖宗是炎帝、黄帝——都希望中国能统一，那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①]这充分肯定了民族感情和民族意志在促进国家统一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经济、政治和民意上的共识，无疑为实现和平统一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正是由于和平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和意志，邓小平向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出了真诚的呼吁：“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他坦诚他说：“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②]而要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基于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现实情况，最好的统一方案就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尊重台港澳的历史和现实

邓小平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①]这话是 1984 年 7 月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说的，当时澳门问题尚未纳入议事日程，但很显然这个构想也完全适用于解决澳门问题。中国面临的所谓统一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台、港、澳三大问题，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统一”。而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尊重这三个地方的实际情况，邓小平说：“解决台湾、香港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或者说用武力解决问题，总是不好的。怎样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呢？这就必须充分照顾到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②]

就台湾来说，一方面，它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祖国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统一是有利于台湾的稳定和发展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③]所以，如果台湾继续孤立于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它将来的前途是很难预料的。正因为如此，坚持“一个中国”、“中国必须统一”，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便成了国共两党的共同主

[①] 《人民日报》1986 年 9 月 8 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0、31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7 页。

[②]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57 页，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70 页。

张。更进一步看，由于台湾地域窄小，资源有限，对外国的依赖性很大，潜在的危机随时有可能发生。特别是孤悬海外，受制于人，最终只能是进退维谷，没有出路。台湾当局的一些有识之上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说：“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将灭亡。”而祖国大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与台湾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同时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国力不断增强。所以一旦实现统一，在经济上海峡两岸可以取长补短，互相支援；在政治上，更有利于台湾的稳定和安全，有利于抵御外侮，维护国家独立。“一国两制”的构想，正是尊重了台湾的客观实际，尊重了民族感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将大陆和台湾统一到“一个国家”中来。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隔阂使台湾同祖国大陆几十年处于分离状态。这种状况已经给台湾同胞，同时也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很大的不幸。如果用非和平的方式，即诉诸武力来解决这种不幸的局面，必然是兵戎相见、骨肉相残，给整个民族，特别是台湾同胞带来更多的伤害和不幸。同时，还必须看到，台湾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几十年来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用国民党自己的话说是“三民主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同大陆也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上相互存在较明显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不用非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就必须尊重台湾的现实情况，允许台湾保留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习惯，实行“两种制度”。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和平统一。关于尊重台湾的现实，邓小平早在 1978 年就有过明确的阐述：“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①]用“一国两制”的方案来实现统一，对台湾来说，不但不会有任何损害，而且还会使其从中受到难以估量的益处。所以邓小平说：“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应该是能够接受的。”[②]

就香港来说，它所包括的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这三块中国领土是上个世纪被英国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和《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割占或以“租借”名义霸占的，是武装侵略的产物。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都未承认过这三个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曾多次申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不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并且主张要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的立场也是这样。1972 年 3 月 8 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①]1972 年 11 月 8 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非殖民化特委会提出的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实现祖国统一被作为三大任务之一提到中国人民面前。与此同时，“新界”租期 99 年届满日趋接

---

①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 30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86 页。

① 《人民日报》1984 年 11 月 7 日。

近，英国方面希望了解我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香港的中外投资者也对香港的前途表示关切。这样，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便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解决香港问题，当然要尊重香港是中国领土、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一历史实际，坚持“一个国家”的原则，选择适当时机，收回香港，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另一方面，毕竟英国人在香港统治了140多年，并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香港经济发展迅速，令世人瞩目。“今天的香港已经与好几个‘世界第一’，好几个‘世界中心，的荣誉连在一起。”[②]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也是世界银行业务和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成衣、玩具、收音机和手表的出口地区，名列世界二十大贸易国家和地区之中；香港有全世界第二大集装箱海运码头和世界第三大国际航运业务，是东西方经济贸易交流的重要枢纽；香港是世界上第三大黄金市场和第三大钻石贸易中心，还是第三大珠宝贸易市场；香港的生活水准列亚洲第二位；香港的公屋计划之庞大为世界之冠。香港的这些成就固然离不开，甚至主要是靠中国大陆的支持，但它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香港人民的生活水平远比内地高，生活方式也不同，他们在“自由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了100多年，已经习惯于西方式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因此，尽管占香港居民98%的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爱国同胞拥护中国收回香港，但却希望能继续保持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我们在解决香港问题时，理应尊重香港人民的这种意愿。否则，一下子改变香港人民已习惯了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会被香港人民接受的。诚如邓小平所说：“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①]“一国两制”就是充分尊重香港的客观实际，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英明决策。

就澳门来说，澳门有着同香港相似的情况，它一方面是祖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使之回归祖国是澳门人民的心愿；但另一方面，它也长期处在外国占领者的统治下，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且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也比内地高，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也存在差距。因此，“一国两制”也同样适合于解决澳门问题，也是尊重了澳门的实际。

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

“一国两制”的构想不仅尊重了台港澳的实际，同时也尊重了中国大陆的实际。邓小平所说的“‘一国两制’是从中国实际提出的”这句话中的“中国”自然包括了中国大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经过20几年的徘徊、摸索，终于认识到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是要解决一个“穷”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能使中国尽快摆脱贫穷，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个“穷”字曾困扰了整整一个近代

[②] 霍英东：《中国现代化与香港“九七”》，《新华文摘》1996年第1期。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4页。

中国，甚至困扰着现代中国。由于贫穷，导致虚弱，于是便受人欺负；由于穷，总是激起争夺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的斗争，于是便乱，造成政治无序，社会动荡；由于穷，教育、文化、科技便落后，于是便愚，民智难开，非理性的行为更易发生……。穷是中国一切政治问题的总根源。这一认识来得何其不易呀！又何等重要啊！中国共产党曾为解决这个贫穷问题做出了巨大努力，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但是直到 70 年代末以前，这个问题未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折，是历史性的飞跃。实现四个现代化，振兴中华，成了全民族的共同心愿和目标。为此，必须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实现全民族的大团结。如果继续分裂、对峙，只能是分散全民族的力量；如果诉诸武力，兵戎相见，又会虚耗国力，于国于民都不利。更为重要的是，要使中国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早日繁荣富强起来，就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引进外资，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而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在这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特殊地位。它们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成一体，而且本身发展得也比较快，可以起到社会主义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通道和桥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就拿香港来说，正如爱国人士霍英东先生讲的。“ 在中国新一轮追求现代化的努力中，香港不仅为内地提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和国际信息，而且成为大陆与国际接轨的枢纽，特别是成为：000 多万华人与大陆交往的主要关口。而这数千万海外华人据说掌握着 2 万亿美元的资产，这比目前中国大陆的国家总资产大约高四五倍。”[①]由此可见，实行“ 一国两制 ”可以使台、港、澳地区充分发挥现有的优势，为祖国的繁荣作出贡献。

中国大陆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而“ 一国两制 ”的构想完全尊重了这一实际。邓小平曾明确阐述了四项基本原则和“ 一国两制 ”的关系，“ 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 ”因为制定这样的政策“ 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 一国两制 ’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 ”而允许两种制度存在，“ 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 ”[②]由此可见，提出“ 一国两制 ”的构想，是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客观实际的。而这一客观实际也决定了“ 一国 ”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说，“ 一国 ”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允许另一种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地区合法存在，而且可以保持 5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变。然而，港、澳、台地区的现行制度 50 年不变，是以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为前提的。“ 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港、澳、台地区的 50 年不变也就没有了根基，“ 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 ”。

---

① 《新华文摘》1996 年第 1 期，第 1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17 页。

因此，“要真正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1]总而言之，“一国两制”政策若不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若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复存在，也就无“两制”可言，中国共产党和大陆人民也不会答应，和平统一也就不能实现。

中国需要和平

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所依据的“中国的实际”，除了台港澳的客观现实和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建设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际外，还有一个重要之点，就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是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说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际上是一种新的构想。我们提出这一方针不仅因为面临香港问题，而且因为我们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是维护世界和平。”[2]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个被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的真理。在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现今世界上，落后就意味着没有持久稳定和平的保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比较强大的国防力量，那么在和平问题上只能是处于被动地位，而强大的国防力量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否则，那种强大也是脆弱的。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曾以灿烂的文化著称于世，并为世界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是非常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对比自己强大还是对比自己弱小的民族和国家，中国人民都是以和为贵。

历史证明，要想有真正、持久的和平，国家就必须强大起来，而摆脱落后，使国家强盛起来，获得持久稳定和平可靠保证的唯一出路就是奋发图强，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落后于世界先进行列，所以要想尽快摆脱落后地位，就必须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为此，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1]“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2]

然而，由于当今世界还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和国家集团之间的不同利益的冲突，特别是存在着霸权主义者在谋求称霸世界、推行强权政治的斗争，再加上各种民族的、部族的，种族的、宗教的利益冲突以及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使得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安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虽然没有打起来，但是各种地区性冲突和战争迭起。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很多热点和爆发点，国际局势经常出现动荡不安。这些都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如何解决世界上现存的许多争端，稳定世界局势，一直是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以及一些有识的政治家为之忧虑的问题。传统的诉诸武力的办法已被实践证明不是最有效的办法，有时它还会加深争端，引发新的矛盾。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台湾、香港和

---

[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18 页。

[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64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0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6—117 页。

澳门问题，以实现国家的统一。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牵扯到有关国家的利益，处理不好，就会引起某种争端和冲突。中国需要和平，人民的愿望也总是希望用和平方法来解决问题，为此，就需要尊重各方面的利益，使各方都能接受。邓小平正是从人民的愿望出发，本着对各方都有利的原则，把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纳入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总战略方针中来考虑，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个最佳方案。

1984 年 2 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①]他还指出，“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②]针对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邓小平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③]可见，“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在国际上具有普遍意义的和平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各种争端的新办法，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思路。这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和平事业的一大贡献。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9—50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7 页。

第三十章　化干戈为玉帛　环球同此凉热

1984 年 10 月 2 日，邓小平会见了参加建国 35 周年庆典的华人科学家，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根据世界的现实、历史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①]这表明，“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依据除了“中国的实际”外，还有“世界的现实”。任何重大理论的创立和某个新思路、新原理的提出，无不同当时的历史时代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深刻地反映了那个历史时代的特点。诚如邓小平自己所说，“一国两制”的构想，绝不是一时感情冲动。它依据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时代的发展变化，是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后的时代产物。

“一球两制”将长期存在

20 世纪国际政治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两种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同一个地球上对立并存。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既有激烈斗争，又需要和平共处。

1917 年，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以后，中国等十几个国家也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就是在地球上铲除资本主义，使人类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十月革命后曾有过种种世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国际资产阶级也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洪水猛兽，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于是有了协约同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张伯伦的“祸水东引”，丘吉尔的“铁幕”政策，凯南的“遏制”战略等等。然而，半个多世纪的较量、对峙，其结果是谁都没有如愿以偿。从国际资本主义这方面来看，当初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直接武装干涉的“扼杀”战略转为实行“冷战”和“遏制”战略，这本身就表明它对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无可奈何。后来，尽管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放弃了社会主义，以至国际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他们“冷战”的胜利，但是，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站稳了脚跟，尤其是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从社会主义这方面来看，能给资本主义以毁灭性打击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未发生，而且资本主义还表现出了相当的自我调节能力，其生命力还没有丧失。目前来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经济基础比较雄厚，其生产水平还会有所提高。尽管自 70 年代以来，直至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一直处在衰退和低速增长时期，但是不会排除在今后某个阶段、某些国家的生产力仍会有迅速发展的可能。从总体来看，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具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革命形势，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取代资本主义，取得全球性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两种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最后由人民来选择，谁也不要企图用武力扼杀、消灭对方，也不应用“冷战”的方式来“遏制”对方。实践证明，任何企图

[①] 《人民日报》1984 年 10 月 3 日。

消灭对方的努力，其最终结果不但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使自己也受到损害。

然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对自己的对立面都有一个认识过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代替”并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从外部通过世界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然后取而代之，而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走向灭亡，最终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这一过程的完成主要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在这种矛盾运动还未完结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有存在的根据。可是，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甚至提出了“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估计。这种估计又导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一些“左”的看法。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 1946 年 2 月 9 日斯大林在演说中指出：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这将使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进而打起仗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和平是不会有的，国内的和平国外的和平都不会有的。这番话讲的虽然是众所周知的马列主义原理，但是在刚结束了战争浩劫的欧洲，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会。美国自由派领导人物之一——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就此大做文章，说斯大林的话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①]这话虽然是耸人听闻，但却有很大煽动性。不到一个月，3 月 5 日丘吉尔就发表了富尔顿冷战演说，这被看作是对斯大林讲话的回敬。

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这一历史现实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当 1917 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时，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拒绝承认它，并联合对之进行“围剿”。可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被剿灭，反而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显示出了社会主义新生制度的生命力。当法西斯的侵略威胁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生存时，它们联合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来共同抗击法西斯，这时它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忽视的现实。然而，即使在那时，它们也没有掩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意，随时都准备去损害它的利益。就是希特勒也看到了这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联盟”中的矛盾，期待着联盟内部发生内讧。反法西斯战争一结束，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就突显出来，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很快就打出了“冷战”的旗号，它们虽不敢武力进攻苏联，但却要“遏制”苏联，不让这股“邪恶力量”蔓延。然而，冷战的结果却是害人又害己。尽管从短期效益来说，“铁幕”这一边的资本主义世界有了欧洲复兴计划，但是从长远看，由于“铁幕”两边的互相猜忌、对抗和仇视，一方面引起“铁幕”两边发疯似的军备竞赛（尽管冷战和军备竞赛不完全是由两种制度对抗造成的），既给人类的发展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也给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影响了其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使得“铁幕”两边不能进行正常的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和互相取长补短。当年极力倡导“铁幕”政策的丘吉尔在他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前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我殷切地希望，新的一代能够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从而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光荣，控制注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①]70 年代初，尼克松政府主动打开对华的大门，标志着资

[①] 沃尔待·拉弗贝（美）：《美苏冷战史话》第 44 页，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①] 丘吉尔：《不需要的战争》第 2 页，漓江出版社。

本主义世界已开始抛弃“铁幕”政策，认识到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应当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经过各自的发展和相互作用，它们自身状况及相互关系已出现了如下几种不容忽视的新情况：

（一）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战后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体系，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最初都是建立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而且毕竟只有六七十年的发展历史，还很不成熟、不完善，其优越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社会主义整体的经济实力同资本主义世界相比较处于劣势。社会主义在其自身的改革、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障碍和困难，甚至曲折反复。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战胜资本主义，取得全球性胜利。

（二）资本主义自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资本主义已演变为以国家垄断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它增强了自我调节能力和对社会发展变化的适应能力，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仍会有迅速发展的可能，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调节国内阶级矛盾、控制社会稳定能力的加强，因此在短时期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具备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

（三）当今世界已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的世界市场，这就使得两种制度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性和进行相互合作的客观需要，这种相互合作的基础就是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国家间的激烈竞争迫使它们要在资本主义体系外去寻找市场，而社会主义国家是个重要的市场源。就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由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看普遍比较落后，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不小的差距，因此需要加速发展、完善自己。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外开放，尤其是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以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和资金，学习、借鉴其一切有用的东西。这种不同制度的国家间的相互开放与合作，反过来又促进了统一世界市场的发展，强化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四）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许多全球性问题，诸如核灾难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人口问题等，已变得越来越突出并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而解决这类问题要求全人类的力量联合起来，齐心协力，互相配合。在七八十年代，这些全球性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地球的安全问题，即核灾难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如何处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企图通过“热战”或“冷战”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已被历史证明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效的。

上述新情况决定处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最好、最可行的办法就是两种制度在同一个地球上和平共处，即“一球两制”。由此可见，“一球两制”将长期存在下去。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正是以对上述“世界的现实”的认识为依据的，它允许在一个国家内从实际出发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利于让不同制度的优越性或长处在各自的条件下得以充分地运用和发挥，促进生产力更快地发展。邓小平说：“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不会在香港这么做。”[①]也不会在澳门和台湾这么做，统一后，“你搞

[①] 《人民日报》1986 年 4 月 22 日。

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这是多么雄伟的气魄啊！难怪连对社会主义恨之入骨的保守主义“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都称这一构想是“最富天才的创造”。美国的半官方战略咨询机构“兰德公司”对“一国两制”构想更是大加称颂，说“一国两制”是邓式战略方针的方程式，从全球战略意义上说，可能超过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而且一文不花，是超级战略。[②]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战争，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它作为政治的继续，一种特殊的政治，通常被用来充当解决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最后手段。翻开世界历史，可以看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以战争为标志的，很多著名历史人物也都和战争有关系，或是战争的发动者，或是战争胜利一方的领导者，一个民族的兴起，国家的统一，王朝的更替，制度的变迁，等等，无不和战争有联系。自从资本主义于 16 世纪在西欧各国兴起后，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就充斥这个世界，和平往往只是两次战争之间的短暂问歇。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战争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频率上看，都远远超过从前。进入这一阶段的标志就是四次战争，即 1898—1902 年的英布战争， 1898 年的美西战争，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和 1900 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帝国主义形成后，世界历史便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自此，战争与革命相互作用而长期成为世界的主题。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发动了两次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的世界大战。战争引起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两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出现了一批帝国主义国家所不愿看到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还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100 多个亚非拉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帝国主义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然而，战争是极其残酷的，在战争中受害最深的是人民。人民厌恶战争，反对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人民包括饱经战祸之害的中国人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许多有责任感的政治家也都为避免再发生世界大战而寻找出路。然而，由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以及超级大国的争霸，世界大战的阴影曾长期笼罩着这个世界。“冷战”曾几度险乎转化成“热战”。到了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发生战争的因素受到大大制约，这些因素主要是。

（一）由于疯狂的军备竞赛，使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拥有的核力量可以毁灭整个人类。据统计，到 80 年代，美苏两国已拥有核弹头数万颗，世界上人均大约要承受约 3 吨 TNT 当量的核威胁。核战争将给人类造成“核冬天”的灭绝性灾难，而且将没有战争的胜利者，交战各方以及整个人类将同归于尽。因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害怕被对方毁灭而不敢下手。

（二）面对核威胁，世界人民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保卫和平运动。各国人民，包括超级大国的人民，都强烈要求裁军，要求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销毁核武器。世界各种保卫和平的组织已达数千个，参加和平运动的群

[②] 《台湾研究集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1988 年第 2 期，第 32 页。

众越来越广泛。

（三）由于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决策主方向转为和平发展新科技和经济，国际上的竞争也从以军事武力争夺领土转向以高新科学技术产品争夺市场。

（四）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发展。发展是个全球性的大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独立后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更迫切需要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加快发展。它们更需要和平，是保卫和平的生力军。上述情况表明，和平的因素在增长，尽管小的局部的战争难以避免，但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较长时间的世界和平是可以争取的。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已经成为历史。邓小平及时洞察到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变化，对之作了科学的阐述和概括。1984 年 5 月，他指出，“ 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 ”[①]以后他又讲到：“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②]既然世界的主题已变为和平与发展，我们就必须改变过去对世界大战的看法，正确估计国际形势，认清战争与和平的实际状况。对此，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重要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 山、散、洞 ’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 ”同时，“ 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①]邓小平在这里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理由：第一，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足以毁灭对方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55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6—127 页。

的核力挝，如果打起来，将没有真正的赢家，因此谁都不敢先动手；第二，美苏的争霸、扩张活动遭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从而破坏了两霸为建立各自的世界军事体系而进行的全球战略部署，限制了它们发动战争的能力；第三，世界的和平力量在增长；第四，新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和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在国际竞争中，军事手段的作用相对下降，科技、经济的作用在上升。邓小平的这个分析，把握住了当今世界的时代特点，从而得出了世界规模的战争可以避免，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科学结论。

基于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这种判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举起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旗帜，并及时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邓小平指出：“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①]中国不仅高举起维护和平的旗帜，而且还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1985 年我国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 100 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进而实现整个国家的和平统一，这完全符合以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主题的时代潮流。

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不仅体现了邓小平对祖国、民族的无限挚爱，体现了他侗察国际风云变幻、顺应时代潮流的大战略家的胆识，也体现了他热爱和平、热爱人类的伟大人格。他曾几十年戎马生涯，转战南北，战争几乎陪伴他度过了整个青年和壮年时代，他深知战争会给人民带来什么，会给国家和民族以及整个人类造成什么后果。

和平时代造就求和平的政治家。求和平，用和平方式解决各种争端已成为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们的共识和实际行动。撒切尔夫人开明地面对现实，同中国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从而为她的传记增加了光彩的一页。德克勒克的明智之举，使南非在乎和的气氛中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在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作为一位曾参加过 4 次中东战争的老资格的军人，一个“战争狂”，在打了 27 年仗之后，却发现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只能用和平手段来实现以色列入和阿拉伯人的共存。半个世纪以来，阿以和巴以冲突一直是最难以调和的地区热点问题之一，它给双方都带来沉重的灾难。拉宾这位阅历非凡、具有深邃远见的政治家，这位在纷争迭起、动荡不宁的中东堪称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为推动阿以和平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92 年 6 月，年已 70 岁的拉宾所领导的以色列工党在大选中获胜，拉宾就任以色列总理。拉宾上任后，便致力于推进中东的和平事业。工党政府接受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承诺在以色列的“安全得到切实保障”的前提下，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阿以争端，把侵占的阿拉伯领土逐步归还给有关国家。这为后来中东和平进程取得历史性突破打下了基础。在整个和平谈判过程中，拉宾积极主动、坦诚开明，功不可没。由于他对和平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93 年 9 月 1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他“博瓦尼和平奖”， 1994 年他和阿拉法特、佩雷斯一起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7—128 页。

荣膺“诺贝尔和平奖”。拉宾虽然不幸遇害，但他以自己的行动给人以启迪，以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告诉人们和平来之不易。以色列人民为他举行了规模空前的、隆重的葬礼，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万群众来到议会大厦广场前向他致哀和告别，有 80 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政府代表参加了葬礼。拉宾用鲜血和生命向全世界发出了一声呼唤：要和平，不要战争。

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

进入 70 年代之后，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世界的现实”就是环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向东转移。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欧洲曾长期占据中心的位置。近代以来，北美逐渐取代了欧洲的地位。直到本世纪 70 年代以前，亚洲国家除日本外，绝大多数都属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无多大份量。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创业、奋发图强，东亚国家创造了让世界震惊的奇迹。在过去的 20 年内，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七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8%，远远高出世界发达国家 3%和发展中国家 4.3%的平均增长水平。据西方国家估计，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东亚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是北美的 2 倍，西欧的 3 倍；到 2000 年，东亚国家在世界各国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将从 1/4 增到 1/3，西欧将从 1/4 降到 1/5。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到下世纪初，东亚地区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和西欧。1996 年 3 月首届亚欧会议的召开，就表明欧洲国家已庄意到了亚洲的重要地位，一些欧洲学者称这是欧洲在重新认识亚洲，欧洲人已完全改变了对亚洲的传统看法，不再把亚洲仅仅当成他们的资本输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除东亚地区外，澳洲、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的经济也发展较快，再加上原来经济发达的北美，这样，整个太平洋地区正在成为世界的经济战略重心。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个大好机遇，又是个严峻挑战。因此，维护这一地民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中国是这一地区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环太平洋经济通向 21 世纪的历程中，中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和经济繁荣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从 80 年代起就定下了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这“三大任务”的实现，部同能否解决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台湾、香港和澳门都地处东亚的中心地带，经济和政治战略位置都很重要，超级大国总是想插手并渗透这些地区。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影响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而且还会危及亚大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说过：“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问题，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美国目前有一股势力，继承‘社勒斯主义’，把台湾当作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吗？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①]与此相似，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涉及到中英、中葡历史争端和双边关系。美、日、德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7 页。

以及东盟国家在港、澳也都有经济利益。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这两个问题，既可以保持港、澳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至于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对维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有着重大意义。

第三十一章　全新的概念儒大的创举

“一国两制”构想从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提供了最佳方案，也为解决各种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一个好方式和新思路。这一科学构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崭新创造，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一国两制”：实事求是的典范

1984 年 9 月 26 日，中英两国政府草签《联合声明》之后，当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赞扬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最富天才的创造时，邓小平说：“这个具有国际意义的构想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而这个构想也只有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才能提出。”[①]可见，实事求是乃是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方法论基础，是这一伟大创见的灵魂；同时，“一国两制”的提出又是应用实事求是原则的光辉典范。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一国两制”构想形成、发展的轨迹同我们党的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是完全吻合的。关于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①]关于“一国两制”提出的背景，邓小平在 1984 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②]不久，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他又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③]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完备的唯物主义”。[④]这种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实际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精神实质进行了生动的高度概括，这就是“实事求是”。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

---

① 《人民日报》1987 年 5 月 17 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7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78、443 页。

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了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思想路线，并坚持用它来指导党的各项工作，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历史有了第一次飞跃。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在他的晚年，未能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良好作风坚持贯彻下去，甚至违背了他原来的正确主张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等作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纠正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拨乱反正，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动脑筋，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要求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中国对内对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在“实事求是”这个重新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制定的。毫无疑问，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一国两制”构想和方针，也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提出和制定的。

在国家统一问题上，70 年代未 80 年代初存在着的“实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需要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台港澳地区已实行了很长时间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高于大陆；中国大陆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主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在同一个地球上长期共存下去；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和平解决统一问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实事”，中国共产党人“求”出的“是”就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这个构想的提出，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不是随随便便就说出来的，而是经过深入研究备方面的现实得出的结果。就邓小平本人来说，他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时，他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在统一问题上也是“一国一制”的思路。那时，中国共产党虽然也曾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但设想的还是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取代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 1974 年 10 月，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同胞、海外华侨时说，解放台湾的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和平方式不可能，也要考虑非和平方式，两种方式都应该考虑进去。首先我们做工作，希望一个阶段内能够用和平方式。希望通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工作，使台湾人民了解我们祖国的面貌，了解我们祖国的情况，了解我们的政策。关于解放台湾以后的政策，我们还在考虑，特别是要同台湾人民商量。不过可以说，解放台湾以后，不可能把大陆上的一套马上搬过去，当然，最后台湾人民总是要在社会主义这个制度下生活.但速度要放慢，需要一个过渡时间，让大家有一个准备，有一个习惯过程，慢慢接受。这是邓小平当时对解放台湾问题的认识，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共识。

邓小平的非凡之处就在于他不固守旧的框框和教条，并且能够实事求是地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来提出新的思路， 1978 年 10 月 8 日，他在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说：“如果我们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一个多月后，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他又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同月，他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瓦克时又指出：和平统一实现

[5]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759 页。

后，台湾可以保持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可见，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工作的深入展开，邓小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已有了重大改变，“一国两制”的萌芽已经产生。

1979年1月1日，正如邓小平所说，是个不平凡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刚刚结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这一天还是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日子。这一天还有一个重要事情，即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并提出：“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同时还建议两岸恢复通商、通邮、通航。在这同一天，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会上宣布，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也就是在这一天，为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从事航行、生产等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岛屿的炮击，长达20年之久的炮击这些岛屿的军事行动停止了。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979年1月8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客人提出的问题时明确说，将来台湾实行什么制度，可以根据台湾人民的意志决定，愿意选择什么就选择什么。如果台湾人民感到它的现行制度要保持一百年，这个可以，我经常说一百年，一千年，意思是指长期，我们不会用强制办法使它改变。同月30日，他在访美期间，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时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的制度。”[①]“解放台湾”的口号从1949年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喊了30年之久，今天在邓小平笔下划了句号。同年9月1日，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他指出：“现在可以提第三次国共合作。”[②]同年12月6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太平正芳时说：实现台湾回归祖国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③]这时，“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已经形成。虽然此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但这一构想的精神实质，即和平统一后允许两种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并存，已经清晰可见。

1981年9月30日，中国政府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九呆方针，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次年1月11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

---

①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

②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1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文专题摘编》第306页。

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①]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一国两制”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已基本形成。

从上述“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过程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统一祖国的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一切都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拘泥于己有的成见、概念和原则，不从马列经典中去寻找现成的答案。他自己最常用的、最能生动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的一句名言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他的原则就是：不管一制还是两制，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就是良策。

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统一后实行“一国两制”，允许台湾保留现行的制度。同样是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始终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他在每一次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中部充分表达和坚持这一点。他认为这是一种“战略考虑”，也是从台湾的现实出发。1979 年 1 月 5 日，他对美国客人说，中国共产党不能单方面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承担了这个义务，就会导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不可能。这样的承担等于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承担了，台湾当局就有恃无恐，可能导致根本不同我们谈，那么不谈的结果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只有一只手，没有另外一只手，结果恐怕只能导致武力解决问题。用右手争和平，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①]可见，统一祖国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根本目标，其它只是手段，都要服从于根本目标，看它是否有利于根本目标的实现。庄这里，原则的坚走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一国两制”构想是在着手解决台湾问题时提出的，但却是在解决香港问题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最终形成理论体系，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从 1982 到 1984 年，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大量谈话和讲话，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多次系统地阐述“一国两制”的构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1984 年 10 月 16 日出版的《瞭望》周刊第 42 期发表的一篇题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构想——邓小平主任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一国两制”构想得到了全面阐述，标志这一构想已系统化和理论化，文章谈到，邓小平最近在会见外国客人和港澳同胞时，曾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并非权宜之计。

在“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整个过程中，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实事求是，这正是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成功之根本原因所在。邓小平的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贯穿的一个总精神就是“实事求是”。正如他在表明自己在“改革”与“保守”上的立场时所说的：“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他说，我是实事求是派。”[①]

[①] 李家泉：《“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瞭望周刊海外版，1987 年 3 月

[①] 《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6 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09 页。

“一国两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书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②]这就深刻地阐明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并构成了其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制度，而且应该首先产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来，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他们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在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胜利。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跨越并不等于生产社会化这一现代化经济必经之路也可以超越。经济落后国家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就像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①]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原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更需要快速发展经济，尽快赶上世界先进行列。为此，我们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条件，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谈及坚持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时指出：“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

中国最大的一个实际就是穷。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行改革开放，改革过去那种束缚人们手脚、压抑人们积极性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很重要一个内容就是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其中包括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这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能发挥一定作用的。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开国门，吸收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它们的资金。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和澳门以及台湾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在实现祖国统一后，在这些地区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是符合我们现实国情的，也是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8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比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①]可见，三大任务有主次之分。所以，解决台、港、澳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必须以有利于现代化建设为方针，也“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②]很显然，根据这样的方针和标准，不能甩战争方式来解决统一问题，因为它对现代化建设、对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幸福富裕都不利。最可取的方式就是和平谈判。而如果在采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时改变台、港、澳地区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但是行不通的，它不能被这些地区的人民所接受，而且还会引起这些地区的混乱，不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国两制”正是既能顺利实现祖国统一，又能保持台、港、澳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长远战略目标的最佳选择。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为基础的，同时它又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即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尊重台、港、澳地区的客观现实，在统一后，将之划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其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保持 5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变，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这在社会主义史上是个伟大的创举和全新的概念，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中国特色”之一和题中应有之义。

当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正确认识到：要想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他指出：“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快经济的发展呢？那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①]苏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利用资本主义”进行了实践，如允许私人贸易自由和私人企业家开设小型企业，实行租让制、租赁制、合作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践的结果是好的，短短几年，苏联的国民经济就得到了恢复并有很大的发展，从而为后来实行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中国在 50 年代初期也曾采用过一些“利用资本主义”的措施，对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进入 80 年代后，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利用资本主义”。但是，以往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利用仅限于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存在，限于引进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少量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而“一国两制”则是在一定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同前者的利用相比带有“质”的区别，是个重大突破和创举，是一种新的、不同于一般性质的“利用资本主义”。从实践上看，这种利用的广度和深度都比从前有了质变性的发展；从理论上讲，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在现阶段还是有存在根据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 页。

[①] 《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392 页。

“一国两制”不仅在社会主义实践史上是个伟大创造，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无先例的。虽然中外历史上曾存在过类似于“一国两制”的现象，但是都不能和我们现在的“一国两制”相提并论。我国古代的辽王朝是封建制度与奴隶制度的两制并存，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是资本主义制度与奴隶制度的两制并存，但是两行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而且它们都没有宪法的明文保障，两制并存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存在着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的可能性，两制之间的矛盾不可能通过和平与法律的途径得到解决，最后只有兵戎相见，诉诸战争。可见，“一国两制”并不等同于字面上的“两制并存”。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是有宪法的明文保障的，可谓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因此是能够稳定长期存在的，当两制所辖地区间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发生纠纷时，完全可以依据宪法和法律来解决。

有一种说法是：现今的英国是“一国两制”的国家。由于长期的政党政治的作用，使得英国工党和保守党这两个主要议会政党都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保守党的力量集中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控制着这一地区的多数地方政权；而工党的力量多集中在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这些地区的地方政权基本都为工党所掌握。这就很像个南北朝。而英国地方政权的独立性又较大，保守党和工党的政策又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当中央政权为保守主义的保守党所把持时，北部的工党地方政权却推行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特别是苏格兰实行与英洛兰不同的法律体系，有自己的议会、货币等。这很像是“一国两制”。然而，这种“两制”也是没有宪法和法律保障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随时都会因政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在英国仅仅体现为某种政策和价值观，而并没有成为一仲制度，因此，那里的“两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种制度。

还有人认为我国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瑞金政府”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并存的局面也是“一国两制”。这也是不确切的。尽管上述前两个政府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而且也都实行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实践，但是，从总体上说，这两个民主政府还都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亦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其带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实践还是很局限的，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制度，更为主要的是，这两个民主政府没有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因此是很不稳定的。这种“两制”和我们所讲的在祖国统一后所实行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的“两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诚然，“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无疑从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得到了启示，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完成的。就像邓小平所说的，这一伟大构想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一国两制”决不是古已有之，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或翻版。邓小平在阐述“一国两制”问题时曾指出：“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又说：“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①]中外历史上的一些事例虽然在某些方面同“一国两制”有相似之处，但其内涵、性质和特征与“一国两制”是根本不同的。历史上的所谓“两制”不过是一种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并不是人们自觉的行动。而“一国两制”则是一种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0、102页。

构想，是人的自觉行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特征、中国国情正确认识的结果和自觉把握的实践，是全新的理论概念，是“天才的创造”。

“一国两制”：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

和平共处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与国之间，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思想和原则。它最早是由列宁提出来的。列宁认为：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仍然是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就必须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在本世纪 50 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并成为国际社会听公认的处理国家之间包括相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

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儿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①]这里，邓小平以雄视 20 世纪历史的气概，总结了“两大阵营”时代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的误区：以“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来取代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和平共处”理论，是填平人类历史鸿沟、超越时代和民族视野局限性的全新的国际政治理论和政治战略。正如他所说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佯，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②]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仅提出了和平共处理论和原则，而且在实践中对之身体力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进一步总结自己处理国家关系新经验的基础上，从当代国际关系买际和时代特点出发，再一次肯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政府用以指导自己同各国发展关系的一贯原则。这个原则，无论是对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还是对于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都是适用的。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战略目标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集中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这就要求国内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国际上有一个和平的大环境。正如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所说：“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因为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①]

“一国两制”构想体现和继承了列宁的和平共处的思想，是列宁思想在新形势下的运用。但是这种运用不是简单的套用，而是创造性的发展。列宁在提出和平共处思想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同国际资本主义相比还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30 页。

[①] 《人民日报》1984 年 10 月 11 日。

处于劣势，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阶级对立还比较严重，谁战胜谁、谁吃掉谁的问题还很突出，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主要是出于一种战略策略的考虑，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邓小平则是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总体力量较之台港澳的资本主义具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提出“一国两制”与和平共处的，而且这种“一国两制”式的和平共处是一种基本国策，并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列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和平共处的思想，用以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这在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确实是个首创。邓小平把和平共处思想引申到一个国家内部来解决统一问题，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成为一国之内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崭新的理论和实践。这在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史上也是一个伟大创举。邓小平说过，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括不同的制度，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们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大胆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②]把和平共处原则运用到处理国家内部事务上，这是邓小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又一大贡献。

“一国两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在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上，实现国家统一后，将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实行两种社会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地区保留在性质上与国家主体部分根本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允许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范围内与自己并存，这无疑在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史上是无前例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一国两制”构想主张把国内阶级矛盾、制度冲突放在国家和民族的总体利益下来协调解决。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们中国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也是全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了共同促进民族振兴、国家繁荣昌盛，全面发挥国家在组织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职能，就要充分调动国内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积极性和潜在力。这个思想深刻体现了国家的民族性，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增添了新内容。

其次，“一国两制”构想主张尊重实际、互不伤害，发挥国家在“特殊时期”的“缓和冲突”和“调停人”的作用。面对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的现实，主张谁也不吃掉准，把相互矛盾、斗争的各方，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于一个统一国家之内，把矛盾和斗争置于宪法和法律的“秩序”范围里。这种对现实两种不同制度进行统一的和平方式，无疑是恩格斯关于国家“调停人”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最为重要的，“一国两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结构的新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是处理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组织结构形式。从历史上看，国家结构形式分为两种，即复合制和单一制。复合制国家是由几个国家联合组成的国家联盟，主要有联邦制和邦联制两种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7 页。

形式。联邦制是由具有自己的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几个成员国构成的统一的、但又是复合的国家形式。其成员国即联邦主体，如共和国，邦、州等，都有自己的宪法、法律，法令，以及自己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政府。同时，全联邦还有宪法、法律、法令，以及最高立法机关和政府。联邦与成员国问的权限划分，由联邦宪法规定，各成员国依联邦宪法的规定，对内对外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前苏联和南斯拉夫，以及美国、加拿大、联邦德国、澳大利亚都属这类国家。邦联是由两个以上独立国家为了某些共同目的而结成的国家联合。邦联的成员国各自保持内政和外交的独立性。邦联与联邦的区别，在于邦联不是国家主体，而是国家的联合体。邦联没有全邦联的立法、行政机关，没有统一的军队、赋税、预算、国籍。它的主要机关是邦联议会，由各成员国派代表团组成，商讨有关重大的特定的问题，其决议须经成员国政府批准认可才能在国内生效。这种形式多见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有的后来逐渐被联邦制所取代。

单一制国家是指在一个国家内有一个统一的立法机关和政府的国家。一般地说，在单一制国家中，都有单一的宪法，国家内部划分成若干行政区域，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权机关对内高于一切，对外保持独立自主，地方政权机关的许多活动要受中央支配，对外不具有独立性；即使个别地区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这种自治权也仍然限制在统一的国家权力范围之内。古代和中世纪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现代的中国、日本、法国等都是典型的单一制国家。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一个国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结构形式，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具体历史发展条件、阶级斗争的形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以及当时它的外部环境。中国在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后，将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基础上实行“一国两制”，这是对单一制下地方政府传统权力范围的一种突破，是以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为基础，但又具有复合制的某些特征的新型国家结构模式。这种新模式的特点是：第一，在立法权方面，特别行政区享有一定的立怯权。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可以同中国其他地区的法律下一致，只要符合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均属有效；第二，在司法权的行使上，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不同于其他地区，在这些地区司法独立，终审权属于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第三，在行政管理上，特别行政区可以比一般地区有更大的权力。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可自行发行货币.自行制定金融政策。在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第四，在对外关系上，中央人民政府将赋予特别行政区以很大的外事权，授权处理某些涉外事务。总之，在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后，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将是一个带有复合制特征的单一制国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的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第三十二章　架起和解的桥梁 明天更辉煌

“一国两制”构想为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提供了最佳方案，为解决国际争端、稳定世界局势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香港和澳门问题的顺利、圆满解决，表明这一构想是切实可行的，今后国际国内的实践还将继续证明这一构想的科学性。　1984 年 12 月 5 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英国下议院进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协调草案的辩论时说：“1997 年将不仅标志着香港一个时代的结束，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①]一些欧美学者评论道：“一国两制”的提出，“可以为未来的政治哲学开一新纪元”，还“足以开创未来世界的新局面。”[②]展望未来，中国将会在统一的道路上迈进更大的一步，世界也会在和平与发展上取得新的进展。这些都会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振兴提供强大的推动力。“21 世纪对中华民族来说，将是全面振兴的世纪。”[③]而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的振兴反过来又会促进世界和平。明天的中国和世界将会更加辉煌。

五十年不变与再造几个香港

1997 年，中国将收回香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有些人对 1997 年以后香港会不会继续像现在这样繁荣表示担心。这种担心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一国两制”毕竟是个新鲜事物，两种社会制度能否很好地和平相处下去，历史上没有成功的先例。而且，中国共产党过去也的确有过受“左”的路线影响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到 20 年。有些人害怕香港回归后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如果真正了解了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含义和实质，上述的担心和害怕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了。太平山下会有太平！

中国政府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确定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要旨是两条：一是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二是在恢复行使主权后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出发点之一，因此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　1984 年 7 月 31 日，邓小平在会见杰弗里。豪时说：“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不变。”[①]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一周之后即 1984 年 10 月 3 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①]同年 12 月 19 日，在会见撒切尔夫人

---

① 《人民日报》1984 年 12 月 7 日。

② 梁厚甫：《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明报》1984 年 6 月 15 日。

③ 江泽民：《在中国科协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 年 5 川 28 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7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73 页

时，邓小平又强调：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中英港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②]“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③]

邓小平的思想完全得到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肯定和继承。江泽民主席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是非常伟大的决策。关于对香港的政策，江泽民主席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人心所向.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④]李鹏总理说： 1997 年香港回归后，将实行“一国两制”，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生后方式不变，中央政府不派一官一吏，这有利于香港的氏期稳定繁荣，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⑤]

正是基于“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这样一个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回归后对香港的特殊政策。

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得人心的，它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赞成。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先生说：“今天的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而香港在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时常想，俄罗斯与东欧的改革，困难重重，成果不大。重要之点是因为缺少一个他们的‘香港’。因此，我更加觉得中国一再宣布“九七”之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是非常重要的，我完全赞成。”[①]

邓小平提出的解决香港问题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港人治港”，即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由香港当地人组成。保证香港现行制度 50 年或更长时间不变的重要前提就是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变。香港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何世柱认为，“中国因素”成为香港经济在世界经济衰退大气候中仍保持稳定增长的主要支持力量。[②]正因为这样，担心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会变也是一些人对香港未来担忧的一个重要根源。关于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在 1992 年南巡讲话中说得十分明确：“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③]可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一个长期的基本国策，只要这条基本路线不变，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就不会变，要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1—102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2—103 页。

④ 《人民日报》1996 年 5 月 25 日。

⑤ 《光明日报》1996 年 5 月 25 日。

① 《新华文摘》1996 年第 1 期，第 15 页。

② 《人民日报》1996 年 5 月 10 日。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0—371 页。

的方针就不会变。这种局面无疑有利于香港的稳定发展。正如何世往先生所认为的，香港的未来有着美好的前景。随着“九七”回归，“中国因素”时香港的投资前景将起着更加积极的作用，资源丰富的祖国是香港经济可以成功转型和持续发展的强大后盾。1996 年公布的“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标志着内地的经济将长期平稳发展，香港也将从中受惠。[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仅要保持一个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为了加快内地的现代化建设，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1988 年 6 月初，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的中外代表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②]再造几个香港，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

由于根据“一国两制”构想所制定的对香港的政策是符合香港人民利益的，所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至今的十多年时间里，香港一直保持着繁荣和稳定。特别是在西方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大气候下，香港却依然繁荣，而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有所上升。这和内地的大好形势正好遥相呼应。许多有识的香港人都认为，香港的前途和中国内地的前途是分不开的，香港之所以能繁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得到了内地的有力支持以及双方的经济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香港保持了繁荣稳定，使得当初因各种原因侈居到国外的很多香港人又都陆续回到了香港。许多企业界人士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佐藤光夫认为，“九七”后香港仍然是国际商业中心。他说：“香港已经牢固奠定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十分发达的金融设施和优越的贸易环境预计将继续吸引外国人到香港来。[③]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席、船王包玉刚的女婿郑维健先生认为，“九七”以后，香港仍将是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能够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基于许多因素。尤其是近年，香港在市场运作系统、风险管理制度、交通运输与通讯科技等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相信未来香港有能力继续发展完善基本设施，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我相信在‘九七’后，香港和内地的金融发展将是互相结合和互补的，并非只对单方面带来益处。展望未来，一方面，具有国际金融中心优势的香港会成为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重要桥梁，另一方面，内地在香港的投资也会使香港的金融业更加繁荣，促进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①]

在香港的很多公司都看好香港的前途。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在 1996 年 4 月份发表的《香港贸易及贸易支援服务》调查报告显示，以香港为基地的贸易公司及厂商，对于香港今后将继续保持其地区总部的地位，充满信心。报告指出，随着内地以及整个正大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香港作为公司总部据点的地位将日益巩固。而香港的境外投资不断增加，以及电信和电脑网络日益扩大，在加快服务贸易发展方面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②]

[①] 《人民日报》1996 年 5 月 10 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67 页。

[③] 《参考消息》1996 年 4 月 24 日。

[①] 《光明日报》1996 年 3 月 26 日。

[②] 《光明日报》1996 年 4 月 27 日。

1996 年 4 月，香港贸易发展局和“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 ”联合举办了一次关于香港前途的大会，与会者部对“ 九七 ”唇香港前途持乐观态度。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在一篇社论中说：“ 没有一个与会者对 1997 年以后的发展表示哪怕是一点点的怀疑。没有出现意见分歧，听众来这里是为了听取对香港前途积极的看法。 ”

随着“ 九七 ”临近，内地与香港关系日趋紧密，港人学习普通话已蔚然成风。学习普通话的活动。不仅在一些与内地关系密切的工商界里进行，而且近两年不少港府官员也掀起了一股学习普通话的热潮。在港府公务员队伍中，有部分高级官员被安排到北京清华大学参加公务员研习班，有机会多听多讲普通话。港府公务员事务科亦开办不少普通话训练班，为各级公务员提供学习机会。一般市民学习普通话的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

“ 九七 ”临近，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情况是，香港著名酒店，1997 年 6、7 月的客房差不多都已预订出去，而且预订者多为海外人士。特别是 1997 年 6 用 30 日和 7 月 1 日的旅客人住的房间，早已预订完毕。有些酒店老板为纪念这一天的到来，还特意将每个床位的价钱升到 1997 元，但旅客们并不嫌价钱高。很多海外华人都想亲眼目睹一下五星红旗取代米字旗在香港上空迎风飘扬的壮观场面。

1996 年 12 月 11 日，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人选顺利产生。 59 岁的董建华当选为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后表示，要团结港人共创美好明天。他指出，香港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再加上基本法的保障和“ 一国两制 ”的方针，相信我们一定会比以前做得更好。在 1997 年来临之际，董建华发表新年贺辞时又说：“ 九七年的形势是好的……我对自己、对特区政府和临时立法会都很有信心。我相信，回归以后的香港会更好，香港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

我们有理由预言，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日益繁荣，只要按照“ 一国两制 ”的既定方针、政策去治理香港，香港这颗“ 东方明珠 ”在中国人手中会更加大放异彩。

中华巨龙腾飞世界

在本世纪还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年中，将要发生的令所有中国人都欢欣鼓舞的两件事是：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门回归祖国！这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巨大进展，是邓小平“ 一国两制 ”构想所结出的硕果。回首过去，上个世纪的这个时间。正是中国受列强欺负，一步步走进半殖民地深渊的时候。中国人民就是以 1900 年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为标志，背负着沉重的耻辱。带着亡国危险的惶恐走进 20 世纪的。而今，一百多年来的血与泪，一百多年来的屈辱与沧桑，都已融入历史的长河。当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即将跨入 21 世纪时，港澳两地回归祖国无疑是民族兴旺的吉祥之兆.是中国将在下一世纪腾飞于世界的标志。

1999 年之后。澳门将成为中国一个高度自治的地区，澳门从 70 年代起，在“ 香港因素 ”和内地改革开放的影响下，也实现了经济起飞，主要经济指标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而且，澳门经济的外向程度极高。旅游博彩业服务对象中 90%以上为来自境外国际间或地区间旅客，出口加工业 95%以上产品外销，与世界上一百多个拉丁语系国家和地区保持稳定的经济贸易联系，是二十多个国际经济组织的正式成员或准成员。 1995 年 12 月 8 日，澳门国

际机场正式通航，这使澳门经济如虎添翼，这些表明，澳门具有自身的多重优势，发展前景是相当广阔的。如果与内地加强合作，互相取长补短，更有利于澳门的发展、稳定与繁荣。

香港和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使“一国两制”构想得到了实践的检验，显示出了它的生命力。香港的回归，是依照“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第一步，这为下一步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香港问题的解决为”一国两制”率先垂范，将使祖国统一大业展现出非常美好、广阔的前景。

解决台湾问题，是邓小平在统一问题上最先考虑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需要，香港问题的解决走在了前面。但邓小平一直在谋划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仅几个月后， 1985 年 1 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代表团时说，“下一步要着手解决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更宽，所谓宽就是台湾可以保留军队，解决台湾问题也不能一厢情愿。大陆的利益、台湾的利益以及同台湾有关的外国资本的利益都要考虑到，否则就搞不成。”[①]在此之前，他对解决台湾问题就已经有了很具体的设想。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杨力宇教授时指出：“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它“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下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①]邓小平的上述设想和政策，充满着和解的诚意，完全照顾到了台湾方面的现实状况和各方面利益，是通情达理、切实可行的。

1995 年春节前夕，江泽民以党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身份，根据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战略思想和近几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其主要内容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对于台湾与外国发展民间性质经济文化关系不持异议；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努力实现和平统一；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中华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的一切正当权益；两岸领导人可以在大陆或台湾共商国是。这八条原则意见，进一步具体阐释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精神实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打破现阶段两岸政治僵局、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建设性主张，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坚持原则、求同存异的立场。江泽民的重要讲话受到了海峡两岸人民的普遍关注和热烈欢迎。

随着 1997 年的临近,如何处理未来的港台关系成了港台两地各界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也颇使台湾岛内居民感到不安和疑虑。1995 年 6 月 22 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政府处理“九七”后香港涉台问题的七项基本原则和政

[①] 《人民日报》1985 年 1 月 20 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0 页。

策。这七项原则切实尊重了香港同胞和台湾同胞的愿望和利益，体现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思想理论原则，是非常务实和宽容的。对台湾而言，时至今日，香港已取代了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区。据台湾官方统计，1994 年台湾对香港的出口值达 212 亿美元。 1995 年超过 260 亿美元，增长了 30%左右，台湾对港出口贸易总额比例超过美国。到 1995 年，台工商界在港的投资达 40 亿美元，设立的公司有 2000 余家。香港还是台湾游客最热门的去处，仅 1994 年赴港的台湾旅客就多达 235 万人次。七项原则充分尊重了上述这些实际情况，考虑到了台湾同胞及香港同胞的利益，提出台湾现有在港机构和人员可继续留存，两地经贸不变、航路照旧等政策原则，从而为“九七”后的港台民间交流和经贸活动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可靠的保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和平统一祖国的诚意和“一国两制”方针的宽容性和灵活性。

目前，台湾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台独分子，执政当局中的某些人还有支持台独倾向，但是台湾最终回到祖国怀抱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也是台湾很多爱国政治家的共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台独是没有前途的，也是做不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许多国际政治分析家都认为。台湾和大陆的统一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且也不会拖得太久，因为拖下去对台湾的发展没有任何益处。

台湾在近 40 年来经济发展较快。从 60 年代至 80 年代，平均经济增长率都在 8%以上， 70 年代达 8.9%。主要经济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进出口贸易总值、外汇储备，在这期间都有很大的增长和提高，已接近或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到 1994 年、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 11 064 美元、排在世界第 15 位，进出口贸易规模是世界第 12 位，特别是外汇储备，已达 1000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现在位居世界第三）。台湾经济同大陆经济也有很强的互补性，将来统一了，更便于发展两岸的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在互惠互利中取得共同发展。

现在国外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未来实现大一统后的“中国”的热潮。一些学者认为，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国将在亚洲和世界发挥更大的影响。中国大陆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八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 1995 年达到 57 600 亿人民币元，提前实现了原定 2000 年国民主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1996 年 3 月 17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提出：到 2000 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 201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将有较大提高，国际竞争力将大力增强，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大台阶，从而为下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些西方学者估计，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到下世纪中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如果再加上台湾和香港这两个“小龙”以及澳门的经济力量，中国的经济实力将更令人注目。仅拿外汇储备来说，目前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额已逾 1000 忆美元，台湾有 900 多亿美元，香港有 500 多亿美元；而现今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日本是 1800 亿美元，排名第二

的美国是 1400 多亿美元。现在世界外汇储备前五名排名顺序是日本、美国、台湾、中国大陆、德国。有的外国人说应该是中国第一，因为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外汇储备加到一起就是 2200 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完全统一后，台港澳地区同大陆的联系会更加密切，双方的优势会得到进一步发挥。经济的互补性会更加增强。大陆有着众多的人口和丰富资源，而且改革开放已经走上不归之路；台湾是外汇储备大户，资金雄厚；香港则以人均产值高达 24 000 美元而雄踞全球第八大贸易地区和第 11 大服务出口区的地位。这样的经济实力，如得相辅相成，会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起到积极作用。中国的经济会有一个更加突飞猛进的发展。有的学者提出，将来在综合国力上能超过美国的最有潜力的国家就是中国。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一些政客才把中国视为眼中钉，提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中国。但这也从反面说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正日益提高，中国龙汗始腾飞于世界。由于中国对内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对外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少数西方政客所鼓噪的对中国实行“遏制”的政策是不会奏效的，而且是不会得到多数西方国家的响应，最后只能是“欲害人者先害己”。

总而言之， 1997 年香港的回归，无论对香港本身还是对整个中国都将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它将给已经开始腾飞的中华巨龙提供一个巨大的推动力，使之飞得更高更远。

愿明天的世界更美好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国际意义在于它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提供了一个新模式，邓小平说过：现在“国际上‘一分为二，的情况很多，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北方和南方……解决的出路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留下来的问题就是和平竞赛，让人民去最终选择，不是打仗的选择，而是和平的选择。”[①]

“一国两制”构想更深远的意义是为解决国际争端找到了一个新办法，邓小平指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①]他还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指‘一国两制’——笔者注）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②]回顾历史，可以看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些国际争端确实成了引起局部战争或较大规模战争的爆发点。朝鲜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英阿马岛战争……。每一次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都给战

[①] 《瞭望》周刊 1985 年第 5 期。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8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9 页。

争双方及其他有关各方造成巨大损失，并且危及世界和平。历史经验证明，和解、谈判、求同存异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好办法。波黑冲突的解决、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都显示了和平谈判的威力。未来人们崇拜的偶像将会是谈判能手。

在用和解的方式解决国家间矛盾和冲突方面，中国人民不仅在理论上勇于探索，而且在实践上也做出了表率。香港问题的解决就是最好的例证，正如钱其琛副总理所评价的：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举世瞩目。1997 年 6 月 30 日午夜庄重的政权交接仪式应由中英双方共同举行。要向世界表明历史遗留问题是可以通过和平谈判得到解决的。也向世界表明“ 一国两制 ”的伟大构想是能够成为现实的。[③]

1996 年 4 月 26 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和塔吉克斯但总统拉赫莫诺夫在上海展览中心签署了关于五国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是亚大地区第一份多国双边政治军事协定。协定内容包括：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通报边境 100 公里纵深地区的重大军事活动情况；相互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有着长达 7000 多公里的边界线，这一协议的签署，使中国东北和西北部边境处于和平、安全状态。曾几何时，这些地区曾雄兵对峙，剑拔写张，几乎成为爆发点。人们普遍认为，这份协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文件，它将对亚大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深远的影响。五国元首在签字仪式结束后向记秆发表讲话时指出：这一文件说明五国人民希望与自己的邻国相互信任、友好相处，它将会为五国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持续和卓有成效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经过漫长谈判道路而签署的这一协定说明，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和平谈判具有强大生命力。江泽民主席说：协定的签署是“ 我们决心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这一共同愿望的生动体现。 ”“ 我们五国部面临着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繁重任务。保持良好的周边环境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 签署这一协定，对亚大地区各国之间增进相互信任、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启示、探索和创举。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称：这个协定是一个划时代的政治、军事文件，它在亚大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承担了非常具体的政治、军事义务。吉尔吉斯斯但总统阿卡耶夫说：协定的签署体现了中国一句古老民谚：“ 人心齐、泰山移 ”。他认为协定是史无前例的，这不仅对亚大地区，而且对世界各国都将是一个先例和榜样。①

在如何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上，邓小平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 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 ”。 1984 年 2 月 22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在谈到“ 一国两制 ”是解决国际争端、稳定世界局势的一种方式后，又说：“ 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 ”[①]同年 10 月 22 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对这个问题阐述得更加具体。他说，

[③] 《人民日报》1996 年 5 月 26 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9 页。

好多国际争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津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②]世界上的许多冲突、战争都是由领土争端引发的，为了寸土必争、寸土不让，往往是诉诸武力，结果是民族、国家间加深积怨。邓小平的“共同开发”的设想为和平解决这些争端提供了一个新办法。

“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和平共处”……这些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新思路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他热爱人类、热爱和平的高尚人格。更体现了他实事求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精神。如果世界各国的政治家都能育这样的胸怀、人格精神、那么 21 世纪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辉煌！

“一国两制”——香港回归——祖国统一——世界和平，这就是邓小平为未来中国和世界设计的发展方程式，是他描绘的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愿的宏伟蓝图。而实现这个蓝图的第一步就是香港问题的解决，邓小平的名字与香港已经历史性地连在了一起。

让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们——携起手来，奋发图强，共同迎接祖国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参考书目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马克思恩洛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一国两制与台湾前途》，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0 年版。《邓小平的思维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一国两制概沦》.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香港问题文件选辑》，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20 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麒麟书业有限公司 1993 年版。

《外国领导人访华讲话选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87—88 页。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香港概论》，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4 年版。

《英国撤退前的香港》，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 3 卷（1966—1976），红旗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日志》，济南出版社 1992 年版。《香江岁月》，奔马出版社 1985 年版。《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年版。《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广角镜出版社 1984 年版。

《邓小平谋略》，红旗出版社 1996 年版。

《香港大事记》，北京出版社 1988 年版。

《香港 1997》，开明出版社 1993 年版。

《秘密大营救》，北京出版社 1986 年版。

《港九大队史》，广州出版社 1989 年版。

《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州出版社 1986 年版。《东江纵队史》，广州出版社 1985 年版。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 年版。《中美关系文件汇编》，香港《七十年代》1977 年版。《唐宁街岁月》， 1993 年伦敦出版。

《在华经历》， 1994 年伦敦出版。

《香港的终结：帝国退却的秘密外交》， 1993 年伦敦出版。